  华人移民欧洲超过一个世纪，欧洲现今的华人人口已超过200万。这庞大的数字并非一蹴而就，其背后蕴含着华人移民的辛酸血泪、艰苦创业，以及苦尽甘来的故事。

       华人移民欧洲始于17世纪，而浙江青田人可说是移民的先驱。20世纪以后的移民，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3万多名华工到欧洲提供战争后勤服务，战后，部分人留了下来；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印度支那政治发生巨变，排华浪潮汹涌而来，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协调下，西方国家基于人道主义，相继收留了百万名冒死逃命的华人；第三阶段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所掀起的出国浪潮。

       经过3个阶段的移民热潮，华人移民大幅增长，并且遍布整个欧洲。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华人偏爱西欧，其中法国及英国拥有最多华人移民。前者的华人人数达60万人，后者则有40万人。

       西欧移民呈饱和状态后，华人辗转涌入南欧各国。南欧的移民门槛低，加上多次实行大赦，华人借此获得了合法居留身份。此后，家属以家庭团聚为由，通过“亲戚带亲戚”的方式，一个个、一户户地移居南欧，华人移民人口又翻了几番。由于南欧在1990年代才开始迎来大批华人移民，因此当地华人社会的结构也趋向年轻化。

       至于中欧以及东欧，随着1988年“中匈互免签证协议”出台，华人立刻把目标锁定为匈牙利。此地的居留权容易申请，加上做生意有赚头，许多华人都带着理想和抱负前往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华人从练摊做起，之后逐渐占据批发及零售贸易市场，同时也催生了不少亿万富翁。然而，部分国家存在着严重的贪腐问题，机遇虽多，钱也好赚，但华人总是无法舒心地生活。

       北欧冬长夏短，对外来移民严格控制，华人人数较少。华人老移民辗转从西欧到来，主要仰赖餐饮业为生；新移民则以留学生、专业人士为主。北欧多为福利国家，经济竞争力名列前茅，因此吸引了大量有胆识的华人前去逐梦。长达半年的天寒地冻，四周一片白雪皑皑，生活或许是沉闷了些，但其完善的福利制度，留住了华人的脚步。

       餐饮、皮革及纺织是早期欧洲华人的主业，批发及进出口贸易则在1990年代异军突起，生意一片红火。华人累积资金后，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并开始涉足外贸、房地产、旅游、文化等领域，经济发展百花齐放。另一方面，越来越多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欧洲华人，也当起律师、科研人员、会计师及医生等专业人士。

       欧洲繁荣、安定，让华人对生活更具安全感。迈向美好生活的道路并不崎岖，只要肯努力付出，就会有所回报。在百年的发展长河里，华人凭着坚韧的毅力、高昂的斗志，努力不懈地奋斗着，从早期的劳工阶层跃升为中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生活大有改善，教育程度也逐渐提高，无论是经济或文化方面，都交出可圈可点的表现。如今，欧洲华人社会变得更成熟，并形成一股不可漠视的力量，但要真正融入当地社会，仍需一段时日。

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国土西自芬兰、东抵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海岸线从北冰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

      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曾经在1917年，与周边国家共同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为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1991年，苏联解体，不但改变了历史，也影响了众多国家和无数人的命运。

      国家的巨变和动荡，使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骤然下降；但也因为混乱，衍生了许多的机会，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淘金者勇闯俄罗斯，上演着如电影般惊险刺激的人生旅程。这其中也包括大批华人。

      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彼此之间的关系每发生一次变化，都对华人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俄罗斯是华人最早到达的欧洲国家。

      15世纪或更早以前，就已有华人移居到西伯利亚。在绵长的中俄边界上，中国的牧人、猎人、渔夫以及采掘人参者便经常来来往往，自由活动。清朝初期，莫斯科附近甚至出现过一座“中国城”以供华裔交易。城头有枪眼、雉堞、街市整齐而划一。18世纪，莫斯科出现了俄国史上第一所汉满语学校，任教者是来自清朝的满族人周戈。他后来在俄国生活了20多年，并皈依东正教，娶妻终老。

      从17世纪到19世纪，清政府被迫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俄国。而当地居民则继续留居在俄国的领土，以农业、畜牧业、渔业及手工业等为生。此外，19世纪中叶，中国西北一批反抗清政府的回族起义军被镇压之后，余部集体逃亡至当时已并入俄国版图的地区，并被当地人称为东干人。

      同时，中国商人仍旧保持着与俄罗斯的贸易，经海路及陆路到达俄罗斯远东地区，继而深入到俄罗斯中部和西部做买卖。他们在莫斯科、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托母斯克（Tomsk）、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等数十座较大的城市都设有商行，销售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及各种手工艺品，再购买俄国的金沙、呢绒、皮货、毛毯等，带回中国贩卖。根据史料记载，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山西晋商，交易手段相当灵活，生意也做得十分红火。另两大商团是在俄罗斯各地贩卖石器的浙江青田帮，和以纸花而闻名的湖北天门帮。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劳工短缺，沙俄招募了一大批主要来自中国山东及东北等地的华工。他们被运送到俄国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从事修筑铁路与垦荒工作。1891年开始兴建，1916年全线贯通，近万公里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可说是数十万华工以血汗和生命铺就而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在中国招募劳工人数达15万，大部分被分派到全国各地的码头、工厂、矿井、伐木场和荒地充当苦力，还有万余人则被送往前线挖战壕、抬担架、运弹药。

      当时在远东的中国商人，以东帮（山东）、南帮（江浙）、北帮（河北、东三省）和广帮（广东）为主，经营商品贩运、建筑、酒馆、洗衣铺和杂货铺等生意。实际上，华人和俄国人当时已过着杂居生活，几乎在每个村子里都能看到华人，有一些则和俄国人通婚，但不入俄籍。尤其在俄罗斯境内的黑龙江流域，到处都可以见到华人的商品，俄国人住的是华人盖的红砖房子，用的是华人工匠生产的器具，喝的是华人销售的茶叶，吃的是华人种植的蔬菜和粮食，家庭所需的一切日用品都得到华人所开的店铺去购买，这些店铺几乎遍布大街小巷。

      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大批华工加入创立、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武装部队，并且组织了华人的连、营、团部队，因而涌现许多华人英雄。在列宁的卫队里，就有70多名华人。据当时的一名游击队老战士回忆说，在远东没有一支游击队里是没有华人的。在莫斯科红场的俄罗斯国家一级公墓中，安葬着两位曾为了十月革命而献身的中国革命者的尸骨，纪念碑上还镌刻着“张，死于1917年”、“王，死于1917年”的字样。他们的名字不详、籍贯不详、出身不详，是所有的墓碑中文字记载最少的。俄罗斯人把他们安葬在列宁纪念馆旁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人的墓碑旁边，足以窥见华人战士在前苏联历史上的地位。他们代表着无数为了俄国革命事业献身的华人烈士。

      十月革命的成功，吸引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来到苏联留学，寻求革命真理。许多名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包括邓小平和蒋经国。蒋经国还娶了位苏联太太，即日后的蒋方良。这批学生中，也有的与家属加入苏联国籍，留在当地生活。

       1949年，中国和前苏联建交，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贸易与技术交流，居留苏联的华人在友好的环境中安居乐业。中国派出大批优秀的学生到苏联学习，他们中大多数学成后归国，也有的因婚恋嫁娶而留在苏联，在文教、卫生领域工作。

       但好景不长，不久后中苏两国的关系恶化，旅苏华人的人数因此骤减。不少人被迫离开大城市，到偏远地区去谋生，有的人则尽量淡化本身的中国背景，入苏籍、说俄语，和中国亲人完全断绝了关系。如今，在俄罗斯华人社会中的老华人已寥寥可数。

       华人在俄罗斯沉寂了近30年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中俄关系的改善，华人新移民于20世纪90年代初又开始涌入俄罗斯。他们有的从中国入境，有的则从匈牙利等国回流。

* *在俄罗斯有一个以“中国城”命名的地铁站。伊凡大帝的母亲叶莲娜·格林斯卡娅为了纪念自己的远祖，即蒙古金帐汗国的风云人物马迈，于是在进行莫斯科城市建设之际，把城墙和克里姆林之间的地域命名为“中国城”，并且建有中国风格的城墙以及塔楼。在二战中，“中国城”毁坏殆尽，如今就只剩下这一个地名来供后人凭吊。*
* 如今的。“中国城”仅是一个地铁站名。

 目前在俄罗斯有20余万华人，一般都持有工作签证，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Irkutsk）、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乌兰乌德（Ulan-Ude）、海参崴（Vladivostok）等地，其中以莫斯科华人数量最多。  
        俄罗斯华人有相当数量来自中国东北黑龙江、辽宁、吉林，以及北京、福建、山东和浙江等省市，极少部分来自台湾。城市以华商为主，乡村的华人则以劳工居多，逐步构筑相对稳定的华人社会。  
        他们追逐着发财的美梦，但多数人依然感觉生活不够舒心和安稳。华人也知道融入当地的重要，可语言的难关还是把他们紧紧地局限于华人的圈子中，只好寄望下一代学好俄语，最好也能兼顾华语。中文教育刚起步，中文报纸已办得有声有色，现在共有6家，为华商提供各种实用的信息。  
        华人是近十几年突然涌入的俄罗斯新群体，人口流动率高。俄罗斯辽阔的土地、富饶的资源，给雄心万丈的华人带来光明的前景。

    如今俄罗斯华人社会的主流，是一批被称为“倒爷”的华商。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带着不同的故事来到这片充满机会的土地，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赚钱。在俄罗斯大起大落的时代背景下，华商们的生活犹如一部部紧张刺激的动作片，情节高潮迭起：暴富、破产、经济危机、刀枪、欺骗、死亡，就在身边上演着，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情在这里都有可能发生。

        1990年代，俄罗斯百姓的物资极为匮乏，于是华人倒爷们身穿好几件皮夹克，把衣服、鞋子、电器、轻工日用品等货物，大包小包地拎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一出境，每停一站就开始在车上车下兜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很多人还没到达莫斯科就把东西卖完了，即使还有未出手的商品，到了当地市场也可以卖出天价。然后，倒爷们再买进在中国能卖上好价钱的油画、乐器、俄产望远镜等，回到中国贩卖。如此来回一趟，费时两三个月，至少可以赚上几千美元。

   随着流动商贩变得更有组织、规模，倒卖的商品从一包一包变成一车皮一车皮，商品种类也在增多。中国大陆商人主要以羽绒服、纺织品、鞋子、轻工业品占据市场，香港、台湾的商人则经营中高档服装和电脑等科技产品。很多华商都拥有自己的贸易公司，而那时最夸张的一宗民间交易是，一名中国重庆的倒爷用几百车皮的日用品，换来了4架俄罗斯飞机。

        不过，这类一夜暴富的故事，随着俄罗斯社会秩序的改善和华商的增多，与“倒爷”这个称呼一起成为不可能再现的传奇。

        更多的华商在俄罗斯各地的百多个市场中，如勤劳的蚂蚁一样运货、上货、卖货，从住家到市场，再从市场到住家，两点一线地赚着辛苦钱。有些华商在莫斯科已有几年光景，却连红场也没去过。原名为依兹迈伊洛沃大市场（Izmailovo Market）,并且曾经繁荣一时的著名华人市场“一只蚂蚁”，就极为巧合而形象地概括了华商在俄罗斯克勤克俭的境况。

        在市场做生意十分艰苦。每天一打开集装箱，摆上一张桌子做柜台，就开始营业。人手实在不够才会请人，不然就自己一个人撑着。集装箱上下层都摆满货物，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市场没有暖气，冬天下雪了，只好在仅有一层塑料顶棚的卖货区域冻着，有时甚至在冰天雪地里边卖货边吃午餐。

        除此之外，当地海关的灰色清关、警察的无理搜查，以及治安的败坏，随时都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不少人因为货物被海关扣留或者被警察查封，而破产回国。总的来说，在这里经商的风险很大，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如果一切顺利，每年赚取几十万美元的利润并不成问题。

        数量庞大的华商，是俄罗斯华人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推手，只要这里的百姓有需求，华商就不会消失，而这也造就了华商极强的耐力和抗击力。

        不少华商都曾经历俄罗斯的两次经济危机。1993年，这里的物价上涨了1000倍。政府规定3天内到银行将老卢布换成新卢布，过期作废，而且有一定的数量限制。很多华商由于语言不通，加上没有合法的经商身份、没有上税，只好眼睁睁看着辛苦赚来的一箱箱钞票变成废纸。有的听说在远东还可以使用老卢布，就冒险背着一麻袋的钱坐火车过去换钱。而在1998年，物价又涨了4倍。两次经济危机，使很多华商从此一蹶不振。

        2007年4月开始，俄罗斯政府规定，外国人不可以在露天市场零售商品。这一规定吓走了一批胆小的华商，但绝大部分华商还是坚持下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以注册公司、雇用当地人、与当地人合伙经营等方式，继续经营自己的生意。

        随着华商的增加，一些由华人经营的宾馆、饭店开始设立，专门针对华人的服务业也在俄罗斯出现，例如房屋中介、法律中介、办理驾照中介、翻译、中医等，并容纳了一部分华人打工族。

   这里的华人私人公司都不敢张扬，设在写字楼内的办公室，挂上小小的牌子，不让人看出是公司，有些还会聘请配枪的保安在门外看守。而做为老板的，许多事都要亲力亲为。如果在餐厅里看到一个人既是司机，又是采购，有时又在收银，说不定他就是老板。

        俄罗斯中餐厅众多，高中低档齐全，除了面向当地顾客，还有专门为华人游客服务的餐厅。当地物价随季节的变化而起落，一箱鸡蛋的价格冬夏可以相差4倍，因此很多中餐厅都是季节性的，通常只选在旅游旺季营业。在俄罗斯，粤菜和东北菜都很受欢迎，一餐的人均消费要30到50美元，而一名普通餐厅服务人员的月薪，也达到500美元以上。不过，由于中餐厅数量多，同行间竞争激烈，开张与倒闭往往只是瞬间的事情。

  市场上的华商大多不作久居之计，一般拼上两三年，赚足了钱就打道回府。不过，有些人因为生意、机遇等因素，一年又一年地呆了下去，甚至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对他们来说，在俄罗斯的发展已经是长期规划的事业，而并非只是追求短期利润。

        这些华人老板通常都十分忙碌，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不停地与生意伙伴开会、接洽。他们多会支付比当地公司高的薪水，因此吸引到当地员工的加入。如果不是特意提到，已经不会有人意识到所在的是华人的公司。

        如今，赤手空拳拿着几千美元闯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俄罗斯正处于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劳动力，这里还提供投资、创业的机遇。

        对于有野心的华商而言，俄罗斯仍旧是一块可以创造大量财富的土地。只要有实力，沉得住气，坚持上几年，融入当地社会，这里的商机是无穷的。华人大企业进驻俄罗斯的同时，也开始迎来越来越多高素质的华人。从1989年第一批华人留学生到来至今，很多年轻专业的市场、法律与技术人员，已经在社会上滚打多年，逐步加强俄罗斯华人社会的实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也出现愈来愈多的华工。由于这些地区的青壮年劳动人口大量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俄罗斯西部地区，因此许多外籍劳工被输入该地，以补充流失的劳力。

        据统计，来自中国乡村的华人数量已高居外来劳动力之首。他们大部分拥有合法的身份，技术好、上手快、效率高，且吃苦耐劳。在俄罗斯人眼里，华人沉默寡言，那股夜以继日工作的劲头，令他们既佩服又费解。

        当地的一名俄罗斯老人说，自己刚起床，就看到住宅旁边搞建筑的华工已开始工作，晚上天都黑了，他们却还没收工；当地有座大楼，俄罗斯人盖了17年都还没盖完，而中国工人一周就能盖起一层楼，令人惊讶。

        这些华人大多与当地妇女通婚。但大部分俄罗斯人承认，华人劳务人员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据俄罗斯研究机构的一项统计，常住远东地区的华人只占俄远东居民总数的3%，但却给当地创造了5%的国内生产总值。

* *以前中国北京管做小买卖的人叫“倒爷”，他们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取高盈利。俄罗斯华人口中的“倒爷”也由此而来。*

大多数华人到俄罗斯的目的都很单纯，即为了做生意赚钱，而不注重生活。

        这里的生活水平很高，但是华人的收入，一般还是能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然而，他们并不认为在俄罗斯生活得舒适，这主要是因为精神上的压抑。他们说，不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一个人背井离乡，出来闯荡，既没有家庭的温暖，也无处娱乐，每天还要提防警察和光头党的骚扰，以及承担生意上随时被扣货的风险。

        可以说，俄罗斯的警察直接影响当地一部分华人的生活方式。基于制度的不完善，俄罗斯警察的收入一般不高，而很多华人因语言不通，只好破财消灾，导致警察经常无故以搜查身份为由，向华人勒索。因此，华人晚上通常不会随处走动，若在市场做生意，除了市场周边，没必要的话，肯定不会主动到其他地方。当地的一名华商说：“好好地走在街上，突然被警察带到警察局，这样的地方怎样叫人喜欢？”

        此外，专门针对外族人的俄罗斯光头党组织，每到四月就会比较猖狂，使得华人不敢出门，大学在此期间甚至允许外国学生不必上学。胆子较小的华商也会在家里避一避，宁可少赚一点钱，也要保证人身安全。虽然俄罗斯的治安情况逐年好转，但是仍有出行的不便，让华人感觉生活十分郁闷，很不自由。

        华人在俄罗斯生活的境遇，跟当地M型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所谓M型社会，即上层社会的富商和下层社会的中低收入者多，而中产阶级少。

        这一点仅从语言就可以看到，虽然在俄罗斯懂俄语的华人不少，但是真正能系统掌握的不到十分之一。由于没有时间，加上生意的不稳定，大部分做生意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学习当地语言，只要掌握一些简单的市场词汇，足以应付生活和买卖就行了。如果参加当地的俄语语言班，一个月学费要几百美元，一周才一节课，很多华人觉得这个投资并不值得。

        而生活较为优渥的华商，多能说流利的俄语、英语。在他们看来，华人在俄罗斯受到欺负，也有自身的原因。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亚洲、欧洲人口各占一半，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外国人和当地人是平等的。如果努力融入当地社会，按照规定办理各种手续、交税，平等地与人交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和民族宗教，以国际心态和思维处事，自然会得到俄罗斯人的尊重。

        俄罗斯的华商们曾经因为安全问题，而集中居住在由警卫看管的宿舍、公寓或廉价宾馆里，这些地方被称作唐人楼。早期的唐人楼是个与当地社会隔绝的独立王国，楼道里堆满一包包的货品，并不时传来中式菜肴特有的煎炒烹炸的味道。这里服务周全，包括翻译、中餐、换钱、理发、美容、中医、出租车、搬运、旅游等，甚至设有小型赌场，可说一应俱全。

        随着当地物价的上涨和旧宿舍楼的拆除，华人渐渐分散开来，大部分都租下当地的民宅居住。莫斯科一间条件尚好的套间公寓，每月租金要1000美元以上。华人在当地也可以购买房屋，但是价格昂贵，即使在莫斯科远离市中心的地段，每平方公尺都至少要4000美元以上，因此买房的华人并不是很多。

如今，在莫斯科还剩下半幢唐人楼。这是一座5层楼的学生宿舍，其中一层被华人租下，再转租给做生意的华商们。唐人楼的条件算不上舒适，一个20平方公尺的房间，可以住四五个人，每人只需付不到100美元的租金，但须共用卫生间和浴室。这里生活方便，不但有华人的理发店、餐厅、卫星电视，还有每天专门开往大市场的华人出租车服务，因此这简陋的宿舍在华商中十分抢手，很多人想住都住不到。

        从物质生活来讲，华人的经济状况是不错的，想吃什么都可以买到，各种消费档次的商品都有。

        做生意时，几美元就能在大市场里的中式快餐厅解决一餐。若自己做饭的话，在菜市场、华人调料店也可以配齐中餐的基本材料。一辆俄罗斯产的二手汽车，售价2000至3000美元，油价又便宜，所以华商们想要拥有自己的私家车并不困难。唯一让华人不习惯的是，在这里，“拉达跑得比奔驰快”。原来当地人不讲排场，性格粗犷，无论什么车，速度都飞快，这一豪放的开车习惯，常让华人无奈地与俄国人飙一把车。

        大部分华商每日的生活从清晨五六点开始，到市场做生意，通常下午三四点就下班回家。他们的娱乐活动主要就是打麻将、上网、看光碟和收看卫星电视，而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大多是围绕着生意和家庭的话题。但也有一小部分华人陶醉于当地的文化，比如高水准的音乐会、芭蕾舞表演，都让他们感受到俄罗斯生活惬意的一面。他们也习惯了这里清洁安静的环境，夏天烤肉、钓鱼，冬天滑雪的生活，让他们不想离开这个国度。

 而在与当地人通婚的华人家庭里，生活又是另一番景象。当地人并不讲究消费，一般居住的房屋都不会过大，但很温馨舒适。通常在这样的跨国家庭，俄罗斯大面包配中式炒菜和俄国茶点掺杂着吃的情况非常普遍，家里的布置也是中式饰品和东正教的神像一起摆放。

  在俄罗斯，华人无论是打工，还是开公司，都要与当地政府部门打交道，而这也是最让华人头痛的。比方说，要注册一间公司，即使是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官员，在不同的时间，所要求呈交的文件可能有所不同，很多这次说好的事情，下次见面时就完全变了样。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适应了当地的人事关系，办理各种事情，才慢慢变得比较顺利。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些当地的华人社团也开始意识到，仅仅一个华人被认同是不足够的，在俄罗斯树立起华人的整体形象，让当地社会从一个正面和积极的视角，认识、接受、承认生活在当地的华人，更为重要。

        很多人都说，俄罗斯的华人社团林林总总、背景复杂、黑白难辨，但是其中并不乏一些影响力较大，并有意识为族群谋福利的华人团体。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如为俄罗斯的华人留学生建立青年创业中心、组织华人参与俄罗斯政府主办的民族演出、举办华人文化节、组织各种华人的体育娱乐比赛等，都是社团成员义务完成的，而他们都很乐意为此出钱出力。其实这些华人社团的工作人员都有着自己的生意，工作紧张、压力大，但是出于朴实的感情，还是愿意为华人社会尽一分力量。

当地华人这样评价自己的社团：“与欧美和东南亚的华人社团相比，我们还很初级，但是从华人到俄罗斯的时间、人数和所处环境来看，能有现在的成绩，已经是很不错了。”

以经济实力和社会活动能力来看，普通小商人组织或参与社团活动，和一些成功的华商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而宗教团体对这些生意风险高、心理压力大的异乡商人来说，似乎更容易亲近。

        俄罗斯华人有宗教信仰的不多，数量较可观的首推华人基督教信徒。教会成员主要是商人和学生，大部分都是到了俄罗斯后才加入的。教会的活动很丰富，经常练歌、聚会、组织晚会、郊游，为华人在俄罗斯的枯燥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更为重要的是，在俄罗斯艰苦的生活环境下，华人更需要借宗教的力量，来慰藉自己的心灵。

他们做礼拜的场地很简陋，但即使在冬天没有暖气的房间里，来参加的人还是很多。每次做礼拜，都会有不少新来的华人到教会请求帮助，也会有老信徒倾诉自己的艰辛，不少人经常在祷告和诵歌时，忍不住流下眼泪。

        每年1月7日的东正教圣诞节，是俄罗斯最热闹的时候，当地人通常会有十天的假日。此时，除了小部分华人企业或政府官员受邀参加当地的庆典外，大部分华人还是如常过着自己的生活，市场上的华商依然照常营业。他们说：“顾客都是来自各国的商人，俄罗斯的节日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这并不表示华商冷漠。实际上，即使是华人最重视的春节，华商也不放假，而只是与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观赏中国的春节晚会，第二天又照常开工。其他像中秋、端午这样的传统华人节日，大家经常会因为忙碌的工作而忘记。反而是结婚、生子，或者公司开业，俄罗斯华人都会摆酒请客，庆祝一番。稍具规模的还会聘请主持人，有的甚至还请来音乐学院的华人学生表演节目，场面十分热闹。

* *在莫斯科十分著名的新圣女公墓，安葬着中国革命家王明。这座华人面孔的雕塑，在那里颇为醒目，而其碑前也总是摆放着悼念的鲜花。*

华文教育在俄罗斯的公立学校和私立语言学校中都已开始起步。

        公立学校中最为著名的是莫斯科的1948学校，它的校长打出“只要学习华语，就有面包”的口号，吸引了很多当地学生。学校里都是俄罗斯教师，从一年级就开设华文课，五年级再设中国国情课，高年级开始上中国旅游课、华俄文翻译基础课。

        而私立学校，多半由华人创办并教授。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既教授华文，也传授中华文化，如书法、舞蹈、京剧等，但由于反应冷淡，不久就关闭了。目前在圣彼得堡有一所中文语言学校，教授华语的同时，还开办书法、绘画、太极、华族乐器等课程。

        虽然这些学校有助于弘扬中华文化，但是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是俄罗斯孩子。华人的第二代，因为父母们忙于工作，或者本身课业繁重，无暇到学校学习华语。他们多是在家接受父母的语言环境熏陶。

        华人家长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中华民族传统的望子成龙思想到俄罗斯也一样延续着。家长多把孩子送到当地的英语学校，希望可以同时学习华语、俄语、英语3种语言。由于俄罗斯具有绝佳的艺术氛围，很多家长又让孩子学习一两种艺术特长。一名第二代华人在大学毕业后，凭借着自己的三语优势，从事中俄贸易的高级翻译，月薪可以达到4000美元。

        更多的俄罗斯华人后代，在学校和同学说俄语，回家和父母说华语。但是明显地，俄语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一语言，母语华语则成了第二语言，很多时候孩子甚至无法用华语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

        家长们很着急，认为“作为华人不懂华语是一种悲哀”。于是，有的家长聚在一起，为孩子请来华文老师做家庭辅导。这种家庭辅导式的教学，多采用中国的小学教材，有的还教授《三字经》。由于没有考试的压力、老师可以从品德、礼仪、行为举止、说话语气等细微的方面对孩子进行辅导。华人家长和老师都认为，一些道理虽然孩子目前还无法理解，但将来待人处世也许派得上用场。

   俄罗斯的华文媒体十分丰富，十几年间先后发行过十几种华文报纸，其中两家还设有网站。曾经有人筹划与俄罗斯媒体合办华人电视台，但最后没有成功。目前在市场上发行的华文报纸有《路讯参考》、《华俄时报》、《捷通时讯》、《环球日报》、《侨报》以及《莫斯科华人报》。

        华文报多在华人聚集的市场发行，每份售价不到一美元。由于阅读对象多是在俄罗斯经商的华商，因此报纸除了报道中国、俄国和当地华人的新闻外，最重要的就是发布经济资讯，让读者获取实用的信息。

        俄罗斯两份最大的华文报是《路讯参考》和《华俄时报》，日发行量上千份。为了节省费用，这两份报纸都在中国采编稿件，排版完成才发到俄罗斯整理、印刷，再交由俄罗斯专员负责广告和发行，分工明确。报社的人员都是年轻人，活力十足。

        其他报社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职员一般有七八人，通常一人身兼多职。虽然华文报能靠广告获取收入，而且报社还经营其他业务，但是办报的费用依然有限。因此，俄罗斯华文报纸相对简陋，多是一版两栏，用钉书钉装订，有些还是黑白印刷。

        《路讯参考》和《莫斯科华人报》还设有自己的网站，读者主要是俄罗斯当地和打算到俄罗斯的华人，以商人和学生居多。网站除了刊登报纸本身的新闻，还有很多实用的信息，是俄罗斯华人对外的一扇窗口。

    在莫斯科有一支已经有十多年历史的华人足球队。球队平时不参加比赛，只是自娱自乐，最热闹的时候，可以同时出现30多人，要轮着上场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碰到球。他们每周六聚会一次，先大汗淋漓地踢上一场，再撮上一顿中餐，有时还会再打几圈麻将。

        这支小小的球队，是莫斯科华人的缩影。他们中有在市场做生意的，有自己开公司的，有打工一族，还有留学生和华人企业驻俄人员。球队都由男士组成，充满了强烈的硬汉气质。队员们来自大江南北，身上都带着一种闯荡的沧桑感，他们说，这是俄罗斯恶劣的气候和生存环境，赋予他们的特殊烙印。

        目前他们在一所大学的体育场租了一年的场地，租金是每年4000美元，每周可以使用场地一次，每次两个小时。对于向来节俭的华人来说，他们觉得花这笔钱很值得，因为每周这两个小时，是他们最潇洒、自在、痛快的时候。“华人就像大熊猫，性格温顺，适合在山清水秀的地方生活，但是来到这里，各方面的生活条件恶劣，自然活得不潇洒、不舒服了。”而这支成员不固定的球队，可能每次来踢球的人都不同，但重要的不是和谁踢，而是踢球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逃避现实的空间，至少在此时，所有的压力、烦恼可暂时抛诸脑后。

        他们的装备十分齐全，每次踢球，球队的队长也是组织者，都会带来专门分辨队伍的背心、守门员手套。他们也入乡随俗，在踢球时加入了俄罗斯的规矩，每次进球，输的一方所有队员都要站到球门里，让赢的一方每人射门一次，让对方被球打到作为惩罚。站在中间的人，经常被球打到哭笑不得，气氛十分愉快。

通常每次聚会，尽兴散去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十点，然后大家开着自己的二手车，驶入莫斯科的夜晚，又开始了各自忙碌的生活，心中期待着下一场属于自己的球赛。

     华人在俄罗斯的发展，就如同这个国家一样，充满了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变化。从几百年的往来融入，到突如其来的三十年空白，再到现代华商大批涌入，每一次变化，都令当地的华人社会面貌彻底改变。

        现今的俄罗斯华人社会，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渐走向成熟。以做市场批发的华商为基础的俄罗斯华社，不论是服务行业，还是社团、媒体、教育，都已经发展起来。尽管当地的生存环境仍然欠佳，但最重要的是，当地的一部分华人已经改变作客他乡的想法，开始有意识地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社群，并愿意为其尽一分力量。

   白俄罗斯位于东欧平原西部，与俄罗斯、拉脱维亚、波兰、立陶宛以及乌克兰接壤。国家以民族命名，意为纯俄罗斯人。在这片被誉为“万湖之国”的土地上有着许多湖泊，仿佛是为那可悲的历史给白俄罗斯人民带来的不幸而掉下的泪珠。

        从14世纪开始，这里就纷争不息，成为周边各国争夺之地，国土几度被吞并。20多年前，在乌克兰境内、近白俄罗斯边境处的一场震惊全球的切尔诺贝尔核泄漏事件，让白俄罗斯深受其害。这里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严重的辐射破坏，220万人口居住的土地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数百个乡镇人去楼空。

        而如此重污染、经济闭塞的白俄罗斯，依然有2000多名华人在此地生活。全球那么多国家，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并非发财宝地的白俄罗斯？他们在这里如何生活？让人不禁心生好奇。

 在白俄罗斯定居的早期华人，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历史因素的迁徙，另一类是为了到这里留学而来的，这些留学生原先大部分是属于公派性质的，后来则多为自费的留学生。

        早在200多年以前，就已经有零星的华人北上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数度被划入俄罗斯的版图，又曾经是前苏联的一部分，所以有些俄罗斯华人的活动范围曾经扩展到白俄罗斯区域，他们的迁移史已成了俄罗斯早期华人历史的一部分。

        关于白俄罗斯华人移民史的文字记载，较早的是距今约170年以前，清朝道光年间，来自浙江青田的章旦乡以及留庆云等人，抵达了当时还是属于俄罗斯疆域的明斯克，他们起初贩卖石雕，后来又去当矿工。而他们在此处究竟停留了多久，之后又到底去了何方，就已经无从考证了。

        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苏关系水乳交融，在中国政府派往前苏联的留学生当中，有一小部分被分派到明斯克的大学深造。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在那时候，街道上看到华人对他们而言并非什么稀奇的事情。

        中苏关系的恶化，导致大部分留学生撤出白俄罗斯，此后，在白俄罗斯就难得一见华人的身影了。

        在80年代，两国恢复邦交之后，少数公派留学生再次踏上白俄罗斯，但是他们停留的时间通常都很短，未能给当地人留下“华人来了”的深刻印象。

        苏联解体之后，白俄罗斯的教育市场渐渐开放，在1992年前后，至早的一批华人自费留学生来到了明斯克。当地人看见城市里出现了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起初还是会感到有些好奇并友好地多看上几眼。

        在这批留学生当中，多数为河南籍人士，后来，更多河南籍学生的老乡以及朋友们也都到此求学。因为这个偶然的因素，如今在白俄罗斯的华人中，河南人还是占大多数，并不似其他的欧洲国家，以浙江人为主。

        2000年过后，在白俄罗斯的华人留学生越来越多，最终甚至占了当地华人的97%至98%，不过，他们在毕业后，大都会选择回国，只有少数决定留下来，而正是这群留下来的留学生，构成了今日的白俄罗斯华人社会的主体。尽管仅有不到十人与当地人通婚，打工者和个体生意人数量也不多，但是，他们毕竟还是这个尚未成熟的白俄罗斯华人社会的先行者。

* *1986年切尔诺贝尔核泄漏事件之后，曾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的医疗人员进入明斯克，并且实行无偿援助，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中医以及中药材开始为白俄罗斯人民所知。*

     白俄罗斯地广人稀，华人在这里打工薪水低，税率高，语言不通，商机可遇不可求。

        目前生活在白俄罗斯的华人多数是留学生，仅有少量的中国大型企业的工作人员和个体商人。

        为什么会选择这里？面对这个问题，留学生们多是挠挠头，说不清楚：“总之是要出国吧。”相对便宜的生活费和学费，让不少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留学生和商人中，以中国河南籍居多，其次为东北人，大部分集中在首都明斯克一带。另外在东北部的维捷布斯克市（Vitebsk）也有少量留学生。寥寥无几的华商处于创业之初的挣扎阶段，吃力地经营着中餐馆、贸易、旅游等生意。

        因为经济能力的不足，这里的华人社会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没形成规模，媒体、社团也势微力弱，所以还称不上是成形的华人社会。

 有说在独联体国家，个人经商如大浪淘沙，一波波人潮乘风破浪，来势汹汹，能够留下的都会变成巨富。不过，在白俄罗斯倒是风平浪静、华商稀少，只因淘金不易。

        华人天生具有商业头脑，善于发掘商机，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中都能突发奇想，创造财富，但白俄罗斯除了国与国之间大型企业的合作外，并没有吸引太多个体华商的关注。

        不是这里被华人遗忘了，而是白俄罗斯交通不便利，再加上一直以来当地人常说的“白、俄无国界”，让人总有白俄罗斯附属于俄罗斯之感。很多华商都是到俄罗斯、乌克兰经商时，顺路来白俄罗斯转转，有生意就顺带做一做，没有生意便如蜻蜓点水般地匆匆离开。

        白俄罗斯的经济还在转型，市场不活跃，甚至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已默许多年的“灰色清关”，在这里都行不通。当地华人说，在这儿做生意的税率高，甚至占到利润的九成。再加上人口少，消费能力低，没有大宗货物交易，自然不会赚钱。

        客观因素决定了白俄罗斯的个体华商生意难以扩大，只有几间中餐馆断断续续地维持了十多年。中餐馆投资小，面积不大，多为当地留学生毕业后所开设，厨师水平一般，有些还是请留学生来掌勺。家庭式的经营，只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多数餐馆开业不久，就关门大吉了。

        中餐馆几乎都集中在首都明斯克，数量从没超过十家。目前，正常营业的有四五家，除了一家白俄罗斯本地人经营的高档中餐馆外，其余的都是华人经营的中低档餐馆。

        其实当地人都十分喜欢中餐，而且舍得花钱来享用，但是华人经营餐馆并不容易。他们雇佣白俄罗斯员工为服务员或经理，只有厨师是华人。因为餐馆规模都不大，一名厨师已经够用。一般人的观念都以为，在海外，同样的职位，华人的薪水较当地人低；然而在白俄罗斯，华人店主却说，聘用华人的成本太高了。除了每月的薪水，他们还要为员工们提供住处，办理身份，而且这里政府对海外雇员的身份检查得很紧，若有问题，还要找关系疏通，因此雇佣华人员工的费用远比雇佣本地员工高出许多。

        一名普通的中餐厨师月收入在500至700美元不等，每天从上午11点工作到晚上11点，不能放长假，原因很简单：厨师休息，无人掌勺，餐厅就要停业。

        在白俄罗斯吃一顿中餐，在较低档的中餐馆每人平均消费也要15到20美元，高档的约每人35美元。昂贵的价格并没有影响客人的流量，这些中餐馆每天至少都会有几桌客人，当地的中国使馆和大型企业外驻华人也会来捧场。尽管如此，在名目繁多的人工费抵消之下，餐馆收益并不多。

        明斯克有一家只设6张小桌子的“迷你”中餐馆，隐藏在一个招待所的楼内，没有名字，没有招牌，当地人和华人竟然都能摸熟门路，而且餐馆有时还会招揽到小型的酒席生意。餐馆老板来自中国东北，他的白俄罗斯太太懂一些中文，每天都在店里帮忙。

这些中餐馆的老板们，还会兼做其他生意，餐馆只是谋生手段之一。

        长期居住在白俄罗斯的华人，都尝试自己做生意、开公司，不过由于经营者的管理能力、投资成本有限，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用他们自已的话来说：“我们所谓的生意都是小打小闹，很不正式。”

        白俄罗斯的华人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不少都自称是业务代理。经过了解，他们并非真正的代理商，多是为中国厂商和当地人牵线搭桥，从而赚取佣金。代理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家具、汽车配件、MP4等。如果运气好，一个业务可以持续代理一段时间，每月平均收入在五六百美元之间。

        在白俄罗斯的华人中也有成功的生意人，只是其生意主要设在莫斯科、立陶宛，不敢单单押宝在这里，而且多数都不会坚持太久。切尔诺贝尔事件后，对核辐射有治疗作用的海带在当地大有市场。海带中含有的碘，对核辐射后遗症－甲状腺肿大的消除很有帮助。曾有河南籍华商把握这个契机，进了大量海带，以此迅速在白俄罗斯站稳脚跟。遗憾的是，政策和生活环境不如人意，使仅有的几名有实力的华商最终也离开白俄罗斯。如今只靠莫斯科的福建商人，在做当地各大城市大型超市的海带、酱油的供货贸易。

        白俄罗斯还有一间只有两个人经营的华人旅行社，主要做机票业务，偶尔也会接待中国来的旅行团。工作之余，他们在朋友郊区的土地上种了一些白俄罗斯买不到的蔬菜，如白菜、芹菜、茼蒿等，来调节这里枯燥的生活。自耕自用、自给自足之余，也会送一些给其他华人。他们曾经把一些白菜拿到市场上贩卖，很受当地人欢迎，可是华人在市

        场上卖菜没有正式的执照，不被当地政府允许，所以也只卖了一阵子就停止。不过，白俄罗斯人由此开始接受白菜成为食用的蔬菜，如今在当地餐厅，白菜已是常见的配菜。

        此外，外国人在白俄罗斯做零售业，办理市场许可和营业执照十分困难，使这里的华人难以做成大规模的市场零售或批发商。

        其实在明斯克的郊外，有一个占地很大、价格低廉的露天综合大市场——日丹诺维奇市场，商品从蔬菜到服装，再到家用电器、装修材料无所不有。昔日很多人在该处卖狗，因此被华人称作“狗市”。1997年以前，华人在这里自由买卖，商品主要是从中国穿过来的皮夹克，只要交一点费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卖一天，这叫“练摊”。随着当地人需求的提高，华人卖的商品也渐以质量取胜，不再卖劣质的皮夹克。1997年以后，白俄罗斯对外国人“练摊”的证件要求越来越多，华人便陆续撤出。如今在这里完全看不到华人商家的踪迹了，只有几家出售酱油、味精的调料店，是白俄罗斯摊主从华人处上的货。这些货品主要是由华商从中国或俄罗斯运到白俄罗斯，他们只赚取中间利润，自己不在市场上兜售。

        白俄罗斯的华商多是当地的留学生出身，有些即使并不是以留学为目的，也多以留学生身份居住在此。他们受经商环境所限，不能像其他国家的华商一样，仅仅会一些市场用语就可以“练摊”。这里的华人必须掌握较好的俄语与当地人交流才做得成生意。对他们来说，权宜之计就是等待。尽管当地市场刚起步，经济不很活跃，就业困难，但机会还是有的。无论是因通婚而留下的华人，还是因眷恋这里而不想回国的华人，都在等待良机。

华人曾经在此处“练摊”的日丹诺维奇露天市场。

 漫长的蛰伏等待，使华人渴望赚钱，对“钱”更敏感。甚至连在求学的华人留学生们，也比其他国家的华人留学生更具有商业头脑。“看看有没有商机”是他们的口头禅，他们赚起钱来也更灵活、有趣。一些华人留学生就在宿舍里因地制宜，为楼内各国的学生提供送餐上门的盒饭生意，还有人专门卖酱鸡脖子、提供打印服务，一般一个月也有几十美元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有种手到擒来的痛快。俄语较好的学生能接到翻译的工作，运气好的，在政府规定的学生暑期工时间，还可以做导游。学钢琴或英语好的学生，则可以找到舒适的家教工作。

        正因为白俄罗斯的个体华商发展还不成熟，所以蕴藏着很大的发展空间。核辐射和严寒的气候，使这里大部分食物都靠进口。如能占有其中任何一种食品的市场，利润就相当可观。此外，白俄罗斯的治安良好，深夜行走在街道上一般都不会有危险。当地人民对待华人都很友善，媒体的舆论导向友好，白俄罗斯与中国的企业合作也越来越多。目前中国的一些大型企业也都在明斯克设有外驻华人员工。尤其在2006年以后，两国的贸易额经从3年前的两亿美元上升到十亿美元，华人在这里的经商环境有望得到进一步改善。

        留守的华人盼望已久的商机，指日可待。

  华人生活在白俄罗斯，首先要克服的两大难关就是饮食和寂寞。

        白俄罗斯肉多菜少，食物以肉类、乳制品、面包、土豆制品和包菜为主，价格低廉。由于很多蔬果都从国外进口，如西班牙的黄辣椒、摩尔多瓦的西红柿、中亚的水果，因此价钱十分昂贵。华人喜欢吃的芹菜、四季豆、西瓜、香蕉等，价格更是高得令人咋舌。

        不仅如此，有些食物还吃得叫人提心吊胆。当年核泄漏事件所造成的污染，使这里许多地方的水和牛奶，不宜直接饮用。因此一些华人只好开车到邻国购买，顺带捎回蔬菜、蘑菇、水果，既可保证身体健康，又能节省生活开销。

当地市场上最常见的土豆，是白俄罗斯华人用来代替米饭的主食之一。

    异乡的食物虽然吃不惯，但他们还是必须适应。华人就地取材亲自动手，一日三餐中西结合。中式炒菜配意大利面，筷子、刀叉一起使用。即使用完了一顿地道的中餐，也不妨再来点白俄罗斯的蛋糕和茶作为甜品。已经适应了当地饮食习惯的华人觉得，虽然食材单一，但是只要能够接受白俄罗斯的饮食，中餐西餐搭配着来吃，每个月消费100到150美元，也同样可以满足自己的“中国胃口”。

        华人在白俄罗斯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多少也影响了当地的市场。譬如白俄罗斯人不吃的鸡爪子、鸡翅膀尖、鸡脖子、猪蹄、骨头，在华人手里会变成美味佳肴。起初，他们误以为华人经济拮据，便把这些爪子骨头之类的东西低价卖给华人，有时干脆不收钱。后来他们渐渐看出端倪，市场上的鸡爪子、猪蹄、骨头便多了起来，每当华人经过时，白俄罗斯摊主就大声叫卖，有时甚至还把价格抬高。

        食物上可以寻求变通，但面对白俄罗斯漫长的冬季，华人似乎一筹莫展。这里阴郁的冬季长达半年，白天最短的时候，下午3点天色就黯淡下来，异乡生活最难熬的时刻也随之来临。本身朋友就不多的他们不能像当地人一样，成群结队站在路边喝酒，只能呆在家里，与孤灯和寂寞相伴，根本谈不上享受生活。

        虽然如此，如何安排生活，还看个人，其实在这里也可以充实地度过沉闷的冬季。

        一般来说，上网、看光碟、打牌、聚餐是华人排遣寂寞最普遍的娱乐。而对于喜欢艺术的华人来说，这里简直是艺术生活的天堂。歌剧、芭蕾舞、音乐会、演唱会等各种演出活动几乎天天都有，表演水准高超，票价便宜得让人难以置信——两杯咖啡的价钱便可以买到一般的座位。若要追求更好的觉享受，只要花上几个美元就以选到最佳的座位。人们经常在剧院里看到坐在前排的华人留学生，那不是他们消费奢侈，而是因为这里的艺术活动很平民化。丰富的展览、旧书店、老建筑，也是吸引华人驻留的魅力所在。

观赏艺术演出是当地留学生喜爱的休闲活动。

   滑雪也是一些当地华人冬天喜欢从事的休闹活动。等到天气转暖，白俄罗斯展现出如画的风景，华人还会约上几个朋友，开车去乡村度假、野餐、游泳，生活过得十分惬

意。他们说，只有感受过这里的冬天，才能真正体会斯拉夫人对初春第一滴溶化的冰水、第一声鸟鸣的敏感与兴奋。

        在这里生活，购买合适的衣服并不简单。华人男子平时穿的衣服多从中国带来，或者请亲人邮寄过来。白俄罗斯的街道上商店林立，但是对于华人来说，服饰的选择有限：款式少，尺寸多不符合亚洲人的身材，价格又贵。当地的冬衣一件要一二百美元，普通百姓的月收入才三四百美元，华人有时也很疑惑当地人如何生活。

        白俄罗斯的华人大部分都在城市里租赁条件较好的公寓。在明斯克租一套房屋价格在每月3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如果仅租一间房间，则每月100美元。这里的生活基本设施很完善，整体生活质量不低，天然气等资源丰富，水电费极低。虽然白俄罗斯法律规定，外国人不能以私人名义购买房屋，不过华人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也可以享受舒适的生活。通常房主都会提供生活必备家具，有的甚至还会留下钢琴和地毯。华人只要身份合法，每年只需花85美元办理保险，就可以免费看病、住院。

        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但白俄优美的自然环境、良好的文化艺术氛围、人和人之间简单的关系，还是让留在这里的华人爱上这片广袤的土地。

        那些在白俄罗斯生活了十多年的华人说：“我走过这城市的每一条街，对每个角落都充满感情，想回国的欲望越来越小，唯一的牵挂就是国内的亲人。时间越久，对白俄罗斯越不舍，越觉得这里像故乡。”

    白俄罗斯的风土人情为华人简单的生活平添不少色彩。同时，中华文化也时时影响着当地人。

        在白俄罗斯结婚，华人如果是基督徒，或与当地人通婚，仪式则颇有讲究。双方一旦注册后，就要紧锣密鼓地准备婚礼了——先与教堂、牧师定好时间，再订婚纱和礼服。婚礼当天，圣洁的教堂内，夫妻双方要面对面跪下，先接受牧师的祷告和祝福，然后自己再祷告今后的生活幸福平安。仪式完毕，礼车会载着一对新人到当地各个景点拍摄婚纱照。在明斯克，必到的景点是“泪岛”。这里有座流泪的小天使铜像，按照当地风俗，抚摸小天使，会保佑自己多子多福。拍照结束后，大家才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聚餐庆祝。

        白俄罗斯人性格质朴奔放，除了婚礼，每逢当地传统节日，全民狂欢的气氛也感染着每个华人，令他们情不自禁地参与热闹的游行队伍，或到充满白俄罗斯民族特色的跳蚤市场上，品尝当地的蜂蜜、烧饼等食物。春节期间，华人也会邀请白俄罗斯友人聚餐，受邀者都为可以大饱正宗的中国菜口福而喜不自禁。饺子更是春节期间的必备食品。大年三十晚上，华人和当地朋友有说有笑地在一起和面、拌饺子馅、擀饺子皮、包饺子。虽然没有敲锣打鼓、鞭炮礼花，饺子也不如家乡的好吃，但大家看重的是这种团聚在一起的和睦气氛。

平时，当地的中国使馆也举办各种活动，组织当地华人参与。这些活动旨在展现华人的美食、服装、音乐、武术等文化。在一些白俄罗斯的各民族文艺演出中，华人留学生自己买布料、动手缝制的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演出服装，为他们的表演生色不少。另外在使馆组织的中华文化展览中，华人留学生把各种展品的名字和介绍文字从华文翻译成俄文，使更多白俄罗斯人了解中华文化。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前夕，在城市中都会看到宣传华人演出的大海报。可以说华人在当地的影响正逐渐扩大。

        白俄罗斯的大学学费与西欧国家相比低廉得多，教学又沿袭了苏联时期的学院派体系，质量高，基础扎实，再加上当地的治安好，所以越来越多的华人学生选择到此留学。目前1300多名留学生构成了当地华人的主体人群。他们主要选择俄语、国际关系、理工科、艺术等专业就读。

华人来到白俄罗斯的时间短，虽有一定数量，但定居者屈指可数。具有号召力的华商也不多，经济实力普遍薄弱。因此，华人社会尚未成熟，华人媒体、社团以及华语教育都未见端倪。

        白俄罗斯华人自助留学网是目前当地唯一一个非官方的华文网站，由一名华人留学生张啸天所创建。他希望把自己在留学中收集到的信息回馈给对白俄罗斯感兴趣的华人，也想借此觅得商机。他坦言，网站只是信息的窗口，大部分登录者还是学生，真正来咨询商情的少得可怜，无利可图，目前难以发展成平面媒体。

     中国使馆组织的华人留学生会是当地仅有的华人组织。他们定期协助使馆教育处举办一些留学生的体育比赛、摄影展览和演出。但是学生们年纪尚小，也不是独立地开展活动，所以并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华人社团。

        在白俄罗斯长大的第二代华人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岁，除了通婚家庭的孩子外，华人儿童几乎都被送回中国大陆生活。而华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后代，在双语家庭的环境下成长，也略通华语。明斯克有3所学校从小学部就开设了华语课程，也有两所大学成立了孔子学院，由本地教师授课。华人父亲们也希望下一代可以学习华语，只不过现在第二代华人普遍年纪还小，华语教育不是那么急迫，家长们也只是在家庭对话中使用华语，希望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相较于媒体、社团，白俄罗斯华人的宗教活动还算小有规模。白俄罗斯华人基督教会有20多名信徒，大部分是留学生。他们没有特定的礼拜场地，每周的教会活动，也是由从莫斯科特地赶来的会友主持。信徒们学习圣经，弹琴、唱歌、聊天，每次活动时还自备水果、蛋糕。夏天时，教会还会组织到郊外烧烤、露营、野炊。他们在信仰之外，更多的收获是丰富了生活，开阔了眼界。教会成员间体贴入微的问候和关怀，让漂泊在外的华人倍感温暖和踏实。

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还要看白俄罗斯对华商的态度。目前所有生活在白俄罗斯的华人都相信，这里的情况会渐渐好转，在未来的3至5年内，华人人数将会增多。如果白俄罗斯政府出台有利于华人在此经商的政策，那么，华人人数增加、形成有规模的华人社会的梦想将会变成现实。

  在白俄罗斯的华人圈子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娶到一名美丽的白俄罗斯太太，或者交了一个漂亮的白俄罗斯女朋友。而华人女性嫁到白俄罗斯的例子却微乎其微。一直在西方世界不如当地人受欢迎的华人男士，在这里却备受异国女性青睐，甚至比在自己国家还要受欢迎。

        尽管有些白俄罗斯女子，认为华人个子矮，身形瘦小，在外形上与她们不般配；也有少部分人对华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认为他们来自落后国家，个人修养和卫生习惯不敢恭维，但是在大部分白俄罗斯女性心目中，华人男性聪明勤劳、性格温和，会赚钱，家庭责任感很强，没有酗酒恶习，不知要比嗜酒如命的白俄罗斯男子好多少倍！由于当地法律没有严格约束丈夫离婚后对妻儿的抚养权益，如果女性遇人不淑，就可能会遭遗弃，更要独自抚养儿女。而历史上的战争，也导致当地的男女比例呈1比7的失衡现象。所以综合看来，朴实能干的华人男子，就成了白俄罗斯姑娘心目中很不错的结婚对象。

        华人男性对白俄罗斯女性也是充满了溢美之词。当地女孩子端庄漂亮，仿佛满街都是时装模特儿，不但教育程度高，而且因当地国情，都学过医疗护理。最让华人男性倾心的是她们身上典型的斯拉夫女性的贤慧品质，勤劳隐忍，不娇气，烹制的当地菜肴和蛋糕美味可口。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白俄罗斯女孩子依旧单纯，经济独立，为男性减轻了很多压力。

        在交往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还是可以和谐相融的。即使宗教信仰不同的通婚家庭，也是可以供奉两种神像，在不同的时间段各自进行祷告，并不会因此发生冲突、矛盾。唯一的小分歧可能就是当地女子结婚、生育年龄较早，华人男性不得不把自己的人生规划提前。婚后，华人丈夫多会考虑到，假如太太随自己回国，也许工作机会不多，饮食、生活环境也未必能很快适应，所以通常都举家留在白俄罗斯经营小生意，同时等待更好的商机。

    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白俄罗斯华人，正式加入白俄罗斯社会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整体上还未成气候。留学生留下的少，华商实力不足，极大的流动致使这里的社团、媒体、华文教育都尚在孕育中。

        蛰伏在此的华人，尽管要面对打工机会少、税收高、生活单调的困难，但是在踌躇之余，也有对这里的留恋与期待。

        虽然他们在内心把白俄罗斯当作人生旅途中的一站，但既来之，则安之，同时也充满希望地等待着可能会突然降临的商机。

    乌克兰意为“边陲之地”，首都基辅享有“俄罗斯诸城之母”的美誉。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乌克兰，在1991年之前，却未曾正式独立过。直到前苏联解体，它才真正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社会体制转型，国家成立时间短，法规政策不完善，这些不利因素，反而成为了以赚大钱为目的的商人的契机，其中也包括纷纷涌入的大批华商。

    在清朝末期，有些浙江青田人以及山东江湖艺人沿着陆路走过俄罗斯到西欧，最终停留在乌克兰境内。后来，在乌克兰隶属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时期，又有中国公派留学生进入乌克兰。这一些人，绝大部分后来都学成归国，但也有极少数人因为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而被迫滞留在乌克兰。

        而今，这批上世纪50年代的老华侨仅剩下王宁文老先生一人。他在乌克兰生活了半个世纪，进过克格勃的集中营，经历过生离死别，并且忍受着满腔的委屈，承受着乡愁的煎熬，见证了华人在乌克兰的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直至今日，王宁文也不愿意加入乌克兰国籍，他与女儿生活在基辅的公寓，从事教书和翻译工作。

        60年代，中苏边境爆发伊犁事件时，在进入苏联的华人中，有3人由中国新疆伊犁流落到乌克兰，一人则杳无音讯，另外两人在基辅安家落户。

        然而，在国境线的另一边，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面包和牛奶都任人吃喝，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使本来就是劳工阶层的难民生活更是捉襟见肘。在乌克兰困苦求生了几十年，他们倍感失意和落寞，不再愿意与更多的华人往来，也很少在当地华人社会中露面。

        截至1990年为止，主要都是以公派留学生所组成的乌克兰华人也不过26人。在苏联解体之后，新一批的华人才纷纷涌入乌克兰寻找发财的机会。从1994年开始，大批以做皮货生意为主的华人“倒爷”涌入。到了1995年，“倒爷”涌入的状况达到了高潮。而今，这些来闯天下的商人以及少数的早期留学生，历经了商海沉浮，能留下的都已经成了当地华人社会的精英，是形成乌克兰华人社会的主导力量。

        1995年至1996年间，有福建和浙江的近万名农民移入乌克兰，他们以零售各种纺织品和轻工业品为生，还在基辅开辟了一个属于他们的露天市场。2002年，匈牙利将一批华人驱逐出境，其中一部分人便来到乌克兰定居，致使此处的华人数量达到巅峰。那时，生意人、中餐馆老板、留学生，三教九流，遍布基辅、敖德萨以及哈尔科夫三大城市。

        然而好景不长，当乌克兰物价上涨，经商政策有了许多限制，留学条例又趋向严格，加上极其剧烈市场竞争，一些华人市场消失了，以家庭式手法经营的中餐馆也大量关闭，一些留学生也纷纷选择到中小型城市就读，此后，华人的数量逐渐回落到两万人左右。

        随后数年的发展及整合，乌克兰的华人人数目前在数量和规模上基本较稳定。随着华商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这里的华社可说是已经日趋成熟。

   虽说乌克兰不是移民国家，生活条件也差强人意。然而，在逐步改善的社会中，存在着无数机会，吸引着华人纷纷来此淘金。

        目前在乌克兰的两万名华人，大多来自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省区，主要集中在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三地，除留学生外，大部分是经营批发、零售贸易的华商。

        与当地人相比，这些华人较富裕，但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不满意。他们之所以在乌克兰的严寒酷暑中，辛劳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大多数人就是为了一个目标：有一天赚足了钱，就衣锦还乡。

     在乌克兰的华商中，盛传这样一句话：“要做大事业，就去敖德萨。”

        黑海之滨的敖德萨，是乌克兰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贸易港口。从市中心沿着典雅的街道步行十分钟，就可到达港口。那里轮船云集，等待靠岸。无数巨大的钢铁起重机直插云端，集装箱遍地皆是，场面蔚为壮观，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氛。

        港口吞吐的集装箱数以万计，而华商的货物量有着举足轻重的比例。

        在敖德萨，华商人数高达七八千。他们多数从事大宗贸易，生意顺利的话，年收入可达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美元。

        而基辅和哈尔科夫华商主要是市场小商人和一些小公司经营者。这两地的小商人在市场上以零售业打拼江山，仅够养家糊口；有些则等待去别国发展的机会，也有不少陪读家长。生意不好时，他们每月收入几百美元，一般情况下，会有上千美元甚至3000多美元入袋。

        “华商在乌克兰像小草，打不死、踩不烂，历经风风雨雨，大部分都做得很好。”敖德萨的侨领彭壮站在“七公里”市场的小山丘上，指着山下密密麻麻的集装箱说：“这里每个集装箱价值20万美元。”

        “七公里”是乌克兰最大的露天集装箱批发市场。因距离市中心的火车站7公里而得名。这里曾是一片大垃圾场，后来被当地农民铲平，作为自由贸易市场，那时被叫作黑市。

        1993年到1994年，“七公里”还是零散摊位，很多华人留学生到此卖货。借着朦胧的晨光，他们在市场开门前翻墙而入，占好位置。与当人相比，华人做生意头脑灵活，懂得薄利多销，以低廉的价格迅速打开了市场。但是华人留学生们大都单打独斗，赚到钱后，经常遭当地人眼红，甚至排挤。

        一两年后，几个集装箱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地运来，进驻“七公里”，其中的商品大部分从中国发货。此外，乌克兰各个城市和周边一些国家都来到这里上货。集装箱越积越多，形成了今天这样壮观的场面。如今的“七公里”市场，不但是敖德萨华人经商的聚集地，也是全乌克兰华商货物的集散地。

        华人在这里做生意虽然赚钱，但是十分辛苦。硕大的集装箱从敖德萨港口上岸，运到“七公里”，华商们要马不停蹄地跟进。节节火车厢般的集装箱，横放在一起就是仓库，竖着立起来就是店铺，上面放货，下面卖货。“七公里”第三区是华人摊位的集中地，卖的都是以鞋子、服装为主的中低档货品。在售卖中高档服饰的二区，也有少部分华商。

   东欧的商人，不做赚不到一半利润的买卖，但这里的华商们却只是赚取蝇头小利，以量取胜。每天大家都想早一点营业，趁着买家们钱包鼓鼓，多做几笔生意，你争我抢地提早开摊。如此一来工作时间越来越早，营业时间竟提早至凌晨两点，最晚的6点也要开始卖货了。每天下半夜，这里都灯火通明，来自各地的商贩把市场过道堵得水泄不通，市场周边也交通堵塞。直到中午，市场才安静下来，大家盘点货物，收拾摊位后就回家休息。

        每天平均上万美元的交易量，与他们的辛苦付出成正比。夏天集装箱不散热，华商们要挺住炎热，在40多度的铁皮屋里卖货；冬天凌晨3点，人体还没有产生热量，一下子就冻透了，还要穿上好几层衣服出来站市场。如果碰到海关扣货，他们更要承受血本无归的风险。

        紧邻“七公里”还有一个刚刚落成的“六公里”市场，占地200万平方米，有篷顶，条件比“七公里”好了许多。该处共有4000个店铺，目前有100多家是华人业主。在这里花7到9万美元便可以买下一间20或40平方米的店铺14年的使用权，楼上办公存货，楼下摆摊卖货，而且还安装了宽带和暖气。客户看过货后，业主上楼可通过网络直接从中国工厂订货。

        在其他城市做零售的商人，虽然辛苦程度不及“七公里”的华商，但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们每周都要到敖德萨进一次货，因为不想浪费白天做生意的时间，所有商人都是傍晚下班后，连夜赶到“七公里”进货，第二天再直接到市场工作。旅途奔波、身心疲惫，这些辛劳尚可忍受，但是因语言不通而遭到的欺骗、专偷跑远程商人的扒手，甚至一些危及性命的意外，令这些华商每日焦头烂额，提心吊胆。

        每当忆及这些磨难，在基辅做零售业主的王女士就难掩泪水。她辛酸地回忆道，刚到乌克兰，只身一人第一次去“七公里”上货，就被当地商人找换了假钞票。语言不通，对当地货币又不熟悉，王女士只能把这个哑巴亏和着泪水咽下肚，就当交“学费”了。而之后每次去敖德萨都是一场心理和体力的煎熬。最初，遇到一些无良警察借故勒索，她还企图逃跑，结果被人高马大的警察反手扣住胳膊，“就像对待犯人一样”，这种委屈和羞辱虽然过了十几年，现在想起仍隐隐作痛。

最揪心的一次是，上货时，扒手用刀划破她的大衣，偷走了藏在羽绒棉衣下面的货款。王女士突然看到眼前飞满了羽毛，寒风灌进胸口，才发现自己的血汗钱已经不翼而飞。她说，当时脑子里和看到的情景一样，都是一片白茫茫的绝望。

        在哈尔科夫的零售业主，都聚集在一个方圆一公里的市场，名为“一公里”。在基辅，他们则主要分布在特里叶什娜、恒通、尤娜和中国楼4个市场。这里的华人也以零售鞋子、服装为主，他们按照市场规定的时间朝九晚六，到市场工作，每个商人都租下几个摊位，雇用当地人为他们卖货。

        这些华商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来自浙江青田与温州。他们回忆自己到乌克兰的第一个冬天，零下20多度的天气，让原本生活在江南水乡的他们明知受不了，还是要咬牙挺下去。对他们来说，能够出国并不容易，如果空手而归会让家乡人笑话。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乌克兰有广阔的市场和无限的商机，只要努力，肯定会有丰厚的回报。

        华商在当地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目前在乌克兰的批发和零售市场上，近80%都是中国货，薄利多销，轻易地占领了市场，令当地商人倍感压力，政府曾禁止华人做小商品贸易。后来随着乌克兰的规章制度改善，华人社会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增强，这种现象才销声匿迹。

  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中餐厅，在乌克兰也不例外，只不过从事这行的人数不多。中餐厅在每个城市最多不超过十家，但是档次和种类齐全，从宴请宾客的高级餐厅到面向普通大众的快餐厅，从专门从中国空运食材过来的粤菜到火锅、羊肉串都一应俱全。中餐厅的食客以本地人居多，他们口味偏好酸甜，因此糖醋鱼、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在当地最受欢迎。在乌克兰吃一顿中餐平均一个人要花10至30美元。

        2002年前后，当时经济较好、华商赚到钱，纷纷经营中餐厅。但是那时普遍营业成本较低，三五人合伙投资，请上几个华人留学生做厨师，就能开上一家。但好景不长，很多中餐厅经不起市场的考验，接二连三地关闭。目前，乌克兰的中餐行业已摸索出规律，经验也有了。挨过了低潮期，华商资金充足，餐厅寿命也越来越长。

        在基辅华人开设的中餐厅里，王明熹的九龙餐厅，要算是行业中的翘楚。在匈牙利闯荡多年的王明熹来到乌克兰，本是经营贸易公司，谈生意的时候，经常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中餐厅来招待客人，于是干脆自己“挽袖下厨”，开起了中餐馆。“因为乌克兰人来吃中餐，就想知道中国的餐厅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王明熹装修餐厅时，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样式，处处融入中华元素，不但华人喜欢，当地人也愿意来捧场。餐厅经营8年来，不知道举办了多少婚宴、寿宴、公司派对和毕业聚餐。

        在乌克兰还有一小部分华人，他们也曾为了生意，被警察扯破衣服；也曾失败过，积压在仓库的滞销货堆得像座小山。但是经过多年的顽强拼搏，他们如今已经在建筑、汽车、工程机械、医疗、印刷等行业，拥有了规模不小的公司，并且进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像基辅的中医诊所“China Doktop”，由两名已经在乌克兰跌打滚爬了十多年的华人中医联合创办。诊所虽然刚刚营业一年半，但是在当地、甚至东欧都打出了名堂。他们的顾客大多是社会中上阶层，在诊所见到议员不足为奇，有些生活在当地的西欧和日本病人，在朋友和大使馆的介绍下，也慕名而来。诊所里的大夫全部是华人，他们以自身的素质、学识和口碑，赢得当地人的尊敬。而吸引他们留在乌克兰的原因，是这里病人的认可。对于病人来说，有时大夫的一通电话就可以让自己安心；对于大夫，如果离开乌克兰，心里也会无法放下这里的病人，深感辜负了大家的信任。

乌克兰人对赚钱的兴趣没有华人那么浓厚，而当地的市场又是那么广阔，这种天时地利，使勤劳的华人在这里的投资大部分都可以得到很高的回报。

        普通生意人，只要不沉迷赌博，都会衣食无忧，甚至还会有储蓄。当年赤手空拳来的创业者，几年后在家乡都买房置业了。

        平时，华人为了互相照应，都租用比较靠近的民宅居住，一套一居室的价格在400至600美元之间。

        有的华人俄语说得十分流利，有些还能说一些乌克兰语，有不少乌克兰朋友，做乌克兰人的生意，已和当地人打成一片。而大部分华商虽拙于读写当地语言，但简单会话不成问题，足以应付日常生活和市场买卖。

        刚到乌克兰时，很多华人都被警察以检查护照为由勒索过，这也是大家觉得生活压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经过几个月的语言强化，华人再碰到这种不公平对待，都会据理力争。华商自身素质提高了，被刁难的事情也就少了。尤其在基辅、华人大可安心地在街上走动，不必像以前一样提心吊胆，担心随时破财。

        想吃中餐，在乌克兰也不是难事。大规模的市场里有专门为华商服务的中餐厅，敖德萨还有华人种植的蔬菜大棚和豆腐作坊，但是产量仅够供应当地的中餐厅，真想解馋还得上馆子。如果在家亲自操刀，就要到华人的调料小店，购买中国的油盐酱醋和豆腐等豆制品。但是华人越喜欢的食物，价格越贵，一块巴掌大小的豆腐售价要近两美元。

     其实这里针对华人的服务算全方位了，中文国际电话卡、中文小说、华俄文电子字典，只要华人有需要，就都能在市场找到，只是服务略嫌简陋、粗糙。

        一家在基辅恒通市场内的华人理发店，仅几平米店面，工具简单，毫无装修，据说已经开了十多年，为无数华人理过发。当地很多成功的华商，当年也许都是在这里从“头”开始的。

        生活纵然便利，但是华人普遍感到生活的素质并不高。

        平时的一日三餐还是以面包、咖啡，以及被华人称作“乌克兰四大菜系”的土豆、洋葱、圆白菜和胡萝卜为主。进口的蔬菜和海鲜价格贵，数量少，各种香肠轮流炒乌克兰四大菜系，是华人家里最常见的主菜。

        在乌克兰对外国人解除了购买房屋的限制后，华人可以享受同当地国民一样的待遇。政策出台时，房屋价格并不高，只可惜当地的华人精通俄语的实在不多，等消息传开，大家都想拥有房产时，房价早已飙升到平均每平方米3000美元。除少部分在乌克兰结婚生子的人买了房子外，绝大多数的华人还是靠租房，强烈的漂泊感也就在所难免。

        乌克兰的两万多华人，真正在当地购房长期居住的不到5%，九成以上都疏离在乌克兰社会之外。

        他们与金发碧眼的当地人朝夕相处，坐一样的地铁，喝一样的咖啡，透过电视看着当地政府的更迭。但是他们却不能融入当地，每天忙碌着，按照一成不变的轨迹上班、回家、上货、卖货。所谓的娱乐，就是上网、看光碟，男士可能还会小赌一把，缓解压力，女士则逛街购物。日久天长，如此反复，乏味得很。

        有些华商因为生意的压力，心情郁闷，又无处发泄，只好拼命消费。基辅和敖德萨曾有华人经营卡拉OK，华人三五成群地约去喊上一嗓子，聊以释怀。因为大家都不是固定的常客，卡拉OK要维持也不容易，目前只有敖德萨的卡拉OK还正常营业，基辅的早已关闭。

 居住在乌克兰的第二代华人数量不多，且大多数还是少年。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的后代，外貌上华人特征已不明显。他们自幼在当地受教育，自认是乌克兰人。

        在这样的家庭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爸爸用中文问，孩子以俄语答，妈妈喊孩子俄文名字，爸爸叫孩子中文名字。孩子头脑中有两个“频道”，“中文频道”为爸爸专设；“俄语和乌语频道”对妈妈和老师、同学开通。

        家长都希望孩子可以流利地掌握中、俄、乌语言。乌克兰语和俄语孩子驾轻就熟，可对于中文，听可以通过家庭环境熏陶，但在表达、阅读和书写上则困难重重。

        而父母双方都来自中国的第二代华人，大部分都在中国长大，有良好的中文基础。他们来到乌克兰，必须先经过一年的语言学习，才能顺利延续教育。乌克兰不管是中小学，还是高等教育，质量上都受到华人家长的肯定。相当一部分华商认为，陪伴、供养孩子在这里完成大学教育，是他们在乌克兰辛苦工作的全部希望和精神寄托。

        对孩子们的将来，第一代华商有着美好的期望。他们说：“孩子在这里成长、学习，思维方式和处世方法都和这里同步。我们铺设良好基础，他们今后就有可能进入这里的主流社会。说不定也能像在美国的华人一样，出现华人州长、议员。至少以后还可以凭着双语的优势，找份好工作。”

 而乌克兰华文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家平时忙于生意，办华文教育心有余而力不足。全国仅有一所以华语为第一外语的学校——东方语言学校。作为前苏联时期第一个全国华语教学学校，华文教学历史已逾50年。校内一半的学生自愿选择以华语为第一外语来学习。一年级学生每天上一节华语课，当地华文教师负责繁琐细致的教务工作。学生毕业时，华语水平可以达到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二级的要求。东方语言学校的知名度很高，但是与其他语种比较，华语教学资金和师资都严重匮乏。

        在民间，还没有华人创办的华语学校，以家教形式辅导华语的老师也不多见。

        当然，随着华人社会在乌克兰的成长，大家都企盼着有人肯为华文教育做些贡献。基辅中餐厅“哈尔滨饭店”的老板赵德珊，就曾为一位以访问学者身份到来的中文系教师免费提供了一年的场地，每个周末在餐厅的包房里上一次华文课。而随着学者访问结束，华文班也结束了。“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很愿意予以支持。”赵德珊说。

由此可见，乌克兰的华文教育缺少的不是场地、生源，而是师资。

* *乌克兰的东部有一所闻名遐迩的中国大学——克拉马托尔斯克经济人文学院。这所大学之所以会被称作中国大学，是因为其创始人，即院长李泽皋是一名中国人，他也是乌克兰唯一的外籍大学校长。这所大学从1992年创办至今，已经完全当地化，从科目的设定，招生到师资，都已经和其他乌克兰大学几乎毫无区别，而且在当地许多私立大学的排名之中名列前茅。*

   乌克兰的华人社会发展时间短，又多是生意人，大部分是打算淘足了金就离开，绝大多数不想定居。他们对于社团活动也不热衷，但是对于华人社会的事情，都愿意帮忙。

        乌克兰全国的华人社团也不过十个，大多数不常举办活动，有的甚至是会长、副会长唱独角戏。然而随着华商数量、生意的不断扩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来代表大家与当地政府沟通。“七公里”市场内曾经禁止华商卖货，当时被赶出市场的商贩们请了几名有影响力的华商出面和政府谈判，才得以圆满解决。正是此契机让敖德萨华人华侨联合会在不久后成立。

        乌克兰华人主要集中在三地，所以在基辅和哈尔科夫自然也需要一个社团，来代表华商发出自己的声音。乌克兰华人总商会就是面向基辅的华商组织，乌克兰华人青年联合会是为基辅的华人青年和学生提供社会实践的团体。而哈尔科夫商会则是哈尔科夫市威信最高的华人社团。

        这些团体都是非盈利性质，所有的活动经费全部来自商人的捐献。除了本身最主要的责任外，社团偶尔还会组织大家去滑雪登山，结交朋友的同时，缓解紧张的工作压力。社团还经常代表当地华人参加乌克兰的活动，树立华人在当地的形象，还经常为孤儿院、养老院捐赠衣物。

        乌克兰的华人社会十分团结，这在当地唯一一份报纸上可见一斑。

        乌克兰三地曾有3家华文报纸，分别为基辅的《乌克兰华商报》、敖德萨的《华声报》和哈尔科夫中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刊物。2007年7月，3家媒体联合成一家，报纸的采编、发行、广告在三地一起合作完成。目前的《乌克兰华商报》共24版，其中8个版面是《华声报》，由敖德萨的编辑部来采写编译当地相关稿件，4个版由哈尔科夫负责。各地版面上的广告，也专门为当地的商家服务。然后稿件再从各地传到基辅的《乌克兰华商报》总社，一起排版印刷。最后再运往各地的市场发行。

        这家大报在乌克兰的十个城市都有发行，通过经营者的努力，还进入了往返中国和乌克兰的直飞航班。报纸每十天出一期，报社所有的工作人员除了自己的主业或学业，还身兼记者、编辑、发行、广告多职。

        报纸每期发行两三千份，在各个华人聚集的市场，都有华商义务帮忙完成发行和订阅工作。《乌克兰华商报》同时还有自己的网站，也有专门人员负责每日的内容更新。

        报社广告收入很少，经费自负，不计盈亏。乌克兰的华人都喜欢阅读自己的报纸，更乐意做些力所能及之事，他们说：“这都是华人自己的事情，能帮就帮。”有自己事业的《乌克兰华商报》社长李相，对报纸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有时他要亲自编译文章，“缺人才”是他目前最为焦急的事情。

 不打算在乌克兰扎根的华人，在乌克兰生活一切从简。即使是结婚，也不像在中国那样讲究。“大家都忙生意，少干一天，就少赚一天的钱。在中餐馆请大家大吃一顿最实在，反正回国还要再办。”尽管如此，华人老传统不能改，红包还是要送的。

        但若是华人与当地人通婚，婚宴则有另一番景象。乌克兰式的婚礼十分热闹，要分别举行3个仪式，即教堂仪式、注册仪式和马拉松式宴会。如若集中在一起举行，要闹上24小时。

        做生意的华人宾客哪里吃得消，晚餐过后，就纷纷告辞。奔放的乌克兰宾客则留下狂欢。他们一边往新人身上撒花、糖果和零钱，一边载歌载舞。他们一次次举杯喊“苦啊，苦啊”，让新郎新娘频频接吻，好像酒就变甜了。就如华人婚礼上刁难新人的小招数一样。这样的婚宴总要持续到深夜，甚至第二天。

        乌克兰留下了华人的欢笑、泪水，却留不住华人的心。落叶归根，将尸骨运回故乡，依循故乡的习俗安葬，是多数华人的希望。就如他们把赚到的血汗钱，大部分都寄回家乡，或买房置地，或积攒起来一样。只有少数华人在乌克兰长眠，根据乌克兰的习俗，棺葬入土。

    农历春节，对整年忙碌的华商来说，只是一个早点下班回家的日子。乌克兰的市场不会因为是华人的新年，就不营业，不收租金。华商们最多是给自己放一天假，请乌克兰雇员照看摊位。下班后，大家回家包上一顿饺子庆祝一下，饺子吃完了，年也就过完了。第二天工作依旧。

        尽管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的淘金者和留学生都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华人的庙宇和宗教组织也是罕见，但华人基督教徒还是有的。他们大部分来到乌克兰后才加入教会。基督教开放温和的传教方式，教会组织的活动和聚会，使很多在乌克兰漂泊、打拼的华人，在悠扬的琴声和颂唱中，找到了集体的归宿感和心灵的寄托。

        同时，中华文化也潜移默化影响着当地人。中医已被当地人认同并接受，蕴含着古老中华哲学道理的太极拳也开始在乌克兰传播。每逢周三，在基辅东部的一所学校里就会看到上百位乌克兰人全神贯注地练习太极拳。1993年有位牟师傅在这里传授太极拳，如今他的学生已经超过2000人，有几位得意门生也开始做师傅、带徒弟了。

      来乌克兰经营小生意的华商们都倍感欣慰，用同样的钱，在其他国家只能打工，在这里却可以做老板。但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他们在与当地员工打交道时，难免感到头痛。

        来此做生意的华商，恨不得一下飞机，就马上投入工作，无暇学习俄语，所以大都会雇用当地人来帮忙卖货。他们语言通，也了解客人的喜好，方便向客人推荐新商品。一开始，老板与员工只能比比划划，或者用计算器来交代货物的价格。遇到较深奥的意思，华人老板只能借助同在市场的朋友帮忙翻译。

        语言障碍可以用时间解决，但是如何管理不同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乌克兰人，学问却很大。

        “这里的员工很有个性，老板要看员工脸色。”华商无奈地说，“起初很不习惯，他们工作一会儿就要喝茶、抽烟，然后回来接着干活，一转眼，又出去喝咖啡了。”习惯了兢兢业业工作态度的华人老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却又不能批评。因为这是地人的生活习惯，如果强迫人家改正，就触犯了当地的劳工法，只能慢慢适应。而且当地员工没有攒钱的习惯，钱够花了，就回家休息，或者去度假。有时员工不想来上班，华人老板把薪水加高，也无济于事。

        经过几年的磨合，一些华人老板总结了一套管理当地员工的诀窍。首先学好语言，以便更好沟通，也会更受员工的尊重。其次是善待员工，工作上严格要求，卖货多的就给以金钱奖励。每逢乌克兰的节假日，华人老板还会准备小礼物，让乌克兰员工倍感温馨，工作也主动积极多了。

乌克兰华人的经商故事，在寒冷和惊险中演绎，在辛酸和挣扎中继续。在风险和潜在的巨大商机面前，勇敢的华人，不畏艰险，来此一搏。

        华人乐观地憧憬，「有朝一日，这里的政策稳定了，我们的境遇肯定会更好。」年轻的第一代华商，不满足现状，他们豪气冲天，总是想把生意做大，希望后代在当地社会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波罗的海之滨、中欧北部的波兰，曾经长期受制于其左右两个强悍国家——德国和俄罗斯。这里是二战中按照人口比例计算死伤最惨烈的国家。悲怆的历史，使波兰人既有最为倔强高傲的头颅，也有一颗对外族过分防范的脆弱心灵。

        随着加入欧盟和成为申根协议国，本来就是移民借路之地的波兰，因其未完全开发的市场，吸引越来越多人来此寻找机会。面对渐渐增多的外来人口，崇尚教育、热爱阅读的波兰人，表现得谦逊有礼，但是心理并不全然接受，因此他们针对从外国来此生活、工作的人们，制定了种种条规。

        然而，在这样一个不欢迎外来移民的国家，华人还是在严格的限制中，找到了生存的方式，并且数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据青田华侨大会的移民资料记载，浙江青田的刘焕清，辗转法、意、捷、德等国之后，1936年在波兰开设了橡胶工厂，还雇用了7名工人，安装了7部电话，1947年回到中国时，带回了一万多银元。

        据载，二战时期，还有一些华人在波兰蒙难。

        二战之后，一些温州人来到了波兰。他们在那时就已做起了皮鞋生意，并多数在华沙或罗兹（Lodz）安家立业。1959年从北京嫁到波兰的李丹凝大夫，在波兰攻读了医学博士，并被称为波兰的中医之母。她回忆道：“我读书的时候，这里还有200多个温州老华侨，和我们学生相比，他们生活得很不错，经济很宽裕，都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

        进入80年代，波兰局势动荡不安，大部分温州鞋商移去西欧，仅有几户人家留下。如今他们的子孙都已长大成人，父辈的积累，为这些二三代华人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让他们能够接受当地的良好教育，有的人还成了李丹凝大夫的同行。

        当地华人自称是“在欧洲历史最短的华社”。

        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如今在波兰，70多岁的李丹凝大夫、在此地生活50余年的女作家胡佩方，以及几名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丈夫定居波兰的女性，是屈指可数的移民先驱。而90年代来的移民，已经是大家公认的“老华沙”了。

        波兰在1989年才小心翼翼地对外打开其国门，当时的华人只能够以国家企业外驻人员的身份来到波兰。他们之中不是企业的中上层管理员，就是知识分子，不但可以用英语和当地人沟通，而且都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或贸易基础。即使后期绝大部分国家的企业撤出了波兰，但这些人大部分都留了下来，并且拥有了自己的贸易公司。

        在波兰的签证政策依然十分严格的90年代末，华人的数量已经近2000人，他们来自中国各地，多数是一些大中型城市，其中，台湾华人也有几十名。他们活跃于电器、轻工产品、玩具、纺织品、成衣、鞋类等领域。这些波兰华人和其他的第一代海外华人有所不同。他们自信、乐观，没有大部分海外华人初到异乡时寄人篱下的忍辱负重、小心翼翼或迷茫不安。良好的自身素质和高起点的贸易基础，让他们心境健康、生活踏实。正因如此，波兰华人“不屑做”的中餐业在这里一直没有兴起。

        在此期间，也不断有一些非正式途径的华人移民路过，不过都是“黑”下一段日子，就借道西去了。直到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来自青田、福建的华人才多了起来，几乎每天都有华人从各国来到波兰考察市场。

        这些华商刚到波兰，延续着其他中欧、东欧国家的生存方式，“找一个市场卖货”。“体育场（Stadion）大市场”就是波兰个体零售华商的第一个据点。它在华沙市中心的大体育场和铁轨之间，露天的摊位排出一站路远，华人摊主的邻居还是老竞争对手－越南人、当地人以及中亚人。那时候，华人每天凌晨两点便开始工作，下午一点收摊回家，

        虽然人在波兰，却过着“中国时间”。

   短短的三四年，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西欧的青田、温州、福建人闻风而来，浙江、福建华人成为如今波兰华人的主体群。

        当地华人的流动率较高，因此，华人的具体数量很难统计。有记录的华人有2000多人，这其中包括一大部分经常往返于波兰与其他国家的华商，而长久定居的华人也不过1000人左右。更多的持有申根协议国护照到此的华人，则无据可查，从这个角度来看，据当地华人估计，在波兰生活的华人总数至少有5000人，甚至可能多达8000人。

        90%的华人居住在首都华沙。而克拉科夫（Cracow）、罗兹、波兹南（Poznan）以及沿海的“三联城”格但斯克（Gdansk）、索伯特（Sopot）和格丁尼亚（Gdynia），也零散地分布了一部分华人。波兰华人的职业结构非常单一，其中95%的人从事与贸易相关的行业；中餐厅在华沙不过十家，全波兰也不会超过30家。此外还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房地产企业。

        华商们在波兰立稳脚跟后，也开始办社团、做媒体，为孩子们提供学习华语的环境。整个波兰华人社会，仿佛池塘中的小荷，开始在波兰社会崭露头角。

波兰给人的印象，悲剧色彩浓厚，然而来到这里的华商，却是海外华人中乐观的一群。

        如今在波兰的华商大致可以分为几个群体：一种是“含着金钥匙”来到波兰的华商。他们多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外派人员，现在则是私人贸易公司的所有者，新的时代环境、良好的教育背景、广泛的社会关系，让他们即使在波兰，也能够如鱼得水。

        另一种虽是近三四年来的新华商，但却是商场上的老角色，辗转过周边几个国家，历经了生意的起起落落。他们把眼泪和失败留在了别的国家，把新的希望带到了波兰。

        还有一种是“财富第二代”，父辈在别国已经创造出了一片天地，第二代在海外接受完教育，被“发配”到波兰开辟新的市场，他们年轻、自信、乐观，当然也带着一些其他地方华商们没有的稚嫩。

        当然，也有一些人，波兰是他们的淘金第一站。他们立足波兰，放眼周边国家，甚至非洲、南美，生意头脑十分活络，眼光更加长远。

   不久前，“Stadion”的批发摊位拆掉了。当地华商估计，剩下的零售摊位可能也坚持不了多久。早在几年前，在这里就不常看到华人卖货了。那些黄皮肤的摊主多是越南人，有少部分华商会把一些不好卖的商品委托他们代卖，周末来收收钱。如今，华商大部分聚集在华沙市外的GD中国城。

        对于仅有几千华人的波兰来说，这个“中国城”有些过于巨大，甚至在中欧、东欧都少见如此的规模和设施。它占地20多万平方米，有5个区域，目前为几名浙江商人和香港商人所拥有。相比之下，对面的“越南楼”和“土耳其楼”则显得冷冷清清。

        然而，“有中国城并不能说明华商在波兰就多有实力。”当地的华商很客观地评价。

        在波兰做贸易的华人，无论规模，还是收益，和其国家比都有差距。GD是当年中国的国有企业广东粤海留下的产业，它名字的由来，也正是广东的拼音缩写。一开始，这里可以说是座没有华人的中国城，华商们都在“Stadion”做生意，没有人愿意放弃黄金的地理位置和熟悉的顾客，搬到离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直到慢慢地有人进驻，一些波兰大超市和周边国家的批发商也开始来这里上货，GD才火了起来，于是大家纷纷搬入这个宽敞明亮的室内市场。

  现在这里已经有华商的摊位近200家，每个华商可能有几个店铺和仓库分散在市场里。同样这里也有大量的越南商人和当地商人，数量并不比华人少。他们经营的商品也是涵盖了服装、鞋类、床上用品、内衣、皮革制品、家电等方面。有了人气后，酒店、银行、邮局、警察局、旅行社及其他商务设施如法律事务所、中介公司、咨询机构也出现了。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大型综合性国际商贸城了。

        第一次来到GD的人，可能会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在这里看不到其他国家大市场推搡、嘈杂的拥挤情景，而是人人踏着一辆单板脚踏车，在过道间来来往往。瞬间竟有置身街头少年滑板聚会的错觉。再看每个店铺内，也都是摆放着一两辆小踏车。原来是因为这里太大，有人发现这种休闲工具可以在市场代步，找人、买饭，就算带上一箱货，把它放在踏板上，轻轻松松就搬走了，比起以前的推车，既快捷又省力。很快脚踏车就普及了整个市场，现在如果哪个商人没有一辆，可真是寸步难行了。

     距离GD不远，还有一个MAXIMUS贸易中心。这里的条件比GD的还要舒适，4座流线型造型的建筑里面，聚集着几百家服装、鞋子、日用品等批发零售店铺。这里的华商目前数量还不多，约有二三十家。

        “起得比公鸡早”的华商，禁得住天寒地冻、烈日灼身，但在波兰反倒可能不习惯。在MAXIMUS一名卖内衣的青田女子，曾在捷克的露天市场干过一段时间，随男朋友来到波兰已经一年。她说：“这里的生活很舒适，每天朝九晚五，上下班都有私家车，市场里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一点也不苦。”

 只要能多挣钱，华人最不怕吃苦。条件良好的市场环境，并不能成为吸引他们的诱因。从福建来的陈先生，正在准备转让店面。“这里的条件是很好，不过没有生意。”近来的全球经济不景气，让做外贸的华商们的日子也不如以往了。

        陈先生说，一年前，这里的生意还很好，尤其是周末、圣诞、夏季，都要请人来帮忙看店，否则一个人根本照顾不来，几乎每天都要丢东西。以前每天都会卖出近千美元的货，现在不行了，一天下来，账本上零记录也是常事。平日里，望着空荡荡的大厅，华商们坐在自己的店铺里，显得有些无聊。上网、看书、睡觉、发呆，就是没有客人时的市场众生相。

        对冷清的生意，华商们看得很淡。陈先生打算转了店后，去罗马尼亚看看。一个20出头的小华商去年卖T恤衫，卖了几千万美元，今年却全部亏掉。巨额的数字，他们云淡风轻地一带而过。波兰并不是这些华商的全部赌注，而是新一代华商牛刀初试的地方。他们也不像这里的越南人和西欧的华人，并没有强烈的一定要留下的意愿，因此心境潇洒许多。

在GD做生意，入门快，即便还不会认波兰的路，只要租到摊位，和大家分享顾客，就能照猫画虎地开张。而真正做大了的华商资金基础好，有自己固定的客户群和办公楼，能够更加正规地独立经营。达到这种程度的，目前有几十家贸易公司、3家旅行社、几个连锁的餐厅和两个房地产公司。

        事业步入正轨，华商们自然而然开始关注华人这个群体。

        十年前，在波兰多年的企业界华人成立了波兰华人联合会，几位华商在工作之余义务为当地华人做一些公益事务。华联会的会址就设在当地华人开发的房地产楼盘内，一些会议和户外的活动，都免费为华人提供场地。2008年的中国四川地震，海外华人都以各种形式举行了悼念活动。在波兰，华人就是聚集在华联会会所外面的庭院内，表达自己的哀思。欧洲的蓝天下、绿茵中，中国传统建筑的亭台，对漂泊在外的华人，显得别样的温暖。

        华联会的分工很明晰，几位副会长分别负责对外联系、宣传、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波兰目前唯一的华语补习班，就是华联会组织开设的，由曾经在南京大学任教的一位副会长负责平日的工作。目前仅有几十个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学龄孩子，而且年龄差距很大。华联会早前开办的华语班就因为学生少、语言程度差别大、年龄不同而停办。现在是补习班的第二次开始，目前有十多名学生，分为两班，利用周日时间在一所小学上课。两位老师，一位是中国大陆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华人，一位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都用简体字教学。

        教室内，孩子们在一字一句地学着简单的字句；教室外，父母们耐心地等待。华语补习班在华沙南部，而孩子们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周末，家长们一大早就得起床，送孩子来上课，然后一直要陪到下课，这样一个休息日也就差不多结束了。孩子的家长说，其实很多波兰人也曾送孩子来学华语，但都坚持不了多久，不愿意一个休息日就这样

        度过，只有华人家长舍得这么付出。不管住得多远，生意多忙，都会坚持。可见华人对子女学习华文的重视。据说，华人家庭为孩子请华语家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

        随着波兰华商人数的增多和实力的增强，华人社团将越来越多。除了不久前刚刚成立的波兰福建同乡会外，波兰浙江同乡会、波兰中国总商会等都在筹备中。

     华人群体有了规模，自然开始寻求了解或传达信息的权利。波兰两份年轻的华文报刊也孕育而生。《波兰环球周报》和《波兰华人周刊》都是当地活跃的华商因感到信息的闭塞而在2007年创刊的。

        《波兰环球周报》是香港华商成标创办的华文报纸。他于2002年来到波兰考察市场，就感到这里的华人企业家们生意忙、时间少、语言不通、生活单调。还在社会转型期的波兰，政策、法律也是频繁地变更修改，如果这些信息不能被大家及时了解，就会直接影响到当地华人的切身利益。经过几年的酝酿，报纸才得以创办。

        该报现在有两名工作人员，负责20个版面的撰写、编辑和排版，而且印刷和装订都完全由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完成。条件看似简单，但是每期几百份的发行，仅每月的人工费用就要五六千欧元。对成标而言，这完全是为波兰华社提供的福利项目，报纸和大部分广告都是免费，办报目的并不是盈利。他说：“经常有人看不到就会来找我要，我觉得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并从中得到了快乐。”

        《波兰华人周刊》则走杂志路线。它的创办者浙江商人缪向阳在印刷质量上，不惜重金，并雇用了当地华人留学生负责编写、排版工作，杂志内容涉及新闻、体育、娱乐、生活各个方面，每期免费发送给各个市场的华商。同时，杂志也与当地华人留学生所创立的最大华人论坛合作，把杂志每期的内容免费上载到网络，方便大家阅读。

        无论是个人爱好，还是商业机会，华人媒体在波兰的出现，让这里的华人社会更加充实与活跃了，至少使华人有了自己的信息交流平台。

       波兰华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与周边其他国家相比，安全得多。与别国互不往来、行事低调的华商不同，在波兰的华商都友好地打招呼、交朋友。

        在GD中国城做生意的华商，一部分人都集中住在两个华人购买的小区内。租金在每月300至600欧元之间，几个朋友开一辆车一起上下班。这里的华商大都是单身居留，要么家在国外，要么年轻还没有成家，再加上做贸易，总要各国间来来往往，或者想赚了钱再走，都安不下心来过日子。

        室内简单的陈设，几个朋友约在一起做上几道家常菜，然后兴致勃勃地打扑克，排不上的，就在一旁看电视、上上网。生活简单得如学生时代。

        要从中国发货的华商，一般一年至少要回家3次，所以一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一些从邻国，如匈牙利上货的华商，可能3年也回不了一次家。生活在他们眼中，有些百无聊赖。“每天六七点钟下班到家，吃过饭，收拾完毕已经要9点多了，看看电视，就该睡觉了。几年的生活就是这么过来的。城市里可以玩的，刚来的时候看一次就足够了。”

     那些在波兰长久安家的华人，一般都居住在自己的别墅或者公寓里，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中国，是他们最频繁的出差目的地。在欧洲除了法国外，波兰是第二重视节日的国家。入乡随俗，度假是大家重要的讨论话题。这些有精力和经济实力的华人，和当地人一样，开始追求生活质量。钓鱼、网球、高尔夫，也是他们的休闲项目。不过一些刚到波兰的华商，可能不会这样潇洒，休假一天，就要损失一天的摊位费，因而舍不得放下生意，彻彻底底地去度个假期。

        在罗马尼亚和波兰两边跑的香港商人丁先生，人很热情厚道，经常为朋友们做饭，他的家就成了大家每天的聚会场所。同是来自香港的Terry，刚从英国学习毕业，是个标准的80后，被家人“发配”到波兰，锻炼再学习。他觉得这里的生活虽然有点闷，但是自己做一个月，比在别人公司打工做一年学到的都多。

        刘小姐来自中国辽宁，是波兰华人留学生中少数留下的，她当初只用5000美元起家，如今生意做得已经小有规模了。

        李小姐是安踏运动鞋的经销商，在中国内地几个城市发展得颇具基础。她来波兰的时间不久，但很快就融入了这里的华人圈子，不过她并不是十分喜欢波兰，觉得生活太过沉闷，经常念叨要回中国去。

        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既是饭友，也是牌友，如果有人生意上遇到了困难，大家也都愿意互相照应，因此他们更是一起在异国的商场上历经风风雨雨的战友。

  其实在波兰的华人，经济上并不紧张。虽然是以雇员身份来到波兰，但是来了之后，大部分都晋身为老板。即使华人打工族的收入每月也有800至1200欧元，比波兰人每月七八百的收入还高。即使生意不好，手上总是有流动资金。因此手头比较宽裕，生活也就更舒适了。

        还有一些华人，会去教会度过自己的休息日。波兰华沙华人基督教会是十年前，由4名来此经商的基督教徒结成团契，而慢慢发展起来。现在教会平时的聚会都会有二三十人参加，最多的时候可以到达五六十人。教会人少，经费有限，因此没有牧师，一般每个周五晚上举行祷告会，周日做礼拜。

        每周日的傍晚，是这些信徒们感到最温馨的时光。他们在租来的老房子里面相聚，主日崇拜后，每人拿出自己带来的一道菜，在桌子上一字排开。在悠扬的钢琴声中，大家享受着这个大家庭的温馨，在异国土地上寻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波兰政府规定，外商公司里要雇用一定比例的波兰员工。因此，在波兰经商的华人，不可避免地要学会与当地人共事、社交。

        与某些国家的人们相比，波兰人对华人还算客气，但是心中仍有欧洲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面对着数量不少且经济状况优越的华商，他们内心的感受颇为复杂。

        一名成功的华商，有不少当地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的朋友，经常一起出去喝酒、度假。他吐露自己的社交心得：“波兰人也是一样的，十分现实，他们看对方的自身素质和所能带给他的利益，选择朋友。”

        对于自己的员工，大部分华商都用波兰语直接交流。因为波兰翻译人才不足，不但翻译费用奇高，一天可以高达300美元，而且水平有限。只能掌握简单词汇的大老板们，也可以和波兰员工融洽相处。

        一名开设咨询事务所的华人，雇用了3名波兰女士为公司处理文件。他很乐观地说，“关键是要笼络住员工的心。别看这些波兰语文件很难，这里连一本中波字典都没有，我对她们开开玩笑，她们就做得很好。”当然，当地工人偷钱、偷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总之，华商们除了用心做生意外，也要绷紧神经，努力、巧妙地与当地人和平相处。

        像中医、武术老师、艺术家，这样以传播中华文化为职业的华人，与当地人的交往就更加广泛了。这里的中医，本着华人的诚实，赢得了当地病人的信任，能治疗的病，就一定好好治，而那些自己不能驾驭的个案，就会推荐给别的大夫。

        中国功夫在波兰备受欢迎，有很多所武术学校。华沙的张凤君师傅，在波兰十多年，就有学生不下5000人。他遵循着“武术乃桥梁，感情最重要”的理念，与不少徒弟建立了深如父子的情感。

        语言、文化上的不同，终究还是使第一代的波兰华人感到与当地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异族通婚家庭中，即使每天生活在一起的家人，还是会有很多习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差别。

        波兰引为自豪的传统食物，竟然是饺子。虽然样子和中国的饺子差不多，但是里面却大大不同，馅是实实的肉末。不同的饮食习惯，使异族通婚家庭的主妇多了一些家务。一般华人太太都会做两套菜，一中一西，比如餐桌上同时有肉排和土豆，炒菜和米饭。

        一边是东方，一边是西方。两种如此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和摩擦是必然的。也正是因思维方式的不同，波兰人自由直接而又严谨礼让的风格，让华人在这里感到舒适与自在。

问起波兰华人有何特点，很多人都会回答“在欧洲的历史最短，但能力最强。”语气里充满着自信。

        虽然在千千万万海外华人中，诚兰并没有世界华人首富，也没有非同寻常的华人壮单，但是却有着健康的心态，以及在其他国家华人中鲜见的“主人思维”。柴洪云就是这样的华商之一。

        柴洪云是中国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来波兰之前，有着一份稳定舒适的工作。他英语很棒，同时还能说德语和日语。1994年作为贸易公司的一名员工从中国上海来到波兰，每个月的薪水300美元。

        与同来的那一批华人一样，几年后，柴洪云也开始自己经营贸易公司了，生意做得还算不错。这时他开始把跟光投向中餐馆——这个做贸易的华商并不看重的行业。“可别小看中餐馆！”柴洪云很尊重自己的事业。可能同样的收入，做贸易就是瞬息间的事，而做餐馆却要一盘一盘炒出来。不过做餐饮却让华人的具体形象，走进波兰人的视野中。在华沙的一间家乐福超市开业时，那里的老板特地邀请柴洪云的餐厅去开分店。如今他的华都中餐厅已经有了3间分店，并为波兰航空飞北京的航线代做飞机餐。

        开餐厅很容易与旅游业有合作的关系。喜爱做新鲜事的柴洪云，把餐厅交给厨师负责，又去经营旅行社。在他40岁的时候，他考下了华沙的第一个华人导游证。这对他来说并不是必要的，但是他却乐此不疲。最后用波兰语考理论知识，他得了那一届的最高分。而现在他又开始开展劳务输出的业务，并在自己的办公室装修出了一间教室，打算开办中文学校。

        在柴洪云餐厅的收银合前，有一份彩色打印、用钉书机装订的A4纸的《华都文摘日刊》。这是柴洪云坚持了8年的个人小报纸，确切说是每天的新闻总汇。只要是他不出差，这个“新闻摘要”每天都更新。他每晚用两个小时收集一些外国媒体的评论文章、与波兰华人相关的新闻，然后自己打印、装订，第二天放到自己的饭店、华人聚集小区和中国大使馆。

        平时喜欢写文章的柴洪云，如果当地媒体有对华人的不公正报道，就一定撰文去驳斥。他坦言，自己的优点就是有毅力，“一般人坚持不过我。”当地报纸网站论坛，一有和华人相关的话题，他总是在网上辩论到最后，等别人都去睡了，他留下最后一条帖子，以胜利的姿态，结束一晚的辩论，明天再接着写。

        开餐厅、写文章，慢慢地波兰人就认识了这个“中餐馆老板”。有华人议题，当地媒体一定少不了采访他。如果有和中华文化相关的活动，人们也不忘来找他提供协助。柴洪云也很直率，“只要维护华人正面形象的，我就出来讲，不怕争议；只要是说我们中华文化好的，我都给赞助。”

走在创业路上的波兰华人，在欧洲国家中属于数量偏少的一群，但生存能力却超强。他们有一种新生代独特的自信，似乎什么都能搞起来。

        对于华人来说，波兰的很多行业都是有待去填满的空白。就如当地华商所说：「只要进来，就有机会。」

   捷克东连斯洛伐克，南临奥地利，西接德国，北枕波兰，是欧洲中部的内陆国。

一战硝烟散去，捷克和邻邦斯洛伐克共和国。经历70多年的风风雨雨，1993年这两个难兄难弟好聚好散，分家后各自成为独立国家。

        其实，捷克在欧洲是个制造业发达的国家。从声名远播的皮尔森酿酒技术，到可以与奔驰、宝马齐名的斯科达汽车，就能看出它工业基础的扎实。因此，加入欧盟后，捷克反而比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更快建立起规范的市场体系。

        这样的环境，虽然不能以小商贩为主的移民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对于从事批发贸易和餐饮业的华人移民来说，他们的到来填补了捷克某些行业的空白，相对而言较容易生存。

尽管华人移民大批涌入捷克是较晚的事，但走遍千山万水的华人，还是很早就孤军奋战，闯荡过这片土地。

        据史料记载，20世纪初，就有华人在捷克穿街走巷，贩卖货品。不过，更早之前就有一名来自中国浙江青田的陈姓男子在捷克定居了。他初期做苦力、清洁工度日，到有了微薄的积蓄后，便开始摆摊卖小百货。如今已作古的他，其子孙已经到了第三代，儿子在捷克的乡区经营中餐馆，而孙子则已经移民到澳洲。

        在捷克的公墓，也可看到有一些早期华人移民安葬于此。一名华人的墓碑上铭刻着死者的生卒年份：1881年生于温州，1951年卒于布拉格。至于他到这里的确切日期，就不得而知了。与此相印证的是，据当地人回忆，上个世纪40年代曾有一批温州人来到捷克。

        此后，捷克鲜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鉴于当时捷克的政治体制，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华人移入的可能性也极小。除了数名与捷克人通婚的华人女性之外，几乎没有华人进入捷克。据统计，从1950年至1985年间，在捷克的华人仅有20余人。

        直至1989年，华人才陆续来到捷克。那时中、东欧各国纷纷改革，中国大陆越来越多人想到国外闯天下。但因美国、西欧、日本等国申请签证及居留较为困难，而华人以旅游签证入境捷克后设立公司，即可转为一年签一次的长期居留。在1990年秋季，首批由十人组成的中国大陆投资移民来到捷克定居。1991年，大批个体户涌入捷克，当地居民和外国人在申请商业执照方面并无差别，注册一家公司最低只需3900美元，营业执照有效期是5年。如此宽松的条件，更让急于圆发财梦的华人趋之若鹜。

        早些年，像其他中东欧国家一般。八成以上的捷克华人都在做贸易。华人在捷克的一片天地，可以说是由北京人闯出来的。那时从俄罗斯进来的“倒爷”，经匈牙利转道而来的北京青年都爱在捷克开设公司。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捷克市场的游戏规则，使这些开路先锋得以在捷克风光一时。

        一些在西欧的福建人与浙江人，听说捷克有钱可赚，也跟着过来寻求机会。这些西欧华人有着在中餐厅打工的丰富经验，来到消费更为低廉的捷克，都纷纷开起中餐馆，开始自己当老板。此外，也有人开始做贸易。而从中国直接来到这里的华人，也因为有亲朋戚友的照应而留了下来，暂时先做些小买卖。

        90年代初期，华人间盛传在捷克赚钱容易，就像在地上捡钱一样。即使要缴付昂贵的空运费，从中国运来的商品，在捷克也能够以成倍的利润出手。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捡到钱”，除了一些基础好、有贸易条件的老生意人，或者那些机遇好、悟性高的新手，大多数的人在面对眼前这个红火的市场时，仍是茫然失措，赔得血本无归者大有人在。

        捷克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法令时而宽松，时而严苛，致使华人难以适从。一旦实施苛政，许多捷克华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不少人不得不另谋出路，转到其他国家，或索性回国发展。在1999年左右，捷克华人的数量因此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迹象。直至2003年，在捷克政府对中国人到此留学、经商的政策放宽之后，人数才慢慢回升。

 目前在捷克的4000多名华人中，有一半以上获得了永久居留权。大部分居住在首都布拉格，在奥斯特拉瓦（Ostrava）和布尔诺（Brno）等城市居住的仅有百余人。这些华人中来自浙江青田的华商就占了三分之三。

        近年来，全球贸易不景气，致使在捷克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华商数量一再滑落，反而是中餐馆却一家接着一家开业。中餐馆和批发贸易平分秋色，而欧洲申根协议国家互免签证开放边境，也为华人在旅游业打开了一方空间。

        安身下来的捷克华人，逐渐凝聚成了一个浓缩的华人社会。与西欧，北美等地的老华社相比，它并不完善。捷克老华侨少，本地化程度浅，缺少一群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华人和庞大的留学生群体。不过，这里却有一个杰出社团，和一份坚持了十多年的报纸。此外，第二代华人的教育，从华文幼儿园到华文学校都有不小的规模。

初时，捷克华人历尽艰辛。平日在大市场做买卖，周末还要到外地去勤加跑动。在七八年前最为热闹的就是位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交接处的奥斯特拉瓦。那儿的市场周末前后会连续开放3天，以供周边国家的分销商批货。华商每天凌晨4点就开市，忙到中午时分才收工。一到周四晚上五六点，数个大城市的华商们便会把货车装得满满的，然后向奥斯特拉瓦出发。为了节省时间和费用，他们连夜赶路。多数买不起大货车的小商贩，就驾着破旧的小车子，每天往返布拉格补货。这些小商贩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睡上一觉，车子翻覆以致赔上性命是常有的事。

        来自福建、浙江、上海的南方人，现在回忆起那段日子，心情每每就会复杂起来，并且有许多感慨。“唉！那几年呀可真是苦啊，即使是天寒地冻，也得半夜起来开始装货。车子常常因为货装得太满而在雪地打滑，可说是从雪地里爬过来的呀！但那里的生意真的很好，有钱赚，就什么苦都能熬过来啦！”

        渐渐地，当地人对便宜的中国商品开始存有疑虑。捷克老百姓觉得买中国货无法叫人安心。一是有些中国货品的质量确实不尽如人意，再来是有的华商的货品卖不出去，就把很不错的东西以超低的价格抛售。当地人看到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摊档或不同的时间，价格相差甚远，觉得容易吃亏。尽管如此，中国商品还是深入到每一个捷克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十年商海两‘盲忙’”，捷克华商经常这样自嘲。当年初到这里时，总是毫无计划地做买卖。然而，累积了十多年的经验，华商已经走向成熟，踏踏实实地经营自己的事业。

        捷克华人经营的主要行业，分别是纺织品贸易、中餐馆和旅行社。

        若时值布拉格的春天，驱车往城市边缘奔驰而去，就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花，黄澄澄的，在湛蓝的天空下极为耀眼。在这样的城郊之处，排列着百米长的集装箱仓库，在油菜地旁，有一种不和谐的感觉。这是位于布拉格四区的SAPA市场，很多华人都聚集在这里卖货。

 在布拉格，像SAPA这样的市场，还有十区的HKH市场和九区的CKD市场。它们是“第一波贸易浪潮”的见证。从华人进入捷克至今，最庞大的群体是从事纺织品、鞋子、日用品的批发商与零售商。只是当年杂乱的市场摊贩，如今变成了有规律的进出口业市场。现在的市场里，伪劣产品并不多见了，货品种类繁多，从小袜子到大家具无所不包。各个贸易环节的操作也越来越专业、正规。

        布拉格的大市场也是近七八年才有了规模，其中的SAPA和HKH都是越南村，是几个有实力的越南商人买下的地段。前者是摊位、门市、仓库的综合大市场，后者是仓库式门市的大市场。在捷克曾有个说法：“越南人靠华人货活着”。意思是说，市场的状况是越南人向华人拿货，或者把摊位租给华人。事实上，和越南人相比，捷克华人来的时间短，人数少，根基浅，资金少，只能依靠越南村做生意。但时间久了，越南人摸透了华商的上货门路，自己跑到中国义乌进货，华人的生意就不如以前好做了。

        这两个市场里的几百家商铺，华人经营的摊位只占25%，其余都是越南人的。即使在SAPA里有以中国城（China town）为名的商业楼，楼主也还是越南人。在越南村的华商多是经营鞋子买卖，其次是做服装生意。他们一直都希望在布拉格能有一个中国市场。“可惜这里的华人规模小，在欧洲就只有我们没有中国城。”这几乎是每个捷克华商的一个心结。

 而CKD大院则有一点中国城的雏形。不过，这里仅是华人租下的捷克国有大工厂的几个院子，场地有限，只有几十家公司，是服装、纺织品的第一手批发中心。华人都愿意进入自己的“地盘”，可是这里实在是没有多余空间。除去仓库，可以作为门市的只有两个院子，而且也没有更多的发展余地，要成为华商梦想的中国城，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样，如今在市场做贸易的华人，境况渐趋好转。

        他们早上九十点开业，晚上五六点打烊：周末也不用辛苦地去外地跑市场了。“我们想辛苦也不行了。现在捷克物价涨了，百姓购买力差，布尔诺和奥斯转拉瓦的都撤回布拉格，周边国家的进货商也来布拉格上货。我们即使周末到以前的市场去，也赚不到钱了。”

        在“贸易潮”中，还有一些华人经营的杂货店，他们运过来的集装箱里的东西一般都包罗万象。在布拉格卖得最杂的一家要数三区的一名福建女老板所开的杂货铺。这里从衣服到指甲刀，从日用品到烟酒，应有尽有。也是大市场练摊起家的她，办公桌上还摆着当年在摊位叫卖的照片。她说：“别看这里卖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小东西，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赚取一万美金。不过最近不行了，市场特别萧条，所以我又去开了中餐馆。”

     近三四年间，中国快餐、中国饭店遍布捷克大街小巷，以及购物中心。自从贸易越来越难做，头脑灵活的华人，便纷纷转行经营餐饮业。虽然开餐馆辛苦，但是收入稳定，风险要比跑货小得多。几年间，捷克的大小中餐馆已有五六百家，光是在布拉格就有470多家，其中中餐快餐店占了五分之四，而属于青田华人的餐馆就占了一半以上。

        “我们捷克青田人的特点就是开餐馆。”在公元2000年以前，青田人中十之八九都在做贸易，开中餐馆的也只有30多家而已。而现在青田人一下子就开了250家中餐馆。

        现在捷克的经济快速发展，使这里的薪金、机会、工作环境和西欧相比都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了意大利、西班牙的一些地方。一个大厨每月收入可以达到1400欧元左右，服务员也能取得1000欧元。因此，抱有长久居住心态的青田人越来越多。他们从亲戚、老乡处凑一些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再托朋友从中国发货时帮忙运来一些桌椅，一间小快餐店马上就可以开业。

        中国快餐店里的食物完全迎合当地人喜爱的酸甜、油炸口味。叫上一份四五欧元的套餐，吃到嘴里的口感和汉堡加番茄酱并无多大差别。若来的顾客是华人，一般店主都对厨师喊一声“给中国人吃的”，厨师便会酌量地少放些勾芡。而走商场路线的中餐，都是做好了菜，让客人随点随吃。当地中餐快餐的翘楚，是来自上海的吴先生。他拥有3个快餐品牌，经营中捷混合的菜色，在捷克有20多家分店，甚至连小镇上都能看到他的连锁店。

        若是中高档定位的中餐馆，店面和装潢就气派得多，食物口味也颇为地道。顾客前来光顾，恍如置身于中国的某家餐厅。当地人也很喜欢这样的中餐馆，不少社会名流都是这里的常客。

        中餐馆需要大量的中式调料、干货、蔬菜。在布拉格的3家华人食品批发店和两家华人农场，主要客户就是这几百家华人餐厅。另外有很多翻译公司与咨询公司。很多通晓华语的捷克人和俄罗斯人，也为华人公司工作。

        捷克加入欧盟和申根协议后，进入捷克旅行比以前方便许多，于是专门为华人服务的旅行社也应运而生，成为捷克华人的新兴行业。但因为开办旅行社的门槛较高，办理手续、注册、交税等更为麻烦，所以目前正式注册的旅行社还是屈指可数。虽然客源主要是大陆人和少部分东南亚人，但雇请导游兼翻译员也不容易。在捷克还没有官方认可的正式华人导游，很多导游都是兼职的，同时为几家旅行社工作。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在布拉格从事导游行业的华人，加起来仅100人左右。

 提起旅捷华人联谊会（简称“华联会”），不禁使人肃然起敬。它的灵魂人物是唐云凌。

        20世纪50年代随丈夫来捷克定居的唐云凌，十多年前创办华联会，目的竟然是为了对付华人的恶势力，主持社会正义。唐云凌以一已之力，坚持了十余年，为当地华人服务。刚到捷克的华人，没有工作的可以找她；被恶势力威胁的，可以找她；遇到牢狱之灾的，也可以找她。即使下大雪的午夜，唐云凌一旦接到电话，也会爬起来开车去解决华人的问题。

        直言不讳的她，总是针砭时弊，提出一些“不受欢迎”的言论。比如，她主张华人公司的老板要善待自己的员工、给打工的华人足够的休息时间、合理交税、购买保险，不能因为在他乡异地，对待当地人和自己人就有不同的待遇。

 唐云凌说，华联会的目的就是有意启发捷克华人的思想，打动大家的良心，让同胞们发现彼此美好的一面。

唐云凌的人格感召了一批华人，来从事华社的公共事务。当地的华人华侨妇女联合会、第二代华人子女的学生会、餐饮协会，都是在唐云凌的支持下组成的。

        此外，捷克还有以地缘为基础的青田同乡会，商业性质的中华第一商会，以及捷克欧中文化交流协会、中捷友好协会等。

        华联会最大的一项成就，就是坚持主办了捷克唯一的华文报纸——《捷华通讯》。

        乍看《捷华通讯》，会觉得它做得十分简单；薄薄20个版面，黑白印刷，平实的设计，浅显的文字，与一些欧洲的华文大报的规格没法相比。但一则则文章读下去，就会发觉，这里的每一条新间，都有很高的含金量，对在当地生活的华人有着很大的帮助。从当地和华人相关的法律条文的白话解释，到如何填写捷克文的各种表格，报纸都做了详细的解释。有的华人甚至把每期报纸都保留着，以备他日派上用场。

        其实，报纸从创刊到现在，十多年风格有意保持不变，目的就是让大部分华人能够读懂，方便保存，在生活和工作中有实用价值。

        在捷克，华文媒体最热闹的时候，曾经有过6份华文报纸，但是只有这份简单的报纸坚持了下来。其宗旨是：尊重华人大老板，但是偏向中下层华人的需求。大家需要什么，就写什么。报纸对内容审查很严，即使是刊在后面的广告，也是严格把关，不但要刊登广告的公司或个人须出示营业执照、护照，而且必须是名声很好、没有负面影响的才可以上报。很多不正规的居留办理公司及涉嫌经营夜总会、赌场的俱乐部，试图上门求助，都碰了一鼻子灰。

        报社的人员很少，只有两三名记者和一名主编。报纸70%的文章，是他们亲手翻译、采访、综合编辑而成。每月在出报的前一天，华联会的唐云凌和几名副会长，会陪着主编和记者一起把报纸做完，每次都到午夜才能结束。在成年华人约有3000多名的捷克，报纸每期印刷五六百份，覆盖率不低。

        而网络上华文媒体则以多种形式存在，有综合性的网站《捷华网》、论坛形式的《中捷行捷克华人华侨网》、《捷克华人》及《留学生之家》、提供各种信息的《捷克华人网》、《华人街》和捷克汉语工作者主办的《CINSKY》、以及博客形式呈现的《布拉格华人视界网络杂志》。

    华人来到捷克有不同的原因，有来此创业做老板的；也有不能入境他国辗转流落到此暂居的，偏偏就是少有一开始就决定要移民捷克的。

        大家漂泊到这里后，才发觉这个中欧小国生存环境不错，交通方便，文化氛围浓厚，只要自己愿意勤劳工作，收入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活素质保证不差。

        一开始有着过客心态的捷克华人，流动性颇高。他们对今后的打算，都说“看着走”。2004年捷克加入欧盟后，越来越多的华人都觉得在这里定居不错。尤其是得到了永久居留权的华人，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开始购房置业，慢慢转向安居乐业。

        打算在当地生活，就要结交那里的朋友。很多华人都有自己的捷克朋友，而且多是警察或律师，在关键时刻可以帮上忙。但华人一般和自己的捷克员工、相处得并不融洽，很多都是不欢而散。在华人老板眼中，捷克人较爱面子，总是和客人聊得火热，却不管生意做不做得成。不仅如此，他们不时会借一些小钱，耍点小聪明。结果华人老板的解决方法经常是让他们走人了事，换来一份清静和省心。

        如今，一部分华人在捷克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别墅和车子，与左邻右舍和平相处。他们会在圣诞节互送美食，偶尔互相造访，讨论如何管教孩子，去哪里度假，怎样修整花园。在院子里举办烧烤聚会的时候，也会彼此邀请。日子久了，就连做的中餐也是如西餐一样，蔬菜要么做沙拉，要么放在沸水里煮，很少煎炒烹炸了。

        而大部分暂居的华人，还是以租房为主。条件好的自己租一套公寓，要省钱的就租一房，有的甚至与别人搭房。平均每月收入千多欧元的华人，与当地人相比，收入还是稍高的，加上华人省吃俭用，可以攒下一半的收入。而当地人却常常入不敷出，但还是宁可借钱也要去度假。也难怪捷克人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个子不高的华人，转眼

间就能像表演魔术一样变出一家餐厅。不过捷克的第二代华人孩子，却看怕了父母起早摸黑的忙碌，都不愿意子承父业。

        在文化氛围浓厚的捷克，只要孩子和家长愿意，就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读完大学在就业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大多以同时掌握几种语言。一些华人的捷克文生意合同，都由自己的孩子来谈判和查阅。

子女的能力比父母更强，却不愿继承自己辛苦创立的事业，华人家长内心也十分矛盾。他们既不愿让孩子受苦受累，又希望孩子可以留在身边帮忙。有家长一等孩子读完书，就为他买上一辆BMW轿车，换来孩子留在身边一起做生意。

        在排外气氛较浓的捷克长大的孩子，总是有些尴尬地徘徊在这个不那么随和的西方文化边缘。

        这里的华人家长说，孩子们大多要经历过一段痛苦的适应期。虽然在父母的财力支持下，他们不用再面对谋生的窘迫，却有着一种压抑的孤独感。在孩子们稚嫩的日记里，会写道：“以前学习不好会被同学笑，现在学习好又被质问，一个外国人干嘛要学得这么好。”在学校里被同学说华人不好，孩子们回来问家长：“华人和捷克人到底哪个好？”面对这样的困惑，华人家长也暗自替孩子感到心疼。

        当地唯一一所华文学校——布拉格中华国际学校，被华人称作“中华小学”。成了华人孩子们喜爱的地方和找到归属感的场所。

        学校原是全日制、为短暂停留的华人孩子服务的华文辅导中心，后来发展到半日制的华文学校，以华文为主，同时教授中国的数学、美术、音乐、自然等课程。目前这里的70多名学生，都是上午在捷克学校或国际学校上课，下午来到这里学习华文。学校的半日制课程设计，就是为了鼓励孩子融入当地社会，突破华人自己的小圈子。而一些数理课程，则针对流动性强的捷克华人群体，方便孩子以后回到中国读书。

        为了让捷克人更了解中华文化，同时培养华人孩子们的自信心和社会认同感，学校还组织了各种文化表演。有时演出和捷克学校的上课时间冲突，孩子们宁愿请假，也要来参加活动。家长们感到，即使对在当地出生的华人孩子，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融入血液的。

        在距离十区HKH越南村不远的地方，还有一间中华幼儿园，园址就是校长席平自己的别墅。曾在中国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席平，在从事贸易多年、经济条件成熟后，终于在2007年开始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

        幼儿园的目的就是为繁忙的家长减忧，方便做贸易和经营餐馆的华人专心工作。家长可在任何时间来接送孩子，还可以选择日托或者长托，这要比捷克的幼儿园方便许多。同时这些说浙江、福建方言的孩子，在这里也可以更好地学习华文。幼儿园的课程都是寓游戏于学习，至今已经教育了四五十个华人孩子。

        从漂泊到稳定，当初独自打拼的华人渐渐接来妻儿老小。家庭团聚，华人走向安居乐业之路，更渴望幸福层次的提升和心灵上的满足。因此在1995年，布拉格华人基督教会孕育而生。在教会建立的十多年来，信众逐渐增加，现在已经有100余人，其中以浙江信徒居多。教会租借当地一座教堂的楼上来活动，条件与东中欧其他国家相比是颇好的。有信仰的生活让一些华人更有爱心、更友善。因此，当地的华文报纸还免费为其刊登广告。

   很多海外华商在生意上轨道后，都喜欢在自己的爱好上玩上一票。在捷克，本是中餐厅老板的黄频，起源于自己偶然写的一篇文章，便一头栽在他的新闻事业中，不能自拔。

        黄频来自青田，在老家大学毕业后，曾经在青田电台工作。因受同乡们的影响，他感到出国做生意才是有出息的正路，于是先到了奥地利，然后又来到捷克经营餐厅。他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在当地小有名气。因一次在上海浦东机场抓小偷的经历，黄频写了一篇稿子，被刊登在奥地利的《欧洲联合周报》上。

        这让黄频再度找到了写作的感觉，开始写文章，并与《欧洲联合周报》合作办了几期捷克版。可是，由于华人太少，没有广告收入，办了几期让他亏了不少，专版也就因此停办。不过稿子却留了下来，并发给中国新闻社。没想到，中新社采用了一些稿件，让黄频兴奋不已，更有了继续写作的动力。随后，他就自己创办了中欧新闻社，把所有的精力全部倾注在新闻社的网站和写稿上。

        黄频每天花很多时间在电脑前，关注各界新闻，看到好的捷克新闻，就自己尝试翻译。有重大事件的时候，他还自己去采访。写出来的稿子，任何媒体只要注明出处就可以刊登，不收任何稿费。而他的主业——中餐厅，就交给太太管理。他的太太抱怨道，他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最有趣的是，他的青田同乡们也很支持这个“个人通讯社”。一有新闻线索，只要大家有空，就会陪同黄频一起去采访。在捷克加入申根协议开放边境的时候，大家下班后，就陪他去捷德边境采访。他们笑说：“我们给了黄频很大的精神支持。”

        黄频也梦想着有一天可以拥有自己的报纸。他说：“我什么也不图，就是喜欢。”看来，他这个爱好仍会执着地持续下去。

  曾有旅捷华人写过一部小说，叫做《布拉格有张床》，讲述一名为追求艺术理想的华人画家来到布拉格，在公司打工、在越南村卖货、恋爱、赌博、沉沦和振作的过程。当地华人觉得故事并不真实，毕竟这里和艺术沾上边者只是凤毛麟角，但这本书名却似乎是漂泊捷克的华人的心情写照。

        来到陌生的异乡，语言文化迥异，要生存，要赚钱，要生活。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曾经经历的是无奈的漂泊、人生的聚散。对于普通的捷克华人来说，可以让心灵憩息和真正属于他们的东西，也许就是那一张或大或小、或舒服或凑合着用的床。

斯洛伐克是中欧的一个内陆国家，与捷克、波兰、乌克兰、匈牙利及奥地利为邻。斯洛伐克原本仅是一个区域名称，最初是大摩拉维亚王国（GreatMoravia，830-905年）的中心地区，十世纪后成了匈牙利国土的一部分，1919年独立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1939年，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占领，并首次宣布以“斯洛伐克”立国，但当时仅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国。二战后，斯洛伐克再度与捷克联合为一国，直到1993年才脱离捷克，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

        虽然斯洛伐克与捷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各方面却更受匈牙利影响。一直以来，捷克着重工业发展，斯洛伐克则为传统农业国，两国之间早就埋下了分家的伏笔。

        今时今日，斯洛伐克凭着自身的实力，开始工农并重，发展逐渐步入佳境。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成了工业发展中心，造船、家具、化学、烟草等工业皆有不错的发展，斯洛伐克因此而成为华人经商移民的选择。

    若与其他国家比较，斯洛伐克的华社可说发展神速。甚至有人说，其他国家的华人需100年时间才办成的事，斯洛伐克华人却能在短短的十年内完成。

        20世纪50年代，当捷克斯洛伐克还未分家时，大部分华人都聚集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Prague），而斯洛伐克境内的华人则是少之又少。

        1992年12月31日，捷克与斯洛伐克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斯洛伐克处于百业待兴，一切从头开始的状态。那一年，聚集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华人不过区区23人。

        在到处都有浙江人的欧洲，这23名华人却不是来自浙江，而是来自移民史上鲜少出现的北京。他们到来的原因各异，只是大多在此待了一段时日之后便陆续离开。

        “北方人恋家，落叶归根了。他们是最初的开拓者，但经营批发业的时间不长。随着浙江人的到来，这些早期移民大多已往美国或返中国发展。”40岁的李迅也是当年的开拓者之一。他表示当年因人数不多，他们并无任何组织，只是偶有聚会。

        至于北京人为何成了拓荒者？原来，他们早在斯洛伐克独立前两年便已经洞悉商机，捷足先登到此从事批发生意。有的更在斯洛伐克建了几个大型的批发库，而那些初来乍到的浙江青田人便是他们主要的客户。

        斯洛伐克的华人移民潮可分为3个阶段。1991年至1995年间，持中国护照者可免费办理签证，手续简易，于是华人便从匈牙利、俄罗斯等周边国家迁移过来。其中的原因不外是因为听说斯洛伐克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当时有一名华商的住家被人破门行窃，单是现金便损失了十万美金。结果此新闻一传十、十传百，名不见经传的斯洛伐克顿时火红起来了。从此以后，周边国家的华人便陆续到来。”李迅回忆道。从这个事故中，华人看到的不是斯洛伐克的治安问题，反倒是赚钱的机会。

        一些华人表示，虽然匈牙利早年曾经大开门户让持有中国护照者进入，不过要入籍却另当别论。当时，在捷克“办身份”比较容易，于是华人就纷纷涌至捷克去办国籍，准备进入匈牙利，以便能够堂堂正正在当地经商，无奈途中却碰上百般阻绕。幸好持有捷克国籍便可轻易在斯洛伐克获得工作准证，华人于是辗转来到此处。

        1994年到1995年期间，斯洛伐克的移民局开始实施限制移民的苛刻条例，华人必须符合种种条件才能获得签证，这就是当地华人所谓的“签证被卡死”。

        斯洛伐克迎来最大批的移民是在1995年至2003年间的第二阶段。据当地华人的说法，那时候的斯洛伐克有可能是因为人口不足，急需填补人口，因此才将入籍条件放宽。

        到了第三阶段，即是从2003年直至现在，这里已经比较少见大规模人移民，而在此落脚的华人也发展稳定，开始投资房地产，只是拥有非凡成就的华人仅占小部分。

        而今，华人入籍斯洛伐克并不困难，只要拥有合格居留证以及通过斯洛伐克语的考试即可。

     直到今日，斯洛伐克华人的主流行业仍是“开库”，即大家熟悉的批发库。1993年后远道而来的华人，身上只带着有限的资本，一切从练摊开始，开库是后来的事。

        “那么远过来，说什么也要干一番成绩回去。”斯洛伐克的华商有着不服输的傲骨，加上刻苦耐劳的精神，咬紧牙根挨上三五年，待有了积蓄后再开辟新天地。当时，华人两手各提着沉甸甸的货品，到处练摊赶集，遇上突击检查时，裹起麻布拔腿就逃。在有能力开库以前，华人都是日复一日重复着赶集、练摊、逃跑的生活。

        每个开库人背后都有一段练摊的艰辛经历。这里没有一夜致富的奇迹，只有辛勤劳作结成的果实。

1992年为华人练摊初期，做生意的地点就在斯洛伐克机场。因为这里人流多，生意自然好，除了华人，也吸引了越南人、蒙古人及寮国人在此地练摊。

        “当时，我两手各扛着装有25公斤纺织品的塑料袋，清晨时分就在电车站等着搭车，准备到市集练摊去，但往往一上车就给司机赶下来，因为货物占了很大的空间，让车厢更拥挤。司机甚至对我说电车是给斯洛伐克人乘坐的交通工具而不是运载货物的货车。”目前拥有两个批发库的青田人罗云标不疾不徐地表示，当时被赶了下来的他，只好继续等待下一班车，直到过了拥挤的上班时间，司机才不会刁难。“斯洛伐克人还是比较随和的。”言谈间没有责怪及埋怨，斯洛伐克华商的豁达宽容就如斯洛伐克国民性情，温婉顺和。

        既然如此，为何华人不避开繁忙时间，宁可日复一日重复着被赶下车的日子？“练摊、赶集自是愈早愈好，有时走运，就顺顺利利上了第一班车。”

早期华人曾在这个名为PB的市场中练摊起家。

罗云标被赶下车的苦涩日子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之后便和一起赶集的华人共乘计程车到处练摊，而且练摊工具中还多了铁条。”他表示，这样就能把衣服样品挂在铁枝上，招揽客人，练摊手法更上一层楼。

        际遇及条件不同，使华人发展速度各异。身怀资本的华人往往在练摊一年后，便有能力买个蘑菇状的小亭子，自此做买卖时便不会被日晒雨淋。“1993年，我以1万5000美金买了个亭子，每天早上搭巴士来到PB（Podunajske Biskupice）市场做买卖。后来又买了辆‘斯柯达’代步。”华侨华人商会的会长季爱雷在同一年就买了3个亭子做生意。季爱雷表示，虽然当年越南人比华人更早在该处练摊，但他们的发展没华人迅速，原因在于越南没有太多加工产品。“我几乎每天凌晨一点钟就起身打点一切。”斯洛伐克有个设在三八路的三八市场，自1997年起就有较多的华人在此练摊。如今，即使不少华人已成了批发商，然而，练摊人的身影在这里依然可见。

        “以前星期五、六、日就是繁忙的赶集时刻，通常星期五赶集地点是体育场，星期六则在军用飞机场，星期日在跑马场。”华商表示，只要有商机的地方，就会见到华人的踪影，总之有练就有赚。“就算生意少，一天也能赚50至60美金，生意多则有100美金。”当年的练摊人除了向早期移民北京人取货，他们也会到匈牙利进货。

        据说，1997年是练摊生意最兴旺的一年，练摊华人有时一个月可以赚上17万美金，年收入达150多万美金。

        练摊营业额要属冬天最佳，因棉服利润高，生意自是不错，但就苦了练摊人。他们嫌棉服厚重，无法行动自如，因此常常弃棉服不穿，改将保护衣服外层的塑料袋往身上套，以此保暖。“我在塑料袋剪了3个孔，套在身上，这样就暖和多了。”一名华人说。

        大部分华人不愿重提当初那段心酸的经历，每每问及，他们就轻描淡写地拨开话题。他们只想积极地朝着更成功的方向发展。

移民初期，手中有小资本的华人会买下小亭子做生意。

 如今，练摊时代可说已近黄昏，华人正式步入批发业时代。

        最初的华人批发库没有一个集中地，而是东一间、西一间地散落在全国各地。后来华人决定把库房建在一起，方便零售商取货，从而带旺生意。如今，在Stara Vajnorska 17这段路上，两旁都是华人的批发库房，长达7公里。入口处有个大大的中文招牌标示着“斯洛伐克华人分销中心”，左边有家由华联会会长季新炎所开设的小赌场“拉斯维加斯”，右边则有家中国食品厂，中间还有栋正在建设中的综合大楼，而对面就是华人最常光顾的湖滨饭店——这些建筑全属华人所有。

斯洛伐克华人批发库的入口处有个“拉斯维加斯”小赌场和酒吧，让华商空闲时可以聚聚或小赌一番。

 目前，这里的批发库有80多家，总面积十多万平方米，平均每人坐拥2000平方米。外形犹如半个巨型铁球的批发库并排在一起；有些较大型的批发库则为独立的楼房式建筑，通常底层的前半部为门市销售，供零售商挑选货物样品，后方为储藏室，楼上则是办公室及工人房。

        华人的奋斗精神带动了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华商自豪地说：“我们制造就业机会。”的确，在华人批发城里，可见到不少斯洛伐克工人忙着搬运货物，甚至华人餐馆也可见当地雇员。此外，这里每个库房每年缴不少的税，也让国库增加不少收入。据了解，斯洛伐克税收不高，华人的净收入无论多少，一律抽取19%的税率。斯洛伐克人的衣着从之前的朴素模样到如今的摩登亮丽，成衣批发零售业可说是居功不小。华人成衣批发商的出现，让斯洛伐克人的衣着品味提升了。斯洛伐克人月入介于600至700欧元之间，中国纺织品价格便宜，自然受到当地人的欢迎。至于价格廉宜的物品是否符合当地口味，华商们则需要不时进行市场调查。“我偶尔会忙中抽空上街逛逛，看看当地人的服饰，知道他们比较朴素，因此订做或选择的产品颜色都比较单一，尽量避免花花绿绿及大红大紫的服饰。”批发业老板孙康强表示。

        批发业生意兴旺，带动了零售业的崛起。目前，属于华人的零售店就有400多家，遍布整个斯洛伐克。每逢周六周日，居住在其他州属的华人就会浩浩荡荡地驱车到首都取货，并在这儿待上一天，顺道会会老朋友，尝尝家乡菜。

   批发业看似无限风光，却也遇上不少问题。政府在华人进驻批发业的十多年来就曾封了两三次仓库，以稽查逃税商品，造成华商蒙受亏损。2008年5月12日，斯洛伐克海关、特警及工商部的官员又再度封库进行大检查。有鉴于此，华商们终于在2008年6月成立了华侨商会，目的就是要华人了解税务及法律方面的课题。

        近年来，华商对着大幅度滑落的业绩频频摇头叹息。华侨华人商会会长季爱雷说：“贸易做个十年就会走下坡，蓬勃景象只是一阵风。”全球经济不景使斯洛伐克华商的生意大受影响。有半数以上的批发商赚不到钱，但他们却无计可施，只能静观其变。

  在批发与零售业备受经济不景的打击时，后劲十足的餐饮业却在此时冒起。可以说，现阶段是中餐业最兴旺的时期。

        一直以来，中餐业因为成本高，利润却不如批发业，导致斯洛伐克华人不太愿意涉足，尤其是青田人。餐馆老板表示，斯洛伐克人对华人饮食文化兴趣很大，因此对中餐要求高，非得要合格厨师才能满足食客的胃口。

        斯洛伐克中餐业按部就班地发展，虽从没像批发业那样如雨后春笋的蓬勃景象，但在首都，中餐馆却也随处可见。目前，布拉迪斯拉发共有50多家中餐馆，多由来自周边国家的华人所创立。

      斯洛伐克首家中餐馆——湖滨饭店的其中一名股东，是持有奥地利国籍的浙江人季岳普。他说：“起初与亲戚合伙开了湖滨饭店，如今我自己在斯洛伐克华人批发中心开了间家庭式的京华酒家。”

        别小看这间家庭式的酒家，这可是批发中心唯一的中餐馆，而且提供的中华美食颇为地道，华人社团一般都选在此处开会聚餐。

        斯洛伐克华人经营的餐馆基本上可分为高档次餐馆、西式中餐馆、家庭式饭店，以及近年来崛起的连锁快餐店。业者都舍得投入资金，把餐厅装潢得富丽堂皇，其中以“上海饭店”最有气派。跨过门栏，映入眼帘的是古色古香的宫殿。高达9尺的假山以及小桥流水，美不胜收，让人仿如穿越时空回到古代，置身于公侯世家的庭院里。

在这个古典与现代建筑交错的城市里，望向高处，总能看见小小的中文广告牌穿插其间，成为这里独特的街景。中餐馆的食客中多为黄皮肤的中国人，餐牌上的菜肴价格以欧洲的标准来说，算是非常合理。

        十几年前，斯洛伐克流行“欧化”中餐。如今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不断扩大，中餐逐渐回归原汁原味。“如今，老外也晓得何谓正宗的中餐。他们不光是对中餐情有独钟，对韩日等菜系也颇有兴趣。”同样拥有奥地利国籍的亚洲饭店创办人胡晓媚如此表示。她说，光临高档中餐馆的当地人通常都是政要及商人，而新式中餐厅不只售卖中餐，也有日本寿司、韩国烤肉、泰国冬炎等菜肴。

        新一代餐饮业者不只对菜肴及店面装潢极讲究，还得了解当地的民族特性。“老外口味有地域性的区别，如接近匈牙利地区者嗜辣、东部人爱甜。”说起当地饮食口味，胡晓媚往往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一些欧洲华人之间冷漠相待的说法时有所闻，不过中欧内陆的寒冷气候却没让斯洛伐克华人变得冷漠。斯洛伐克华人对陌生面孔的同胞会非常热情，纵使头一次碰面，也会给对方一个关怀的眼神及友善的微笑。

        斯洛伐克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大使馆主办的聚会可以让侨领、留学生及商人相互认识，拉近距离，彼此也留下联系方式，以方便日后能互惠互助。

        虽法律规定批发库不准作零售生意，但热情的华商总会用低价把衣服零售给留学生；而华商在需要语言方面的协助时，亦会请留学生充当翻译。

        “这里有公派的留学生，就读学科包括了电子工程、经济管理学、欧洲国际关系及斯洛伐克语系等。”留学生们说，这里的学习用语包括英语和斯洛伐克语，而他们所掌握的外语正好是华商所需要的。

        生活上的种种需求把不同领域的华人拉在一起，互相扶持。

        大多数斯洛伐克华商虽然自身教育程度不高，却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即使身在海外，也坚持要孩子在祖国将母语学好，方才接到居住国来一家团聚。“之前也试过把孩子接来此处上免费的中文班，可是因人数太少，而且年龄不一，难以集中教导。”多数华人如此表示。

        因此，华人通常会让孩子在家乡求学至中学毕业、才接到斯洛伐克升学。“我们把孩子送入斯洛伐克大专学府，或让他们在当地高中接受教育，目的是希望孩子能学会这里的语言，在此地立足。”不少斯洛伐克华人甚至大手笔每年花上一两万欧元把孩子送入英国或美国国际学校就读。

移民历史不过十几年，区区二三千人口的斯洛伐克华社，社团组织却有6个，包括最早成立的青田同乡会、斯洛伐克华人华侨联合会、斯洛伐克中国友好协会、华人华侨商会等。

        斯洛伐克华社有个社团联合会，只要打一通电话过去，便会以事务性质分别交由相关社团处理。华团虽多，但每个侨领依然非常忙碌，因此办公室也设在他们口中的“大库”批发库里，虽然不见招牌，也没有所谓的会馆及会址，但是徽章、章程等却一一备足。

        “‘几会是一家，就是靠大家’，这就是我们斯洛伐克华社强调的统分结合。”社团联合会会长季新炎表示，分工合作是斯洛伐克华团的特色。他说，只要把各华团会长团结起来，那会员之间的团结也就不会有问题。

华人从最初的练摊走到今日的置产，一切看似循序渐进，其实过程中所历经的种种磨难绝非外人能体会。但斯洛伐克华人的韧性，却是在受尽煎熬的苦难岁月中磨练出来的；而岁月磨不掉的，是斯洛伐克华人之间浓浓的人情味。彼此间互相扶持，相濡以沫的真情，常常叫外人动容。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矗立着7个穿着东方服装、骑马射箭的勇士雕塑，他们代表着最早创建这个国家的7个部落，是为纪念匈牙利人西迁定居欧洲1000周年而建。

        有着浓郁东方情结的匈牙利人，经过十多年的官方考古协会研究，宣称自己的祖先源自新疆天山一带。就连大部分欧洲人也觉得，匈牙利人的思维模式很东方，不但语言与印欧语系不同，而且姓名也如东方人一样先姓后名。

        拥有蒙古式宽阔面骨的匈牙利人，本来就与遥远东方的华人有着奇妙的联系。在上世纪80年代末，匈牙利成为了欧洲惟一对中国免签证的国家。这象征两国友好关系的一纸协议，在华人移民史中意义非凡。它不但掀起了一股移民热潮，更为华人大规模进入中、东欧打开了一扇大门。

   有人说，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有华人漂泊到匈牙利，但是具体的人数及其他详情则已无从考证。一些文献提及，匈牙利政府曾在1945年勒令当地华人必须在十日之内离境，否则将他们逮捕关押。当时，仅有一户人家留了下来，即祖籍上海的吴恒昌，他被关押一段时间后获得释放，并定居于匈牙利。

        直至上世纪50年代，进入匈牙利的华人仍是寥寥无几，仅有数名中国女性，以及匈牙利留学生因通婚而移居匈牙利。她们有的当翻译，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则经商。据相关资料统计，到1978年，匈牙利的华人只有24人。

        80年代后期，有100多名中国东北人通过劳务输出来到匈牙利，合同期满后，其中30多人决定在此定居。

        1988年“中匈互免签证协议”出台时，适逢中国80年代末的“出国热”。北京、上海一些信息灵通的青年，在对比西欧和北美等国签证较难、路费较贵的实际情况之后，马上将目标转移到这个印象中的“欧洲香港”。大家拿着护照、怀抱梦想搭上国际列车，穿过中国东北，跨越广袤的西伯利亚，十天后抵达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

        在一片争先恐后的出国热潮中，出国是目的，落脚何方并不重要。他有没有挑选的权利，也来不及挑选，只是恰巧因为这里不需要签证。也就来了。

        初抵匈牙利的华人，对于这个国家顿感眼前一亮：空气清新，绿树成荫，古典建筑优雅地仁立在多后河两岸，当地人又温和友善，原本的舟车劳顿一下子消散殆尽，心情也豁然开朗，当然，最重要的是，此地看来“钱”途宽广。

        第一波闯进匈牙利的华人，不是拥有在俄罗斯倒货的经验，就是在北京红桥、秀水市场做过买卖的。他们在城边铁路旁的一处空地，手上拿着货物，就开始了站摊生涯。小摊贩的管理极为松散，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位置，提着头花、内裤、发卡等小件商品东张西望地转悠。虽然所卖的货品看似不起眼，但很受匈牙利人欢迎，颇有赚头。

        那时，华人在匈牙利居留也算是挺容易的，只要交上申请，很快就可得到一张有效期为一个月的白卡。几个人凑上8000美元，将其中7000美元存入匈牙利银行，1000美元则交给匈牙利律师作为手续办理费，就可在当地注册成立一家公司，而且还能获得十个人在匈牙利3年居留的黄卡；持黄卡住满两年后，就能够申请15年长期居留的蓝卡。

        传出去的这项消息是那么地激动人心。中国国内的人们于是带着希望与抱负，一车紧接一车地从北京赶往布达佩斯。先前一些在欧洲其他国家历尽千辛万苦也得不到合法居留的浙江、福建等地华人，也闻讯而纷纷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荷兰等国涌入匈牙利。大家一到了布达佩斯，不论以前是博士，还是政府官员，全部都去练摊，做生意完全不懂市场规律，全凭感觉摸索，个人觉得什么好就上什么货。后来因为供不应求，他们上货不再是一包一包地上，而是以集装箱批发。回忆起当时的盛况，匈牙利华人至今还觉得恍如在梦中：“从中国带来的白背心，在这里的地下印刷厂印上名牌商标，一元人民币能卖100元，哪里是在印图案，简直是在印钞票！”、“那时候，袜子从来不洗，脏了就扔。”

        在短短两三年内，匈牙利就聚集了至少3万名华人。

        然而，这段蜜月期实在是短暂。有些华人的一些不良行径开始引来非议。他们不拘小节，把租来的住所弄得脏兮兮的，而且乱七八糟；电话费欠了几千美元之后，人就消失了，害得求索无门的匈牙利老妇人拿着账单去使馆哭诉：“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为了要把从事不法勾当、无合法居留权的外国人全部驱逐出境，匈牙利政府取消了免签政策，对前去延长居留期的华人，加盖“黑章“，予以拒绝，同时、索贿、殴打和辱骂华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许多人纷纷撤出匈牙利。不少人还没踏足匈牙利的土地，仍在火车上就被挡在国境之外，淘金梦碎，因而不得不辗转到邻国或返回中国。

        1992年初，4名匈牙利人得到了布达佩斯八区铁路旁的管理权，成立了一个正规的约瑟夫市场。由于有4名老板，故此华人都叫它作“四虎市场”。

        这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地方，造就了许多亿万富翁。在90年代中期，四虎市场成就了匈牙利华人的辉煌，使之在周边各国声名远播。那时华人只能够以企业法人的身份入境，因此人人皆是老板，并自称“老搬”——总是在搬货。即使是再大的老板，也要从自己推车运货开始做起。

        于是，华人又开始大量涌入经商，所销售的商品五花八门，就像超级百货公司般琳琅满目，而匈牙利刚刚转型的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又是那么地如饥似渴。这一切促成了匈牙利第一代华人迅速地通过贸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50年的路。”在海外这么说，就知道是指匈牙利华人。

匈牙利华商的孕育之地——四虎市场。

    匈牙利现有3万华人，约2万人直接来自中国大陆，一万人则从西欧流动过来。他们的飞速崛起和斐然成就，令当地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在中、东欧地区，华商地位最高的当属匈牙利。

        以浙江青田、温州人，福建三明、福清人占多数的当地华人，大部分集中在首都布达佩斯，95%依靠贸易生存。这里三分之二的华人持有长期居留证，因工作的关系往来中国与匈牙利，所以大部分华人都不入籍，觉得保留中国护照更加方便。

        对于外界的褒评，匈牙利的华人很理智。他们认为，与欧美国家的老移民不同，匈牙利华人移民时的社会条件更好了，他们的视野更开阔，自身起点高，再加上历史机遇，成长异常迅速是很自然的。

        匈牙利华商近20年的奋斗史，可以说令当地社会瞩目，但华人经济实力还谈不上能影响匈牙利的经济发展。即使是某些被公认成功的人士，他们的实力与一些老牌移民国家的华商相比，也有不小的差距。不过，他们确实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种种便利。

        现在，匈牙利华人已经不如外人想象得那么轻松自在——“钱不用数，而是放在秤上称”。曾经的暴利已成追忆，如今一年从几百万欧元的收入到赔得血本无归的大有人在。成熟的市场中，只有那些有基础、已经做大了的华商，靠着稳扎稳打，前途才会广阔。

        不过匈牙利华人的活力依旧，当地福建华人经营的小商店，遍地开花。在这个自然环境美、生活节奏慢、人民和善、消费不高的国家，华人潇洒生活，华社朝气蓬勃。

        “公司好，品牌强，报纸多，社团林立，宗教活跃”，这是当地华人对自己的评价。“匈牙利华人”这个称呼，让他们非常自豪。

四虎市场如今已成为布达佩斯地图上的一个景点，被称为中国市场（Chinese market）。在城市里免费派发的旅游手册上这样介绍：“这是一个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的地方，比洗衣服还便宜，而且日日营业！”但真的来到这里，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诱人。

        虽然占地面积不小，但是露天的四虎市场很简陋，摆设的货品也很廉价。里面七八成的摊主都是华人。看着稀稀疏疏的顾客，他们满腹牢骚：“欧洲哪还有这么破旧的市场！生意越来越难做，每天都在赔钱。”

        早在90年代末，四虎市场就已经没落了。1995年是匈牙利华商的分水岭。

        政府政策的调整和周边国家批发市场发展日趋成熟，导致这里的华商开始分化。与四虎市场类似的露天市场，如上海市场，欧洲市场等，不是消失，就是没有人气。四虎市场里的华商也是一批批地换，虽然早已不赚钱，但是只要是新来的华人，就一定要到这里“滚”一下，学习本土经商规则，好似入行的必经之路。

        因为四虎市场影响市容，布达佩斯政府儿次都想取缔它，而华人也在别处建起了购物环境良好的中国商城、亚洲中心，希望可以取代四虎市场的地位。可是，这个已经衰落十年的匈牙利华商摇篮，依然苟延残喘。

        自然成形的四虎市场，是中、东欧华人新移民市场的代表，意义重大，而且久经风雨，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华商们对它饱含深情。“匈牙利华人都是从这个点开始的，没有这个支点，就玩转不开。”

        近几年国际经济不景，人民币升值，对做国际贸易的华商影响很大，再加上匈牙利是欧洲交税最高的国家，税收高达收入的70%，造成了过半的匈牙利华商连生存都有困难。“出国难，回国更难”，华商们的资金压在货物上，想撤出也不是朝夕间的事情。

        然而华商如猫，有9条命。那些在匈牙利失意的华人，虽然没面子回国见江东父老，但是他们不动声色地把货物转移到罗马尼亚等周边新兴市场，或者通过自己的亲人、老乡在南美、非洲把货卖掉。东方不亮西边亮，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老华商透露：“即使人人口口声声喊着赔钱，但手头上总是有现金流动。”

        那些先前就站稳脚步、走品牌路线的正规华人公司，是如今匈牙利华商的发展趋势。当地人们的生活已不似往年，眼界也开阔许多，便宜但不美观的衣服、鞋子，不会再有人疯狂抢购了。那些质量好、款式时髦、价格适中的商品，才受欢迎。现在华商们只要有能力，都开始打造自己的品牌。这些被市场卖货的华人散户称为“大老板”的华商，一小部分在城市里拥有独立的办公室，大部分都集中在匈牙利另一个新兴起的聚集点“银河大院”。

        银河大院本是城郊的几个工厂，被一名房地产华商买下，改建后租给做贸易的华商当作仓库和店铺。来到银河大院，入口处的指示图上，有着几百家不同的品牌，都是英文标识，橱窗陈设也很时尚。若不走进店铺，看到里面的老板，还真不知道这些品牌都出自华人之手。除了银河大院外，旁边的几个院子也都在建设中。据这里的负责人说，在还没开工的时候，这里所有的店铺已被上千家商户抢订一空。

银河大院是现在匈牙利华商的聚集点。

 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华人，匈牙利华商在打造自己品牌上不惜下重金。若是见识过银河大院里眼花缭乱的商标，走在匈牙利的大街上，或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都可以很轻易地看到这些品牌的海报，尽管当地人并不知道这些司空见惯的广告背后的商家来自何方。

        许多华商原本想追求短期利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长计议。特别是华人品牌Wink运动鞋在匈牙利的成功，更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Wink在匈牙利是一个销售量超过耐克、阿迪达斯的运动鞋品牌，地铁里、公路旁、电影院里、电视中，经常可以看到它的广告。当地老百姓对Wink这个品牌极为熟悉，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平价运动品牌。实际上，它的经营者魏翔是个来自中国福建的华人。没来匈牙利前，他是一名画家，当年随着“东欧热”来到这里从商，在四虎市场磨练了一阵子后，觉得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艺术家总是舍不掉文化情结，在竞争残酷的海外商场上，他仍希望做儒商，把生意当作一件艺术品来经营。

        然而这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精力，但魏翔和太太挺了过来。如今他们对创业的困难一笑置之，不愿多提。从当年亲眼见他们如何熬过来的同行口中得知，这个业绩斐然的“名牌”，也曾有过举步维艰的坎坷。如今，大家看到的却是布达佩斯繁华街道上的一家家连锁店，规模不小的独立办公楼，素质良好的匈牙利设计师团队和稳定可靠的当地员工，以及对社会的真诚回馈。匈牙利每年的马拉松比赛、残疾人运动会都由Wink赞助，而且Wink还出资建立了乒乓球俱乐部，不少当地的各级比赛冠军，都是从这里训练出来的。

        他们以这样完美的方式融入匈牙利社会。2003年，匈牙利政府把国际特殊奥运会火炬的第一站设在Wink公司，魏翔就是第一位火炬手。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被同学推选为学生会主席，“一个中国孩子可以在匈牙利同学中享有颇高的威信，这让我们华人家长感到十分欣慰。”魏太太自豪地说。

   “在匈牙利生活过后，会觉得其他国家都没有布达佩斯方便。”这是很多匈牙利华人的切身感受。虽然很多人在当地都拥有几处房产，但是大家主要还是集中在固定的几个区域活动。

        四虎市场和马路对面的环宇大楼是匈牙利最老的华人地标。一边是经久不衰的大市场、华人仓库，一边是匈牙利最大的连锁中国超市——环宇超市。超市从华文期刊、书籍，到调料、零食、补品，甚至锅碗瓢盆无所不包。楼上楼下，也是密布着华人理发店、小餐馆、旅行社、社团、会计事务所、翻译公司、华文报社，还有每周活动一次的华人基督教会和免费的华人活动中心。

 围绕着这个地标，往北两站地就是周末供孩子学习华文的光华小学；往南的居民区，住着很多在市场卖货的华商，居民区里还有一处华人基督教会希望堂。这里本是一片废弃的工业区，但现在不少大楼已被一些有实力的华商买下作为办公室。环宇超市的老板还把其中一些原本很普通的办公楼，改建成了当地最高档的中餐厅。浓厚的中国气息、地道的粤菜，无论是华人还是匈牙利人，无需跑太远，就能享受纯正的中华美食。

 布达佩斯没有中国城，可能在当地人心目中，这里早已经是华人的聚居地了。在布达佩斯街上问路，匈牙利人只要一看到是华人面孔，难以沟通时，就会毫不犹豫地指引着他们来这儿。

        另外一处时间较久的华人聚集地是华人经营的酒店——东方宾馆。宾馆对面本来是上海市场，吸引了一些华人在周围买房置地。后来市场虽然关闭，但是宾馆和旁边的中国贸易信息中心大楼，仍聚集着不少华人租客，一些社团也设在这里。有生活，当然就少不了物质和精神慰藉，高档中餐厅、平价快餐就开在华人宿舍外，华人基督教会在这里也设有分会。

        地点较为偏远的亚洲中心、中国商城一带和银河大院，则是新兴的华人中心。银河大院主要是商业中心，有人说：“一些华人行业如华人事务所、中餐馆、华文媒体、广告公司，只要依附在周边，就可以存活。”因此不少商业嗅觉灵敏的华人，纷纷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意挤进来。而亚洲中心和中国商城，虽然环境可以与百货公司媲美，但是地点过于偏远，人气并不旺。里面除了做生意的华商外，还有几家华文媒体，以及华人的体育运动中心和文化团体。

        华人在各国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小天地，但数布达佩斯的数量最多，而且此起彼伏，生生不息。原本只象征着华人移民努力维持传统和保留记忆的地方，在这里却焕发着蓬勃的生机。

温和的匈牙利人不排外，曾有的排华情绪，早已淡化。华人生活在这里，感到受尊重、不拘束。“在匈牙利你看不到低声下气的华人，都是洋人给我们打工。”

        如果说在俄罗斯、西欧和北美，华人是被动地适应，那么在匈牙利，华人则显得自由、主动多了。

        匈牙利华人因为职业关系，需要频繁地到中国出差，所以很轻易地把新思维、新概念甚至任何“蛛丝马迹”带回匈牙利。“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和在中国没有差别，吃的、用的、玩的、看的都和中国一模一样。”

        匈牙利的华商很会找乐子。从下里巴人的娱乐到阳春白雪的雅趣，几乎人人都能如愿以偿，在市场的商贩一般早上6点上班，下午3点就下班，公司业主则是朝九晚五，工作有规律，治安良好，空闲的时间可以随意安排。

        有的人爱热闹、好美食，每周都要有一两次约上三五个朋友，去中餐厅享受一顿。当地华人说，便宜的中餐快餐是给外国人吃的，华人都去高档的中餐厅，一般一顿消费在200欧元左右，大家轮流请客。“我们吃得起，又爱吃，为什么不吃？”对于走过花花世界，见惯大把使钱的的匈牙利华商，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觉得日常生活里谈的都是“小钱”。

        当地华人自己估算，匈牙利可能是世界华人拥有卫星电视比例最高的地方。在华人理发店、超市、公司里，儿乎全天播放CCTV-4或凤凰卫视。他们说，每一个家庭都安装了不止一个卫星接收器，有的有几处房子，每处房子至少有一个，有的除了家，公司也要安装。平日工作忙起来确实没时间看，但是开着电视并不影响工作效率。

        华人赚了钱，一定买房、买车，或者扩展生意，在几个市场周围，若是看到车号是666、888的吉利车号，车主必定是华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满足了，一些华商开始玩起摄影，不少“大老板”的车上，会放着一套专业的摄影器材。当地的华人摄影沙龙，不时地组织采风活动，并成功地举办了两次影展。沙龙的负责人史小行介绍，平时几个沙龙的老会员总会开车四处找拍摄景点，发现了好地方，就约大家清晨五六点去拍，拍完了直接上班。

        生活在异乡，所从事的国际贸易市场叵测，风险极大，每个华人都会倍感压力，有些忐忑不安。生活中华商们借娱乐减压，借音乐抒怀。匈牙利华人歌友会聚会时，熟悉的前奏在耳畔响起，他们尚未一展歌喉，已情不自禁潸然泪下。压抑许久的情绪如江河决堤般迸发出来。“那种感觉宛如找回多年前曾有的快乐。”慢慢地，来的人越来越多，没想到这些平日风吹日晒的生意人中竟是卧虎藏龙，水平可与专业演员媲美的大有人在，这让一些自娱自乐的门外汉有些怯场。大家从简单的聚会开始，发展到排练节目。倘若邀请匈牙利华人表演一台两个小时的演出，他们一定会应付自如。

        匈牙利的华人妇女组织也十分活跃，只要有各国华人的聚会活动，她们的舞蹈表演，总是震惊四座，让其他国家华人啧啧称赞：“匈牙利真是人气旺，太活跃了！”而当地华人则认为，这是他们表达生活激情的方式。“工作再忙，生活也要有含金量”。

   匈牙利华人社会的成熟与凝聚力，从当地的华文媒体就可以窥见一斑。

        华文媒体在匈牙利开始的时间并不长，1996年才有第一份华文报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市场上已有9家华文报刊。其中，除了匈牙利华商经营的华文出版社发行的《世界华人名人录》杂志外，《新导报》、《市场报》、《欧洲万事达时报》、《欧亚新闻报》、《欧洲论坛》、《中华时报》、《布达佩斯周报》、《中欧商报》都为周报。其中一些还兼办杂志、搞印刷和制作电视节目。这些媒体虽被当地人称为“非主流族裔媒体”，但是报人们认为，他们已经藉此融入了匈牙利的主流社会。

而事实上确实如此。坐在华文媒体的办公室里，会看到传真机不时发来一份份会议邀请函，其中不少是与华人无关的活动。各家华文报和匈牙利同行一样，都有专门的记者，也要抢新闻，写稿子，排版式，甚至2008年的台湾大选，匈牙利还有华文媒体飞去台北采访。像《世界华人名人录》杂志一样，他们已经不把自己局限为仅是匈牙利境内的华人媒体，而是以匈牙利为基点，放眼世界，抢先提供第一手的资讯。

        几份发行量比较好、同时又兼做广告制作的报纸如《新导报》、《万事达报》，在办公室里都设有专业的摄影棚，器材、背景、灯光完全不逊色于当地同行。商品和模特儿的拍摄，都是由报社的华人摄影师独立完成。

        除了硬件条件不俗，这里的媒体经营者都很专业。中文报纸分工合作，前后错开出报日期。但是竞争依然激烈，每份报都以客观、公平的方式报道新闻、拓宽发行渠道，以吸引当地3万名华人的关注，提高发行量。在具体发行的时候，报社的人员会骑着摩托车，亲手把报纸送到订阅者和广告客户的门上，风雨无阻。有了一定规模的发行量，广告自然就多了起来。在匈牙利单纯靠经营报社或广告公司来谋取盈利的，为数不少。这在华人移民历史不长的国家中并不多见。

        他们的操作模式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媒体十分相似，只是规模较小。这里的工作人员忙得投入，忙得专业，报刊读起来更是津津有味。匈牙利华人在自己的小王国里，建立起一种规范良好的媒体氛围。“在海外，不能因为人少，华文报纸就敷衍了事。”专业精神一流的报人如此敬业，自然是对中华文化最好的宣传。

        平面媒体如此蓬勃，匈牙利的华文网站也相当活跃。除了很多报纸建立了网络版外，有的华人还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设有时事新闻版面。例如Wink公司网站所编写的当地华人新闻，经常被一些华文报纸当作素材。

        华人个人办的网站或论坛点击率也很高。其中欧华热线，由当地一名青田华商建立。网站从2001年开始，坚持到现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但提供实用全面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通讯录，还有很多有关当地华人生活、工作的文章。网站不但是匈牙利华人指南，更是华人在匈牙利发展的见证。

 成年华人视匈牙利为享受生活、积聚财富的风水宝地。然而，对于随父母移居他乡的孩子来说，这里没有喜爱的迪斯尼，没有世界知名的名牌大学，也没有故乡的玩伴和路边的小吃。这片土地对他们来说，是那么陌生，语言艰涩难懂，到了其他国家又派不上用场。要不是父母在这里，他们也许还不知道有匈牙利这个国家。可一贯注重教育的华人家长，是不能容忍孩子读书散漫的。他们必须上这里的学校，学这里的语言。

        匈牙利有两间华文学校，一间是医学博士张庆滨和他的妻子开办的光华小学，一间是政府的中匈双语学校。1998年建校的光华小学现在有100多名学生，分为9个年级，每周末两天为孩子补习华文和数学。中匈双语学校则是一个全日制小学，有35%的课程以华文为媒介语，其余皆用匈语教学。

        两所学校都采用了中国大陆学校的语文教材，这在海外的华文教育中是不多见的。光华小学的张校长对这种做法很坚持。他觉得匈牙利华商多做贸易，流动频繁，经常会有中国的孩子来匈牙利插班，或匈牙利的华人孩子回中国上学，使用中国大陆教材可以保证孩子教育的连贯。此外，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不但要与世界接轨，海外的孩子也要与中国接轨，良好的语言环境可打造孩子的双语优势，华人后代要对中华文化有所认识，今后才能更好地与中国交流。

    可是对孩子来说，新的国家、新的语言、新的文化、新的同学，既新鲜又陌生。父母可能做几年生意就离开，他们因而感到迷茫困惑，甚至心里抗拒，经常问：“我为什么要学匈牙利语？”而一些在当地出生的华人孩子，也时常与父母有文化思维上的冲突。当父母向孩子灌输华人意识时，孩子的反应是：“我都没有看过中国，怎么做中国人？“呛得家长又气又恼，有的孩子倒是操一口标准的华语，可是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和父母沟通时准免要不停地问“什么意思”，让家长哭笑不得。

        光华小学补习使用的中国数学教材，使华人孩子在学校里的数学成绩特别好。匈牙利人在欧洲被誉为“有数学脑袋的民族”，魔方、电脑、原子弹等发明都有匈牙利人参与，千万人口中就有13位诺贝尔奖得主，然而学起数学来，还是不得不佩服华人孩子。在匈牙利，华人孩子代表学校或者国家参加数学比赛获奖的例子不胜枚举。

        小小的华语学校连接着大多数华人家庭。一些生意成功的华商子弟多在国际学校受教育，而大部分经济一般的家庭，则会考虑把孩子送到双语学校读书。因此学校更能反映华人社会的变迁。近几年生意不景气，一些人开始撤出匈牙利，学校内华人子弟减少，匈牙利孩子增多。因为只有一所这样的双语学校，很多华人学生纵使住得远，每天清晨五六点就要等校车，还是风雨无阻地来学校报到。

 充满活力的匈牙利华人社会，精神生活十分丰富。单是当地华人基督徒就达到2000人，在布达佩斯礼拜场地就有5处，这样的规模是邻近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教会每个周三举行祷告会，周日举办主日聚会，参加的人数不少，流动性也极大。很多匈牙利华人到了其他国家还成为传道人，因此匈牙利又有“华人福音的出口”之称。

        教会的聚会多是全家人一起来，各个场地总是座无虚席。他们经常一起去旅行，钓鱼、郊游，还定期为监狱里的华人传送福音。这些绝大多数在市场中打拼的信徒们，每次都为这里的生存环境、时事、工作祷告，为心灵寻找一片宁静的天空。

        匈牙利华人的佛教团体发展得也很活跃，当地有两所华人寺庙——普济寺和虚云禅院，华人信徒达1000多人。这两所寺庙都在布达佩斯的郊外，红墙灰瓦的中式庭院建筑在一片欧式的洋房中，格外吸引路人的目光。

        寺庙每周日都为华人念经、讲课，平日里也是门户大开，香客可以自愿到访上香，或者请求师父开导。普济寺的明来法师说，寺院就是希望为华人提供一个免费祭拜的地方。任何人有困难，寺院都会尽量帮助。很多时候的帮忙虽是千里送鹅毛，但是足可以让华人的心灵感受到莫大的慰藉。

        美丽的寺院里种满了梨子、樱桃、苹果、核桃、玫瑰，香气醉人。果子成熟的季节，寺院的师父就会把水果送到华人市场，与大家结缘。“予人玫瑰，手留余香。”小小的善举，同样也给师父们带来愉悦。

        在匈牙利，虽然天主教是主要宗教信仰，但是对于佛教，当地人也很乐意接受。普济寺已然去世的房主本是一对虔诚的天主教姐妹，师父起初很担心邻居和房主家属会排斥这个佛教寺庙，特地请来房主的后代，并为两名已逝的老人超度。没想到，房主60多岁的孙女非常感动，周围的邻居们也说，现在院子变得这么美，又是宗教场所，两名老人一定会含笑天堂。

        寺院的师父走在街上，经常会有当地人主动上前，双手合十地打招呼。不仅如此，还有匈牙利夫妇上门来请求办理佛教婚礼。佛教讲究“随缘不变”，不分种族和宗教，敞开胸怀接纳任何有请求的人。

        在华人看来，匈牙利人的佛教婚礼新意十足。虽然场地是古色古香的中式庙宇，但新人还是穿着西式的婚纱。整个婚礼由献花、献果篮、唱经开始。金发碧眼的当地人要像华人一样，先拜菩萨，再拜父母，最后夫妻对拜。婚礼前，新人还要先向师父学习茶道，仪式当天要专业地斟上献给家庭的第一杯茶。最后婚礼在寺院师父的祝福下结束。

  胸怀开阔的匈牙利人，本来就对东方文化有好感，接受起来也很容易。华人大批来到匈牙利后，当地人不但开始穿中国加工的衣服，菜市场上也卖起了华人吃的白菜、茄子，甚至受到一些中餐厅的启发，有的匈牙利人也在西式餐厅安装了卡拉OK。

        匈牙利人对中华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譬如中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当地就很受信赖。匈牙利教育机构不但认可了13名华人中医的学历，还为其中十名医生颁布了独立开设诊所的许可，甚至有一名医生还拿到了处方权，这在当地医学界意味着真正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肯定。

还有一批匈牙利人，他们不但爱学中华艺术，传播中华文化，甚至把“少林寺”搬到了布达佩斯郊外。

        匈牙利的少林寺里面只有一名中国师傅释行鸿。这名“下山”的中国少林寺弟子，1999年来到匈牙利创办了匈牙利禅武联盟总会。而在此之前，一个热爱功夫的匈牙利人早已建起了一座微缩版的少林寺。两个武术组织并行发展了几年，释行鸿接手了匈牙利少林寺，将两个团体合并。

        现在拜访匈牙利少林寺的人，通常很难看到释师傅，只有他的弟子穿着僧衣，在砖墙大院中练习功夫的情景，一招一式，有板有眼，把武术的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决不逊色于“正统”的少林传人。

        据匈牙利少林寺的洋弟子介绍，现在匈牙利习武的人中，光参与竞技训练的就超过5000人。2003年，释师傅被匈牙利警察总局聘请为总教头，专门训练特种部队和当地的警界精英。

        还有一些匈牙利的中华文化爱好者，在1995年创办了一个名为匈中文化艺术中心的社团。这些匈牙利人开办武术、华文、茶艺、书法、中国乐器等课程，常组织当地华人和本国的中华文化爱好者远足或举办各种文化活动。

        他们还在办公室内设置了一个小型电台，专门制作一个用匈语介绍中华文化和艺术的节目“中国之花”。这一小时的节目已经坚持了四五年。同时他们也积极参与制作与华匈文化交流相关的电视节目。

  匈牙利华人的发展过程，是海外华人移民历史中的骄傲。

        家境不错的匈牙利华人，已有三成在当地长久定居。他们起点高、自我意识强，仍在追求更多的发展空间。住别墅，开好车，早已不能满足第一代华人的精神需求。

        华人希望真正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具有选举权的民族，而不是徘徊在边缘的群体。而他们相信，这些将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实现。

莫扎特不老的音符，多瑙河流淌的波澜，奥地利让人们想到的是那浪漫醉人的艺术气息。

        奥地利位于欧洲中部偏南，是个历史久远，艺术氛围浓厚的繁华国度。二战曾导致国内人口锐减，战后一段时间，国土被美英法苏4国分别占领，后来才重获统一。奥地利珍惜和平，于1955年宣布为永久中立国。凭着原有的良好经济基础，它大力发展工业，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允许外国人入境就业、定居。

        风景幽美、生活富裕、艺术丰硕的奥地利，让世界各地的游人流连忘返，也吸引着华人移民和学子带着心中的梦想，纷至沓来。

   奥地利的生活平静、安稳，吸引着一代代的华人不惜跋山涉水，或飘洋过海，或是经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航程，踏上斯土。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一些湖北天门人、山东江湖艺人及浙江青田人远道而来，浪迹至此。

        提到早期的华人移民，不能不先说说已在奥地利居住了四代的孙氏家族。

        一战结束后，孙巨兴4兄弟从贫瘠的浙江青田，乘船两个月，在意大利登陆，辗转西班牙、法国、荷兰、德国，最终落脚于奥地利。为了生计，他们背着石雕、领带、袜子、手套等小商品，沿街叫卖，挨家挨户兜售。在那个中国国力衰弱的年代，堂堂的7尺男儿，在欧洲常要忍受被踢骂和被狗咬的侮辱。

        不久，二战的炮火打散了孙家4兄弟。两人打道回府，一人去了荷兰。孙巨兴和张岩方、王兴标两名青田同乡则留在了奥地利的格拉茨（Graz），靠为当地人做粗活度日。

        战争结束后，百废待兴，积蓄变成了废纸，几个如浮萍般漂泊在奥地利的华人，凭着顽强的毅力，生存下来。

        当时中国大陆还未开放，不便接家人来团聚。几个青田人，便与当地女子组建了家庭，不时给中国的亲人写信、寄东西。孙氏家族的一个后代至今还珍藏着一枚手表，是当年孙巨兴寄给他父亲的。他说，当年接收海外的东西要缴很高的税，爸爸只好又写信给孙老先生，请求再寄税钱来，才得到这份贵重的礼物。

        那时中国人移居奥地利的不多，除了孙氏和同乡，有的就是来自台湾的移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与一些退伍老兵，在这里娶妻生子，靠经营中餐馆为生。

        到了70年代初，奥地利已有二三十家中餐馆，店主皆为台湾人。

        几千名来自柬埔寨、印度、越南等国的华人，于1975年后纷纷涌入，使当地的华人急剧增加。尤其是到了80年代末，奥地利经济起飞，各行各业皆面临劳工短缺的困境，政府于是开放劳工市场，凡持旅游签证来到奥地利的外国人，皆可办理工作居留。中国人便借此源源不断地涌入奥地利。短短一年，已有两万华人来到奥地利，有的当教师、科技人员，也有的成为音乐家、画家等。

直至90年代末，奥地利的经济开始下滑，政府对移民的限制又日渐严厉，华人移民才明显地减少。如今，除非是亲友团聚，否则已经难以再移民到奥地利这块土地上了。

奥地利国小民富，华人大都聚居在首都维也纳。目前奥地利的3万华人，有七成来自浙江青田及温州。与他们的同乡相比，移民奥地利可能不如法国、德国那么气派，城市不那么时髦，华人生意也不如别处做得大，但他们却在这里找到了难得的平静与安逸。

        一些华人圈子里的恶势力、黑帮派、在奥地利销声匿迹。想暴富不容易，但饿肚皮也很难，因为奥地利移民限制越来越严厉，劳工短缺，要找一份工作并非难事，反而是雇主担心员工走人。

        当地制度规范、社会福利优越，外国人只要连续8至10年交税，就可以申请入籍成为公民。现在约三分之二的华人都选择加入了奥籍。

        除了占大多数的浙江人外，还有来自福建、东北、上海、北京、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和印度等地的华人。他们大多经营餐饮业，只有5000余名来自中南半岛的华人在林茨（Linz）的工厂工作。

        奥地利华人对自己的境况都很满意，认为这里生活素质很高。很多青田华人都用自己的双手，炒出一盘盘菜地赚钱、存钱，建起了洋房，开上了豪华汽车。虽然在店里，三餐吃得很简单，日子看似很凑合，但是进到他们的住家，就会感受到他们生活的舒适。

        丰足的物质生活，配合上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可谓相得益彰。在奥地利很少有人抱怨生活沉闷、枯燥。维也纳浓郁的艺术气息，为一些华人文化爱好者提供条件。这些热衷于组织、参与文艺活动的华人，虽然仅仅一二百人，但因为他们的存在，让这个小小的社群显得更加生气勃勃。

 奥地利环境优美，治安良好，旅游业发达，人际关系简单。华人白手起家，靠着一间间中餐馆，在当地立足生根。

        导游总是这样介绍：“也纳历史悠久，教堂有300多座，可是这里的中餐馆比教堂还要多。”光在维也纳就有中餐馆600多家，整个奥地利的中餐馆加起来约有1400余家。

        中餐馆的老板，以青田人居多，儿乎每户青田人至少拥有一间中餐馆。他们从台湾人手中买下老餐馆，经过翻新，请来大厨，三四个亲友帮忙，一间可以养活全家的餐馆，就这样开张了。

        奥地利局势安定，社会福利健全，华人克勤克俭，只要干上几年，就能买车置房，过上安定目子。即使失业，也衣食无忧，政府每月给予800欧元的救济金，并减免房租及交通费用。只是华人自尊心强，自食其力，不愿领失业救济金过日子。即使在厨房帮厨、在餐馆跑堂，每月拿1000块欧元薪水，也默默坚持，从小伙计熬到月薪2000多欧元的大厨师。待到有所积蓄，再和亲戚凑钱，自己开餐馆做老板。

        一对在奥地利创业20多年的青田夫妇回忆：开第一家店，没经验，赚不到钱，就转手让人；再开第二家，又遇到店铺租赁问题，饭店被房东强行收回，刚有起色的生意只好半途而废；养精蓄锐后又转战第三家店，终成正果。像这样的曲折经历，在奥地利做餐馆的华人中并不罕见。

        有的人做餐馆是为谋生，也有的人把经营餐馆当作财富的投资。在奥地利，餐馆的顾客以本国人和西欧人居多，法国餐和奥地利餐价位最高，当地大批土耳其移民经营意大利餐馆，成为属中等价位的中餐馆的主要竞争对手。竞争激烈，华人只能比别人更勤劳，绞尽脑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吸引口味刁钻、喜新厌旧的食客。

        现今，很多中餐馆改变了传统的单一菜系做法。青田人不做浙江菜，反而博采众长做“亚洲餐”。走进中餐馆，不但能吃到传统的宫保鸡丁、中国饺子，还可以发现日本的寿司、生鱼片，韩国的烤肉、石锅拌饭，甚至泰国的冬炎汤。而且有实力的老板在用餐环境上也越做越讲究，动辄就是200万欧元的投资和200个席位的大堂。

        不过，在奥地利中餐里脱颖而出的，是一家四川饭店。店主是位学音乐出身的香港华人女性。西方人不喜吃辣，别人的餐馆迎合当地口味还来不及，这里却坚持着辛辣川菜的原汁原味，一点也不迁就西方人的胃口。其他华人取笑该店“菜做得太土气”，可当地人即使辣得面红耳赤，还是乐此不疲，一次次做回头客。

        店主赵小凤一语点破玄机：“我不懂经营，只对美的东西感兴趣。”她在室内与庭院的装修上费尽心思，不惜重金，讲究楼阁亭台，突出东方韵味。食材坏一点就必须扔掉，菜品的装盘不但要颜色鲜艳，还要有立体感。端上桌的，与其说是一道菜，倒更像一首诗，一幅画。赵小凤的艺术修养，让她用审美的眼光来要求中餐烹制，正适合了当地人“用眼睛吃饭”、注重细节和品质的特点。

   完全以艺术的心态来经营，是当地艺术留学生出身的生意人的共同特征。赵小凤不认为自己是商人，她更喜欢做一个中华文化的捍卫者。开的是饭店，享受的是中华文化。红砖绿瓦，垂柳翠竹，曲径通幽，中餐用西餐的慢食上菜方式，让顾客饶有兴致地品尝地道的中华美食，同时也可欣赏中华艺术，甚至也可参加这里的插花、太极、风水等专题讲座。

        在奥地利，很多中餐馆老板都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这里吃的中餐和在中国的味道不一样？”去过中国的当地人越来越多，像油炸春卷这样的西方世界里的中餐通行证，将越来越难“唬弄”住欧洲人了。而像赵小凤这样的半路出家的店主与传统生意人不同；他们更了解食客的心态，擅长捕捉灵感，懂得融会中餐的文化价值，因此做起生意来，反而后来居上。

  维也纳艺术之都的光环，总是让人对它抱有遐想：这里除了食尽人间烟火的餐馆老板，还应是才华横溢的华人艺术家的聚集之地。

        事实上，每年也有大批华人留学生来此寻梦。除常住华人人口外，每年来到奥地利的华人学生就有近万人，其中70%的人都选修艺术科系，尤其是音乐专业。然而最后能够留下来，并以艺术为生的华人，几十年来屈指可数。

        在奥地利纯粹搞艺术的华人不多。多数依靠餐饮业为主要谋生手段，并衍生很多服务行业。还有一些华人以杂货、贸易和旅游行业为生，也有会计师、律师、医生、翻译和在当地企业工作的人员。他们与当地人的生活并无太大差别。

        在奥地利从事艺术的华人，认为自己生活在外国人圈子里，与华人圈子里的华人很不一样。因为竞争者、欣赏者、工作中打交道最多的都是当地人，所以无论在生活习惯，还是文化理念、思维方式上都必须要彻底地改变。

        每年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奥地利最好的音乐学府的毕业生都会演奏一场音乐会。来自台湾的邓老师回忆20年前自己考入大提琴专业时，班上只有两名华人。如今的舞台上，虽然有一半黄色面孔，但真正的华人仍只有两个。现在从事音乐辅导工作的邓老师道出华人进军当地专业乐团的难度和艰辛：“即使学成的华人，留下的也不多，文化、音乐背景、导师等很多因素形成障碍，使华人毕业生很难签到理想的乐团，一般就是做课外的音乐教学、辅导工作，所以从经济角度考虑，还是回国发展更好。”

        选择维也纳，有的人为的是生计，有的人怀揣着梦想。在海外，拼出一家人的小康生活，对于华人来说不是难事，而拼搏出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幸运。

        太多人都有一个被遗忘的自己。曾经拨动琴弦的手，为了生活也要操起钟点工的粗活；修读的深涩艺术史，也可以变成通俗的导游解说词；临摹过克里姆特的画笔，也能批量画出廉价的明信片式街头画。偶尔街上擦肩而过背着画板或琴盒的年轻华人面孔，会让他们片刻走神，忆起当初的自己，而这小感伤很快就被现实生活淹没了。

        然而，在这里的艺术天地里，也有华人成功的例子。

        已经在奥地利居住了19年的陈彧，是第一个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长期签约的亚洲人。本来在美国留学的他，被欧洲的经纪人选中，便来到了维也纳。他在维也纳的第一场演出就作为男主角，演唱《费加罗的咏叹调》，当时的极度紧张，现在还记忆犹新。“要在西方人的世界立足，就要很努力、很拼搏。华人如果不比别人突出很多，就会被淘汰。”

        “因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切从零开始努力，就要接受、尊重这里的文化，甚至饮食起居的细节都要注意。”陈彧也感慨，虽然得到了很多的成功与荣誉，但是也失去了很多，比如因为不常接触华人，有时会找不到恰当的华语词汇来表达自己，这种对自己民族文化上的生疏感，令他倍感遗憾。

        居奥多年的华人女画家刘秀鸣，是极少数没有放弃自己专业的华人艺术家。她的画不但被当地人收藏，维也纳的华人也喜欢购买，欧洲和中国很多美术馆都藏有她的作品。人们羡慕刘女士可以如愿以偿地追梦，可以用作画来维持自己的画室，但她感叹：“大家看到的是我现在的状态，但不知道其中的艰辛。”

 在维也纳学艺术是对毅力的考验。20年前作为华人留学生的她，是班里最勤奋的，每天都是晚上11点以后才从画室回到宿舍。欧洲同学条件优越，衣食无忧，她却要面对生活压力。“我必须比别人优秀两倍，才不会被淘汰。”在这一点上，所有学习艺术的华人都有着强烈的共鸣。“而要画出忠于内心的作品，就要远离各种喧嚣，忍受创作的孤独。”学过中国国画的她刻意与当地的华人圈子保持距离，抛开固有的华人思维，全心全意感受全新的文化。

        “这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一种学习必须有的态度。中华文化的精髓是融在自己血液里的，割也割不掉，最终会回来。”正如刘秀鸣所说，观赏她的作品，不难发现画面所涌现的中西文化共通和碰撞出的力量。

  奥地利人喜欢到郊外度过周末，因此城市里显得异常冷清。不过在维也纳的街道上，会看到很多华人面孔。尤其是市中心，三五成群的华人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都朝同一个地方走去。原来，周六是维也纳的中文学校上课的日子，几乎当地所有的华人家长都会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一所中文学校。

        目前在奥地利有3所教授中文的学校：温州华人创办的维也纳中文学校、在外企工作的华人发起的维也纳中文教育中心、以及台湾中文学校。3所规模都不小，成立时间也很长，各具特色。

        维也纳中文学校租用了一座有着150年历史的中学校舍，据说莫扎特还曾在这里读过书。这里有8个级别的华语班，还开设了很多舞蹈、乐器、书法、跆拳道等特色课程。周六这幢建筑里显得很热闹，活跃着华人孩子和家长的身影。孩子们上课时，家长就坐在走廊里聊天、看书。下课后，孩子们自在地嬉戏，欧式的古老建筑与华人孩子稚气活泼的笑验相映成趣。

为了给孩子提供学习中文的机会，在当地外企工作的华人联合创办了维也纳中文教育中心。起初只有十几个学生，后来不断有新学生加入，现在已有500多人。这里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就是，学校的管理层都是在各行各业大公司工作的前留学生，管理十分规范，定期开家长会，做工作报告，老师们周一到周五都在各自公司工作，晚上和周末的时间都投入在备课和教学上。务实严谨的态度，灵活有趣的教学，吸引了来自浙江、广东、福建、台湾，以及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甚至奥地利本地的学生。

        这些中文学校团聚了孩子，也团聚了家长。

   华人家长重视教育，即使再忙，也会抽空送孩子来学中文。家长们说，能学多少并不强求，仅是看到小孩子们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因为有了归属感而更自信、更快乐，就很满足。

        维也纳中文教育中心除了开设孩子的中文、特长课程外，还为家长们开办讲座，主题涉及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奥地利酒文化、华语电影赏析、理财投资、医疗保健。若有德国、中国教授来访，学校也会请来为大家上一课，当然还有舞蹈、绘画、棋类、武术、篮球、健美操等这类放松身心的活动。孩子上课，家长聚会，风雨无阻。中文学校成了周末的热点，难怪孩子还没下课，等在门口准备打篮球的父亲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有着30多年历史的台湾中文学校也是如此，家长就是学校的义工。即使孩子已经毕业好多年了，家长每到周末还是会来“上课”。

        奥地利的中文学校仿佛是一个个以孩子为纽带的团体，维系着华人社会的感情，中华文化在几代华人中慢慢渗透，潜移默化着一代又一代海外华人子孙。现在学校里的孩子多是第二代土生华人，有的已经是第三代了。和第一代孩子相比，他们没有德语上的障碍，物质条件也更丰足，不知愁滋味，自然显得勤奋不足，但是心态却是更健康、轻松、平和。尽管家长们总觉得孩子的中文很差，但事实上，家庭的熏陶使第二代华人还是具有很强的语言优势。在维也纳大学的汉学院里，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第二代华人。

 虽然奥地利华人主要由来自乡村、工作繁忙的餐馆经营者构成，真正热衷于文化活动的不过200人，但是他们十分活跃，华人社会中，处处可见他们熟悉的身影。维也纳本身优越的文化条件和各国社团、协会组织的民间活动，相辅相成，为这里的华人提供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文化氛围。

        每年二月，维也纳金色大厅几乎为华人敞开。每逢春节，当月过半的演出，台上台下皆是华人。

        开这股风气之先的正是当地的华人组织——奥中文化交流协会。

        1997年，奥中文化交流协会为了满足当地华人渴望一睹华人明星演出的需求，组织了以慰问华侨为目的的新春音乐会。演出安排在大年初二，很多演员刚刚下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便飞到维也纳。为了配合中餐馆员工的时间，音乐会安排在晚上12点。没想到，消息传出去，周边地区的华人放工后，不辞劳苦地开上一两个小时的车，踊跃赶来观看演出。反响如此热烈，音乐会便成为一年一度的盛事。现在的维也纳华人新春音乐会已成品牌，被誉为“第二个春节晚会”。

欧洲最高的艺术殿堂金色大厅渐渐商业化，奥中文化交流协会开始促成海内外的华人音乐家与金色大厅合作。华人演出慢慢增多，上至当地政要、下到普通百姓，亲眼目睹了当今华人另一崭新风貌。最让协会有成就感的是，在平等的交流平台上，艺术跨越了国界，以优雅的姿态改善了奥地利人眼中旧有的华人形象。

        此风一发不可收。很多华人社团开始热衷于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当地几个比较大的华人社团如奥地利华人总会、奥中友协华人委员会、旅奥青田同乡总会、奥地利青田同乡会、台湾妇女联合会等，每逢春节、端午和中秋等传统佳节，都会组织文艺演出、举行舞会、或是集体旅行。Naschmarkt的“华人节”和多瑙河畔的美食义卖活动，最受当地人的欢迎。赛龙舟、舞龙舞狮更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此外，各个社团和中文学校开设的合唱、韵律操课程、烹饪讲座、下午茶聚会及到当地的敬老院和幼儿园的义工活动，最受女性华人欢迎。

 与很多国家相比，奥地利华人说自己的文化生活可以用“奢侈”来形容。这里不但有辉煌的金色大厅、美丽的多瑙河，而且在维也纳市中心的老城内，还可觅得难得一见的京剧社。静谧的周末下午，从巴洛克装饰的窗子里，传来阵阵京胡和咿咿呀呀的吊嗓子声，此地此景，别具情趣。

        维也纳京剧社是由居奥华人会计师宋健创立。出生于京剧世家的他，十多年前就开始和当地票友聚在办公室自娱自乐。剧社人数不多，但社员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各地，从事行业多种多样。他们从中国带来乐器、行头，有时画上妆、穿上戏服，粉墨登场地唱上一段《霸王别姬》的《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这西方城市中的片刻东方诗意，挑动了华人的心灵之弦，家乡仿佛近在咫尺。

   初抵奥利的华人对于当地的清静并不适应，日子久了，才慢慢感受到它的好。齐全的社会福利，物质生活有所保障，精神需求自然活跃起来。当地华人社会中的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以及各种研究哲学礼仪的组织也五花八门、数量不少。宗教场地规模正式、设施齐全，且活动频繁。

    因为信徒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印度、东南亚不同地方，所以华人基督教会新成员申请表，还特别增添了普通话、温州话、青田话、闽南话、客家话、广东话等语言选项，以便教会安排说同样语言的信徒为其讲经，让大家感到乡音的温暖。奥地利各个佛堂的华人也同样来自各个地区，信徒多为女性，而且以第一代华人为主。第二代华人因为思维方式和伦理观念的变化，接受起来相对困难。不过也有一些奥地利人对象征东方文化的佛堂、道场感到神秘和好奇，也来参加祭拜，但大多过不了多少时日，发现东方文化也不全是想象中的“功夫”，感到坐不住、听不懂，便就此作罢。

        其实，在奥地利要学习中华功夫也并不是难事。陈时红师傅在维也纳创办的奥中武术协会、白氏太极艺术馆、孙氏武馆都教授太极拳以及各种中国功夫，不但为当地华人提供强身健体的锻炼机会，也培养了不少可以参加比赛的奥地利武术运动员。

  在充实多彩的华人社会中，更少不了为大家提供信息的华文媒体。在奥地利活跃着3份华文周报和3个华文网站，分别是以公司形式经营的奥地利《欧洲联合周报》、浙江华人联谊会主办的《华信报》和青田同乡会主办的《中国人》，另外还有朋友网、欧华侨网和欧拓社区网。

        除此之外，奥地利华人社会也向着稳定的华人社区方向发展，华文图书馆和书店逐渐成熟。当地的宗教团体如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和维也纳慈济都设有藏书室，对所有华人开放。在维也纳名气不小的奥华书店，也可以找到各种华文畅销书、字典、杂志、光碟，以及一些当地人感兴趣的武术、针灸书籍。萨尔兹堡也有个林红书廊，为那里的华人提供各种华文读物。

        移民生涯难免有苍白、孤独的时候，而身边的文化氛围，让日子变得不再平淡如水。奥地利华人怨言少，对生活满意，与当地文艺活动的丰富多彩密不可分。

 奥地利的早期华人移民人数少、历史短，影响甚微，所以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唐人街或中国城。不过，如今在维也纳四区的Naschmarkt一带已经略具雏形。

        这里规模不大，没有中式特色建筑，没有标志牌坊，也不受当地政府承认，但是对于初来乍到的华人，这里是移民生活的第一站，购买生活必需品、手机卡、国际电话卡，打听一些招工、租房信息，即便是走一走，心里也会踏实许多。

        Naschmarkt本是一处为游客开辟的露天市场，汇集着中国、日本、土耳其、东欧、奥地利、意大利等各种风格的餐馆、快餐、蔬菜、水果、杂货和纪念品摊位等。在市场附近的街道两旁，衍生出很多中档的中餐馆，杂货行也在周边一间接一间地出现。杂货行是最能够吸引华人的地方，Naschmarkt的人气也就越来越旺。

        现在这里不但有手机电话卡公司、华文书店，还有一些社团。当地的3份华文报纸的办公室也与Naschmarkt相距不远。华人组织的舞狮舞龙活动，亦多选择在这条街上举行。

        这一地区还有很多商铺属当地人或其他国家的移民所有，许多华人十分看好这里的商业潜力，都希望可以买下一块地盘，作为投资。他们相信，今后这一地区的华人公司一定会大量增多，成为奥地利真正的唐人街。

奥地利的两个主要政党－－奥地利人民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被华人称作“黑党”和“红党”。黑党比较保守，代表当地中产阶级的利益；红党则反对歧视、主张为条件欠佳的人提供平等机会。作为移民的华人，觉得自己处于社会的边缘，大多数很自然地更倾向于“红党”。

        整个社群要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受到当地人的接受和认可，仅在华人自己的圈子里，显然行不通，只有走出“唐人街”，深入当地，融入社会，广泛结网，才能改善现状，为将来顺利参政铺路。

        加入奥地利国籍的华人，约占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二。第一代华人不热衷参政，对自己的投票权利并不重视。

        随着华人移民经济实力的提高，更多华人渴望参政议政，希望有人能够代表自己社区的利益进入当地政界。令人遗憾的是囿于自身的语言能力、专业和知识程度、文化差异，华人进军奥地利主流社会仍有一定困难。他们寄厚望于第二代，华人社团都表示，如果华人子弟有从政意愿，华社将倾力相助。

        奥中国际经贸促进会会长倪铁平，住在林茨地。通过多年办社团的经验，感悟到奥地利的大部分华商生活稳定、收入较高，拥有企业、家产，已经不是初到的移民了，而是要脱离“要求欢迎新移民”的诉求，以中产阶级定位。因此他主张华人要好好利用自己的权利，并支持代表中产阶级的“黑党”。

        倪铁平的协会多次受邀参加议会议程的旁听。他说：“当地其他国家的移民都没有受到如此的优厚礼遇，在议会上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特别显眼。我们华人已经不能只是倡导‘有意识’参加投票，而是‘应该’参与选举的时候了。”

华商倪铁平是当地最早主张华人要重视参与选举投票的侨领。

  在新生活的追求中，华人移民不断调适自己。有的地方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有的地方虽然不断吸引着各方人潮，却也让身居其中者倍感沧海一粟的渺小与无助。

        对很多人来说，奥地利可能不是最佳选择。可居住在这里的三万华人没有抱怨，反而感到满足、安定。

        勤劳向上的华人为奥地利带来了一间间中餐馆，留下了自己的青春和艺术才华，自力更生地立足在新到的土地上。奥地利也敞开胸怀包容着他们，并回馈给华人平静的快乐和踏实的富足。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四周与9个国家接壤，因处于东西欧来往要冲，素有“欧洲的心脏”之美誉。雄伟的阿尔卑斯山东西迤逦，境内有美丽的莱茵河与多瑙河缓缓流淌，壮丽的雪山，柔情的流水，交相辉映，谱成美妙的旋律。

        德国的日耳曼人是一支优秀的民族，富于浪漫的情调与绵密的思想，无论在文化艺术，或是科学技术等领域，都绽放出万丈光芒。

        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曾说过，德国人很“可怕”。一开口不是谈诗就是谈哲学。这个爱思考的民族，造就了太多的伟人：马克思、尼采、歌德、黑格尔、贝多芬、巴赫、爱因斯坦、格林兄弟等等。认真严谨和恪守纪律的天性，使它的工业技术傲视全球。说起汽车、机械、电子电器、航空、航天甚至皮革，都会让人不禁联想到这个连续5年称霸“世界出口冠军”的欧洲中部大国。

        1945年战败投降后，德国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最终在1989年推倒了分隔两地的柏林墙，东西德重归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于世人眼前再次展现过人的魅力，迅速成为欧盟最大的成员国，跻身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德国从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慢慢走向开放及接纳外来移民，至今拥有许多来自东欧与地中海区域的移民。这里的华人不到德国总人口的0.2%，而且，他们居住地分散，并常常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诗人海涅于1823年写的一封书信中，提及在德国的两名中国人，他们是冯雅学与冯雅生。两人从广州经伦敦辗转到柏林卖艺。歌德称他们为学者，因为他们后来为普鲁士国王服务，也协助将基督教文献译成汉语。后来，年长的冯雅学决定返回中国，而冯雅生则选择留下，并因工作成就卓越而获赠别墅，成为最早旅居德国的华人。

        19世纪70年代，清廷派遣第一位特使到柏林，也带来了首批留学生和军事实习员。中国学生联合会早在1880年就已成立，当时会员大约有40多人。随后，一些广东海员陆续到德国打工，他们大多居住在汉堡（Hamburg）港区，甚少与当地人来往。

        另一批华人来到德国，是在19世纪末。他们有山东的江湖艺人，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莫斯科和东欧国家入境。也有浙江青田、广东及北方商贩，他们携带中国货物沿街兜售，以行商谋生。

        20世纪20年代，已有数千名华人生活在德国。汉堡的圣堡利区Schmuckstraβe街已形成了繁华的唐人街。这里有中餐馆、杂货店、洗衣店，还有半地下室的歌舞厅和咖啡酒吧。当年的《汉堡晚报》就称这一区为“小中国”。后来，政府以对外国人管制为由，曾在1926年递解数百名华人商贩出境。

        30年代有许多华人子弟来德国深造。当时的3700名华人中，留学生就大约有700人。这些清一色男性留学生，大都有良好的经济背景，成为德国女子倾心的对象，奈何纳粹当权时期不允许中德通婚。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但是即使已结婚的中德夫妻，也无法取得政府的法律承认。

        二战期间、中国和德国断交，华人纷纷逃离德国。剩下的却不幸被纳粹军人逮捕，部分扣押在集中营，有些人因过度劳役和营养不良而丧生。战争结束后，残留在德国的华人仅有400名左右，而在偌大的唐人街幸存活下来的，只剩下约30人。

        据居住在汉堡的陈名豪回忆：“爷爷陈纪林在1915年经香港到汉堡来当海员。这里是德国通往世界的大港口，当时有许多宁波籍的华人海员，在船上做烧锅炉或清洁工作。华人总是勤奋负责，又刻苦耐劳，受到船主们的喜爱。1920年，爷爷成立了水手馆，协助从中国招来更多海员，也照料那些初到此地的同胞。”这间欧洲唯一的华人水手馆，就是今天汉堡中华海员之家的前身，也是当年在唐人街最早的华人机构。

        “父亲陈顺庆接手水手馆后，大力发展，可惜后来二战爆发，船运业几乎完全停顿下来。当时华人急着返乡，父亲与船运公司交涉，让华人一批又一批地转道意大利回国，自己却留在汉堡继续组织同胞回乡。”等到陈顺庆要撤离时，这条海路已断，他只好取道陆路，长途跋涉横越西伯利亚辗转回乡。陈名豪回忆说：“父亲回到家门时，已是3

个月后的事了。”

        50年代开始，许多香港人和台湾人陆续来到德国。德国政府更在60年代大量聘请台湾女护士。70年代中期，大批印支华人难民来到德国，人数达8000多人。自中国开放后，有更大批的华人以团聚、旅游、劳务输出形式进入德国。随着80年代的留德热潮，也把许许多多的中国留学生吸引过来。不过，2006年后，德国实行更严厉的移民政策，华人移民潮才逐渐减缓下来。

 15万华人听起来不少，但在德国800万外来移民中，却显得微不足道。

        德国地广人多，许多城市都有良好的规划，华人分散在100多个大中小城市。这样说来，每个城市也不过有数千名华人。“德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居住在不同的联邦州就会面对不同的法例和规则，要清楚自己区域的已不容易了，哪还有时间去了解其他州属的情况？”许多华人说，他们的生活总是“各自为政”的。

        德国过去的华人以粤人及浙人为主，后来福建、江苏、上海、东北等地人士也来了。粤浙人目前各占华人总数40%，其他则约占20%，他们有些是老华人的后代；十万人来自中国大陆，其中两万人已入籍；台湾人有8000多，入籍的有3000人；印支华人约有4万；还有来自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

        德国大学向来是免费的，因此成为中国留学生热门目标。近年的留学政策虽有所调整，却并没有改变华人留学生的选择。至今，在德国的华人留学生有数万人，有一部分毕业后留在德国工作，有的嫁给德国人。

        华人较集中的城市有柏林、汉堡、法兰克福（Frankfurt）、慕尼黑（Munich）、纽伦堡（Numberg）、北莱茵（Nordrhein）、波恩（Bonn）和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等。不过，自二战以后，这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唐人街。目前，德国有60多个华人社团、70多家中文学校和超过6份中文报纸，它们在支撑着整个华人群体的中华文化活动。

 如果说华人的传统谋生工具有菜刀、剃刀和剪刀，那德国华人只有第一把刀——菜刀。

        德国立法严厉，对外国人的经济活动严格限制，不得逾越。“德国人做不了的事，就好像中餐饮食业，他们就会让华人去做。至于其他行业，即使是理发，都得考上执照，并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才行。”华人无奈地说。

        从上个世纪到今天，最多华人从事的行业，依然是餐饮业。全德国目前共有6500家华人开的中餐馆和快餐店，75%以上的华人在餐饮业工作。

        80年代是中餐业的鼎盛期，全国有近万间中餐馆。刚开始是由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主导，大批印支华人进入德国后，也投身此行业，使餐馆数量骤增，在各角落遍地开花。同年代，西德经济快速发展，德国啤酒厂商为了拓展啤酒销量，对经营餐馆业者提供贷款，使华人得以纷纷开店，自己当起老板来。

        “这些贷款可以用来装潢店面，老外就是喜欢中国的装饰。然后通过每个月的啤酒销售来还贷。那时期，只要开门营业，就生意滔滔，从来不愁没有顾客。”业者感叹餐馆的辉煌时期仅有10年，90年代后就逐渐衰落。

        那时德国经济不景气，百姓减少外出用餐，中餐馆生意受挫，却衍生出另一个生机。

        华人开始把中餐改为“快餐”，把煮好的食物放在水蒸保温柜台让顾客选择。这些份量多的炒饭、炒面、炒菜等食物，经济又实惠，自然广受欢迎，很快地流行起来。德国人称这种快餐店为“Imbiss”。店面很小，只有数张站台或桌子，甚至不摆设座位，顾客得自己拿餐具，也得自己收拾清理，总之都是自助式。华人说：“由于成本较低，经营方式也较简单，开的店越来越多。Imbiss很适合德国人打包当正餐，不过这些其实并非纯正的中餐，有许多还是参杂了泰国、日本等口味的亚洲快餐。”

        同行之间的竞争，加上后继无人，许多老牌中餐馆在近年内结束营业或转售他人。这个时候，原本在餐馆打工的浙江温州人和青田人，以集资的方式快速发展起来，在餐饮业成为了生力军。

        “这5年来开得最多的，就是蒙古烧烤店，可是店内却不卖蒙古菜色，更没有蒙古烧烤！”店老板这么说：“取蒙古这名字为的就是要让顾客区别这里与旧式中餐馆的不同，是Mongolian Restaurant,不是Chinese Restaurant。这里卖中餐、日本餐、泰国餐等，且不止是以亚洲自助餐的方式来经营，还增加了当场烹饪的日本铁板，有点像其他地方的WOK餐馆。”

        有人说这是换汤不换药，可是以新潮手法经营的烧烤店，大多开在购物广场附近，因地点适中，停车方便，价格合理，所以迅速窜红，各大城市都能看到高高挂起的蒙古烧烤招牌。

        “华人餐饮业的前路并不好走，竞争也是难以想象的激烈。虽然不断有新开或转型的餐馆，但关闭的也不少。整个行业其实在萎缩中，全国餐馆的数字近年可说是有减无增的。”华人感叹行情不好的同时，也咬紧牙根在餐式上求新求变，苦苦支撑。

* *中国北京有举世闻名的天坛，德国柏林近郊则有天坛饭店。浙江青田人叶文贵从2001年开始，用了一年时间从中国进口72个集装箱的建筑材料，建立起比天坛祈年殿还要大的天坛饭店。此瑰丽宏伟的建筑有30公尺高，直径达32公尺，它是德国最大的华人饭店。*

 从行业的人口比例来看，餐饮业是德国华人的第一行业，不过它的营业额和利润却不如另一大经济支柱的贸易批发业。

        保守估计，全德国共有2000家华人贸易批发公司，任一城市还出现多个华人批发大厦或商城并存的局面。可惜，有些华人兴建的商城却维持不久。他们说：“相信这与法制健全、政府廉洁、消费习惯以及高进口税有关。”

        然而，从事贸易业的华人，还是越来越多。

        德国华侨商贸总会常务副会长林国煜说：“以前中国人以投资申请居留的门槛很高，至少得投资100万欧元，现在只要2万5000欧元，加上雇用两三名德国人即可。华人要投资设公司，最好还是做贸易批发。”另一名副会长涂文谦坦诚地说：“许多温州人的心态是在这里经商，回中国养老。德国啊！就是欧元好！”

        至于华人经营旅游业，是近年兴起的现象，这得拜德国政策之赐。德国是欧盟里最先开放给中国人的国家，因此许多中国游客从德国进入，再到欧洲其他国家旅游，使许多面向华人游客的服务和商业应运而生，一下子涌现了数百家的华人旅行社。

        “鼎盛时期在2000年，开了400多家华人旅行社，在接待中国游客上占尽上风，做了85%到德国来的中国人生意。”欧洲最大的凯撒旅行社社长陈茫如此表示。他还在汉堡创办了中文导游培训学院来应付需求。“以前华人导游都是留学生的业余工作，现在有许多第二代华人也来干这份差事，德国可能有超过1500名华人导游，收入不错。”

        中医在德国民间十分受欢迎，可是，政府却不承认中医师的资格。德国有30万名医生，其中有5万人拥有针灸文凭为病者作辅助治疗。没有西医执照的华人医师，只能以自然疗法或保健医师的身份，附属在西医诊疗所看病，中药则以食品或营养品进口。中医师们都希望政府扩展医疗保险范围，使中医术有更广阔的空间。近年流行的，还包括保健按摩中心。有许多是开在市中心，白领阶级的德国人会趁着午休时间前往享受半小时的按摩，然后再回到工作岗位去。

        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有的任职于大企业机构，有的在高等学府执教，有的从事科研工作，工资高，福利也好。据德国华人教授协会统计，在德国大学执教的华人教授有31位。其中，孟丽秋还是著名的慕尼黑理工大学有史以来的首位华人第一副校长，成为德国学术殿堂最高位的女华人。

        华人相信，随着第二代的成长和新华人移民的加入，德国的各行各业肯定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华人脸孔。

* *华人大学毕业生准予留在德国一年，以便找工作。不过，德国近年来的失业率一再上升，法令规定聘用员工优先把机会保留给国民，其次是给欧盟国家成员的国民，最后才考虑其他外来者。*

   来到德国的华人，别说要融入主流社会，生活中先要闯过种种难关，首要的，就是语言障碍。

        “德语堪称为欧洲最难学的语言，即使学好了，也会因文化隔阂而引起许多尴尬。好像德国人说的笑话，我们都笑不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华人不愿与德国人交往。”闯不过语言难关的华人，总是有这样的挫折感。

        此外，德国生活费高昂，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生存压力可想而知。为了应付金钱这一关，华人常常会在生活细节上想办法节俭，许多人就利用周末聚会的时间，相互为对方理发，不介意手艺的优劣，只为了省下的理发钱而开心。

        华人在异国他乡，睹物思人，经常感到寂寞，难以排遣，便利用良辰佳节，聚会联欢。无论是春节、中秋，或是圣诞节及元旦，华人都喜欢聚在一起。穿传统服装、包饺子，吃喝聊天，就是排遣乡愁的最好“解药”。德国华人留学生多，几乎每所大学或高等学府均设有学生联谊会。他们也在佳节期间，积极筹办各类欢庆活动，从数十人的小型聚餐会，到数百人的文艺表演晚会都有。让身在这块过节气氛不浓的土地上的华人，浑然忘却置身他乡。

        不过，大多华人始终喜欢“自成一家”，聚在自己的圈子里，自我孤立，与德国人格格不入。

        华人常常碰到德国人这样问：“你是从哪里来？”如果答案不是当地出生的，那第二个问题将会是：“你什么时候回国？”

        他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德国是属于德国人的，外来者最终会有回归自己国家的一天。

        但是，在德国生活久了，华人也慢慢感染了德国人的严谨作风，并逐渐喜欢上这里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德语有句话说：“准时就是帝王的礼貌”，因此华人紧记着凡事先预约，约会要准时的态度。生活中，华人也学着德国人，尽量保持安静，努力不去干扰别人，尊重他人的隐私。过了晚上十点便不再打电话给德国人，也减少在家中的煎炸烹饪时间，以免引起他人反感。

  早在19世纪末、德国就出版了华文刊物《日国》。因有留学生的积极参与，不同时期都出现过风格各异的中文报刊。从以前大部分含有政治色彩，到现在走向商业和专业化，其编辑方针已经大大不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曾涌现过许多中文报刊，但最后都销声匿迹了，办得最久的是走过25个春秋后才停刊的《西德侨报》。

        “1997年创刊的《华商报》，是德国第一家商业化的中文报纸，也是第一家以半月刊形式出版的报纸。”总编辑修海涛说，许多在餐馆工作的华人，无法从其他管道吸取资讯，免费的中文报纸就成了他们最大的精神慰藉。各城市华人之间不常联系，也得靠报纸来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情况。另外，还有《欧华导报》、《联合周报》、《欧洲商旅报》等报纸，也有中文杂志《本月刊》、《商务先锋》，以及中德文对照的《你好欧洲》等。

        除了透过平面媒体看世界，附属于德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德国之声》中文广播，创办于1965年，面向全球华人。德国华人通过网络广播以及它的中文网，既可以用耳朵聆听，也可以透过文字了解更多资讯。

        随着国开放，大批新移民涌入，导致华人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后，中文媒体的内容和形式也跟着改变，打开了新窗口。

        “高知识水平的华人是跟世界同步的，许多留学生会利用网络做广播，或开设有论坛的中文网站，如欧览网、开元网、德国热线等。”于2008年8月改名为《欧洲新报》的主编范轩说，该报除了出现网络版外，也增设了视频论坛会，希望能够成为华人的喉舌。

        这里市场不大，加上与主流社会缺乏沟通，使中文媒体难有很大的作为。“除非德国一夜之间敞开大门让华人自由进入，不然我们也只能随着科技的进步来更新传播方式。”对未来前景，业者希望中文媒体可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 *1989年台湾人送给汉堡市两艘龙舟后，激发了德国人对划龙舟的热爱。由于德国人酷爱团体运动，也喜欢水上活动，所以划龙舟很快在这里流行起来，也出现了许多专业划龙舟队伍。各大城市纷纷举办龙舟比赛，队伍里却往往没有华人踪影，偶尔才见台湾Go Top队伍参赛。一直到2004年，一群由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才组织了龙行汉堡龙舟队，并加入德国水上运动俱乐部，作为业余队伍参赛。*

      德国华人散布各地，像一盘散沙，团结凝聚成了艰巨的工作。

        “社团很乱，说来可能有接近100个所谓的华人团体，可是几乎有80%从来没有选举，也没有召开会员大会。”

        有些华人甚至说：“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华人开始追求名利以提高社会地位，在这种受人尊重的心态作祟及现有的社团理事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只好不断地创立新会。”

        他们称这样的社团为“一人会”，虽然挂着某个组织的名字，但旗下只有发起人，要不就拉拢一些较为熟悉的亲朋戚友。“更夸张的是，自己常常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就被挂名当了理事。”说这些话的人，语气中虽带点激愤，却有更多的无奈。

        幸好，实际情况并非全然如此。

        德国最早成立的中华会馆，从1929年至今，仍然坚守着它的岗位，为许许多多华人服务。还有在1998年，由当时27个侨团联合成立的首个全国性组织全德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一直为华人的合法权益做了大量工作。

若是有某些无良的德国媒体扭曲事实，诽谤华人餐馆挂羊头卖狗肉、华人从事间谍活动，整个华社就会沸腾起来，大家站在同一阵线来捍卫华族的利益和尊严。

        或许，就像当地华人所说的，只有在问题出现时，华人才会团结起来。

        华人社团较大的贡献，莫过于在各地开办了周末中文学习班。从华人体育文娱会到现在的汉华中文学校协会，一直努力推广中文教育。虽说只在星期日上课大约两个小时，但学校教学质量非常高，还创作了《汉华之歌》作为校歌，并立下了汉华校训。它更被中国政府认可为“孔子学堂”，同时目标锁定让德国教育制度承认该校的文凭学分。

     太极拳和其他中国武术在德国越来越盛行，就连德国医生协会也承认太极对减轻压力的功效。除了华人学习外，当地人也向华人师傅拜师学艺。这一来，许多武术馆和太极学习班便应运而生。

        2001年，德国建立了当年唯一由中国少林寺法师住持的欧洲少林寺。该寺除了开办太极、气功、功夫、禅功、打坐和散打班外，也推广佛法，不定期举办弘法讲座。少林寺负责人丁丁博士说：“全校大约有500名学生，从4岁到80多岁的都有，其中以德国人居多。这里注重身、心、灵的修行，除了学习功夫防身，也是修心学佛的好地方。”

        少林寺在德国非常受欢迎，常常参与社会民间组织的活动，如在狂欢节、体育节和足球赛事期间作表演，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少林寺还受邀为备战的德国运动员开办气功学习班。”丁丁博士手拿德国媒体相关的报导，自豪地说。

   德国唯一的华人公墓，早在1929年由中华会馆争取建立，设在汉堡卧尔斯多福公墓内（Hauptfriedhof Ohlsdorf），共租用两片墓地。

        旧的公墓可容纳百余个穴位，立了一个刻着“华侨公墓”的石碑，德文则写着“纪念在汉堡逝世的中华海员和同胞”。其中，中华海员的字体特大，可见当时该会馆和华人社会都是以海员为主体，后来才包罗了其他行业成员。

        当年华人经济实力薄弱，墓碑小而平面，手写的中文字，大多没有照片。

        “华人的习俗是先人逝世十年后一般都会挖起来收殓，这边可能会25年才收殓，把剩下不多的碎骨放在公墓内的灵塔内，腾出的墓穴又再使用。”自台湾的中华会馆会长杨文村这样说。一直由该馆管理的华人公墓在饱和的情况下，近年又新辟了一个约有80个墓穴的新墓园。“以前华人都是在复活节去扫墓，这几年华人才开始在农历清明节去祭拜，主要也是以鲜花和水果，很少烧冥纸。”

   不同的德国华人，有着不同的故事。有些华人感受到德国人的强烈民族意识，也有的看见德国人冷漠面纱下的热情。

        喜欢上德国的华人，会继续留下来。当然，也有许多人只是以旅客的姿态，来去匆匆。

        留下来的华人形容：「我们是跟上了高速公路，跟上了这里的社会步伐。但我们一直逗留在车内播放着京剧，做自己的事情。」东德与西德经历了四十多个春秋才把柏林墙给推倒了，而要拆除华人与德国人那一面无形的墙，则显得遥遥无期。

 提起瑞士，马上让人联想到许多足以傲世的美誉。

        瑞士地处欧洲腹地，因境内盘踞着欧洲最高、最大的阿尔卑斯山脉，有着“欧洲屋脊”的称号。它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山青水碧和终年不化的冰河使它成为“世界公园”。它是“钟表王国”，久负盛名的钟表业迄今不衰。它也是金融保险业高度发达的“金融帝国”，人均在国外的资产占世界第一位。

        瑞士独立于1648年，1815年宣布为永久中立国，及后实行独特的银行保密法，令它一直承载着许多传奇。

        瑞士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接受移民的条件也特别严格。然而，他们却极力捍卫人道和人权，愿意为许许多多的弱势群体打开方便之门。大批华人亦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入这一文化大熔炉，靠双手实干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惬意绿洲。

华人早期都是从欧洲其他国家辗转进入瑞士的。

        最先到达瑞士的华人是浙江青田人。他们主要是售卖青田石雕等手工艺品的商贩，分别从法国、德国等地移入，之后在瑞士的中部定居了下来，并且靠小本经营为生。他们大部分都与当地女子结婚，多年以后，从他们后代的身上已看不出明显的华人特征。

        在一战之后，日内瓦（Geneva）成了国际联盟的会址。20世纪30年代，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李石曾，率领一批人员抵达瑞士日内瓦并于1936年在国际联盟的会址设立了“中国国际图书馆”，主要是供到欧洲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进修之用。这些在图书馆工作的华人后来定居于瑞士，成家立业。那时随同李石曾到来的一批儿童在长大成人并完成学业后，也有部分决定留下来。

        二战后，联合国所属的400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总部选择在日内瓦设址。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办国之一，也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因此，有许多华人职员、学者、专家等，留驻联合国各个组织内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便有不少华人高级知识分子留居瑞士，组成了一定规模的华人社会，当时只有少数华人在从事餐饮业。

        瑞士的第一家中餐馆中国国际饭店，是在1935年3月15日于日内瓦开设的。店主朱保泉是清代皇宫的御膳房大厨，他从1913年便跟随胡惟德公使的欧洲拜访团，负责整个拜访团的膳食。当年，瑞士的发展步伐虽然不是走在最前列，但它的人文环境却吸引了周游列国的朱保泉决定留下来。“那些年的华人是过着没有酱油、没有白菜的生活，但我们的饭店想尽办法，还是坚持做了正宗的中国菜。最初开业时，瑞士人进来作首次尝试，只用餐具拨开饭菜看一看，一口都没有吃进去。”82岁的朱猛，想起父亲70多年前创业的艰难，不禁流下男儿泪。

        后来，中餐业慢慢打开市场，当地陆续出现好几家中餐馆，店主更高薪聘请来自香港的厨师当家。有的厨师最后也留下来，自己另立门户。

        在60年代初，东南亚各国的一些华人学生前往瑞士留学深造，毕业之后便留下来工作。一些人则从台湾、香港、澳门前往瑞士经商，最后也定居下来。瑞士国家小，市场也小，当时并没有引起华人多大的注意。他们之所以愿意留下来，不外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又或者是对这个好山好水的乐园产生了特别的感情，迷恋上此处的纯朴民风。然而，这样的人也不算很多，直至70年代初，定居瑞士的华人只有约300人。

        后来，瑞士面临医护人员严重缺乏的困境，于是从台湾聘来了不少女护士。这群白衣天使之后大部分都嫁给瑞士人，成了较早移居瑞士的台湾人。“当年的华人不是很多，走在街上所遇见的每一个华人都是认识的。若看见陌生的华人脸孔，那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啊！不论是定居瑞士，或是刚好来旅游的人，只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华人而倍感亲切，哪怕是在街上刚刚认识，都会把对方邀请到家里来做客。”这是家族在40年代已移居日内瓦的朱丙安对于当年情景的回忆。

        瑞士华人的人数突然增加，是70年代末以及80年代初的事。当年，瑞士政府收容了不少的越南船民。根据保守的估计，在那数年间，就有超过7000名越南、柬埔寨、寮国的印度支那华人，以难民身份来到了瑞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原本是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家，在逃难过程中变得一无所有。来到了陌生而新奇的环境，他们由瑞士政府决定居住地点、通过监护人寻找工作，一面学习瑞士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习俗，一面追求自己所向往的自由生活。

        到了90年代，华人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像日内瓦、苏黎世（Zurich）等建有著名大学的城市，便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学人。瑞士拥有好风光、高福利、高素质的生活条件，而税收又比周边国家来得低。故此，向往到瑞士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学术精英多年以来一直都有增无减。

 政治稳定，经济发达，设施先进，教育完善，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住在瑞士的华人儿乎都会这样形容这个国家。他们说：“如果追求安逸、平静和舒适的生活，瑞士会是理想的不二选择。”

        不过，瑞士的移民法令极为保守，外国人不能轻易取得瑞士公民资格。即使是申请入籍手续，都得等上居留满12年后才符合资格。如果没有印度支那华人的涌入，相信今日的华人人数难达两万多人。当年收容的逾7000名印支华人，加上他们的后代，相信至今已经多了一倍，并有超过80%已成功入籍。他们都参与政府的规定居住计划而分散在全国各地，大多数进入监护人介绍的工厂或其他单位工作。少数累积了资金的华人则会找机会做生意当老板，从事的行业不外是传统的餐饮或杂货业。在这些人当中，潮州籍占了三分之一，其他的依序是广东、客家、福建和海南人。

        华人社会中，还有自中国大陆移入的4000人；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则分别有500人左右。比较大的州属，通常聚居了较多的华人，比如苏黎世、伯尔尼、日内瓦、圣加仑（St.Gallen）等州。

        瑞士是一个国际大都会，有至少157个国家的人居留在此。人数稀少的华人在如此多元文化的环境下，就像沧海一粟。不过，以印度支那群体为主的华人，还是努力撑起社群的文化活动，包括办乡团、建佛堂和中文学校等。新近的中国新移民也加入行列。目前，华社有20个社团、近20所中文学校以及中文刊物，散播着中华文化，希望有一天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做生意当老板，好像是大多数华人都具有的雄心与愿望。可是，瑞士的华人更享受于薪水高、福利好、税收低的工作。这里有接近95%的华人，都属打工一族。这也难怪，瑞士物价高昂，劳工成本高，市场规模却不大，华人行业都受到了局限，尤其投资贸易业方面更不容易。即使开了门做小生意，也很难发展成较具规模的企业。商家说：“瑞士国土面积、人口和资源有限，对外来投资者通常持保守态度，对新兴市场也会有较长的观望期，所以到今天都没有看到大型的华人企业。”

        瑞士的化学和化工领域发展蓬勃，许多大型企业如西药制造商都在当地设厂。当年获接纳的印度支那华人，绝大部分就是进入工厂当工友，有的也在银行和百货公司服务。最低的月薪有3500瑞士法郎，雇主还得为雇员购买不同的养老金和保险金，好让他们的生活有保障。“月薪低于2500瑞士法郎就会获政府的生活津贴了，但是很少华人领取这份律贴。只要有工作，过着正规生活的华人，一般都处在不愁吃穿的小康水平。”许多从踏上瑞士国土以来，一直在同一间工厂内打工至退休的华人如是表示。“打工收入高，假日福利也多，又没有风险。说到做生意，还真没多大兴趣。只要够吃够穿，工作不太繁重，负担不多，压力不大，生活自然轻松了。”

        的确，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这份安定的满足。他们的观念也体现着瑞士人的工作观：不看事业上的成就，一切以生活为重。因此，那儿的华人经常声称，在瑞士可以活得很快乐，很长寿。

        而华人留学生通常选修的则是广受瑞士市场欢迎的化工化学、电子工程、信息科学、医药，或是银行保险金融。明显地，他们想追随前基们走过的路，从事专业研究工作，当个高薪收入者，过上富裕的生活。这些至少拥有硕士文凭以上的精英，若毕业后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几乎与“高薪”和“稳定”划上等号了。

        从意大利到苏黎世联邦大学进行研究工作的吴华博士谈到，博士生和博士后都很容易寻得心仪的工作，而且待遇不错，一旦正式获聘，就是不容易打破的铁饭碗。“博士的研究工作当然不轻，但是薪水也不低，从7000瑞士法郎月薪起跳，且每年在增加。如果两夫妻都工作，家庭收入轻易过万。”全瑞士大约有20%的人收入都在此水平。华人学者可说几乎都与吴华一样位列其中。

        还有一群身份特殊的华人，也领着高薪，过着待遇优厚的生活。他们是联合国及国际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人权组织等机构的职员。有200多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每年有大约8000次的国际会议在此举行。华语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也是国际会议的主要语言之一。随着中国参加会议的次数日益频密，所需的中文口、笔译和文字编辑也越来越多。专业中文翻译，也成为瑞士华人从事的一大职业。

        打工，或许不单是这一代华人，而是瑞士的华人后代们同样会选择的理想出路。

* *瑞士的钟表业名扬天下，传奇人物杨玉明，便是涉足钟表业的华人翘楚。28年前，他来到瑞士留学，在两年后即投身商海，所涉足的正是当地最有名的钟表业。后来，他购下瑞士的另一家钟表厂，成了拥有两个瑞士百年钟表品牌的老板。*

 大自然赋予瑞士这片秀美土地的风光，足以构成一幅极具幻思色彩的图画。无论是终年积雪的山峰、明媚动人的田园景致，还是波光粼粼的湖光山色，均向人们展示了大自然充满魅力的伟大杰作。旅游业，也为当地华人铺出一条康庄之路。

        华人游客大量涌入瑞士，单是中国游客，每年估计有30万人次。随着旅客人数与日俱增，华人旅行社由上世纪90年代的两三家增至目前的20多家，从事此行业的有300人左右。华人旅行社虽然规模小，却接待了来瑞士旅游的中国游客生意量的20%，在当地旅游业中发挥着不小的作用。瑞士旅游局对中国市场高度重视并寄予深切期望，开始与华人旅游业者合作，采取包括对华人导游进行培训等一系列措施，共同提高服务质量。

        华人旅游业联合会于2007年应运而生，在行业内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会长孙双西相当看好未来市场，越来越红火的旅游业会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开创旅游公司的门槛还算低，而且还有优惠和方便，只是市场大，竞争也剧烈。”瑞士是个开放国家，其他国家的旅游代理也可带队进入。华人业者面对的不单是当地的竞争，而是内外的夹攻。

        旅游业也为华人制造许多就业机会。中国游客出手大方，在瑞士每天人均消费达500瑞士法郎，是德国人的3倍、荷兰人的4倍，促使商家们越来越喜欢雇用华人店员。旅游区里提供中餐、中文导游及旅游手册等，无形中增加了华人的就业空间。

        最初以餐饮业扎根的华人，也得益于旅游业所带来的流动顾客。80年代印度支那华人来了之后，中餐业才迅速发展起来。此后，华人虽然不断增加，但餐馆的总数却平稳增长，大概每十年增100家。目前大约有300家中餐馆分布在各大城市，以日内瓦和苏黎世最多。“80年代的中餐很红火，当时的价格比瑞士餐更贵，仅次于法国餐。到了星期五和星期六，还得限制顾客吃饭时间为两小时。大家都得排长龙等候，也接受这样苛刻的用餐条件。”经历过该黄金时光的业者，不禁感叹中餐业已不复当年的风光。

        不变的旅游天堂，将会是华人孜孜创业的天地。

瑞士人喜欢安静，是超乎想象的。

        晚上十点后，他们再容不下任何的噪音。“十点后洗澡，警察上门找！”许多华人谨记着这一点。“洗澡会导致水管发出声音，如果是住公寓式的房子，将会影响整栋楼住户的睡眠。若有人投诉，不出5分钟就会有警察找上门。”

        瑞士人是善良的，但绝不会姑息冒犯他们生活安宁和秩序的人。对喜欢热闹喧哗的华人而言，刚开始是有点难于适应。不过，现在连他们都会说：“晚上9点后的电话，是一种对生活的打扰。十点后回归宁静，是不成文的规定。”住在瑞士时间长的华人，甚至也难忍其他人破坏安静，拿起电话就直拨警察局。

        是的，在瑞士，休息是最重要的权利，这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认为，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

        他们基本上从来不加班。有人笑说，瑞士人似乎对挣钱没有很大兴趣，为了追求生活质量，即使再多的钱也可以不挣。当然，瑞士号称世界首富之国，人均收入在全球名列前芋，人民早已过了忙忙碌碌创造财富的阶段。而华人来到这生活有保障的国度里，也开始贴近如此舒适的生活方式，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以探求瑞士人生活的境界。

        对这里的人来说，休假，就是纯粹的休息。周末，是一定要到外地度假，或属于户外家庭日的。这是在瑞士久住的华人也慢慢养成的习惯。“周日在家里劳动会遭白眼啊！曾经有一个礼拜天，看不过眼的邻居把刚晒在屋外的衣服全收了，气冲冲地拿回屋内，责怪我们不该在好天气的这天做家务，而应带孩子到外头去。”这是与瑞士人为邻的钟铭一次好气又好笑的经验。

        现在，华人也爱走出屋外游览瑞士的湖光山色。瑞士虽小，却有1500个湖泊，15公里范围之内很难找到没有湖泊的地方。加上湖周围山峦叠嶂相映构成的风景线，美得令人流连忘返。滑雪、钓鱼、烧烤、森林公园散步、徒步登山、玩滑翔伞或者极限运动，同样有着华人的身影。尤其滑雪运动，更令许多华人为之着迷。瑞士人说，不会滑雪就像不会走路一样，因此，在瑞士生活的华人，都要碰过雪橇，有在雪山中摔过一跤再爬起来的经验，才算“长大成人会走路”。

        瑞士人还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权利，就是喝咖啡。

        喝咖啡的时刻，才能体现出瑞士上至政府官员，下到平民百姓皆悠然自在，充分享受人生的生活观。休闲的街上、学习的校园、办公的地方，咖啡厅无处不在，已成为大家聚集闲聊交流的地方。学生和教师会在课间休息去喝咖啡，公司同事也常溜去喝一杯。华人在当地的体验是，如果办事需要等待，别人会建议先去喝杯咖啡。总之，生活不要太紧张，轻轻松松才是应有的节奏。对于喝咖啡，华人往往是从起初觉得浪费时间，到后来欣然接受，最后甚至也养成早上10点、下午3点的“瑞士式”喝咖啡习惯。

        对于瑞士人的生活方式，大部分华人是很熟悉的，也很习惯。

        没办法，政府的分散居住策略就是要外来移民融入当地社会，一栋公寓内已规定了瑞士人和外籍人住户的比例。20户住家内，可能只有一两个家住户是华人。这也是为什么瑞士华人散布各地的因素。

        只有瑞士籍或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人士才有资格买房子，而华人通常都用储蓄了20年的养老金来付款购屋。养老金是每个月薪水的5%至9%慢慢储蓄起来的，20年的时间一般都有几十万以上，足以支付购屋的费用。华人家里或许可以没有美丽的装潢，但却一定要有卡拉OK的设备，以便随时在空余时间唱唱歌。

        面对昂贵的物价，华人习惯到邻近的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去购物，包括一些日常用品和在瑞士很难买到的亚洲食品。华人看的中文报纸，也是邻近国家出版的。甚至是为了感受过年气氛，也可以到法国巴黎去，参与盛大著名的春节彩妆大游行活动。

        如此安逸和安静的生活，让许多华人不知不觉地喜欢上这里。

* *瑞士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凡是政府要实施的政策，都得先经过全民公决。即使一个人的入籍申请，都必须经过申请者居住区的公民投票赞成才可以通过。而华人这个时候也往往会履行公民的责任，积极地出席公决会议投票提意见。*

  从摇篮到坟墓，瑞士人一路有福利相伴。

        许多华人老人原本想回祖国安享晚年，可是想到祖国的医疗设施比瑞士差，又想到瑞士的医疗费可报销，最后还是留下来。

        “只要是纳税人，去世时政府还会把棺材免费送到。不过，家属可以选择要或不要。除了棺材，政府也提供15年免费的公墓墓穴。”已经入籍的黄立和这样说。

        有些华人家属会接受政府的棺材，有些则花上一笔钱另购品质更好的。而政府提供的墓穴，不论任何宗教，一般都是在住家附近教堂后面的公墓内。15年期满后，需缴付租金，要不然就挖出来火化，腾出墓穴让位给后来的死者。

        葬礼很简单，在殡仪馆有个告别仪式，华人佛教徒会请法师诵经，然后灵车就直接把尸体送到附近的墓园了，所有仪式就在一个上午完成。在没有华人法师之前，华人家庭有人往生要进行佛教仪式的葬礼，只好找来自斯里兰卡或印度的法师诵经，尽管一句都听不明白。瑞士虽然以印度支那华人居多，但这里的条件绝不允许华人搞冗长而烦琐的葬礼。

        由于工作关系，华人得渐渐放弃传统清明节扫墓的日子，改在11月1日的瑞士扫墓节（Allerheiligen）扫墓。这天也是天主教的“亡灵节”，有些地方则会放假一天。

        华人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也得迁就周末。可是，年轻一代的华人对过年的观念很淡薄，只是为了应对父母的期盼，并非发自内心。而他们最开心的是，可以过两次年，一次拿红包，一次拿礼物。

        没错，圣诞节对他们而言也是过年。他们甚至更期待这个节日，半年前就想好自己要什么礼物。“这边圣诞节的气氛那么浓，大家都过我们不过，孩子会觉得很奇怪，所以家里也布置圣诞树。反而华人新年则简单得多了，就是聚餐和分红包，碰不上周末更没有过年的气氛。”许多融入当地社会的华人，也有与瑞士台湾协会会长侯武男同样的感受。

        然而，还有大部分华人，尤其来自印度支那的华人，对筹办春节活动还是很坚持。

* *在每年四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苏黎世都会举行“送冬节”。这个经已延续了100多年，让当地人辞旧迎新的盛大游行活动，自从在5年前邀请苏黎世标准中文学校加入队伍之后，便添加了中华色彩。当地人期待着这个历史悠久的节日，而苏黎世中文学校上下则更加期待这个个可以展示中华文化的好契机。送冬节前一天的大游行，该校孩童们身穿独特的中华民族服装，手拿精巧的工艺品，并敲打着中国锣鼓，把中国龙舞上了苏黎世的街头。*

 瑞士华人以信奉佛教居多，印度支那移民没来之前已是佛教徒。为此，瑞士两个佛光山道场的会员义工，也是以他们为主。

        卢塞恩附近的瑞士佛光山面积2200平方公尺，在1996年由旧建筑改造而成。没有古色古香的佛寺，取而代之的是瑞士传统的木屋。

        十年后获日内瓦州政府在联合国办事处附近拨地4000多平方公尺建造成的国际佛教会议中心，风格更是非常欧化，外形完全看不出是座佛寺。建筑格式打破了传统，也让人感觉融入了当地。

        “在瑞士宗教是自由的，但我们不会大事宣传。我们是以文化方式让民众接近佛法，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把大家引进道场，包括开设禅修课程、合唱团、办语言班，教导中文、德语、法语；教导太极拳；也开设才艺班，如烹饪、插花、儿童绘画等，把佛光山打造成不仅是教徒的聚集地，更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教育基地。”日内瓦国际佛教会议中心住持觉彦法师这么说。她还强调生活化的佛教，有意要办卡拉OK比赛。

        佛光山已是联合国组织会员之一，日内瓦国际佛教会议中心的名称、位置和角色，更能突现它的身份，它是佛光山欧洲总部，也是举办许多讲座和会议的地点。两所道场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开放，除了华人来上香膜拜，当地人也会进去参观。所举办的活动，也是开放给社会各界人士。一般活动都以华、粤、英、法、德语进行，迎合了瑞士多语言多文化的特色。

        华人基督教徒占的比例很小，全境内的7间教会不超过1000人，主要成员是流动很快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华人教会都是租借当地人的教堂作为活动场所，一般星期日都得等当地人礼拜结束后，下午才进行主日崇拜聚会。一个月只租用一天的费用是400至500瑞士法郎，要维持下来并不容易。

   许多外派职员最后选择定居在消费极高的瑞土，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在瑞士，小学至大学是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而且多语言的环境让他们掌握了至少德、法、意和英语4种语言。

        华人家庭向来对子女的教育要求很高，也乐意花很多时间在子女的学习上。华人子弟绝大部分都完成大学教育，在会计、银行、金融和经济领域有不错成就。全瑞士大

        约有10%的学生能到重点学校接受特别培训，而华人之间的说法是，大概有90%的华人子弟都名列其中，没被选中才是罕见的。

        至于母语，华人对子女更有要求。

        “这里没有大气候和大环境来讲中文，许多印度支那华人父母本身中文也讲不好，但十分坚持送孩子来学习，即使牺牲休息和睡眠时间也在所不惜。”唐人中文学校校长唐超容对这些父母有如此的决心很是佩服，这也成了她努力把学校办得更好的最大推动力。该校最初只是开设成人中文班，以及让外国人学习中华礼仪，然而，之后却有越来越多印度支那华人前来求助，要求她开办儿童班。

        于是，唐人中文学校儿童班就在2000年成立了，每个星期六上90分钟的中文课，主要对象为苏黎世和附近一带从事餐饮业的印度支那华人家庭的孩子。除了语言班之外，该校也开办很多45分钟的学习班，比如绘画、舞蹈、中华历史等。之后的两年，儿童中文周末学习班迅速扩展到了十多个城市，目前全国学生总共有350人。该校的教学水准深获各方认可，是苏黎世州内唯一受承认的中文学校，因此，这间学校的考试成绩也可作为学生选修课的学分。

        在苏黎世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也开始担心起子女的中文教育问题，除了在家里多讲华语和家乡话之外，也于1997年通过学生联谊会，由家长充当教师并在家中为孩子们开办中文初级班，主要是指导书写。隔年，苏黎世标准中文学校成立，并在2002年以家长为基础创办了学中文协会，负责管理和对外联系。该校获得政府支持，得以免费借用当地学校的校舍，家长们在周末送孩子来上课之后，自己也可以留在校舍进行各项活动，比如学习民族舞蹈、腰鼓等，一举两得。

        瑞士各州对教育制度有不同的政策，所以在不同州属的中文学校上课的时间也不一样，有些是在周日放学后的下午6点开始一直到晚上，而大多数则在周末上课。全国约20间中文学校，一般都借用当地学校作为校舍。除了台湾人所创办的中文学校至今仍然使用繁体字以及注音符号之外，其余的一律以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教学。

        在这里成长的华人后代，可说个个都成了“语言专才”，加上母语和家乡话的充分掌握，是父母们最大的欣慰。

* *1967年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的李东华，是瑞士的国宝。他因为婚姻关系而来到瑞士继续体操事业。1996年，29岁的他代表瑞士，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夺下了体操鞍马冠军，打破了瑞士45年来没有奥运金牌、百年没有体操金牌的历史，顿时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瑞士洛桑的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还把他的比赛用品作为馆藏，以宣扬他的奋斗史。此外，他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任命为瑞士的代表团特使。*
* *日内瓦中文书会成立于1900年，是联合国各国驻日内瓦国际机构的中国籍，或者中国血统华人职工和家属的组织。取名书会，主要是想通过中文书来凝聚大家，因此设有图书馆，中文藏书达数千册，还长期订购大量中文报刊、杂志。这个书会属于联合国内部职员团体，不对外开放，而经费和硬体设施也获得联合国的资助。书会以前每隔一两个月出版《书会通讯》，刊载会员所发表的文章、新闻消息以及活动资讯。而现在已改为《芠荟》网站，以更加快捷地互相通讯。*

 瑞士是宁静的。

        外人也许认为这过于平淡的静是无聊。华人却说就是这样的平静，生活才踏实，才多一份安定。瑞士或许不能够完成发大财的梦想，但它绝对可以满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有人说，全球经济不景气也会波及瑞士，不知道瑞士人的悠闲生活还能维持多久，可是，在华人心中，不管如何变化，这里已是他们心中永远的乐土。

   意大利是欧洲南部的文明古国。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是古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版图遍及整个地中海沿岸。古罗马的辉煌成就，表现在文学艺术、建筑艺术、雕刻绘画、农业技术、地理科学及医学等方面，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至于那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也起源于意大利。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级的人才辈出，其流风余韵，洒遍欧洲各国，呈现了古代文化勃兴的景象。

        意大利虽然自然资源贫乏，但却是当代欧洲四大经济强国之一，经济实力全世界排名第六。它的工业发达，其中以汽车工业与钢铁工业最为称著；制鞋业更是传统工业，为它赢来“制鞋王国”的美誉；旅游业发达，为世界第四旅游大国。庞大的外汇收入，足以弥补国家收支的逆差。

        外来移民占总人口4%，约240万人，其中华人约26万，散布在全国各地。

  中国浙江省文成、瑞安及青田的农民，是第一批来到意大利的华人。

        他们于20世纪30年代远涉重洋到意大利来谋生，最年轻的只有18岁。

        他们从上海出发，在海上飘荡了41天后，终于抵达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Milan)。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欧洲是天堂，憧憬着绚烂的前景，但想像与现实之间落差不小。他们流落到陌生的异域，人生地不熟，没有居留身份，身无分文，再加上言语不通，只好沿街兜售领带、皮夹等小商品。

        他们起早摸黑，白天在海滩、街道上叫卖，晚上就到餐馆、咖啡店向食客兜售。那时，当地人一见到华人就叫“两个里拉”（“里拉”是当时的意大利货币）。原来一条领带华人只售两个里拉，所以“两个里拉”竟成了华人的代名词。

        他们不绝的叫卖声终于引起当地人的厌恶，结果经常遭到驱赶。他们只好提着货物到乡下去卖。一年的辛苦劳碌，只能够挣来维持生活的区区360里拉。

        他们省吃俭用，吃、住都在一块儿，30多人挤在阴湿的地下室里打地铺，咀嚼着便宜的饭菜。为了生活，为了家人，他们咬紧牙关熬日子。

        好不容易积蓄了资金后，他们就开工厂制作小皮夹。由于无力购置剪模机器，只好用人工裁剪，耗时又费力，他们埋头苦干，将辛苦挣来的一分一毫都汇给家中老小，并且期盼着衣锦还乡的那一天。

        谁知二战爆发，中国与意大利成了敌对国。他们有的被关进集中营，有的遭到枪杀，生命、财产几乎都失去了保障。

        好不容易熬到战争结束，作为战败国的意大利，赔偿了华人在战争中的部分损失，有人便利用这笔钱重新创业，也有人返回了中国。

        50年代中，随着意大利华人经济条件的逐渐好转，家乡亲戚们也陆续接踵而来，其中也包括战后离开该国的华人。

        这批华人有当地的亲戚和朋友接应，处境相对而言要比第一批华人好得多了。

        那些重新踏上这片土地的华人，凭藉过往的经验，积极发展皮革业，得心应手的他们发展迅速，很快就打进了被当地人垄断的市场。

        60年代中，有更多华人从西欧国家移入。这之后，越来越多华人向往先辈们在当地创造的奇迹，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意大利，华人数量迅速增长。

        自90年代起，华人犹如潮水般涌入意大利。据估计，目前当地有超过30万名的华人，但官方统计只有26万名左右。换言之，有相当数量的华人是非法移民。

        华人群体以浙江人居多，其余则来自福建、北京、山东等地。

        即使同为浙江人，也散居各地。文成人聚居在米兰，瑞安人在佛罗伦萨（Florence),青田人在威尼斯（Venice),温州人在罗马。

     华人在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成就令人顾目。无论是40年代的皮革业、70年代的餐饮业、80年代的服装加工业还是90年代的批发贸易业，都发展迅速，现已成功扎根于各大城市之中。有意思的是，由于当地人偏爱日本餐，华人便将中餐馆改为日本餐馆来经营。

        华人社团数量高达80个，有十多个侨团还自行创办了中文学校，为子弟们提供中文教育。此外。当地中文媒体发展也很成熟，华人信仰各种不同宗教的人也很多。

        当地华人贫富悬殊。富者拥有多处房产，出入以名车代步，生活令人称美：但也有贫者为了还债日夜工作，那些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华人更是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但无论是谁，既然踏上了这片土地，他们就得拼搏到底。

        他们始终相信自己能在这里实现人生的梦想。

最初，华人在当地人的皮革工厂打工，有了积蓄、习得一技之长后就自己开店当老板。

        创立一家皮革坊成本不大，只需两台缝纫机就可以了，华人把皮包样式裁剪好之后，再交由家庭妇女去缝制。这批妇女为了多挣几个钱，竟日以继夜地工作，常累得趴在缝纫机上沉沉睡去，醒来时嘴上还粘着胶水。

        华人盈利后便扩大投资，购置新机器，将皮革坊一步步发展成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不少。

        然而，皮革厂工作时间长，日夜辛劳；皮革业竞争也日趋激烈，利润下滑，有些华人就萌生了转行的念头。

        在高峰期，佛罗伦萨的皮革加工厂有2000多家，但目前只剩下约400家。

        大部分皮革业主转而投资经营中餐馆。从80年代起，就有华人涉足该领域。

        在鼎盛时期，米兰共有500家中餐馆，罗马有300多家。可惜，2003年因中国非典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中餐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部分业者只好忍痛将餐馆关闭，另谋出路，也有人咬紧牙关渡过了。如今，米兰只剩下100多家中餐馆，罗马200家左右，生意也大不如前。

        中餐受冷落，华人便改卖价高、卫生，又不油腻的日本餐，重新吸引了大批顾客。日本餐比中餐盈利更丰厚，经营上更省时、省力。米兰如今200家日本餐馆中的95%，其前身都是中餐馆。

        除了皮革业、餐饮业之外，当地华人还在服装加工领域里，大展拳脚。

        普拉托（Prato）是意大利的纺织业基地，华人于2001年到此抢滩。家庭式服装加工厂只需两三台缝纫机，三四名亲戚就足以运作，日均产量高达2000件左右，本小利大，十分划算。规模大一点的工厂则有300多平方米，数十名员工，产量更高。

        裁剪公司每天接获订单，裁剪之后即分发到各个加工厂去。加工厂接到订单，当天就投入生产，缝纫机轰隆隆地从晚间响彻到凌晨，通宵赶制不休。

        当地人的工厂，每件成衣售价8欧元，但同样成衣，华人只要价3至4欧元，价格便宜一半。当地人竞争不过华人，便索性将工厂转让给华人。

        如今，普拉托的服装加工厂已有3000多家，90%都是华人业主。业主大多以温州、青田人为主。

        华人之间竞争更显激烈。

        “无法不压价，你不做别人会做，利润少也得去做。”为了工厂能持续经营，老板们只能薄利多销。

但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据说半数工厂都陷入了没有订单的困境，工厂停产，华工失业，给普拉托纺织业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华人另一大主业是批发货行，虽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

        开一家商行需投资十万欧元，成本虽高，但回报也高。第一家华人商行出现于1994年，业主在罗马维多利亚广场开设了3家中国小礼品批发店，商品价廉物美，备受当地人青睐，天天客似云来。

        如此商机，吸引不少餐馆业者、工厂老板转投贸易业。服装鞋帽商行一家挨着一家开，迅速在罗马、米兰形成了华人商贸圈。

        走在罗马的维多利亚广场，或米兰的保罗，萨比街上，鳞次栉比的批发商行触目皆是。围绕着批发货行，还有家用百货、中餐馆、理发店、网吧、汇款行、书店、中药店、旅行社等，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商贸区。

        有趣的是，一些服装店的橱窗里只陈列几具塑料模特而不摆设货物，让人感觉空荡荡的。原来，业者为避免同行抄袭，把货品藏在了店铺的后面。

        最近几年，随着竞争的加剧，商行的利润额也在逐年下滑。有业者将店铺一分为二，分租店面以节省开销，也有些人重操旧业，经营餐饮业，或转战其他领域。

        尽管华人从事的主要行业都因市场大环境影响而备受冲击，但华人还是秉持信念，坚定地走下去。

  意大利华人贫富悬殊，生活两极化非常明显。

        事业有成者，拥有自己的商行、工厂、餐馆和房产，住别墅洋房，出入以奔驰、宝马代步，生活富足而安闲。

        而打工一族，则需日夜为基本生活而拼搏。

        以服装加工厂的工人为例，每月赚取约1600欧元左右，折合成人民币似乎很多，但意大利生活水平高，每月余钱所剩无几。工厂的后半部，通常以木板间隔成小房间，每间充当四五个工人栖身之所，居住环境恶劣。他们大多数是借债来到意大利，连穿的都是老华人的旧衣旧鞋，遑论消费享受。

        也有人租房子，但租金实在昂贵，区区20平方米的空间每月就要1600欧元。为了节省开支，只有多住房客以共同分摊租金。于是，空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床挨着床，除床位之外就无多余的空间。

        罗马华人华侨妇女联谊会会长林建华追忆当年，无限感慨：“舍不得花钱，一年半载只花个30块钱买信封信纸，给家里写信。”

        他们得苦拼两年才能偿清债务，接着办居留证、考驾照、回国探亲等费用又要花掉两年工资，4年后才能有点积蓄，稍稍改善点生活条件。

        打拼数年后，有些经济稳定的华人会买房落户，安定下来。他们一般会在远离城市的地区，选择西式洋房或公方。面积介于50至8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楼房，售价约12万欧元，是他们的首选。

        尽管前途崎以艰难，但华人始终认定，无论多苦还是比待在家乡好。

        “在这里生活虽苦，与中国相比却又微不足道了。在国内，每年才赚个两三万人民币，当老板的顺利时能赚二三十万，倒霉时却可能连本带利都亏掉；在这里安心工作，一年哪怕只赚取两万多，折合成人民币也有30多万呢！”华人坦言。

    华人、意大利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不但没激起绚丽的火花，反而在诸多方面凸显出彼此的矛盾。

        当地华人自我孤立，交往的都是亲朋戚友，延续着家乡的作息与生活，居留十年却对意大利语一窍不通的华人比比皆是。有的人觉得，即便言语不通也一样能赚钱，因此对意大利语和当地文化都不热衷。这便使他们与当地人沟通带来了障碍。

        尽管有部分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无论在生活习惯或言语上都已渐渐本地化。但是，华人整体上仍是习性不改，作风、态度皆与当地居民格格不入。

        饮食方面，华人喜欢煎炒，做一顿饭会弄得满室油烟，而自制的咸鱼、菜干等摆晒在阳台上，除了不卫生，也飘洒着难闻的气味。久而久之，华人与当地人的积怨愈深，衍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在罗马，华人为进驻批发市场而租用了维多利亚广场一带的传统面包店、咖啡店及杂货店，迅速改建为600多家服装鞋帽商行，此举也间接影响了当地人原有的生活。

        以往，家在店铺楼上的意大利人只要下楼即可购得面包、咖啡及其他日常用品。在店铺改为商行后，居民被迫得到大老远去购物，十分不便，对华人抱怨更深。

        米兰的保罗·萨比街，是500多家商行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华人商贸区。随着商贸区的繁盛，当地人与华人之间的矛盾开始浮上了水面，还爆发了意大利首宗华人与警方的冲突事件。

        原本平静的街道，在华商进驻后变得车水马龙，又乱又吵，当地人忍无可忍，发动游行示威，扬言要将华人赶出去。

        在当地人施压下，警员每天临检、罚款、没收货物，令华商压力倍增。如此一来，双方积怨日深，冲突一触即发。

        2007年4月12日，有警员没收了一名在该地违例停车的华人妇女的驾照，争执中警员动手殴打了该妇女，最终点燃了华人和警方冲突的导火线

        闻听此消息，隐忍多时的华商怀着满腔怒火一拥而上，将值勤警车的玻璃打碎。防暴警员迅速赶到，与在场数百名华人对峙。冲突的结果，除了有多名华人受伤外，还有42名华人遭起诉。

        事后，经各方协商，事件才逐渐平息下来。

        种种的差异和隔阂，令彼此间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于是，当地政府为了帮助华人融入，与华社合作开办了免费的意大利语班，部分华人白天营生，晚上学语言，一番苦心之后，已能跟生意伙伴沟通。

        此外，当地无论打工或事业成功的华人，都有曾被歧视的经历。

        由于皮革业、服装加工业等都由华人主导，当地人觉得饭碗被抢，便迁怒于华人。有时候华人走在路上，会莫名奇妙地被骂，在政府部门办手续也会受到无礼的对待。

        但歧视毕竟还是个案，华人遇上了一般都会躲开而不去理会。

        大体上，华人尽管对融入不太热情，但对当地生活还是满意的。相信他们只要愿意学习语言，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且多与当地人交流，融入之路会更顺畅些。

* *截至2007年年底，意大利的所有女性移民之中，当老板的共有4万3110人，其中，华人女老板就占了1万1443人，也就是四分之一，高居榜首。*

在意大利，华人传统节日并非当地公共假日，即便在春节，华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工作，仅是在晚上下班后会有更多的亲戚朋友过来聚餐而已，同时家中也会为了营造气氛而布置一番。

        而华人社团则会隆重一些。在罗马，华人社团会在歌剧院里举办舞龙舞狮、歌舞演唱会及抽奖活动等，气氛热烈，找不到座位者干脆就站着观赏。在米兰、普拉托（Prato）等华人聚居地，华团也会组织大规模的舞龙及秧歌表演，龙吟狮吼，鼓声震天。

        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舞龙、舞狮不仅活跃了华人的节日气氛，也展示了中华文化魅力，为当地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

        相较于传统节日，当地华人更热衷于当地的节庆。

        华人只在当地节庆日才放假休息，诸如复活节、圣诞节等，华人都会参与其中。这一天，他们会走访意大利朋友，送礼道贺，浓郁的佳节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热闹更胜于春节。华人社团，也会组织大规模的舞龙巡游表演，共襄盛举。

        早期，与当地人通婚的华人较多。

        那时候，前来谋生的华人儿乎都是单身年轻人，他们日夜在厂里工作，与同事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顺理成章地共结连理。因此，早期通婚华人的妻子多是当地工人。

        新人遵循着中国的风俗，男女双方在注册结婚后，会在中餐馆举行盛大的宴会。婚宴一般在下午两点开始，傍晚6点结束，以便于外地亲友们往返。

        现在，则鲜闻华人与当地人喜结连理的事了。

        意大利宗教自由，几乎所有宗教都得到政府的认同和保护。

        然而，佛教在早期的发展并不顺利，因为当时政府只承认藏传佛教的合法性。经过多番对话，普拉托市长最终批准了意大利华人佛教协会的申请，同意华人在普拉托设立佛堂。

        面积约500多平方米的佛堂由仓库改建而成，设立在普拉托市的Gualchierina广场中。每逢初一、十五或华人传统节日，善男信女都会前来膜拜。

初，华人让孩子接受意大利教育，还取了意大利名字。遗憾的是，孩子长大后虽口操流利的意大利语，却连中文名字都认不得，写不出，谈到传统文化更是一脸茫然。

        随着全球中文热潮的兴起，华人开始意识到中文的重要，纷纷打探哪里有中文补习班，好让孩子从小打下中文根基。“你的孩子学中文吗？”这话成了家长们见面时的口头禅。

        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于1998年开办了米兰第一所中文学校，反应热烈，但终因学生的高流动率而停办了。2007年，它重新开办，由胡光绍夫妇接手管理。

        胡校长租用意大利学校，利用周末上课，从最初的3个班发展至目前的8个班，每班平均25人。除了中文，学生们也同时学唱中国民谣。

        教科书分为12册，由中国国务院侨办提供，学完整套就具备了中国初中毕业生的中文程度。

        这批土生土长的孩子，意大利语说得比中文还要流利，彼此都以意大利语沟通，中文倒像一门外语了。经过在补习班长期的听说、造句及写作练习，学习的兴趣日益浓厚。相信这群孩子口说中文，手写中文的日子，就在不远的明天。

        佛罗伦萨中文学校，是当地唯一一所由政府资助的全日制中文学校。刚开始，有70多名年龄介于5至18岁的学生，校方根据他们的中文程度而非年龄来分班。换句话说，无论孩童或青年，只要从没受过中文教育的，就会被编入小学一年级班，从基本的拼音学起。

        然而，学校却面对着学生流动率高的问题。

        有的孩子随父母迁到外地城市去，也有部分家长最后决定将小孩送回家乡接受教育。学生退学的理由各有不同，导致初中班目前只有五六个人。

        外人或许以为，在意大利办中文学校必能赚钱，其实并非如此，个中滋味亦非旁人所能理解。

        该校潘校长说：“意大利不能没有中文学校，我们办校并非为了名利，而是怀抱着一份传承中文教育的使命。”

   意大利有6份中文报，即《欧华时报》、《欧洲快报》、《欧洲侨报》、《华商报》、《欧洲华人报》及《欧华联合时报》，皆由华人或社团创办。

        报章内容以翻译当地的法律法规为主，重点报道劳工的申请、身份及居留等问题。

        语言不通的华人生活在意大利，他们看不懂当地报纸及广播、电视，中文报便为他们开启了一扇窗口，让他们了解主流社会发展，也得以探闻家乡的消息。

        但中文报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以《欧华时报》为例，它于1996年创办，是当地创刊最早的中文报，每份售价欧元一块半，每期销量在一万至两万之间，扣除了开销、印刷费用后，有时不赚反亏，苦苦支撑两年后才有起色，但也是维持着一个不盈不亏的局面。

        由于华人工作忙碌，并无每日阅报的习惯，因此中文报主要通过零售的方式，或交由中国食品店去代销。市政府及移民局则会常年订阅，作为档案来收藏，从中了解当华人的生存状态。

        总体来看，当地中文报仍处于萌芽、发展阶段。

   在意大利，华人社团多达80个。

        法律规定，只要有会员3人就可以注册成立社团，因此它的种类繁多，有同乡会、联谊会、文化交流协会及商会等。历史较长，影响力较大的社团，要属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及罗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前者于1956年创办，前身是意大利北部华侨华人工商会，直到1986年才改名并沿用至今；后者成立于1998年1月，是罗马地区较大的华人团体。

        逢年过节，社团负责举办活动联系华人，活跃华社气氛；此外，也在华人的融入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提供意大利文课程及协助处理与官方之间的往来文件等。

        巾帼不让须眉，当地华人妇女的表现，赢来了一致好评。

        2000年成立的罗马华人华侨妇女联谊会，在维护妇女同胞的权益之余也不忘公益，多次为当地筹集善款，大大提升了罗马地区华人的形象。每逢三八妇女节，还组织活动，与主流社会的妇女进行联谊。值得一提的是，该会于2006年曾到贵州考察农村的教育情况，并当场捐助了20万元人民币。

        社团虽成立宗旨不一，但都以维护华人的权益和福利为目标，他们的活动有助于提升当地华人的形象，并促进他们的融入。

    2004年3月，来自青田的潘永长在罗马市30余万外来移民的支持下，当选为罗马移民议会议员。同年9月，他又被选为罗马移民议会副会长，任期5年。他是首位荣膺这个职位的华人，也是欧洲政坛职务最高的华人。其主要职责在于协助外来移民融入当地，并对行政部门进行监督，约束其不得出现有歧视移民的现象。

        入籍意大利的华人林红玉，于2008年当选为佛罗伦萨省冈毕 比森齐奥市政府移民局局长，专事负责处理中国移民事务。她能操一口流利意大利语，显得精力充沛，毫不讳言地表示她很喜欢这份能为华人服务的工作。

        华人的参政，提高了他们在意大利的社会地位。当选的华人为了移民的生存、权利而奔走，促进了移民的融入，也树立起了华人的良好形象。

华人移民意大利已超过半个世纪，他们从陌生到熟悉、从颠簸到安稳，从只身一人到儿孙满堂，一步一脚印地走到今天。

        当地华人奋斗的故事，深深嵌在下一代的记忆中。他们追随前人的脚步，发扬光大，家族事业犹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这形形色色的华人中，得意者有之，失意者也有之，但他们总是咬紧牙关地奋斗，相信这片土地能为他们带来奇迹。

    1991年克罗地亚脱离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宣告独立后，随即陷入内战，直到1995年才签署和平协议。自此以后，克罗地亚摆脱了社会主义框架的束缚，走向自由主义经济的道路，经济才逐渐发展起来。

        在巴尔干半岛诸国中，克罗地亚的经济较为发达，工业及制造业稳步发展，在石化、机械、造船、医药等行业，均以先进高超的技术见称。克罗地亚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地区渔产丰富，渔业发展甚佳。境内有高山绵延，河流密布，自然风景秀丽，享有“千岛之岸”之美誉，亦被称为欧洲最美丽的国家之一，是其中一个旅游业最发达的欧洲国家，旅游业每年为该国带来数以亿计的外汇。

        上世纪90年代，克罗地亚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吸引了华人带着勤奋与刻苦的精神来到这里，准备干一番大事业。

  据了解，最早抵达克罗地亚的华人，是一批大多数来自中国北方的知识分子。来自东北的刘雅各医生就是其中一个。1983年，他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交换学者计划”来到这里当医生。

        刘雅各于克罗地亚行医3年之后便回国，接着，一年后又再自费回到克罗地亚。而今，第一批华人当中，有的已投入商海；有的转行开了翻译公司，专为华人服务；而刘医生则选择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

        在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之后，迁移到克罗地亚的华人便逐渐增多，他们大部分来自周边国家，主要有罗马尼亚、波黑及奥地利等国，其中，罗马尼亚和奥地利的移民人数最多。他们再移民的原因，除了为财富，而且还为了保命。当年，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华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Belgrade）迁至克罗地亚。

        2002年至2003年间，到来的华人人数最多，并且多数属于商业迁移。在那个时候，办签证并不难，很多华人都办旅游签证过来，所需的文件仅是一张邀请信。华人来此的目的并非旅游，面是为了商业考察，一旦发现此处有商机，就会即刻着手创业。

        “通常，创业只需要在银行开个户头，然后租个地方再注册公司就行了。”

        当年，克罗地亚的发展颇佳，申请经商、移民、工作签证的条件也并不严苛。这些华人大多数是带着资本及生意经验移民过来的，所以移民的经历并不像其他国家的华人那般艰辛。

        克罗地亚也曾经一度拒华人游客于门外，然而，这种状况并不是源自于种族歧视的原因，而是一些害群之马所造成的。千禧年间，曾经有34名华人在萨格勒布旅游途当中上演“集体失踪”的戏码，有人猜测这批失踪的华人其实是去了西欧。那期间，边境管制不是很严厉的克罗地亚成了通往西欧的中转站。偷渡客经常从克罗地亚取道前往斯洛文尼亚，然后再到西欧。

        自从克罗地亚实施严厉条规之后，这种事情已鲜少发生，不过，克罗地亚对华人入境旅游的管制至今仍然非常严格。

        在短短的十年间，克罗地亚华人人口从寥寥数人一下便飙升到千余人。但种种条例的限制，使他们大多只抱着过客的心态，难以对这里产生什么深厚的感情。他们说：“万一待不下去的话，哪里有钱赚，到时就往哪里去。”

        对那些从周边国家过来的华人来说，克罗地亚充其量仅是他们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称之为买卖点，或许会更加恰当。

克罗地亚多年的内战，令首都萨格勒布迄今仍有满目疮痍、颓墙断壁的景象。不过战后其发展速度还是超越周边其他国家，而华人在此地的发展亦相当顺利。

        九成华人集中在首都萨格勒布，他们多来自浙江青田，东北人则占少数。虽然青田人多为农民出身，教育程度不高，但论及生意成就，却以他们最为出色，东北人往往自叹不如。知识分子出身的东北人大都以专业技能在克罗地亚谋生，他们坦言：“早年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尝试做生意，无奈总做不起来。”

        克罗地亚华人不过千余人，但在短短十余年便交出了85家批发店及200多家零售店的亮丽成绩，在克罗地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克罗地亚的华人过来时手上都带着一些开业资金。因此有八成华人一开始便从批发业做起，没有足够资本而不得不忙于练摊及赶集的华人并不多。

        “不过，有些华人是因为勤劳，要货跑得快（卖得多）才抽时间到外头赶集。”来自浙江的商人季爱文如是说。

        当然，并非每一个克罗地亚华人均是富商，其中也有少数华人面对资本不足的问题。

        “青田人做生意，口袋有500块钱，心里就想着做1000块钱的生意，不够就会向朋友借。”季爱文表示，“大家都是中国人，遇到没钱的就赊些货给他们，等以后他们成功立业，做生意时就会回头找你批货。帮了人同时也多了忠实客户，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呢？”

        以前，克罗地亚华人分别在亚洲商城、中国街及中国商城开设批发商场。当时要属中国商城最具规模，大概有15家华人批发店集中在那里。但是，这3个地区的盛况很快就在数年后纷纷走入了历史，有些商店甚至已遭拆除，不复存在。

        如今，85家华人批发店部集中在首部西部地区的长城商贸中心，店主多为青田人，只有少数福建人及东北人。

        这个面积达1万1000平方公尺的商贸中心，是2006年由两名华人合租，以间隔板搭建而成，再分租给其他华商。如此一来，华人便能集中起来，也方便零售业者到此取货。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下，他们的生意反而更好。

        “我们大多数是同乡，各人拿货设定价钱都是凭良心，绝不存在故意压低价钱的恶性竞争。”

        华商也表示，这个商贸中心让华人更为团结，共同为事业及业务之外的福利和慈善事业而努力。例如，2007年，华商在开业一周年之际举行大型捐赠活动，捐出了15万欧元的衣服鞋帽等物品予克罗地亚红十字会。此举让克罗地亚人对华人留下好印象。

        此外，此商贸中心也为当地人制造了不少就业机会。据调查，除了约有200名当地人在该中心为华人老板打工外，还有不少吉普赛流动商贩也来此批货，然后再四处练摊摆卖。

        走进长城商贸中心，一排排的简单而相似的批发店铺林立，店铺门面窄而内里宽敞，面积无论大小都有门牌及商铺招牌。

        这里批发生意的运作方式，一般是夫妻俩共同经营——先生驱车到码头提货，太太便在批发铺里忙着招呼客人。

        “周一至周五的客户多为当地人及吉普赛人，而周六周日则以华人为主。”华商们说。的确，平常在商贸中心随时可见当地人面孔，而一到周六周日，华人就多了起来。“住在乡下的华人每逢周末就会到首都取货，然后顺便留宿一晚，再到中餐馆用餐及与友人相聚。”

        他们口中的“乡下”就是指其他州属（省份）以及海边城市的华人。

        其实，商贸中心的华人并非时时刻刻都在忙碌中度过。几乎每个华商的柜台上都有一台新颖的电脑，在等待客户的当儿，他们会上网与家乡亲朋戚友联系，或打打游戏来打发时间。另有一部分人则会在走廊处聚集，玩玩扑克牌、聊聊天。

        克罗地亚政府定下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因此华人傍晚5点便必须收工回家，比起其他地方，生活相对清闲。“回家就记记账，点点货，日子倒是很空闲。”大部分华商皆异口同声地如此表示。

        这里的华人就是以这般不急不缓的节奏生活着。

        青田人大多秉持着华人要学中文的心态，因此通常把孩子送往中国接受教育。双方相隔千里如何一解相思之苦？他们说：“好在现在有网络视讯，平常有空便上网和孩子聊天，见见面。”

        克罗地亚华商不只善用现代科技，而且也注重本身的装扮，每日上班都穿得整整齐齐。“听说初期华人曾穿睡衣上街，如今个个穿着体面不说，还非常摩登，使当地人对华人另眼相看，改善固有的印象。”的确，商贸中心大多以批发纺织品为主，所售卖的衣服都是时下流行的款式；售卖者穿着摩登，也是店里的活招牌。

        “通常我们都会先设定款式，再回中国定制，所以这些服饰你在国内（中国）未必买得到。”克罗地亚华商做生意绝非单纯地订货取货，不少商家还会打造自家品牌，树立独特的风格。

        可是好景不长，竞争激烈加上一些客观因素的转变，如全球经济萧条、气候反复无常等，使得批发生意越来越难做。“往年这个时候早就下雪了，如今迟迟不下雪。虽然棉服利润最高，但今年的销售不如往年好。”批发商纷纷摇头叹气。

        华人选择到此地的原因在于华人不多，竞争不大，当时华人都能分得一大块经济蛋糕。如今，前来分蛋糕的人却愈来愈多。“现在半数以上的批发商都不赚钱啊！”这是大部分华商的看法。

 克罗地亚华人在零售业这个领域倒发展得相当顺利。据说，每个开零售店的老板，至少都会有两家分店。克罗地亚的批发商都集中在萨格勒布，而零售店则遍布整个克罗地亚。部分克罗地亚的零售店甚至比商贸中心的批发店还大，而且所售卖的物品从衣服、鞋子到首饰，应有尽有。

        有些打工族一存够钱就转行当零售店老板。“我以前是中餐馆厨师，后来资本够了便开了这家零售店。”陈永杰的零售店刚开业数年，坐落在首都市中心的古城建筑物里头。他表示，华人开的零售店都会标明“Kinazeski”的字眼，意思就是“华人零售店”。

        在克罗地亚人眼里，华人与零售店仿佛是连体婴，当地人一看到华人就认为他们都是零售店老板。“之前我住家隔壁有间零售店，后来不知何故搬走了。结果某天有个克罗地亚老太太抓着我猛问为何关了店，说她要买东西。”刘雅各医生说，他当下哭笑不得，只得向老太太解释他是医生而非商人。

        也有部分华人店主不住在克罗地亚，而是在邻国远距离遥控这里的生意。或就算他们人在克罗地亚，也多数住在首都，其他地区的生意就交由当地人打理。华人对克罗地亚人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并认为克罗地亚人办事认真。

        华人集中的萨格勒布是个古建筑物云集的城市，因克国政府保护古迹的政策，华人的店铺只能低调地融入其中。“这里的政策不容许我们对古迹大肆动土，充其量只能挂个中文字招牌，或在店门口放个石狮子像。”亚洲饭店的老板娘李晓彤无奈地表示。

        当地人喜欢吃中餐，走在萨格勒布的街上，随处可见中餐馆，而老板大都为地道的华人。最先起步的中餐馆后劲十足，完全不受目前经济萧条的局势所影响。

        克罗地亚的中餐行业多走中高档路线，因此起家不容易，入行门槛比批发业和零售业要高出许多。但相对的，这里的中餐价格也比西餐贵上许多。

在克罗地亚，歧视问题看似不存在，其实不然。当地媒体对于华人的报导呈两极化零售业中餐业后来居上，有的报导客观及正面，有的则抹黑形象、凸显华人的黑暗面。

        目前就读于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政治系的中国留学生上官旭峰表示，对于当地媒体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报导方式，他早已习以为常，处之泰然。

        抱有这种看法的不只上官旭峰一人。刘雅各医生也指出：“曾经有一对从事自由写作的夫妇报导了关于克罗地亚华人的种种，形象正面，可是文章久久不见刊登，致电询问后，该夫妇才知道那本销量极佳的杂志一直把稿压着。”那对夫妇无奈地向刘医生抱怨说，该杂志以“华人形象塑造得过于正面”的理由拒绝刊登文章。

        刘医生表示，他从此不再订阅该杂志。“所幸那篇文章最后还是被另一家杂志当封面故事登了出来。”

        无论如何，大多数的克罗地亚华人还是忙着打理生意，而无暇关注这些“歧视”的问题。

        事实上，克罗地亚政府在各个方面对外来移民都一视同仁，而大部分克罗地亚人对华人也并无歧视之见，只是有时印象欠佳。这不只是他们固有的偏见使然，部分原因也出自于一些华人素质不佳，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不过，也有一些克罗地亚人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情谊，如成立马可·波罗协会的安东尼·西门内丁（Antonio Simonetti），对马可·波罗的热爱使他进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兴趣，积极担任起文化交流的使者。

  “我是全克罗地亚唯一一个生活在海边的华人。”刘丽英自豪地说。当年，刘丽英在中国深圳认识了来自克罗地亚的另一半。两人共结连理后，她毅然放下编辑主任的高职，于1999年随丈夫回到这个在她印象中“闭塞”的沿海城市波雷奇（Porec）生活。

        刘丽英依旧为自己在2008年奥运会上的壮举兴奋不已。她回忆说：“当时，在克罗地亚与澳洲的篮球比赛上，我让华人同胞拿着克罗地亚旗帜，用克罗地亚语为克罗地亚参赛队伍加油。”刘丽英说，当时中国队没参赛，而克罗地亚支持者稀稀落落。“比赛开始前，我对着席上的中国人说：来！帮帮忙，为克罗地亚喊加油，他们豪爽地答应了。结果，克罗地亚赢得了参赛以来的第一面奖牌。”

        此举让远在波雷奇的克罗地亚人对她刮目相看。

        “想当年，我初到此地，这个地区还很闭塞。他们甚至没看过黄种人，还特地光顾我和我先生的咖啡店，目的是来看我，更贴切地说是‘观赏’我，注视我的一举一动，甚至有人还问我洗了头发后，水是否黑色的？”刘丽英说，有排外心态者甚至口出狂言要华人离开这个国家。为了让此地的人对中国有更多的认识，她正筹备成立一家奥运博物馆。

        如今，刘丽英已入籍克罗地亚。“我爱克罗地亚，这里有我的事业、我的朋友。”当年一句克罗地亚语也不会的刘丽英，如今已是克罗地亚波雷奇的商界女强人，也是少数真正能融入克罗地亚人圈子的华人。

克罗地亚华人的移民史和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短暂。定居于此的华人不多，社团组织相对较薄弱。华人大多没有久居的打算，只抱着赚不到钱，待不下去就离开的心态。

        当年，许多华商是因为相中了这里的商机，才愿意带着资本前来。如今批发业生意逐渐式微，只有中餐业的前景较为明朗。华人还来不及融入克罗地亚，已经酝酿着离开，寻找新的契机。

 作为奥运发祥地的希腊，同时也是西方文明的摇篮。首都雅典是希腊文化与艺术

中心，巴特农神庙、雅典娜纯金塑像以及无数的神殿、古迹等，其建筑艺术风格之独特，及雕塑与装饰图案之精湛，可谓独步古今，充分显示了古希腊人的聪明与睿智。

        这个曾经众神庇佑、群贤毕至的圣地，留下了大量令人神往的神话传说。那独具一格的文化遗产，仿佛向世人倾诉着昨日的辉煌。然而繁华已逝，希腊如今经济发展缓慢，赤字、债务及通膨率居高不下，成了欧盟成员国中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

        虽然如此，这个拥有3000多个星罗棋布的岛屿、三面环海的国度，加上明媚的风光、湛蓝的海水，以及处处散发的古文明气息，连年吸引着无数慕名前来的游客，可从中赚取外汇，平衡开支。

        遗憾的是，由于法令不健全，当地政府没能敞开大门迎接外来移民，历年来移居当地的华人寥寥可数。而那些已经足履斯土的华人，则逐渐适应环境，继而落地生根，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经济生力军。

  最早把华人带到希腊来的，是跨国婚姻。

        一名上海的王姓男子，于1951年随改嫁希腊人的母亲来到这里。他曾在希尔顿酒店上班，后来在当地成家立业。

        20年之后，30多名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女子远嫁希腊海员而来。不久，香港、台湾的移民也陆续到来。尽管身处全然陌生的环境，有的还与海员丈夫聚少离多，但这批过埠新娘却凭着顽强的毅力，从生活中掌握当地的语言和文化，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言语不通，菜都不知怎么买，买东西也得指着橱窗。”来自台湾、当初被语言难倒的许莉，如今却成为一名口操流利希腊语，为当地华人服务的翻译，可谓苦尽甘来。

        来自狮城的冯俊芳于1977年嫁到希腊，就在这碧海蓝天的国度里过着悠然惬意的生活。“海岛生活轻松，日子不难过。用简单的英文加上比手划脚，一样可以沟通。”丈夫航海期间，邻居对冯俊芳照顾有加，过年过节也邀她一同庆祝，体现了当地人的友善与热情。她因此没有被孤立之感，更不觉得寂寞。人称“芳姐”的她，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从当初的家庭主到今日的翻译品，始终游刃有余。华人要是碰到身份办理或税务等事项都找她帮忙，使她在华人圈中小有名气。

        越战结束后，大批南越人开始了逃亡生涯。1979年，一艘载着逃亡者的船只不幸沉没，正好有艘希腊货船驶过，救起了59人，并将他们送往希腊。后来，希腊政府也从香港的难民营里收容了200名印支难民，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越南人，其余是华人。落脚后，他们的住宿、工作都获妥善安排，有的在工厂或酒店里打工，有的则开餐馆，自力更生。而今，经已入籍的他们不再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在希腊展开了新生活。

        此后，来自台湾、香港及东南亚的华人逐渐增多，然而，却迟迟不见中国大陆华人的身影。直至1985年，才有3个中国温州的男子，到当地的餐馆来打工。3人中只有一个叫李白丁的人留下，另外两人后来分别转往马耳他和荷兰另谋发展。

        初期生活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语言不通。李白丁忆起早期生活，边笑边摇头道：“买了牛奶回来，打开却是盐。语言不通，字又不识，常常闹笑话。当时资讯不发达，没法收听广播，家乡寄来的报纸也是迟迟才收到，生活闭塞得很。”纵使生活有点苦闷，但华人本着打拼的精神，熬一熬也就过去了。

        因移民不间断地涌入，希腊于1998年实行第一次大赦，华人从奥地利、意大利及法国等地陆续前来，领取居留身份，华人人数增至2000名。

        2001年的第二次大赦，一批非法移民从意大利乘渡轮而来。他们将护照藏于口袋，警方检查时就马上丢掉。警方无法查核身份，他们就能避免被遣返。走运的，轻松过关；倒霉者，终遭扣留，还被关进监狱3个月。

        其实，华人对这种偷渡领身份的做法早有准备。他们一般事先联系当地的蛇头，再支付2500欧元为代价，花个两三天即可办妥。到了2005年实行第三次大赦之时，华人大举涌入希腊。前后3次大赦，壮大了希腊华人的阵容，华人总数突破了两万人。

        偷渡、等候大赦、利用他国居留身份来此开店等等，移民们的花层出不穷。华人无论如何，总想方设法留在这片土地上。“这地方太破旧，待下去会完蛋。”福建同乡会会长陈金辉当初虽曾抱持这样的想法，但留下之后，如今不但成为零售店老板，还在社团中担任要职。

        整体而言，希腊的工业不发达、工作机会少、失业率高，显然不是移民们首选之地，而赚了钱就转往西欧国家，才是华人的如意算盘。不过，那些留下来的，却在这里打造了另一番人生天地。

  欧洲华人常说，希腊似乎是温州人的天下。

        尽管温州人在1980年代才姗姗来迟，但短短20余年，人数却占了当地华人总数的80%，其余的华人则来自青田、福建及东南亚。雅典的市中心奥莫尼亚（Omonoia）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不会希腊语没关系，只要懂温州话就铁定能挣钱。由此可见温州人在希腊经济影响力之大。

        华人分别聚集在首都雅典，以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Thessaloniki），主要从事批发、零售及中餐业。批发货行的老板多是浙江人，零售店的老板则多是福建人。

        当地的华团常相互联系，热衷于社会公益。希腊唯一的中文报《欧洲联合周报希腊版》，更获得华人华商的支持，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至于刚成立的中文班，则为当地中文教育奠定了基础。

        希腊这个国度，沉浸在典雅文化及爱琴海的浪漫气息中；久经濡染，华人也在不经意间放慢了脚步。这里悠闲自在的生活，散发着诱人的色彩，华人从容地走过岁月，愈加体验生活的美好。

        当地的华人移民历史虽短，然而，他们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岁月荏苒，华人已在这个异乡，开拓出另一块生存天地。

 希腊的服装贸易业起步虽晚但发展快，短短几年已成为当地华人的主业。他们不但在此扎稳了经济根基，还圆了当老板的梦。

        服装贸易业的发展，可追溯到1996年初。一批扛着价廉物美的纺织品、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温州新移民，本着不妨一试的心态，就地摆设地摊，售卖各类物品，没想到货物瞬间被抢购一空，生意居然火红起来。于是他们趁热打铁，开始物色店铺，计划将生意做大。

        雅典市区奥莫尼亚是个贫民窟，妓女和瘾君子聚集。市貌脏乱得连当地人都不愿踏足。然而，这一区店租便宜，华人便选择在此落脚。意大利华商孙建平独具慧眼，率先于1998年在这里设立贸易商行，第二家商行的业主则是来自法国的李大乐。接着，第三、第四家也陆续投入营业，4家商行都以服装批发为主。据说，一个集装箱一晚上就卖光了。从此，服装贸易在此奠下了基础。

        当时的商行只有十几家，顾客都排队买货，每月营业额曾达6万欧元。商行老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生意很好做，货物卖掉一半就已回本，剩下的全是利润。春天卖不完的货物，可以在秋天继续卖。”

        服装贸易业的盛况持续蔓延，生意规模也扩大了。到了2001年，几乎人人都在找店铺，商行增至100多家，后来竟增至300多家。华人的旅行社、中国食品店、网吧及理发店电纷纷在此落户，便得奥莫尼亚的行情水涨船高，身价百倍，30平方米的店铺顶让费涨至3万欧元，租金每月1500欧元。

        贸易行的货品以服装、鞋帽为主，另有玩具、家具、建材、五金、小型电器及汽车装备等。这里批发商多，每天的成交额可达上万元。短短8年间，华人已主导了雅典的服装批发市场，奥莫尼亚也成了华人聚集区。

        可惜好景不长，随著商行渐渐增多，竞争日益激烈。华商有的赚、有的赔，也有的收入仅够维持基本开销。有先见之明者，预见这市场终将饱和，便于1909年开始转战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

        萨洛尼卡是一个海港城市，临近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塞浦路斯。因地缘关系，这里的华人绝大多数从意大利转来。贸易商行从最初的几家发展至目前的140家，华人社区、批发市场都已逐渐成形。

        近年来，供过于求是希腊商行最大的致命伤；往往仅能消耗100箱货物的市场，却进口超过200箱货，货品供需严重失衡，生意差的商行都面临囤货赔钱的窘境。再加上欧洲经济不景气，国民消费力下滑，贸易业前景令人忧心。另外，同行间的恶性竞争也导致商行生意滑落。批发商无奈地说：“货物得有30%的毛利，扣除税收、开销，剩下的是净利，向来如此。但华商任意压价，只求脱销，毛利只剩10%，形成了偷税、漏税的风气。”商家们近乎赔本的压价手段，打乱了整个市场的行情，而商品价格一旦下降就再难调升，生意越发难做。

        竞相压价的结果，导致同一货物价格跟当地商家的价格差了好几倍，双方积怨日深，不满的情绪终于爆发。2006年，200多名希腊人在奥莫尼亚游行示威，指责华人压价抢饭碗，扬言要将中国人赶出奥莫尼亚。

        不过，希腊人毕竟还是温和的，示威、叫骂过后又再次平静如常。不管示威是否带来实效，但至少已经表达了他们的心声。

        另外，华人也涉足小本经营的零售业，单在奥莫尼亚就有约2000家各类零售店，业主多为福建人；而华人服装零售店更是遍布希腊大街小巷。

        在希腊，华人如果资金短缺、语言不通，工作没着落，还可以走街串巷兜售货物维生。据估计，这些以福建人为主的“卖散客”，共有4000人左右，其中1000人散布在萨洛尼卡市。他们每天清晨就拖着货物出门，奔波于大街小巷之间，哪里有市场就往哪里去。无论在火车站、咖啡馆或餐厅，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兜售着收音机、打火机、太阳眼镜、按摩棒及相框等货品。

        其实，“卖散”只是华人的过渡行业，一般通过它来学习语言、累积商业经验，再逐步走向正规的经营，当地多数的商行老板都由此起家。

        另外，还有一部分华人因缺乏资本，只能到零售店、批发店或中餐馆去打工。商行的工作量大，从早上9点忙到晚上9点，平均月薪700欧元。若在餐馆工作则更为辛苦，得从早上忙到午夜12点，才能赚取1200欧元的月薪。

        华人离乡背井，不远千里而来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只要有钱可赚，日子再苦都会咬紧牙关熬下去。

 希腊人生活悠闲、热爱自由。在华人眼中，希腊人是懒散的，休息远比工作来得重要。他们很注重生活享受，早上在露台铺好干净的桌布，摆上精致的茶具，与家人同吃早餐、喝咖啡，谈谈笑笑；反观华人，天微亮就开始忙碌的一天，随便往嘴里塞些面包或稀饭，就赶着出门上班。

        “希腊人爱聊天，一杯咖啡能喝上五六个小时。”华人搞不懂，希腊人为何那么悠游自在、慢条斯理？希腊人也纳闷，华人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累？东西方大异其趣的生活态度，在这片土地上充分体现。

        其实，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悠闲的生活虽好，但代价却是发展步伐的缓慢。“20年前与20年后的希腊，相差不远。”20多年前就嫁到希腊的许莉，对此感触良多。

        希腊人每逢周一、三、六工作半天，周二、四、五则从早上9点至下午2点，傍晚5点再继续工作至晚间8点，周日休息。华人却是每天从上午9点工作至晚上9点，而星期一、三、六则更为忙碌。希腊人工作半天，下半天的休息时间一般都不会到华人店里来消费，因此华商则趁当地人休息时到批发行去进货，忙进忙出地一天就过去了。

        在这3天里，无论卖菜的还是卖糕点的，都会到奥莫尼亚中国城旁边摆摊，其中的油条、麻花、浙江凉菜、凤爪及猪耳等，都是华人爱吃的菜肴，也是他们缓解乡愁的良药。

        根据当地的规定，除了餐馆、咖啡馆可以在星期日照常营业外，其他店铺都得歇业一天。华人最初无法适应这种规定，若周六忘了购物，星期日就只能在家吃罐头度日。在当地，购置日用品得算准时间，早作安排才行。

        希腊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生活费较其他欧盟国家来得便宜。一个小康之家每月的生活费只需约600欧元。希腊人的晚餐总在夜间10点开始，一顿饭从沙拉、头盘到主菜，少说也得吃上3个小时，饭后也许还到咖啡馆、酒吧去继续那未完的话题。华人却总在为生活忙碌，下班后备菜烧饭，饭后顶多看看电视、报章或杂志，就这样打发了一天。但到了周末，有的华人会开车到郊外游玩，或到海边游泳、捉螃蟹；有的则找朋友聚餐、打麻将、玩扑克甚至上赌场；也有些人在家休息、上网、收看中央电视台、香港电视台的节目，再不就上希腊餐馆去吃烤肉。

        希腊妇女联合会会长历春莲表示：“这里有的是同乡、朋友，生活不单调，就是忙于工作，没时间玩而已。”

        作为华人聚集区的奥莫尼亚一带，房子陈旧、交通拥挤，是希腊最脏乱、治安最差的地区，但也是当地华人上班和栖身的所在。营生的商行和居处很靠近，华人上下班十分方便。从前，华人很少在希腊购置房屋，多数是四五人合租一间约80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600欧元左右。后来，该国规定只要在当地买房子，无论有无居留身份都获准留在希腊。如此一来，购置房屋的华人越来越多。

        在雅典，80%的华人都有遭窃被抢的经验，据说是一小批华人与其他外来移民合力干下的勾当。这批华人掌握了当地华商的生活作息，对哪家手头上有大量现金了如指掌，每每伙同七八名匪徒尾随其后，或在被害人家门口守候，趁其不备就下手。由于当地警方的办事效率令人失望，这类罪案接二连三地发生。

        希腊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张锡清无奈地表示：“天天抢，治安糟透了。去报案，警察反而说劫匪就是没钱才会偷。他们今天捉人，明天放人，报警根本没用。”市中心奥莫尼亚这地方龙蛇混杂，卫生、治安及秩序都欠佳，华人只好自求多福，一再退让，只求能保住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

        若撇开治安问题，华人的生活大致上还是平静的。在失去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的同时，也少了家乡那份压力和紧张。或许，华人只要适应，就可以安稳地生活下去。

延长居留的问题，是希腊华人内心最大的隐忧。

        希腊长期以来是移民输出国，直到近十年才开始接收移民，但移民欲申请配偶、子女前来团聚却不易。过往，一年的居留身份可更新为3年，3年后更新为5年。申请永久居留，则须通过希腊语及文化知识的测试。

        “50人中，只有一人拿到绿卡。”批发商说。希腊移民政策经常更动，华人处理居留手续时都得面对繁冗琐碎的过程，最终却可能换来拒签的结果。手续拖拖拉拉，证件未必到手，华人为此身心疲惫。

        申请入籍的程序更是繁琐，最快也得等个漫漫十年才能获准。虽然只要跟当地人结婚，居住超过3年即可申请入籍。然而，申请不表示被接受，有些华人连孩子都长大成人了，仍无法入籍。如今，成功入籍的华人不到30个。因此，对于入籍一事，华人已不想再费劲去跟当地政府周旋，也不再抱太大希望。既来之，则安之，只要生活安稳，入籍与否已是次要。

        当地政府于2006年开始，规定从商者必须持有“老板居留身份”，才有从商的资格，否则必须关闭店面以保住原有的居留身份。简单来说，光具备居留资格者不得从商，而老板居留身份一旦被拒签，就意味着必须关闭商店。华商无奈，只好寻求法律途径，但法院审判过程冗长，迟迟未见定夺。华商目前手持政府发出为期两年的临时等待纸，留守希腊。一旦等待纸不具备购买发票的效力时，商家便失去了开出任何发票、单据的权力，商铺面临被关闭的危机。

        此外，除了春节或夏天可以回返祖籍国外，手持等待纸者一概不准离境；即便离境也不可去往欧洲其他国家。此条例变相地使华人滞留在希腊，这对往来中国、希腊两地的华商而言，损失难以估计。当地华商仿佛被套上了无形的枷锁，万般无奈下也只能无止境地等待。

        至于华人第二代，即使只有区区400人左右，也同样面对居留的问题。依据法律，在当地出生的移民子女必须满18岁才能申请公民身份，且须证明已在希腊居住了至少十年，另加上1500欧元不可退还的申请费。在公民权未获准之前，他们仍需持临时居留身份呆在希腊。但由于父母工作忙碌，他们都被送回家乡托亲人看顾。至今，第二代身份问题及老板居留问题仍悬而未决。

        部分偷渡而来的华人历尽千辛万苦，合法居留仍旧遥遥无期。去留的问题始终盘旋脑际，挥之不去，令华人仿佛断了线的风筝般迷失了方向，对希腊也就少了一份归属感。

 在希腊、社团既是凝聚华人力量的平台，更是他们倾吐心声的空间。

        希腊华人的移民历史不长，社团尚在起步的阶段，领袖也比较年轻，自1983年以来，希腊共有数个成立宗旨不一的华人社团，但目标都为团结华人，协助他们融入社会。

        这些社团的成立时间虽短，但彼此关系融洽。希腊的华人社团包括希腊华侨联谊会、希腊华人华侨总商会、希腊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希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希腊福建同乡会、希腊青田同乡会、希腊萨洛尼卡华人华侨联谊会及希腊华人华侨妇联总会。这些社团实行理事会负责制，主要领导人由两年一届的会员大会上选出，会长则由副会长、常务副会长推选，而社团主要的经费由领导层支付。

        社团的会所既是办事处，也是华人共享的休闲中心，设有乒乓桌、麻将桌、茶室及卫星电视。简单的设施营造出温馨的环境，是当地华人的情感联络站。

        希腊华侨联谊会成立得最早，由来自台湾的张步仁于1983年创办。80年代的希腊华人不多，这个社团尚属联谊性质，会员约30多人，以台湾及新、马远嫁而来的女士居多。每逢中国传统节日，会员们会携带家眷，齐来欢聚。社团组织联谊、文娱活动，让会员们于工作、生活上彼此照应。例如有800多名会员的希腊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就成功举办了希腊首届华人卡拉OK大赛。

        社团团结力量大，足以协调华人之间的矛盾，例如出面调解批发商生意上的纠纷，劝谕双方将货物价格加以调整，以稳定市场。此外，社团甚至也介入协调家庭纠纷，协助解决问题。

        华团回馈社会，也在当地塑造了友好的形象，赢来好口碑。2007年7月，华人社团捐献1000多件衣服给雅典一家福利院的残疾人士，希腊媒体大篇幅报道，引起很大的社会回响。同年8月，希腊发生森林大火，一半以上的国土遭劫，百姓流离失所，财物化为灰烬，灾情严重。华团即刻动员筹款，成功募集了价值12万欧元的日用品和6万欧元现金，协助重建被大火毁损的奥林匹亚山。这项意义深远的行动显示出华人不光是来赚钱，也是来生活、来建设的。

        希腊语难学，令华人融入当地颇为困难。日常在店铺里的雇员都是同乡，生活总围绕在口操乡音的圈子里，很少用上希腊语。而且，华人成天忙于营生，也没太多时间去思索融入的问题。有鉴于此，成立于2002年的希腊华人华侨总商会免费提供希腊语培训班和法律培训班，协助华人掌握语言及法律知识，以便克服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为融入当地创造更好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3月24日，在7个社团的合作下，800名当地华入，清晨从希腊各地赶往古奥林匹亚竞技场，见证了第29届北京夏季奥运的圣火采集仪式，为北京奥运会助阵，华人这声势浩大，前所未有的活动，展现了他们的团结精神，足以让希腊华人引以为豪。

 中文报是华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但是希腊却迟至2005年才出现了首份，也是唯一的中文报——《南欧时报》，内容包括希腊经济、政治、当地法律和风俗人情，扩大了华人的视野。

        报纸最初只有16版，以双周刊的形式发行，每期印刷100份，免费派送。当时规模不大的报馆只有两名编辑，新闻主要都由网上下载。

        万事起头难，经过两年的亏损后，报馆才转亏为盈。然而，来自青田的创办人吴海龙却不曾打退堂鼓，本着要让每位华人都看到中文报纸的理念，他始终坚持不懈。后来，该报更名为《中希时报》，在2005至2006年希腊移民大赦期间，它翔实地反映了大赦的情况，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谣言，为华社解决不少实际问题，因而广受好评。从此，报纸的知名度提高，华人、华商也对该报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提供不少赞助。总编辑汪鹏表示：“华人是报社存在的前提，彼此间唇齿相依。”

        2006年9月，《中希时报》与法国《欧洲时报》、上海《新民晚报》合作，正式加入《欧洲联合周报》报系，更名为《欧洲联合周报希腊版》，其发行范围扩及巴尔干半岛上其他数个国家，销量甚至突破了3000份。如今，这份三度易名、增至48版的报章每周五出版，内容以华人最关切的移民法令及新闻为主。该报不但服务华人，同时也成为希腊人了解当地华社的管道。报纸每期皆派送30份到雅典大学，免费提供给选修汉语的希腊学生们。

在这尚无正规中文学校的国度里，中文班肩负了传承中文教育的使命。

        希腊青田同乡会于2007年开办了中文班，首批学生只有8人，后来通过宣传增至15人。上课分为大、中、小3班，由来自中国的李芳老师负责执教，每周5天，每天从下午2点到4点。3班学生的年龄由小到大，分别是3至6岁的学前儿童、7至8岁以及9至10岁的儿童。

        每天从国立学校下课后，学生就赶过来上中文课。他们大多都显得非常快乐，从不言累。这些学生多数来自青田、温州，他们在校说希腊语，在家则口操乡音。经中文教育的熏陶，他们已具备读、写的能力。李芳老师说：“他们爱说中文，不觉得方块字有多难。”

        许多华人家长将孩子送来学习，打好基础后就送他们回家乡去接受正统的中文教育，因此学生的流动率很高。但无论人数多寡，中文班还是会继续办下去。

 雅典中文学校”肩负传承中文教育的使命。无论学生人数多寡还是会办下去。

 希腊有3000多个海岛，碧海蓝天，是著名的度假胜地，也是华人挣钱的天堂。自2000年开始，一群华人背负行囊而来，为希腊游客提供沙滩按摩服务。仅靠粗浅的手艺，想不到竟成了岛国上的按摩先驱。

        当时，整个沙滩上只有两三个华人按摩师，生意特好，一般每次15到50分钟的服务时间，收费10至30欧元不等。这一本万利的行业很快就传开来。此后，每年5月至10月，在商行打工的华人会向老板请假，到海岛打工，每天可赚取200欧元，一周下来要比在商行赚得更多，5个月后就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没学过正统按摩技艺的他们，只有一双勤奋的巧手。炎炎夏季，希腊的气温最高可达40多度。他们在烈日当空下挥汗如雨、手酸背疼地替游客按摩，丝毫也不敢怠慢。

        或许，只要能生存，只要能挣钱，这点辛苦在他们看来已是微不足道。

希腊的发展空间有限，不算是个理想的旅居国。但多年以前，华人就开始风雨兼程地闯荡希腊，在不知不觉间应和着当地节奏，放慢自己的生活脚步。

        对比今昔的心境，华人惊讶于自身的转变。甘于平凡，知足常乐，希腊华人从不显露骄横之态，而是埋头耕耘，守着自己一手创立起来的事业与家庭。

  素有“玫瑰王国”之称的保加利亚，是全世界最大的玫瑰产地，酸奶、葡萄酒更是享誉国际。它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东部，北连罗马尼亚，南接土耳其、希腊，西临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东濒黑海。

        公元681年，斯拉夫人及古保加利亚人，在多瑙河流域建立了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1946年宣布废除君主制后，成立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1990年11月15日，正式定名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多年的封闭，让它被视为巴尔地区最神秘的国度。华人循着商机而来，在此开拓着人生的新天地。

 一场杂技表演，将华人带到保加利亚。

        20世纪40年代，3名来自河北吴桥的中国男子随杂技团前来表演。后来，其中一人随波兰籍妻子回乡发展，另一人离开后不知去向，只有一人留了下来。

        中国抗日战争中，华、保人民之间诞生了一段异国婚恋，为保加利亚带来了第一位华人知识分子。

        来自北京、当时年仅23岁的张荪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积极投身抗战医护工作。在硝烟战火中，她邂逅了响应“国际医药援华会”的号召、前来支援中国的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

        他俩并肩战斗，相知相惜，爱苗悄悄地萌长起来，并于1942年的中国抗日前线，喜结连理。

        抗战的硝烟终于散去。1945年8月，张荪芬带着两岁的长子保中，跟随丈夫回返保加利亚，定居首都索非亚。

        尽管在保加利亚生活了60年，但张荪芬始终没有入籍，很以中国人的身份而自豪。90岁的她五代同堂，儿孙成群，生活朴素简单。

        1989年，保加利亚局势动荡不安，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民不聊生。当时市场上物资匮乏，连买面包都要排队，购物还得使用政府发放的限额票根。

        乱世觅商机，几十名中国青田人于1992年远道而来。他们每天提着篮子到菜场、餐馆去兜售青田油、领带及计算器，货品十分畅销。

        市场一片大好，这批青田个体户见到了发展的曙光。于是，原本将当地视为到西欧跳板的他们，改变了往西欧去的初衷，盘算着如何将更多货物带到当地，以扩充生意。

        或许，华人认为只要能赚钱，在哪儿生活都一样。与其到竞争激烈的西欧打工，不如留在保加利亚当个小老板。

        那时，在索非亚郊外有一个叫比打卡的周末跳蚤市场，华人闻风而至，每逢周末都一窝蜂涌到市场来抢“摊”。区区2000平方米的空旷地段，却引来上百名的个体户，竞争之激烈不言而喻。

        市场在清晨7点才开门营业，为了抢占好摊位，有华人凌晨4点就会乘出租车到场排队，在铁栅外苦苦守候3小时。有的练摊贩不守秩序，任意插队，彼此大打出手；也有急躁者等不及铁门打开，越栅而入，结果被保安人员一顿痛殴，真是钱未到手，头先挂彩。

        市场上人潮络绎不绝，华人忙得不亦乐乎，窃贼也在窥探着下手的时机。有些吉普赛人假意前来购物，几个人在前头假扮顾客，几个人在后头趁摊主不备，顺手牵羊。

        丢了再赚，赚了又丢，一天的努力所得往往化为乌有。“要防顾客偷货，又得小心钱袋被扒走，赚钱真不容易。”保加利亚中国商会会长章志光，谈起了早期练摊的亲身经历。

        多少愤慨，几许无奈，生活却仍得继续维持下去。

        那年头运输业不发达，每隔两周，华人就得连夜搭飞机回中国去添购货物。为了多带，他们尽量挑选轻便的领带、羽绒服、丝巾等货品。当时行李没有重量限制，他们把货品尽量往行李箱里塞，每次少说也有几百公斤。“有人背着100公斤的乌金石过关，腰都压弯了。”章志光回忆当时情景，无限唏嘘。

        随着当地市场大有赚头的消息不胫而走，华人的亲友们开始大量涌来。1997、1998年是华人涌入的高峰期，华人人数高达一万。

  保加利亚，并不是一个移民的天堂。

        移民政策的限制、过高的关税加上难学的语言，纵使有钱可赚，也难以吸引更多华人到来。大部分华人只是匆匆过客，来了又走。如今，华人人数约2000多人。

        他们基本上都拥有长期居留权，大多聚居在索非亚。其中，青田人占了总数的80%，其次则是温州、福建、河北、上海及江苏人。

        他们主导了当地的百货批发业和中餐业。

        他们人数不多，但却拥有好几个社团。

        中文报的出现曾给华人带来慰藉，却又受到网络资讯的冲击而停刊。中文补习班则犹如禾苗，正在茁壮成长。

        华人在这个玫瑰王国里发财致富、生活闲适，颇感欣慰。然而，无法融入当地是他们最大的遗憾。

  世上难有笔直的路可走，保加利亚华人取得的成果，也并非一帆风顺。

        从早期的练摊到集装箱批发、从漫无章法到略具规模、从身无分文变为商铺老板、从单打独斗到聘雇员工，一步一个脚印，将生意由小做大。

        90年代，保加利亚市郊有个简陋的批发市场，名为依林翠，原在比达卡跳蚤市场练摊，已奠下经济基础的华人，萌生了进军批发市场的念头。随着华人的到来，市场迅速扩大，分为一区和二区，商铺激增至1800家。依林翠市场摇身一变，成了保加利亚最大的批发市场。

        华人聚集在市场一区，由最初的几十家，发展至现有的400多家，他们主导了依林翠批发市场。

        400多家的摊位与商铺，有80%为青田人所有。市场生意红火，客似云来。每天，周边国家如罗马尼亚、马其顿及塞浦路斯的零售商都前来采购，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商铺由原来的仓库间隔而成，店内整洁，灯光明亮。商品以服装、鞋帽及皮夹克为主，质量虽然一般，胜在价钱便宜，满足了当地商品匮乏、消费力低的市场需求。

        可惜好景不长，保加利亚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欧盟，虽圆了当地人的梦想，却为华人的经济带来了消极影响。

        欧盟国家采取自由通关制、顾客都涌到规模更大的罗马尼亚批发市场去购货，从前生意红火，如今冷冷清清，巨大的反差让华商们撑持不住，纷纷关闭商行，转而发展其他行业，主要是中餐业。

        早期，中餐馆的作用除了维持生计，也是华人间相互交流的平台。第一家中餐馆于1992年开业，名为祖国饭店，位于洛迪纳酒店里头。

        那时候，华人都会到中餐馆来跑一趟，一边享用中餐以慰藉思乡之情，一边打探消息。诸如保加利亚的概况、如何申请居留、哪些生意好做、怎样联系华人等，都是初来乍到者所面对的迫切问题。

        最初，中餐馆老板以中国南方人居多，菜系以浙江菜为主，如今则以份量大、价格便宜的北方菜为主，一顿饭吃下来，最低消费两欧元，最高也不超过40欧元。

        中餐馆主要的顾客群是当地人。业者们为了迎合市场，贴心地备有两份菜单，以供当地人及华人作选择。当地人不吃带有骨头的菜肴，偏爱酸甜口味，因此糖醋鸡、酸辣汤及炒饭是他们的最爱。至于华人，则习惯以鸡鸭鱼为主，菜式变化也较多。

        在当地，中餐无须费心思变化，只要有味精、酱油就足以令当地顾客满意，酱油瓶是餐馆里不可或缺的要件。“白饭一上桌，保加利亚人就会倒酱油，光酱油都不知吃了多少。”或许在保加利亚人看来，酱油本身就是一道佳肴。

        中餐馆只需两万欧元就能开业，无疑是投资最少、回报最快的行业。如今，有100家左右的中餐馆，星罗棋布于保加利亚的大小城市之中。

        然而，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中餐馆的生意普遍欠佳，周末更是出奇地冷清。但无论如何，华人还是坚持每天营业，赚多少算多少。一名老板谈起自身的经历，很是感慨：“经营中餐馆很累，每天从早到晚守在店里，钱又赚得不多。”

        由于担心移民会冲击当地的劳务市场，政府设置了许多申请外劳的限制，并规定外来移民在当地开设公司，无论规模大小都必须聘请当地人。可是，自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后，当地人都涌到国外去谋生，人口从900万降至如今的760万。人口严重流失之下员工难请，申请外劳又面临诸多限制，中餐业者们面临有活没人干的窘境。

        餐馆如果没有厨师，没有工人，迟早会关门大吉。就这样，当地华人前后经营的批发业及中餐业，都是先盛后衰。

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华人不再是从前那练摊的无名小卒，而成了批发货行或中餐馆的老板。在当地人眼中，华人都是住着楼房的富豪，出门有宝马、奔驰等豪华汽车代步。

        有“花园城市”之称的索非亚，是华人集中聚居的所在地。这里没有一般都市的喧嚣，非常宁静。四周群山环绕，市内还有4座美丽的花园，景色迷人。街道、广场上，一丛丛的玫瑰争妍斗丽，在草坪上，花园中，散发着沁人的馨香。

        华人偏爱依林翠批发市场附近的公寓，两房一厅的房子售价12万欧元，上下班十分方便。当地的楼房外表看起来很破旧，但里头的装潢却很新潮。华人家里，无论那小巧的中国结，还是墙上的山水画，都洋溢着中华文化的气息。

        或许，这正是华人思乡情怀的体现，也是他们传承中华文化的一种方式。

        漫步在索非亚市内的公园，会看到成群的老人坐在板凳上，在翠绿的林荫下悠然度日，那份无拘无束的自在、与世无争的神情，令人神往。在潜移默化之下，华人的生活步调也从容了起来。

        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3点，华人在批发市场里工作。除了进货、发货时比较吃紧外，剩余时间都比较轻松。

        由于大半天都呆在批发市场里，早、午餐自然也在市场内解决。在这里，青田人开的早餐店普遍受到欢迎，稀饭、豆浆、花卷、包子、饺子、馒头、花生及咸菜，各种中式早餐任君挑选。早餐店里，华人之间以青田话交谈。饱餐之后，就忙碌起来。

        他们的午餐以面食为主，晚餐则在家中烹煮。由于亲友都在当地，彼此经常相约到家中用餐，联络感情。晚餐一般从下午5点开始，菜肴以乡味为主，六热八凉，海鲜、酒水更是不可或缺，一顿饭吃下来少说也得三四个小时。如此热情的款待、丰盛的菜肴、酒足饭饱之余的闲话家常，是保加利亚华人悠闲生活的写照。

        每逢假日，华人也会驱车到乡下郊游、烧烤，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乡下空气清新，青葱翠绿，叶落鸟鸣，宁静气氛抚慰着奔劳的心灵。

        保加利亚湖多、河多，爱钓鱼的华人不少，坐在凉风习习的绿茵上垂钓，十分惬意。有时，一个下午就能捕获数十条大小不一、不同种类的鱼，收获颇丰。

        保加利亚的酒吧、咖啡馆遍地皆是，通宵达旦的舞厅，也是华人休息、放松的好去处。每逢中国的大小节日、亲友生日或喜庆纪念日，华人之间电话相邀，轮流作东。庆祝会上，大家吃吃喝喝，共享欢乐。与当地人不同的是，华人在餐馆里是纯粹吃饭，温馨在静默中流淌；当地人则在餐前或餐后跳舞，享受另一种乐趣。文化的差异，就从这小小细节中反映出来。

        其实，在中餐馆工作的华人，平时根本没有时间参与活动，一年到头都在忙碌着。上午10点至晚上11点，工作和生活都在餐馆度过。下班后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即是每天仅有的一点娱乐。

        然而，他们对这一点早已习以为常。对他们而言，到当地来的目的就是挣钱，一名餐馆老板分享个人感受：“在这里，能挣到钱就尽量挣钱。”看来，只要目标明确，确实没什么可抱怨的。

        这里90%的华人都有遇劫的经验。喜欢现金交易的华商，往往将大笔现钱存在家中，成了窃贼、抢匪们觊觎的目标。有时，辛苦积攒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但因自身也有逃税的问题而不便报警，只好哑巴吃黄连。

        时过境迁，保加利亚的治安已比从前要好很多。劫夺案减少，华人不再担惊受怕，但戒心仍在，未敢轻视。

     保加利亚的华人不多，过年过节的气氛也就因此淡薄得多。

        众多节日中，华人比较重视春节，但这天却并非当地的公共假日。他们有的回乡去，有的则留在当地照常工作，下班后亲友们围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就算过节了。春节尚且如此，其他传统节日如端午、中秋等，华人就更无暇顾及了。

        保加利亚华人多数是无神论者，对宗教并不热衷。无论是家中还是商铺，都难以见到神龛的影子。总之，宗教对他们而言，不如生意兴隆来得更实际。

        然而，有部分华人却因为饱受乡愁的煎熬，日渐空虚，宗教便成了他们精神的寄托。在保加利亚，已有百余名华人受洗成为基督徒。

        2000年，来自美国华人宣道会的牧师，在此创办了保加利亚基督教华人宣道会。由于牧师短缺，教友每次聚会都通过银幕聆听牧师的传道，并通过互联网视频，与美国的牧师共同查经、参加主日学课程。

        面积不大的宣道会所仅可容纳100人，却是信徒们寄托心灵的所在。每星期3次聚会，虔诚的教友都准时出席，有的还携全家前来读经、祷告、唱诗。

        宗教信仰，令一些华人的心灵有了寄托，无论来自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都得到了舒缓。

        此外，保加利亚的文化氛围，还造就了一位华人艺术家赵箭飞，执着追求抽象画艺术的他，旅居当地11年，举办了16次个人画展，作品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表扬，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及广播电台电多次对他进行过专访。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保加利亚人对华人最初的认识，源于四五十年代铺天盖地而来的电视、报章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介绍。因此，热情、纯朴的保加利亚人在众多外来移民中，对待华人特别友善。奈何双方言语不通，彼此间始终存在着隔阂。

        在当地生活了十年以上，保加利亚语却依旧不通的大有人在。或许对当地华人而言，工作与生活都以家乡话为主，是否通晓当地语言并不重要。一名批发商说：“会说的就只有多少钱、要多少、大码、小码、男装、女装等，说不清楚的就通过计算机，直接看数字。”华人总觉得，经商只要掌握简单的用词和数字即可，比手划脚还是可以交流的。

        但在市场之外，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华人与当地人的对话往往词不达意，更谈不上促进了解或文化交流。双方同处在一个时空下，却活在各自的圈子里，这或许就是华人缺乏归属感的缘由。

        言语不通，犹如一堵墙挡在了华人面前，成了他们融入当地的障碍。

        不过，对那些通晓当地语言的华人而言，情况就有所不同。以中医为例，他们的文化水准较高，大都能操一口流利的保加利亚语，不但思维方式跟当地人无异，社交对象也以当地人居多，融入困难不大。中医师田勇，坦然分享个人的生活体会：“保加利亚足球队赢了，我会感到高兴；保加利亚面对困难，我也会感到难过。”

        一名在当地生活了15年的华人坦言：“华人完全融入社会得寄望第三代，他们在当地成长，熟悉当地语言和文化，融入比较容易。”确实，华人的第二代多数都在家乡受教育，又有土生土长的第三代，才可能达致融入的目标。

        为了协助华人融入社会，华人社团曾开办过保加利亚语学习班，象征式地收费5个列弗。可惜，华人出席率差强人意，结果不了了之。

        其实，语言就像一座山，认真爬起来其实也并不算高。当地华人只要加强本身融入的意识与意愿，就有望打破融入的僵局。

 孩子的教育，始终都是华人重视的课题。

        自90年代至今，已有200名华人小孩出生于当地。由于工作忙碌，无暇照顾，大部分华人都把孩子留给家乡的亲友看顾。骨肉分离非华人所愿，但孩子在身边会给工作带来不便，为人父母者确实为难。

        除此之外，等孩子到了入学年龄，为难的局面将再次浮现。毕竟，保加利亚语并非国际语言，华人在观念上无法接受当地教育。那些让孩子留下来的，就会安排他们到当地的美国国际学校去读书。

        尽管孩子的学业得到了保障，但华人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孩子能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父母们心目中的最佳安排，就是待孩子念完中学或大学后，将他们送回家乡去学习中文。

        至于在家乡成长的华人孩子，每逢夏天都会到保加利亚来度假，家长们也会督促他们学习中文。在批发市场里，能经常看到华人在生意空档的时间里，教导孩子读书写字，可谓呵护备至。长年累月无法陪在孩子身边，就只能在一个月内尽情陪伴他们学习了。

        这群华人父母，打算先让孩子留在家乡完成小学、中学，再转到保加利亚就读。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孩子在具备基本的中文能力后，再学保加利亚语，以便能通晓两种语言。这样，既守住了华人的语言文化，同时也能为孩子将来在当地的发展铺路。

        经过不断的协商，中国保加利亚商会在一年前跟索非亚101学校合作，聘请中文教师，提供免费教材，将汉语课程纳入正课。汉语班分为幼儿班和少年班，每班平均20人左右，每周上课两次。华人、当地人子弟一同学习中文和保加利亚文，促进对彼此语言、文化的了解，对融入起了积极的作用。

        至于创办独立的中文学校，目前的条件仍未成熟。

    早在20世纪50年代，保加利亚医学院就设置了针灸临床专业，治疗疑难杂症。当地人对中医治疗很是信任，奠定了当地中医业发展的基础。

        保加利亚卫生部，也承认中医师的行医资格及中药的合法性。

        然而，中医师在当地不得独资开办诊疗所，须采取跟当地人合作的形式，由当地人申领执照，华人提供医疗服务。双方签署合同，保障彼此的互惠互利。

        目前，中医诊疗所共有4家，中药和相关保健品，则在药店、化妆品店等地广泛销售。

        女中医师田勇在保加利亚中医界的知名度最高，当地报纸和电视台为她作了多次专访，被喻为“来自东方的神医”。田勇来自北京，出身于中医世家，在保加利亚开办中医诊疗所近20年，始终门庭若市。

        除了门诊治疗，她也经常为报刊、杂志撰写文章，大力弘扬中医。田勇根据保加利亚人的体质特点，专门研制了4种不同类型的保健茶，还以此荣获保加利亚东西欧智力发明家协会奖章。

 在索非亚大学，汉语由当初的选修课，发展为现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这全归功于老华侨张荪芬。她在汉语教学领域不断开拓、耕耘，为保加利亚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汉语人才，是当地汉语教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2年，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朱德熙教授，被政府派遣到索非亚来教授汉语，张荪芬应聘为翻译。

        她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编写了汉语、保加利亚语对照的教材及词汇手册，让汉语的种子在当地生根、发芽。

        两年后，她与朱教授合作编撰的汉语教科书正式出版，这是保加利亚的首部汉语教材。随后，她相继编写、出版了适用于不同年纪的汉语教科书、《保汉常用词汇》及包罗1万5000个词条的《保汉分类词典》等工具书。

        这杰出的贡献，为张荪芬赢来了保加利亚汉学界、教育界普遍的赞誉和尊重，更荣获索非亚大学颁发的教育领域最高荣誉奖——蓝带勋章。

        张荪芬的努力令汉语学习热潮至今魅力不减，持续燃烧。

总的来说，保加利亚如今的发展空间不大，诱人留下的条件确实有限。

        然而，这里尊重、善待华人，再加上清新的空气，令华人对它产生了眷恋之情。

        所以，许多人都在落地生根与落叶归根之间逡巡着、观望着。

        不过，过程毕竟胜于一切，就这样一路走下去，也没什么不好的。

 罗马尼亚景色秀丽，雄伟的喀尔巴阡山、蓝色的多瑙河与绚丽多彩的黑海，是它的三大国宝。

        1989年齐奥塞斯库独裁政权被推翻后，罗马尼亚从此山河变色。华人也于此变革之际，大量涌入这片美丽的土地。

        历经了近15年的争取，罗马尼亚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欧盟。如今，它政治稳定，经济也开始好转。华人经过多年的打拼，在这里可说是已站稳了脚跟，为实现美梦而奋斗。

  一次偶然的商业访问，促成了一桩异国姻缘，也因而将华人带到罗马尼亚。

        据说，来自浙江文成的支德严，是最早定居在罗马尼亚的华人。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到罗马尼亚来经商时，结识了一名罗马尼亚籍女孩，最后留在当地娶妻生子。如今夫妻俩均已逝世，其女支铭丽则跟随父亲入了中国籍，目前正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任教。

        此后，陆续有华人因婚嫁而来到了罗马尼亚，其中有两名留学海外的华人女性，在60年代初随同罗马尼亚籍的夫婿回返当地定居，一名是来自中国上海的赵姓女士，另一名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胡梦华。目前，赵女士在丈夫去世之后已搬回家乡，而胡梦华则仍在当地定居。

        直至罗马尼亚发生剧变以后，华人移民群才开始大规模涌进这里。1990年，约有20名来自福建、浙江、河南的华人，带着装满了小商品的行李前来跑单帮。乱世之中，质量一般的廉价商品却成了时髦的抢手货。

        之前的20多年，罗马尼亚一直实行锁国政策，外人根本进不来，国人也出不去。本地质量好的农产品都得出口以赚取外汇，而外国食品却无从进口。由于资源匮乏，每家每户都得凭票排队购物，迟了就只有望物兴叹了。“食物卖完的话就没有东西可吃了。”老移民回忆说。

        “他们不是没钱，而是有钱没东西买。”胡梦华的丈夫万达，一语便道出了当年的窘境。

        华商的到来，对当地人而言可说是久旱逢甘霖。据说当时他们只要把车子一停，抢购的人群便立马围上来。打火机、羽绒服、皮夹克、手套以及衬衫等商品，往注在三两天内就被检购一空。“他们就连你身上穿着的都想买下！”批发商回忆当时的光景。

        有趣的是，当地人从不讨价还价，价值一元人民币的商品即使标价一美元，他们也觉得便宜。就这样，华人每天至少可以赚取100美金，获取三四倍的利润。

        市场的行情风风火火，华人赚得眉开限笑，闻讯者便如潮水般涌入了这个国度。

        由于当时短期访问罗马尼亚并不需要签证，致使1993到1998年之间有大量的华人涌入，在高峰时期，华人共有两万名之多。

        在那段时期，入境者只要用1000美金即可注册一间公司，且在一个月内就能取得居留许可证。在等待身份的过渡时期，华人也丝毫不浪费时间，和同乡相互打听哪里能做生意。有了可靠消息，再掌握数句简单的罗马尼亚语，他们便开始肩背手扛练起摊来。

        华人皆分散到各大菜市场去练摊，尤其集中在星期天跳蚤市场以及奥布尔菜市场。其实，练摊是不合法的，在没有固定摊位的情况下，他们都依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只要地上有空位，就把货物摊开叫卖。当时，无论是在邮政局、机场、菜市场或地铁站，都能看到华人手里拿着衣服和皮带等商品在叫卖。

        2000年初，罗马尼亚政府改变政策，从原本敞开门户欢迎外来移民资，转而紧闭门户，不仅扼紧了发签证的条件，还大幅地提高了投资资金。

        既然不获准延续居留，万般无奈的华人就只好忍痛将一手创办的事业拱手出让，并陆续离开。

 落后、贫穷的罗马尼亚，最初并不是华人理想的落脚处。他们一开始并没想过要在这个国度里安家立业，而通常将此地看成过境或偷渡到西欧的跳板。然而，这里既多机遇，又易挣钱，他们不但安了家，还过着富足的生活。

        在罗马尼亚的上万名华人中，老华人人数不多，新移民则于90年代初来此，主要集中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但据官方统计，只有7000人拥有合法居留权。青田及河南人是华人中最大的群体，其次则是福建人、瑞安人及温州人。

        在这里，无论各行各业，生意大小，华人都是聘有当地雇员的老板。其中，有80%的华人从事回报既高且快的贸易批发业。当地的中餐馆不多，简捷、方便的外卖店崛起，成为新兴的行业。其他如旅游业、物流业等，则仍处于起步的阶段。

 在布加勒斯特市郊Colentina，一片尘土飞扬中，映入眼帘的尽是批发商铺和摊档。车鸣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落。因“Colentina”发音与中国的高粱地相近似，华人初期干脆称它作“高梁地”。

        这个规模庞大的集散地看似贫穷而破落，其名气在东、南欧却是“掷地有声”，华人在此地尽领风骚。

        然而，这一华人的商贸“罗马城”并不是一天就建成的。

        这里原来是一片庄稼地，在1993年被开发成拥有20多家批发摊档的欧罗巴市场。露天的摊档以土灰、砖石及水泥搭建，再用铁皮间隔而成。店面粗糙简陋、店前摆货物，店后则是仓库。华人打趣地称之为“铁皮房子”。

        后来，在这片7万平方公尺的土地上，挤满了1500家批发摊档，一家挨着一家，犹如一座小型的中国城。

        批发市场上的华商以浙江青田及河南人居多。商品的档次不高，胜在价格低廉，除了当地顾客外，也吸引了乌克兰、保加利亚等国的顾客远道而来，每天的成交量可高达200万欧元。

        当时，一个集装箱只要两天就卖个精光，华商轻易赚进几十万美金。于是华人趋之若鹜，纷纷投入贸易批发一行，许多人因此发迹。

        尼罗市场在较后也应运而生。它参照欧罗巴的设计，2000家批发摊档的外观与后者一般无异，但无论环境或保安系统都更为规范。

        尼罗市场旁的唐城批发市场，则是首个由华人投资并管理的批发市场。它于2000年启用，宽敞明亮，井然有序，整体设计更胜于欧罗巴及尼罗。业主叶锋，当初为了吸引商家迁入，曾半年内不收租金，而后半年也只收取象征性费用。于是，200多家商铺成功快速崛起，唐城与欧罗巴、尼罗市场鼎足而立。

        华人首富郑思勇更是高瞻远瞩，料定了铁皮房子有天必遭淘汰，不惜一掷千金，与尼罗集团合作，开设了现代化的室内批发市场。这3座雄伟的大商厦名为红龙，占地8万平方公尺，拥有5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商铺，集批发、零售、餐饮、储仓和办公于一体，环境非常舒适。

        就这样，这里由最初杂乱无章的铁皮房子，发展成今天井然有序的现代化商场。4座规模庞大的批发市场，矗立在这50多万平方公尺的土地上，华人委实居功不小。

        然而，批发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表面上，批发市场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敲诈、勒索、偷窃及治安问题层出不穷，一直以来华人都在沉着应付。

欧罗巴的管理失当，卫生及安全皆差强人意，华商的仓库经常遭窃。面对巨大的损失，华人忍无可忍之下往往只能放弃摊档，搬出市场。被遗下的摊档如废墟一般，满目荒凉，对比昔日的繁华，令人唏嘘不已。

        批发市场于2005年开始走下坡，市场销售力日益低迷。如今，除了童装、拖鞋及玩具之外，其他商品都面对程度不一的冲击。“一件皮夹克从前可赚70美金，现在货源已多，压力也变大，生意不好做。”一个批发商苦笑着说。

        自加入欧盟后，罗马尼亚经济好转，民众开始追求品牌，过去一味以廉价取胜的中国产品，相形见绌。此外，当地人也学会亲自到中国进货，货物品味更符合当地人的喜好，再加上周边国家的客源减少，市场遭受更大的冲击。

        警察的敲诈，则更令华商们心力交瘁，备感压力。

        原来，当地官僚腐败，贪污问题非常严重，警察常假借查账、查货或查身份等名义，明目张胆向华商敲诈勒索。由于华人多不谙罗马尼亚语，加上自身也有逃税的问题，一旦警察上门，往往便罚款了事。华人破财消灾，警察却中饱私囊。

        在此地，用钱买方便是可行的。

        另外，当地人薪金低微，华商虽乐于聘请他们，但一些人偷窃成性，却也令华人老板们伤透了脑筋。据说只要老板一转身，有些雇员随即会将服装、现金等偷塞进自己的包里。为此，无奈的老板即便上个厕所，也会请隔邻的华商代为看铺，可说是煞费心思。

        总之，罗马尼亚华商每天都在无形的压力下开店做生意。除了应付警察，还得提防员工。然而，他们始终抱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的精神，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咬紧牙关熬下去。

   罗马尼亚中餐馆很少，只有区区40多家，而华人经营的只占半数。

        或许，中餐馆的租金高、回报慢，还要长时间的经营管理，发展前景远不如贸易批发，因而使罗马尼亚华人裹足不前。

        当地中餐馆大部分是家庭式餐厅，规模小，档次不高，装潢却富有中华特色。菜单一律用罗马尼亚文印刷，菜系以北方菜、川菜为主。中国城老板说：“一定得考虑这个国家的市场。华人少，一般都在家做饭，难做他们的生意。”

        中餐馆菜肴毋需多大变化，就能轻易俘获当地人的口味。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及酸辣汤，都是他们的最爱。

        档次较高的中餐馆，则要属唐域批发市场老板叶锋所开的唐朝，秦朝、皇朝及唐城饭店最为有名。4家饭店各有特色、富丽堂皇，装饰品都远从外国进口。以秦朝为例，除了门口立着两尊兵马俑外，无论餐具、陈设都非常讲究，气派十足。

        起步较慢的中餐业，前景不尽理想。中餐店老板一语道破个中缘由：“忙人没时间来吃饭，闲人却没钱来消费。”当地物价低，中餐馆价位较高，因此中、下阶层人士难以负担。

        中餐馆不受落，只要一通电话即可定餐的外卖店却异军突起，行情走俏，前景一片光明。

        搞外卖无需店面、装修及摆设，资金数额比经营中餐馆要求低，因此，目前已有20多家中餐外卖店在市场上相互竞争，其中千宝、华龙两家的老板是华人。

        “有钱没钱，一样享受中餐。”华龙外卖店老板董树平笑道。到餐馆消费，一般至少要50块列伊，外卖却只要20块就够了。董树平看准了外卖市场的潜力，就结束地毯批发生意，全心全意来经营外卖店。外卖店经过两年的亏损，如今已经转亏为盈，生意越做越大。

        “欧洲人爱享受，不愿自己做饭。百姓有钱了，定餐的将会更多，因此外卖不会被淘汰。”董树平信心满满地说。

   尽管生意不如从前，生活却仍要继续下去。

        凌晨4点，当人们还在甜梦中酣睡，罗马尼亚华人已经起床，5点就在市场里准备就绪。他们在晨曦中互道早安之后，也正式拉开了一天生活的序幕。

        不一会儿，市场里的八方来客已络绎不绝，华商们穿梭在人群之间，忙进忙出。只见他们一会儿点算货物，一会儿到仓库去提货，同时还跟讨价还价的顾客们周旋，忙得不亦乐乎。

        上午11点以后顾客开始稀落，市场从一片嘈杂声中安静下来。此刻，华商们聚在一起谈笑风生，绷紧的脸上总算绽出笑容来。

        下午一点钟摊档陆续关门，整个市场一片寂静。接下来漫漫的午后时光该如何消磨，华人自有安排。他们有的在家体息或收看卫星电视，有的则互相串串门子，有的上网聊天看新闻，有的就打扑克、搓麻将、有的还会到赌场去过把赌瘾呢！

        往日罗马尼亚物资匮乏，冬季都没有蔬菜供应，市场上只有面包、土豆，胡萝卜及洋葱，大米更是难得一见。早期华人的三餐饮食条件极差，据说，当时由于面粉品质差，饺子一下锅就糊成一闭，味同嚼蜡。

        “那时生活艰苦，为你送来酱油、味精和咸菜的人，就算很好的朋友了。”罗马尼亚河南工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孙建设细说当年，感慨不已。

        和过往相比，现在的生活已好上至少20倍。七八家中国食品店分布在布加勒斯特市内及市郊，各种调味料及餐具都很齐全。另外，华人租用当地农场来种植小白菜、芹菜、空心菜、小油菜、葱和莴笋等，应有尽有。至于浙江人最爱的海鲜则需进口，价格高昂，一只龙虾要价300欧元，令人咋舌。

        华人集中居住的历史古城布加勒斯特，是欧洲东南部最大的城市之一。这里房子有别墅、平房及楼房，其中楼房最受华人的欢迎。几百名浙江人，集中聚居于批发市场附近一带的楼房，该区因而得名“浙江村”。

        有着西式外观的楼房，内里的摆设却流露东方色彩。在这安乐窝里，可以看见富有中华特色的精致雕刻、山水画和对联，散发出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如此家居，除了可以稍解华人的乡愁，也是对后辈的一种熏陶，足见主人的良苦用心。

     “喜欢这里好赚钱。”华人不约而同地说。在这里华人个个都是老板，竞争不大又赚钱容易，令人难以抗拒。

        “从不适应到适应，从适应变成习惯，我很清楚这里就是发展事业的基地。”叶锋于1994年到来，一留就是十多年。

        此外，吸引华人留下来的还有宜人的气候，以及温和有礼的罗马尼亚人。

        罗马尼亚是第三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两国长期相互支援，关系非同一般，初来乍到的华人总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例如在早期，当地人总把排队的华人领到队伍的前面，让华人优先购买食品，大街小巷彼此碰了面也会主动问好。

        华人在新环境受到如此温馨的对待，稍稍缓解了他们的绵绵乡愁。

        华人与当地人一直和睦相处，直到新移民大批到来，情况才开始转变。

        有些新移民的文化素质偏低，有些作奸犯科，甚至还涉及谋杀案，经过媒体的大肆渲染后，华人明显感到当地人的友善态度起了变化。

        “走在路上被指指点点，房子也声明不租给华人。感觉受到羞辱，人又不是我杀的！”董树平曾在商店遭人白眼，感受深刻，尽管无奈，却无从扭转当地人对华人的成见。

        庆幸的是，大多数型马尼业人对待华人还是温和有礼，歧视也只是个案。他们看到华人住洋楼、开房车，对这富裕的一群存有敬意，罗马尼业中国交流协会会长陈建表示：“罗马尼亚人还是很温和、宽容的，在这里久了一定会产生感情。”

        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董树平并不因此而萌生回国念头。在当地生活了17个年头，他早已习惯这里的生活，对气候相环境都感到满意。“离开很久了，回去反而会不习惯，老了也不会回去，回去干什么呢？”

        看来，对这个机会既多、又善待华人的罗马尼亚，华人尽管偶存不满，其实早有了不自觉的依恋。

  经过多年的打拼，华人事业的根基已经打好。如今，他们积极培养孩子成为接班人，让事业得以延续。

        一名老移民说：“没打算入籍，这儿的事业就留给子孙，偶尔回来玩玩。”罗马尼亚华人大多持5年的居留证，入籍的不过50人左右。或许只有产生了归属感，才会有定居的决心。但基于无法克服的语言障碍，华人总在本族的社交圈里打转。

        融入当地，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也许只能由子孙来完成。

        “人老了，学不起来。”一个批发商指出，学语言少不了毅力。华人往往为了生意，只学会几句简单的罗马尼亚话，很少能够真正掌握这门语言。有人曾开办过罗马尼亚语学习班，但随着反应冷读而终告关门。对华人而言，或许生存的压力比语言更紧迫，纵使比手画脚，也还是一样可以过日子。

        华人对后代发展的前景也早有安排。他们会先让孩予在家乡接受中文教育，再带到当地的国际学校去就读中学，这样，孩子既能掌握中文，同时又学会了英语及罗马尼亚语，至于华，罗通婚家庭的子女，因自小就融入了当地，选读国立学校的比例也较大，学习中文的机会就不多。

        其实在早期，当地曾有过一所全日制的中文学校。虽学校条件简陋，只是把小平房间隔为课室，一班仅容纳两三人，但聊胜于无。为了让孩子留在身边，一些华人把孩予从家乡接到这里来上课。可借学费既贵，中文教育又不正规，导致学生流失率高，成立两年后就宣告倒闭。

        始终期盼孩子能接受中文教育的华人家长，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孩子送到中文补习班去。在坚持中文教育方面，当地华人可谓费尽心思。

        在双语教育下，当地华人的第二代出类拔萃，他们在这里兼有事业和家庭，生活与当地人无异。这一份归属感，正是先辈们老在渴望，却又始终欠缺的。

* *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有一条叫作“北京大道”的马路，位于第一区的米尔恰·埃利亚德大道与尼古拉卡拉姆菲尔路之间，全长1.5公里。*

    罗马尼亚华人的团结，有赖于华人社团的积极互动。

        2000年，一名华商因生意纠纷，在批发市场遭当地人活活打死。命案发生后，社团呼吁华人展开罢工行动，市场全面关闭3天，作为对营生环境受到威胁的无声抗议。华人这次同舟共济，联手维护集体的权益，也加强了团结的力量。

        目前，罗马尼亚共有18个华人社团，其中多以同乡会居多，倡议同乡之间的互助互惠，为华人提供了交流、联谊的平台。以2008年由罗马尼亚担任东道主的第八届欧洲媒体大会为例，各大社团出钱出力，促成大会的圆满举行。他们派出代表，接送远道而来的媒体朋友，还安排迎客的宴席。古道热肠的代表们倾力相助，场面令人感动。

        在传统文化的推动上，社团也不落人后。罗马尼亚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每年平均举办两次大型的节日欢庆活动。2007年，该会在中秋节举办了拔河及歌唱比赛，参与者云集，场面非常热烈。

        除此之外，该会还有两项尚待完成的任务，其一是成立华人乐队，其二是开办中文学校。该会特从中国运来电子琴、锣鼓等音乐器材，罗马尼亚华人乐队的诞生指日可待。至于中文学校，则因目前的条件尚未成熟，且待来日。

        罗马尼亚华人虽少，却拥有4份中文报，分别是《旅罗华人报》、《欧洲华报》、《欧洲青年报》及《企业家报》，报纸每周出版，风格各有千秋，其中以《旅罗华人报》最受欢迎。

        “每周坚持出版，不因任何事而耽搁，着实不错！”老移民郭庆元提到《旅罗华人报》时，赞不绝口。

风雨不改、认真办报之人，正是这位《旅罗华人报》的社长李建华。也许冲着这份坚持，当地90%的广告都刊登于该报，华人更是踊跃支持订阅。该报创刊于1999年，每期销量约1000份，不到十年已跃升为销量最大的中文报。刚开始报纸每卖一份还要倒贴8毛钱，如今随着广告收入激增，早已转亏为盈。

        当地办报不易，设备有限，人才短缺。为了节省经费，小小的一个楼房既是住家也是报社；员工只有3名，从采访、编辑到排版，个个身兼数职。条件如此简陋，但报社秉着传达信息的使命，作风严谨，毫不含糊。报纸每期有24版的篇幅，新闻主要是当地华社华团的相关消息，以及各类资讯诸如居留办理、商业法规等。

        作为罗马尼亚唯一的欧洲媒体协会会员，《旅罗华人报》在2007年与《欧洲时报》、《新民晚报》合作，联合出版《欧洲联合周报》的罗马尼亚版，发展更上一层楼。

        由于华人不谙当地语言，对当地法规一知半解。中文报的出现，仿佛为华人开了一扇了解罗马尼亚社会的窗口。随着华人逐渐养成阅报的习惯，中文报的发展潜力也备受看好。

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后，罗马尼亚华团自发举办烛光追思会，组织当地华人一起追悼受难同胞。（照片由当地华人提供）

2007年4月13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二区政府，以市场存在着愉税、漏税及卫生问题为理由，限令欧罗巴、尼罗市场在同年10月31日自行关闭，否则必用强硬措施加以对付。

        消息一出，登时引来一片哗然。拆除摊档，犹如切断华商的经济命脉，事业将毁于旦夕之间。华商该何去何从，损失该如何弥补？区政府的无理蛮横，令人难以接受。

        根据合约，除非发生自然灾害，否则2000多家华人商铺就拥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可在当地永久营业。“若是改建的话，当局理应赔钱收购，但限令的内容却是不花一分钱就想要把华人赶出市场去。”旅罗华人维权中心负责人潘继东愤愤不平地说。

        这一次，华人不再忍气吞声，他们成立了“旅罗华人维权中心”，由90名商家共同集资，合力将布加勒斯特政府控上法庭，并在当地中文媒体发表《告全体旅罗华胞书》。这真是一场史无前例，旅罗华人联手告政府的诉讼大案。

        旅罗华人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经法院裁决，布加勒斯特市二区政府发放的限令无效。换句话说，华商得以继续留在原地营业。

        华商们此次携手共患难，不但合力维护了自身的权益，更因此而促进了华人的团结，巩固了社团之间的联系。

   来自上海中华武术会的朱荣富教练，本着一颗热爱武术的心，从1992年开始在罗马尼亚教授武术，深受欢迎。

        他的学生清一色是当地人，从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现在的数百人。其中，大部分从小就跟着他习武，成家立业后仍持之以恒。当地人对武术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朱教练的学生不懂中文，却本着对武术的浓厚兴趣，学习认真，无论马步、太极拳、剑术还是棍术，都学得有板有眼，架势十足。他们已连续几年夺获罗马尼亚全国武术冠军，成就斐然。

        另外，他还教导学生舞龙。这支由罗马尼亚人所组成的舞龙队，动作娴熟，连华人子弟都自叹不如。

        同时身为中医师的朱荣富，在中医行业的发展却没有武术来得顺遂。

        90年代初期，当地人还不了解针灸、推拿、按摩与拔罐的奥秘，因此愿意接受中医治疗者寥寥无几。刚开始顾客稀少，生活日益窘迫。后经媒体的宣传，中医才逐渐受落。“以前收费两块美金都没有顾客，现在收费12欧元，顾客却源源不绝。”巨大的反差，真令他哭笑不得。

        不过，对自小习武的他而言，开诊所只是为了维持生活。他内心深处的牵挂，始终还是中国武术的传承。

罗马尼亚就像一颗毫不起眼，却兀自发光闪亮的小星，吸引了华人的目光，激励着华人到此来追寻梦想。

        一路走来，那更迭起伏的岁月，跌宕浮沉的际遇，都丝毫不影响华人打拼的决心。只要生意一日可以继续下去，他们的心灵就有所依靠，生活便觉踏实。

  公元前1500年，希腊人迁入塞浦路斯，后土耳其又于1573年占领该岛，并带来大量的移民，形成希腊、土耳其两大民族并存的局面。塞浦路斯共和国于1960年成立时，即由这两大民族组成了联合政府。

        然而，两大民族因为信仰等因素的分歧，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1974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占领了37%的领土，导致希腊族南迁，土耳其族北移，形成南北对峙、国土分裂的局面。

        南、北之间有一个联合国缓冲区，通称为“绿线”（Green Line)，将首都尼科西亚一分为二，成了柏林围墙推倒后，世界上最后一个被分裂的首都。经6年谈判，南塞政府于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北塞则被拒于欧盟之外。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地区第三大岛屿，传说爱神维纳斯即诞生于此。这里旖旎迷人的风光及冬暖夏凉的气候吸引华人留了下来，安享惬意的生活。

  20世纪40年代，华人为了逃避战乱，飘洋过海来到塞浦路斯。这个地中海岛国首次出现了华人的身影。

        那时候的塞浦路斯仍是个荒凉的岛屿，道路破旧，设施落后，除了首都市区，其他地方连交通灯都没有。

        来自中国成都的陈玲（译名）是第一个定居于塞浦路斯的华人。她是一名中德混血儿，在家乡邂逅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塞浦路斯籍丈夫，两人婚后定居成都。夫妇俩育有4名孩子，组成一个和乐融融的家庭。然而，40年代的中国战乱不息，1945年，他们举家搬回丈夫的故乡——塞浦路斯，成为岛国第一个具有华人血统的家庭。

        陈玲的夫家位于岛国西南的帕佛斯（Paphos），在当地算是名门望族。帕佛斯这个海滨城市碧海蓝天，阳光灿烂，生活甚为悠闲。陈玲在这里虽面对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冲击，但生活上一切有佣人侍候，没有遇到太大难题，因而很快适应了当地的新生活。

        纵然生活过得不错，但陈玲内心深处始终眷念着家乡。她住宅的外观虽与当地一般住宅无异，但屋内不论是餐桌、沙发或各类设计，处处散发出中华韵味。陈玲一家以华人血统为荣，也非常重视华人传统。平日生活以中餐为主，且保持用筷子的习惯。逢年过节，一家大小都会受邀出席大使馆举办的新春联欢晚会，同时也会在家里与亲友共聚，吃团圆饭。

        塞浦路斯的国际知名度不高，早期华人对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概念。自陈玲之后，前来的华人不多，有的来打工，有的是因为婚姻，但较少长期留居当地的。

到了90年代中期，华人才开始涌入，人数由最初的数十人增至数百人。随着岛国加入欧盟，华人人数更增至数千人，尤以留学生居多。

        塞浦路斯的签证较其他欧美国家易办，华人因此一批又一批地到来。部分留学生通过中介办理了签证而来到此处，美其名是为了留学，实则准备通过塞浦路斯转到其他欧洲国家去。但许多人抵达了之后才发觉上当，懊悔不已。为了偿还向亲友们所借贷的旅费，无可奈何的他们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将学业完成。

        总而言之，这岛国对入籍和长期居留的限制甚是严格，至今，在这里拥有正式身份的华人移民并不多。

  塞浦路斯分裂为南塞、北塞之后，华人大多生活在南塞，分散在首都尼科西亚、利马索（Limassol）、帕佛斯、拉纳卡（Larnaca）及阿亚纳巴（Agia Naba）各地。

        在岛国上生活的华人约有5000名，入籍或持有永久居留身份者有约300人，余者则以留学生为主。他们大多来自中国东北、辽宁、福建、浙江及南京，少数来自香港、台湾。

        当地华人涉足的行业，包括中餐馆、网吧、酒吧、服装批发、食品及婚纱设计等。其中，以中餐馆、网吧的数量较多。

        定居岛国的华人很少，发展未成气候，至今还没有中文报、中文学校或华人社团。然而，在这个民风淳朴，治安良好的国度，他们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短短数十年已繁衍到第三代。

 早期来塞浦路斯的华人，知识及技术水平低，只凭一双巧手烹调出佳肴，俘虏当地人的味蕾。一家家中餐馆陆续进驻当地，让华人成功通过中华饮食谋得一席之地。

        当地首家中餐馆名为“Pagoda”，于1968年开设，老板是个娶了香港妻子的英国人。餐馆由夫妻俩和他人合股经营，聘有3名香港厨师，以粤菜为主。当时生意十分红火，当地人很快就接受了中餐。

        然而，政府为了保障当地人民的权益，规定所有经商的外国人都必须跟当地人合资，当地人还须拥有至少51%的股份。因此，除了与当地人通婚的华人之外，想在当地创业的人都得通过各式各样的变通方法。

        1981年，来自台湾的常茂工夫妇与当地一名律师，正是通过合作的形式开设中餐馆。夫妻俩包揽一切开销，仅占20%股份，而只负责办理注册等繁缛细节的当地律师，却占了80%股份。夫妻俩打趣地称这些光收钱，没做事的合作伙伴为“sleeping partner”。这种以互信为根基的合作方式风险极大，要是对方心怀叵测，很可能落得血本无归的下场。

        夫妻俩信心满满地筹备了半年，无论餐具或材料都从外国进口，整体设计也以华人钟爱的红色为主。大方的拱门、古雅的餐桌、炫亮的灯饰及艳红的圆柱等皆极富中华特色，处处见巧思。餐馆甫开业即门庭若市，馆内30张餐桌经常爆满，忙得人透不过气来。在高峰期，虽聘有十多名服务员却仍应接不暇。

        然而，随着中餐馆的日益增多，同行竞争激烈，导致营业额大幅度下降。周末的生意犹可，周一至周四简直就是在惨淡经营。

        餐馆生意一落千丈，夫妇俩于是只卖晚餐而不再供应午餐，但生意依然不见起色。为了避免亏本倒贴的局面，夫妻俩毅然于2007年11月结束了餐馆生意，从此过着退休生活。

        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后，外国人已被允许独资开业。如今塞浦路斯拥有30多家中餐馆，其中，旅游区帕佛斯及利马索各占十家，首都尼科西亚、海滨城市阿亚纳巴则分别拥有7家及5家。总体上，由华人经营的中餐馆约有8家。

        餐馆的客源以当地人及游客为主，华人反倒很少光顾。对当地华人而言，只要简单的材料即能煮出一桌经济实惠的佳肴，没必要光顾那价位既高，口味又不道地的中餐馆。

        馆子里的菜式原以粤菜为主，但为了适应当地人的口味，菜式渐被份量较多的浙江菜所替代，其中以糖醋鸡、扬州炒饭、腰果鸡丁、炒面及酸辣汤等最受欢迎。尽管竞争激烈，餐馆业者们对前景还是充满信心，坚信只要稳守市场，终究可突围而出。

   由于当地的家用电话费、上网费昂贵，所以华人留学生们都爱光顾网吧，玩玩线上游戏或浏览网页。

        中华会馆是尼科西亚第一家华人网吧，其他人眼见有利可图，也积极投入这个行业以分一杯羹。网吧的服务对象以华人为主，其次为斯里兰卡人、孟加拉人。

        除了上网，网吧也提供拨打长途电话的服务，务求营业多元化以吸引更多的顾客。中华会馆的老板郑凯聘请电脑技工，提供电脑维修及解决网速问题等服务，同时也留意顾客喜爱的歌曲、影片或线上游戏，尽量引进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此外，由于当地劳工法令非常严格，工作签证的申请手续很繁琐，期限也从5年减至4年。因此，在当地打工的华人很少，他们主要在酒店、贸易公司及会计公司等处上班。职场上，他们与当地人享有同工同酬的待遇，很少遭遇打压或歧视。

        陈玲的孙子安德利亚于2004年在首都开设了一家名为“Photo China”的摄影店，店面设计、经营方式突显华人特色，连拍摄风格也注入不少中华元素：“我在婚宴的请柬上印上中文字，再将婚纱照用象征团圆的圆框框起来。”安德利亚眉飞色舞地说。他个人不但对摄影充满热诚，更对华人血统感到自豪。

“路不拾遣，夜不闭户。”这是华人对早期寒浦路斯众口一词的形容。

        餐馆老板胡家琥，是第四个前来岛国的华人。他说，1980年代的塞浦路斯犯罪率很低，治安非常良好，家家户户基本上不必上锁，同时民众也相处和睦，呈现一派祥和的气氛。

        前财政部长夫人郝焕华表示：“车子停在屋外都不必上锁，子女通宵达旦在外也不担心。”

        除此之外，早期当地人对待华人也非常亲切友善，路上遇见华人，无论相识与否都会给个热情的招呼，甚至硬要邀请华人喝咖啡。随着汉语热潮席卷全球，当地人也学会一些简单的问候语，偶尔还能听见他们以中文的“你好吗”来问候华人。虽是一句简单甚至发音不太标准的中文，但这份好意令华人感到贴心。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留学生及新移民的涌入，一些害群之马在当地制造了一些社会问题，令当地人对华人的印象大打折扣，热情也开始冷下来，还不时传出华人被歧视的个案。

        老移民无辜受牵连。但毕竟老移民在当地生活了20年以上，拥有不少当地朋友，隔阂因此少些，也足以让当地人明白犯案的华人只在少数而已。

        其实，老一辈当地人确有歧视外国人的倾向。他们观念守旧，总觉得外国人是二等公民，华人的前来被视为抢了当地人的饭碗。这是因为华人主要从事一些工资较低的工作，无形中瓜分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

        作为少数的个案，华人遭受歧视或不平等的对待时，一般都抱以避之则吉的态度，清楚知道争论是没用的：“这里毕竟是他们的国家，争也没有用。”一名过埠新娘无奈地表示。

        不过，当地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态度远比老一辈来得开放和包容，因此华人长期都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主要的社交圈子也以他们为主。

        由于大家忙于工作，加上生活圈子不同，华人之间的往来反而不多。例如中餐馆业者的工作时间是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其他上班族则是朝九晚五，彼此碰面的机会很少，更遑论聚在一起了。

        塞铺路斯没有熙来攘往的人流，加上犯罪率低、治安良好、生活也就安闲从容得多了。

塞浦路斯有三宝：气候、橄榄及葡萄酒。

        这岛国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华人很是喜欢。夏天到海边度假，冬天到山上滑雪。无论冬夏，秀丽的景色各具变化，户外活动也各有不同。

        椒榄是当地特产，餐桌上无论主菜、配菜或头盘，它都被派上用场、只是，习惯中餐的华人，对当地“无橄榄不欢”的口味仍无法全盘接收。反观第三宝——葡萄酒，由于滋味甘醇，华人也仿效当地人，爱在餐前餐后小酌一杯。

        塞浦路斯餐与希腊餐不相上下，菜色都以烤肉为主，烤得焦焦的肉类口感欠佳，所以华人还是以中餐为主食。然而，留居日久，当地华人的早餐不再是豆浆油条、炒面或白饭，而是由牛奶、火腿、乳酪、面包或三文治等西点所取代；午餐则到快餐店解决。至于晚餐，华人往往亲自烹调，举凡土豆炒肉、番茄炒蛋、红烧鱼及排骨汤、都是华人喜爱的菜肴。

        当地没有华人超市，只有一家开业一年多的中国食品店。食品以干货为主，包括火锅酱料、冬菇、米粉、面粉、豆腐及方便面等。另外，在尼科西亚老城区还有个星期三菜市场，华人一般在下午3点以后到来，趁市场收摊前购买便宜蔬菜。

        无论饮食或天气，华人由最初的无所适从渐渐到安之若素。唯一让华人不习惯的，就是当地的娱乐设施欠缺，文娱活动也非常少。华人下班后除了到超市购买日常用品，就是回家上网、看看电视。

        在尼科西亚老城区有一家卡拉OK，可说是市内唯一能提供华人娱乐的所在。它只在周五营业，晚间10点到11点半是卡拉OK时间，过后就属于跳舞时段。每逢周五，约有30至50名华人前来消费，小小一间酒吧人潮拥挤，热闹非常。

        值得一提的是，塞浦路斯人在早期都不热衷干户外运动，华人饭后在公园散步或大清早在公园晨练，往挂引人侧目。近年来因受华人影响，当地人也逐渐开始散步健身。加入欧盟后，当地也开始举办古典音乐会、绘画展等文化活动。参与其中的华人，已明显能感受到当地的文化气息。

        塞浦路斯的交通系统欠发达，每座城市只有几条公车路线，约半小时或一小时通车一次，班次不准，因此当地人往往以车代步。汽车的价格从最低一万美金到最高40万美金不等，华人家庭至少拥有一辆车子，成员多的拥有3辆也不足为奇。

                这里没有欧、美国家的摩天大楼，一般都是6至7层高的楼房，在首都尼科西亚，备有车库、花园及游泳池的小别墅随处可见。至于华人的居所则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寓，有一室一厅、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等选择；另一种为独立小楼，通常有三四间卧室及客厅、厨房、厕所。中上经济能力的华人，都住在欧式的别墅洋房里。

        总的来说，经商的华人有房子、有车子，经济富裕而生活安定。而打工的华人则相对清苦，酷暑时没有能力安装冷气，寒冷时也只使用电毯而不用暖气，以节省电费。

        然而，在这空气清新，作息规律，犯罪率低而工作竞争又不大的国度里，华人无论贫富都对当地生活感到满意。

 塞浦路斯的移民政策很严格，多年来，这里的外来移民非常少。

        按法律规定，凡与当地人结婚者即可申请入籍，生活5年以上就能申请永久居留证。入籍的华人与当地人享有同等的福利及待遇，然而至今入籍者只有30人左右。

        部分华人并不在乎投票权或参政权，因此往往住了十年以上，仍然没有入籍的念头。这群手持长期居留证的华人，尽管身在异乡，却始终心系故土，回乡探望成了他们最开心的事。

        近年来，华人与当地人的通婚率有上升的趋势，有半数以上的华人因为婚姻关系而留居岛国，尤以女性居多。据非正式统计，有逾百名华人女性嫁到塞浦路斯，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及马来西亚。至于与当地人通婚的华人男性，则总数不超过十人。

        华人女性一般是在欧、美留学，结识塞浦路斯籍丈夫之后，再随着夫婿回到家乡来发展。男性一般则因为工作而结识了当地女子，进而共结连理。

        他们的婚礼通常采用希腊形式进行。华人婚前都先受洗成为东正教徒，之后才正式在东正教堂里举行婚礼；至于非教徒则于市长办公室内，在两名证婚人的见证下注册结婚，接着便举行简单的自助餐会宴请亲友。

        基本上，迎聚当地女性的华人毋须为住房担忧，因为岳父母将准备一套住房作为嫁妆，让新婚夫妇俩安住其中。婚宴上，他们还将接受亲友们送上的礼物、礼金及祝福，而新人也会向每位来宾派赠一个甜饼，象征夫妻生活永远甜蜜。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曾有一对中国留学生，在帕佛斯教堂举办中式婚礼。新娘向中餐馆员工租借旗袍充作礼服，并在一家中餐馆以自助餐的形式设宴，结束后还有亲友前来闹新房呢！婚礼由始至终都参照中国传统婚俗，毫不马虎。

        当地华人人数不多，传统节日气氛淡薄，他们对待节日也没在家乡时那般注重。众多节日里，华人较重视的还是春节，无论多忙碌都会加以庆祝。他们一般到大使馆去聚餐，或三五知已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吃饺子、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中国大使馆举办的春节聚餐及中国国庆聚餐，正好让经年各自忙碌的华人借机碰头，相互庆贺，分享生活点滴。此外，酒吧商也会转播中国的新春庆典，吸引华人到店里来共庆佳节。因此，每逢春节，酒吧里都聚集着成群结队的华人。

        到了端午节及中秋节，当地华人也会裹粽子，或品尝亲友寄来月饼赏月应节；而元旦时也会自制汤圆。

        同时，华人也入乡随俗参与当地节庆。以复活节为例，东正教信徒在复活节前的40天内吃素，而华人信徒就象征性地在每个周五吃素。

        岛国上没有华人公墓，只有东正教公墓与政府公墓，早期在当地过世的华人都葬在公墓里。生前并非东正教徒的华人原先不被允许葬在公墓，但经朋友向神父说情后，只要接受皈依东正教的条件，即可安葬在公墓。

        一般上，神父点头后，死者的亲友会将遗体运送到公墓，经神父通读圣经后便下葬，仪式简单。多年前，一名心脏病发的香港厨师不幸客死异乡，朋友们无法联络他远方的亲友，只好协助办理身后事。他的友人还保留了基地的地契收据，期盼有朝一日，死者的亲友能将遗体运回原籍地安葬。

        在尼科西亚的公墓里，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墓碑，墓主正是早年移居塞浦路斯的陈玲。她于1979年去世后，子女为了凸显其中国人身份而特地将基碑上的十字架设计成一个“中”字。这个“中”字基碑不但别具意义，也分外引人注目。

        另外，由于当地华人一般都是无神论者，华人基督教会因此特派宜教士前来传教，部分信仰佛教或道教的华人，因为迁移到这么一个没有庙宇的新环境，往往就转而信奉基督教或东正教了。

        来自新加坡的彭国雄牧师，于2006年6月在尼科西亚建立了第一所华人基督教会。教会租用教堂，每逢周末让30多个以留学生为主的教友聚会做礼拜。

        教务目前由两名分别来自新加坡、香港的宣教士负责，教会另外也租用一间小房子作为活动之用，每星期也在民宅举办聚会。教会经费都来自会员的捐献和新加坡教会的资助。每逢华人传统节日，教会也会举办餐会，让教友共庆佳节。

    塞浦路斯是一个福利国家，国立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学费全免，还另有多所私立国际学校。私立学校一般采取小班制，以英文为媒介语，教学质量高，第二代华人往往都在此接受教育。

        当地第一代华人都以中文沟通，至于第二代则多为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的后裔，自小在当地接受教育，平时多以希腊语、英语交谈。

        为了培育下一代的中文能力，华人在家里都坚持以中文跟孩子沟通，营造一个让孩子能同时掌握希腊语、华语的言语环境。

        岛国上没有汉语学校或学院，没有学习中文的环境。富裕的华人，每年暑假都把孩子送回中国，学习中文及传统习俗，让下一代认识中国文化，了解祖先的由来。而部分忙于工作、无法亲自教导下一代中文的家长，则希望孩子先在当地完成高中课程，掌握希腊语之后再到中国报读中文课程。

        不管经由哪种方法，华人始终期盼下一代能掌握华语，了解中华文化与历史。

        岛国华人人数不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华人社团。1987年成立的“中国塞浦路斯友好协会”，拥有会员500多名，华人却只有五六个，而蔡伟洲医师正是该协会副会长。多年来，该协会举办多项活动，包括每年组织会员到北京、上海及西安旅游，让他们亲身体验中华文化。

        此外，协会也曾举办中国玩具展、绘画展及摄影展，通过文化活动向当地人介绍中华传统，引起相当的回响。另外，协会每年也提供一份奖学金给中国学生，让他们有机会到塞浦路斯来留学，亲身体验岛国的风情。

协会中的华人会员虽然偏少，但他们一样同心协力地搭建两国人民沟通的桥梁，致力于文化的推广、交流。只要华人增多，群策群力，成立塞浦路斯华人团体并非一个遥远的梦。

        另一方面，由于当地没有中文报刊出版，华人都通过塞浦路斯唯一的中文门户网站——“塞岛在线”，获取当地的资讯。

        这个网络媒体于2000年成立，注册会员以留学生为主，目前约有两三万人，主要目的是让留学生们能有个沟通的平台，其涵盖的信息内容，包括当地要闻、气象报告、房屋地产、学院讯息、交友及二手产品资讯等。此外，“塞岛在线”早先还不定期举办餐会，让华人见面交流。

        当地的中文资讯虽不多，却聊胜于无，这些中文精神食粮除了提供讯息，也慰藉了海外华人的寂寞心灵。

来自上海的蔡伟洲，是当地首位华人中医师。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他，凭着医学知识及高超的针灸术，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中医师。

        然而，他的医术并非在朝夕之间就获得当地人的认同。

        一个华人用银针行医，当地人乍然见之，难免狐疑满腹。如何博取病患的信任并进一步获得认同，真是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中医诊所于1989年初开业时，民众根本不了解何谓针灸疗法，再加上当地规定医生不得刊登宣传广告，诊所可谓是惨淡经营。不过，蔡医师深信只要凭藉医术将病人治好，通过病人之口即能达致免费的宣传效果，迟早获得认同。

        一路抱持着这种态度，他坚持自己当医师的理想。一个心脏病人背痛，屡向西医求治却不见起色，3个月都睡不好。然而，经蔡医师的妙手，竟成功根治了背痛。这为蔡医师赢来极好的口碑，诊所的名声也因此传扬开来。

        悬壶当地20年，他的诊所已经上了轨道，有90%的病患是当地人，报章、电视台也经常访问他。针灸疗法从乏人问津到广受认同，证明他当初的坚持是明智的。

  21岁那年，他带着自制的唱片，走访塞浦路斯的首家唱片公司，结果音乐才华获赏识，唱片公司跟他签约4年，发了两张专辑及一张单曲。这位音乐才俊，就是塞浦路斯第一位华人歌手——胡庄礼。

        凭着对音乐的热爱，他16岁就开始跟朋友在录音室里，利用电脑、音乐器材自制唱片，分送友人。作品备受肯定给了他很大的鼓舞，进而萌生了出唱片的念头。他的专辑倾向于叙述生活、歌颂宗教、控诉战争及贪腐等等。他将唱片所得扣除开支，悉数捐赠不幸或贫困者，一时传为佳话。

        唱片合约于2002年期满后，考虑到原公司的规模及发展空间不大，他于2003年自组唱片公司，从制作到发行皆亲自参与。同年，他发表了第三张专辑，但只发售于塞浦路斯及希腊。

        5年前，塞浦路斯因特学院举办一场公开的校歌创作比赛，胡庄礼在众多知名歌手中脱颖而出，除了赢得5000美元奖金外，也获得学院提供5年的免费大学教育，修读传播系。他希望将来从事跟娱乐有关的工作，也期待哪天能成立一个慈善团体，扶助更多不幸的人。

        如今，他在当地已颇有名气，电视、电台都曾访问他，连总统生日都邀他献唱。作为塞浦路斯首位引进摇滚乐的歌手，很多年轻人都想向他学习，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与指点。

 塞浦路斯人口少、工业落后，发展机会不多。然而，这里政治稳定、治安良好、气候宜人，仅这三大因素就足以吸引华人留下来。

        华人觉得，当地生活虽偏于沉闷，但对比那些充满压力、竞争的环境，塞浦路斯还是个适合居住的国度。

  马耳他处在南欧、北非之间的地中海上，共由5个岛屿组成。首都瓦莱塔，位于马耳他岛的东北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马耳他国土虽小，但素有“地中海心脏”之称，它是欧、亚、非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数千年以来，其优越的战略性位置，也为它带来了不少腥风血雨，各国军队纷至沓来，曾引发无数的厮杀与战斗，但他们也把各自的文化带到这里。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而岛上的古建筑物则是历史留给马耳他人民的宝贵遗产。

        基于历史因素，马耳他人民大多为欧、亚、非的混血后裔，相较其他国家的人民，他们胸襟豁达，较能包容外来族群，对远道而来的华人热情友好，且以礼相待。

追源溯流，至早踏上马耳他的华人，要属上个世纪70年代的华人客工，他们是由中国大陆公派至马耳他筑建码头的。该批华人曾对这个国家作出贡献，可惜并没有居留下来。那时，中国大陆正面对着其本身的经济困境，却仍然在马耳他有需要的时刻伸出援手，这是为何老一辈的马耳他人，对中国总有说不尽的感激。

        继华工之后，第二批华人则来自香港。他们是首批正式驻留于此地的华人，担任中餐馆厨师一职。当年，中餐馆的雇主多为马耳他人，欧洲人对中餐的要求致使马耳他雇主不得不到香港去聘请合格的厨师，而当时的香港仍然属于英国殖民地，因此办理签证并不困难。及后，中国大陆也公派了一些厨师到马耳他的各家餐馆工作，驻留在此地的华人人数也就因而逐渐增加。

        马耳他华人以自由移民居多，其中包括了居留移民、技术移民、或通过与当地人通婚而移民等。据当地的政策规定，外来者必须居留此地长达19年以上，并符合种种要求才可获得公民权。尽管如此，华人移民之中也有特殊例子，香港人秦正贤只在短短一两年内，就以技术移民资格获得公民权。当年，他随友人到马耳他去旅行，发现当地的体操业发展相当缓慢，于是瞄准商机，决定以自己的专长——体操，在此地创业。

                马耳他是一个求才若渴的国家，这完全是由于自家的专才均已被欧洲各地“挖角”而离去，加上国外的薪资较高、发展也更为先进，导致人才外流，因此，华人只要符合马耳他的条件，且通晓英语，申请以技术移民的名义到马耳他绝非难事。

        至于通过与当地人通婚的方式移民，旅游局则审查得特别严格（在马耳他，居留签证由旅游局负责，而非移民局），因为假结婚以便换得入籍的案例实在不少，其中以妙龄华人女子嫁给年长马耳他男人的情况居多。通常，旅游局会派人上门稽查，盘问一些诸如：“昨天是否有行周公之礼？”“对方今日穿什么内裤？”等隐私问题，然后再对照双方的“口供”，以分辨真伪。

        马耳他华人的人口在高峰时期曾经多达5000人，然而其中多数为过客，而今居留在当地的华人，顶多也只有2000人左右。

 有人笑说，倘若在马耳他岛迷了路，沿着海岸线就能走回原地。的确，只需50分钟的车程就能环绕全岛。

       这里没有所谓的华人聚集区。华人留学生多集中在马耳他大学附近的幕思达（Msida）。其他华人大多集中在游客区，其中圣朱利安（St.Julian's）和斯利马（Sliema）就在同一条路上，只要20分钟就能从这一区走到另一区。这两个地区都有极美丽的海滩，酒店林立，经济繁荣，随处可见中餐馆。斯利马也是著名的夜店区，是华人喝酒消遣之场所；此外，布基巴（Bugibba）沿海地区，也有较多华人，连带中餐馆也较多。

       马耳他华人来自五湖四海，包括广东人、浙江人、陕西人、四川人、山东人及香港人等，其中以广东人最多。他们大多从事餐饮业，且多为打工族。马耳他的广东人非常低调，在移民此地20年的岁月里，不曾有过社团组织，也较少与当地其他华人联系。

       马耳他华侨华人联合会是浙江温州人徐瑞松在中国驻马耳他大使馆和前任大使祖庆舜的帮助与支持下于1999年成立的。该社团是马耳他目前仅有的华人社团，同时也是马耳他与中国建交后，成立的第一个社团组织。

       尽管乡音有别，但一操起普通话，马耳他华人就能相互沟通。或许来源地不同，少了他乡遇故知的情怀，彼此之间总是客客气气的，平时大家各忙各的，极少到彼此的餐馆坐坐，更甭提贸然上门串门子。

       马耳他华人的下一代就较为幸运。他们在此处接受教育，进而往欧洲其他国家深造，“年轻一代，总该让他们出外看看世界。”无论是做餐馆厨师的胡汉邦抑或拥有马耳他唯一华人食品厂的徐瑞松先生，他们的孩子虽然不在马耳他出生，却在马耳他成长并接受高等教育，在不忘母语的前提下，操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许多年轻一代的华人已成家立业，并繁衍出第三代。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马耳他华人与中餐馆，仍是唇齿相依。

       马耳他华人大多从事餐饮业，不是老板便是厨师或者侍应生。当地华人表示，马耳他政府保护意识强，只有马耳他人无法胜任的行业如中餐厨师、华人才有机会。

       这个四面环海的国度，捕鱼技术却非常落后，海产业并不发达，国家主要收入来自旅游业。当年，马耳他中餐馆老板都是马耳他人，厨师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等地。今天，这群早年踏足马耳他的厨师已成为马耳他华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当中少数已从打工族过渡到自立门户。

       如今，为马耳他人打工的华人仍占大部分，他们甚至与马耳他老板维持了大半辈子的雇佣关系，欧洲人也同样有“做生不如做熟”的想法，打工厨师在洽谈续约时，也会要求把老婆孩子都接来马耳他生活。

       目前，马耳他约有50余家由华人经营的中餐馆，而且无论餐馆面积大小，装潢一般上颇为讲究，虽不至于每间都富丽堂皇，但能标榜中餐馆特色的装饰，如走马灯或古色古香的花瓶等，都能随处见到。

       欧洲人看中餐，装潢不是最重要的，但厨师必须是道地的华人，甚至连侍应生也如此。他们心里有个无法解释的标准，认为道地华人必定烧得出正宗的中华美食，而侍应生的英语能力只要能够应付就好，最好还带着汉语腔调。欧洲客表示：“如果英语如我一般流利，那感觉不够‘中华’。”身为老板，能适应食客的胃口仍嫌不够，还得练就能够猜透食客心理的“攻心术”。

       然而，马耳他中餐就是正宗的中餐吗？若深入观察，事实也并非如此。“欧洲客嘛！较好酸甜辣，中餐烹调应他们的口味而有所变化。”中餐馆老板娘冯丽华表示，正因如此，欧洲食客比较喜欢麻婆豆腐、宫保鸡丁等菜肴。

       欧洲人保守刻板，也是最忠实的客户，甚至有的会坚持要熟络的招待员替他点菜。“他们（欧洲客）总会事先摇个电话，找我预约点菜，如果我不在，他们就不来。”冯女士如是说道。欧洲客认为，找对人点菜，菜肴就不会走味。“的确，我记得甲客好酸甜，乙客的官保鸡丁有一点辣就行。”冯女士也透露欧洲食客点来点去就那几道菜。

       马耳他中餐馆几乎不见华人客户，而回头客多是马耳他人和游客。冯女士说：“这些游客不少是老顾客，甚奎从旅游的第一天开始至最后一天都会风雨不改来光顾我们餐馆，而且事后还介绍亲朋好友来。”餐厅一旦建立了良好口碑，生意自然蒸蒸日上。华人很少光顾中餐馆，平时不管忙生意也好，忙打工也罢，几乎都是在家下厨自行解决三餐。

       然而，随着2008年全球经济大衰退，马耳他中餐业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在马耳他，一般中餐价位较高，游客区一碟中式炒面外加一瓶矿泉水就要12欧元，而西餐一个大份量的三文治不过3至4欧元，价差令许多游客退而求其次选择西餐。而今，西餐厅的门庭若市与中餐馆的门可罗雀，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情形在过了旅游旺季的夏天更为明显。大多从事餐饮业的马耳他华人，难道不心急如焚吗？

       此外，华人还面对聘请厨师的问题，因为条例一年比一年苛刻，厨师能待的时间不长，届满3年就必须回国。“再从国内（中国）请个厨师过来也得等大半年，其中就得以3个月的时间申请工卡（工作准证），认证需4个月，再来签证又得办上20天，而且当局对厨师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冯丽华的丈夫王家祥表示。“除了静观其变，我们也准备了后路。”生意不好是其次，政策的变化更让华人忧心。“今年我们已到美国物色了地皮。”正所谓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王家祥夫妇甚至已安排孩子在美国接受中小学教育。

   此外，处在南欧及北非之间的马耳他，毗邻欧洲大陆的地理位置，成了不少外来人的跳板，而华人居留者也是其中一例。这个岛国一直以来都不是移民国家，要入籍该国也不容易。一些华人在没有工作准证的情况下，只能在餐馆打打零工，赚取微薄收入。由于生存艰难，他们待机会一到，便往西欧发展，从此一去不返。

       近年来，马耳他的法律愈加严厉，华人如果没有工作准证，就绝对不能工作。马耳他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徐瑞松叹息道：“不是华人不帮华人，只是黑工请不得，请了就等于抵触法律，要坐牢的！”

       马耳他政府为保护国民就业机会，限制外国人到此工作，除非身怀特殊技能者或从事当地人不愿或无法胜任的工作，例如码头建设工人、厨师等。在马耳他，华人因教育程度不高，很难进入上层社会。

       关注国内政策上的种种细节及法律动向、不怕麻烦及有耐心更是马耳他华人必备的“生存条件”。他们不厌其烦地解读每项条例，并严格遵守，从迁移到落地生根，马耳他华人一路走来不容易。许多马耳他华人表示：“要在马耳他生活下来，很难，但挨过就好。”

       马耳他在未加入欧盟前，由于学费佼为低廉，曾是中国留学生优先选择地。自从马耳他加入欧盟后，中国留学生数目比以往少了，因为马耳他的费用开始向西欧看齐，而且不少日常生活物品的价格攀升，税率亦提高了，因此中国留学生转而选择到西欧各国。

       马耳他大学学生顾问卢嗣思女士表示，华人留学生人数不比往年多，而且马耳他大学宽进严出，入学门槛不高，能否顺利毕业又是另一回事。“入学和毕业的比率是2：1,原因在于有些学生在求学半途转校去了其他欧洲大国，一些留学生因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而打道回府，另1一部分的学生则转去就读职教学院，少数则为留级生。”

       另外，在法律上，中国留学生在马耳他不能打工。即使毕了业，中国留学生可以拿着马耳他大学文凭到欧洲其他地方觅职，就是不能在马耳他找工作。

   马耳他虽小，却是欧洲第二个拥有中国文化中心的国家，且就设在首都的游客区。在一片乳黄色的建筑群里，鲜红色的五星旗帜，特别引人注目。自文化中心于2003年成立以来，举办的活动不胜枚举，足见其传承中华文化的决心。“2007年中国国庆，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中国日’等活动，受到马耳他媒体广泛的关注。”马耳他文化中心主任郑浩翻着收集的剪报自豪地说。

       另外，每学年的马耳他大学迎新周，也把中华文化、手工艺和华乐等列入活动之中。马耳他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还体现在马耳他世界太极拳日这个活动上，主办单位在当日邀请当地华人武术高手，相互切磋竞技。

       马耳他华人移民史不长，华文教育不算姗姗来迟。海外华教事业一向发展不易，马耳他的华文班，从师资、地点到经费，全仰赖当地热心华人及大使馆的帮助。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于2004年开办首届华语班，课程共分初级、中级和高级班3种，学生共250人，虽然主要对象是华人，但其他民族的学生人数却比华人更多。在此地出生的华人，通常是透过电视节目自学华文。新一代华人大多数是在青少年时期才移居马耳他，一般华语的说听读写能力不成问题。

       华人在此地安居乐业，孩子一旦成为马耳他公民，即享有免费教育，有的则被父母送入欧洲其他国家接受高等教育。“总要让孩子自己出去闯一闯。“许多马耳他的华人父母都有这种想法，可见在西方教育及文化的熏陶下，华人思想也开通了不少。胡汉邦先生说：“我女儿18岁时就独个儿去了法国等地旅行。”如今，让华人引以为荣的不止是孩子的高学历及成就，也包括了孩子的独立自主。

马耳他另一小岛——戈佐（Gozo），住有20几个华人，全来自四川；无论当老板或替人打工，一律从事餐饮业。“这里的川菜也未必家家正宗，有些随着食客口味调整，但我这家坚持原汁原味。”住在该岛的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会长毛曦表示，即使戈佐华人均来自四川，却甚少来往。马耳他华人总是各忙各的，皆是同乡的戈佐岛华人一样如此。

       生活在此处的人自称为戈佐人，并把岛外的同胞称为马耳他人，不仅称谓划清界线，连往来两岛的船票价格也有所差异，渡轮公司即使亏钱，也让戈佐岛人享有票价减半的优惠，这也凸显该岛岛民一直想“独立建国”的心态。

       现年39岁的毛曦已入籍马耳他。对生活在此处长达20年的毛曦而言，比起马耳他岛，戈佐岛是宁静了些。“当年我妈妈是公派厨师之一，在戈佐岛一家旅店当厨师，当时合同届满准备回国，雇主要求续约，妈妈便开出把我带过来的条件。”当年，大多数打工一族的华人就以这类“亲人接应亲人”的方式在此合法居留。

       一年后毛曦随着妈妈离开，两年后她独自再回到戈佐岛创业，“回想当初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一句英文也不会，每天与老外聊天，不明白就随手抄下来再查字典，自学6个月后总算能应付顾客。”

       “当年，部分戈佐岛人认为中国人又穷又脏，我一定要干一番事业让他们瞧瞧。”如今，毛曦灵秀的模样出现在悬挂于马耳他首都总车站，以各色人种面孔组成的巨型照片里。“那是联合国的一个活动。”毛曦微微笑着说。

马耳他华人来自五湖四海，移居马耳他的历史不长，亦不见大规模迁移，但是华人之间的关系却也不疏离，且只要有华人需要帮助，「马耳他华侨华人联合会」的会员都会伸出援手。

       在此文明的国度里，华人奉公守法、刻苦耐劳，获得当地人的欢迎及认同。对华人而言，马耳他是上天赐给他们的福地。

  陆止于此，海始于斯——葡萄牙的著名诗人卡蒙斯（Camoens）如此歌颂祖国，它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最西端，号称“欧洲之角”。

        葡萄牙东及北部连接西班牙，西部和南部濒临大西洋，并且囊括大西洋亚速尔群岛（Azores）以及马德拉群岛（Madeira）。15世纪之际，这个蕞尔小国，竟是地理大发现的始作俑者，曾经一度是在非、亚、美洲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海上霸主。

        1974年，在极右政权被推翻之后，葡萄牙的民主化进程才告开始，除了放弃非洲殖民地，这个国家也出现了第一位平民总统。

        1986年，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也即是后来的欧盟），此后发展较快，而华人移民也开始大批地蜂拥而至。

大约于20世纪20年代，原本居住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浙江青田和温州商人沿途行商，辗转到达葡萄牙之后选择留下来，成了第一批定居葡萄牙的华人移民。

        较后，有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前来欧洲参与后勤部队的华工，也于战后迁居至葡萄牙。

据说，在30年代前后，还有少数华人从中国乘船远航，抵达欧洲追寻淘金梦。但是，他们所乘搭的船只在经过运河进入地中海时，却无法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登陆，于是只好绕道在葡萄牙上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葡萄牙属于中立国，在当时也吸引了不少中国移民选择入境。

        70年代，葡萄牙的殖民地东帝汶有数百名广东籍华人，为逃避印尼的政治迫害，纷纷移居到葡萄牙本土。随着葡萄牙逐步放弃它在非洲的殖民地，来自莫桑比克以及安哥拉等地的华人，也转往前宗主国谋生。后来，还有不少香港以及澳门华人也移民到葡萄牙。

        然而，由于葡萄牙经济发展比其他西欧国家缓慢，政局也不太稳定，致使许多当地的华人移民感到前景欠明朗，因而选择再度迁居至澳洲或欧洲其他国家，另谋发展。

        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移民潮的到来，来自上海、广东、山东、福建、北京等地的移民陆续迁往葡萄牙。1986年，葡萄牙的华人人数约有3000多人。

        早期的中国移民主要是聚集在里斯本、波尔图（Porto）和葡萄牙南部较小的城市塞图巴尔（Setubal）和贝雅（Beja）。此外，也有少数华人散居在国家森林保护区的乡间，以及大西洋中部的葡属亚速尔群岛；来自香港的华人则大多数聚集在阿尔加维（Algarve）。

        由于西方人十分讲究穿着，大多数人都会系领带，所以早期华人到当地店铺购买领带和衣服等物后，沿街兜售，以“倒卖”的方式赚取利润。当时还有一批为数不少的青田籍流动商贩，走南闯北，时而摆摊设点，时而穿街走巷，贩卖自己所制造的装饰品、丝绸和石雕等物。他们风雨不改，省吃俭用，以便尽早累积足够的资金，开设工厂及商行。来自中国青田的励松标，就是早期华人实业派的代表人物。他仅仅用了有限的资金来开办领带制造厂，之后又成功地把工厂的规模逐步扩大。

        在葡萄牙扎下了根之后，华人开始涉足中餐行业。

        周洪泽于1966年在波尔图市中心创立首家中餐馆“金龙酒家”。1974年，他又在著名的景观大铁桥附近开了“中国酒家”。这两家餐馆均获得当时的总理特批，因而享有25年免税优惠，其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在当时，中餐就是高档餐饮的代名词，光顾中餐馆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1992年，葡萄牙首次实行大赦，将许多滞留在欧洲各地的华人吸引了过来。及后的数次大赦，更是把移民人数推向了高峰。

        多数华人坦言，若不是在这里可以具有明确的身份，他们也不愿意来。但是也有部分华人正是看中了葡萄牙较小的竞争市场，及那较为宽松的政策，所以选择了居留于此，并且呼朋唤友到来开拓事业。

* *距离里斯本约40公里的波图奥图（Porto  Alto)有一个“中国城”，不过此地并非华人聚居的地方，而是中国商品批发零售中心。1998年世界博览会于里斯本举行之际，当时中国在参展时所用的牌坊“中华门”于博览会结束之后，由当地华商购买下来并安放在该处，该中心也就因此有了“中国城”之称。*

目前葡萄牙华人大约有1万5000人，主要由中国大陆移民、澳门及非洲华人三个群体组成。中国大陆移民以浙江青田和温州人最多，占了近90%。他们主要居住在首都里斯本、波尔图以及南部的旅游城市法鲁（Faro）。

        经历了数十年的起伏变迁，如今，华人移民在葡萄牙经济上已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有人说，葡萄牙华人有三业，指的是早期一枝独秀的中餐业，和近年慢慢开创出来的“三百”业和批发业。这3项行业平分天下，在葡华经济蛋糕中各占三分之一。不过，近二三年来，原为华人经济支柱的中餐业，在屡遭冲击下，陷入低迷；而“三百”业和批发业则迅速发展，渐领风骚。

        借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气势，葡萄牙华人开启了“三百业时代”。他们在葡萄牙各角落开设了超过3000家“三百店”，数量之多足以傲视全欧洲的华人零售业，在葡萄牙日常用品的市场更占据重要之地位。据说在葡国，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华人的“三百店”。

        “三百店”内的商品，价钱大多是300埃斯库多（前葡萄牙货币，折合约一欧元），因而得此称号。这些售卖中国廉价商品的“三百店”恰恰迎合了葡萄牙低迷的经济状况，在市场上获良好的反应。

        葡萄牙百货协会会长甄添祈解释说：“当时许多零售商都是在有限的资金下创业。不过他们只需出资租下店面，批发商就会提供所有的货源，并且还让零售商赊账。”这种大约只需数千至一万欧元的低成本经营模式，在2000年推出后大受欢迎，随后数百家“三百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配合着“三百店”迅速发展的需求，批发业也逐渐兴旺起来。目前已形成大规模的仓储批发区有波尔图的维拉贡德（Vila do Conde)、波图奥图等；大型的批发商贸城则有亚洲商城、欧亚龙——中国城等。

        这些批发商多数是年轻移民，一夜暴富成为当地华人的新贵。1992年来到葡萄牙的陈坚，就是个无人不晓的批发巨子，当地华人批发区几乎都由他带头开发。来自温州的他，目前已拥有百货、批发和自身品牌的童装生意。他说：“刚来时发现华人只有单一的中餐业，反而是印度人在卖中国货赚钱。”发现了商机后，他就从家乡运来商品售卖，慢慢演变成批发，进而开发商业中心，把乏人问津的地段发展起来。

        大略估计，葡萄牙的华人批发商已有近1000家，单在里斯本市中心路易公爵大街上的马迪慕尼斯（Martim Moniz）大厦以及对街的商业中心大厦内（俗称新旧货行），就有400家华人开办的进出口批发店，因此有了“货行”和“唐人街”之称。这里原是葡萄牙最古老的商业区，许多印度人在此经商。华人开始进驻后，慢慢“占领”大厦，现只剩下少数的印度和阿拉伯商人。

        第一代华人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在“三业”中奠定事业基础，如今也慢慢涉足美容、旅游、媒体等其他行业。而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在当地接受高等教育或经过高级职业培训后，已走出父辈的传统行业，如开办律师事务所和房地产中介公司等；亦有人发展成现代化企业集团、逐步融入主流社会，成功跻身于葡萄牙商界名流之列。

        另外，原本持着葡萄牙国籍身份的莫桑比克华人，则在学成后大多进入政府机构或外国大企业工作，甚少踏入商界。

* *谈及葡萄牙华商，不得不提“澳门赌王”何鸿燊。他在葡萄牙开了两座五星级的大型赌场，分别于著名海滨埃斯托里奥（Casino Estoril）以及里斯本世博会附近（Casino Lisboa），并在1997年收购北部波尔图的Casino da Povoa。这3家赌场的收入总额占了葡萄牙博彩业总收入的60%以上。*

葡萄牙华人的“三业”——中餐、“三百”和批发，是华社的经济支柱。

不同群体的葡萄牙华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自葡萄牙前殖民地的华人，拥有葡萄牙教育和文化的成长背景，生活就像个道道地地的葡萄牙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不谙中文，结交的多是西方人。这些华人显然已完全融入葡萄牙社会中，逐渐远离华人社会。

        而20世纪末期才从中国移民到葡萄牙的华人，大都不属于专业移民，因此大部分在语言、观念和文化的差异下，只能把自己封闭在华人圈子里，遇到任何问题都找华人商店或企业解决。

        虽然第二代华人已慢慢融入当地社会，语言沟通也不再是问题，但新一代华人还是会这么表示：“受不了老外的前卫思想，毕竟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可见他们仍受到了华人家庭观念和思想的影响，比较喜欢和同族在一起。

        为求生存，许多葡国华人只能辛勤地劳作。为了赚取更多金钱来提高生活素质，他们每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让许多葡萄牙人折服。在他们眼中，华人几乎一年四季，白天黑夜都在工作。

        但一些华人也有所感触：“即使赚了很多钱，住别墅、驾宝马、穿西装，却不分昼夜地埋头苦干，埋葬了青春，磨损了健康。葡萄牙华人在这边好像只是生存奋斗，还谈不上享受生活。”

        不过渐渐的，葡国美酒的香醇和葡国人和善的态度，也开始吸引他们放慢脚步，在这平静国度里，悠然过活。

        当地人对华人大致上也持着正面的看法。据说，安分守已的华人至今都没有任何严重的犯罪纪录，只是习惯在周日营业的违规做法让当地人较为头痛而已。

        葡萄牙人非常注重服饰礼仪，华人也入乡随俗。男子在正式社交场合都西装笔挺，女子则是端庄的套装或连身裙。华人与葡萄牙人谈生意时都会穿上西装，以示尊重对方。他们也开始适应当地的商务礼仪，例如避免在中午12点至下午3点非办公的时间打扰对方。

        华人和葡国人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也闹出不少的笑话。为了迎合华人的饮食习惯，许多华商千辛万苦把中式食品引进葡萄牙，但像腊味、腐乳这类华人视为“极品”的美食，在当地人眼里却是过期的腐朽食品，并不适宜食用。不过，这种情况已慢慢改善，双方已逐渐互相了解，接受对方的文化。

随着葡萄牙的华人不断增多，不同性质的华人社团也陆续诞生。目前全葡大约有30多个华团，除了葡萄牙华侨华人协会和由北部华人组成的葡萄牙华侨华人总会为主要华团外，活跃的还有葡中工商协会、葡萄牙中华工商总会等。

        葡中工商协会成立于1978年，是葡萄牙第一个致力于中葡经贸关系发展的工商界联合机构。1990年，经营中餐业的老华人周洪泽，联络有志于公益事业的其他华人，发起成立了葡萄牙华侨华人协会。该协会不断壮大，陆续在葡萄牙南部、北部和中部成立分会。而中华工商总会则是于1997年由工商企业主组成，属下设有百货业协会、餐饮业协会和马德拉分会。总商会拥有200平方米的会所，具备图书馆和娱乐设施，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对外开放，免费让同胞阅读报刊杂志、打乒乓球、唱卡拉OK。

        由于零售店不断增多，良莠不齐，有的零售商不讲信用，拖延欠款，批发商们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于2006年底组成了“百货批发商联盟”。当时共有22家主要批发商成为盟员，把欠款不还的零售商列入黑名单，停止为这些商家提供货源。此外，他们也建立一个信誉评估制度，为新入行的商家打分，以打击不讲信用的商人。

        许多华团也自动自发举办法律讲座，解答华人对该国相关法律知识上的疑问，华商的法律概念，教育华商遵守当地法令，避免出现和当地商人利益冲突而引发不愉快事件。这些举措收效明显，显示了华商团结的力量。

        此外，有些华团积极投身参与当地的社会事务。比如，当葡萄牙发生森林大火后，旅葡华团便立即发动华人捐款，表达对葡萄牙人民的深情厚意，被葡萄牙媒体广为赞颂，传为佳话。每当葡萄牙足球队在欧锦赛取得好成绩时，葡萄牙华侨华人协会也会适时组织舞龙舞狮，与葡国人民同欢共庆，深得当地社会的认可。

        另外，当地还有体育和文化团体。例如，成立了14年的葡萄牙华人业余乒乓球队、葡萄牙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的足球队伍、中国功夫联合会等，丰富了华人业余的文化生活。

        当地有两个非常活跃的华人宗教团体，即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和里斯本华人基督教生命堂。它们是众多华人祈求心灵慰藉之所在，也是大家互相交流的场所。

        1995年2月成立的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至今大约有固定会员260人，也拥有固定的道场。每年四月初八的浴佛节（又名佛诞节或龙华会），该会都会在葡萄牙大型广场举办庆典，引来了许多佛教徒共聚一堂，庆典除了有浴佛法会、斋会、结缘和放生等活动，还有中华传统节目的表演作为开场，如舞狮、武术等。在葡萄牙，浴佛节不单是华人的节日，不少当地的葡萄牙人以及印度人也积极参与。

        该会每年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更为盛大，受到当地社会的关注。除了逾千名华人参与外，也有数百名葡萄牙人出席，同时达到推广中华文化和弘扬佛教的效果。

        里斯本基督教生命堂于1999年10月21日成立后，波尔图市也分别在2001年及2006年成立波尔图基督教生命堂和明德路基督教生命堂。这3间教会约有300名会友。教会的活动丰富，除了例常崇拜，每年也会举行大型的圣诞晚会和春节感恩聚会等活动。

 葡萄牙的中文教育起步较晚，第一家中文学校——里斯本中文学校，在2001年才在里斯本出现。

        这家学校从创办初期的14名学生，发展到今天已有200多名学生，已成为葡萄牙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其中，还有大约十名是外国学生。学校共开办了12个班级，借用当地校舍，让4岁至17岁的学生在周末学习中文。

        该校校长陈晓红说：“学校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自己的校址，发展受限。而每周仅有的两个小时学中文，对学生来说也不太足够，达不到最佳的效果。”

        她补充说：“中国国务院侨办所提供的教材并不适宜，惟有根据海外华人的状况，自行编出更适合当地的教材。”另外，学校也在课后开办中国舞蹈班和书法班。

        接受葡萄牙教育的新一代华人，已习惯在生活上使用葡语。即使是与华人同学交谈，他们也多使用葡语，华语仅限于家里使用。家长们了解新一代为融入社会，必须接受当地的文化和教育，但他们也希望孩子不会忘记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有些家长甚至在假期中千里迢迢把孩子送回中国去学习华语，目的是提醒孩子不要忘根。

        随着中葡两国政治、经贸、科技和文化等各领域交流日益加深，游走于迥然不同的中葡文化中的华人后代，无疑将充当起交流使者的角色。

        许多社团组织和企业也慢慢在这方面做出努力。2008年2月1日，由葡萄牙华人自发组织的“葡萄牙——中国传统文化推广协会华人艺术团”正式成立。该协会精英在春节联欢会展露身手，让当地人领略了饱含中华文化元素的表演，如琵琶、葫芦丝演奏、太极拳表演等。

        中文报刊方面，1999年创刊的《葡华报》，是目前唯一本土出版的中文报纸。其前身为半月刊《葡华通讯》，由当初12版复印发展到现今的32版双色胶版油印。多年来，葡华基本依赖这份葡萄牙唯一的中文平面媒体了解华人的新闻和信息。

        《葡华报》每期发行大约1000份，固定的订户有400人，覆盖整个葡萄牙地区。《葡华报》自加入欧洲联合周报的体系后，与其他报章如中国的《新民晚报》合作，有更加全面的新闻报道。创刊9年后，该报目前正积极开拓周边国家更大的华人市场，同时也与时并进，设有网站www.puhuabao.com。

        近年来，西班牙的中文媒体也已开始陆续涌进葡萄牙。如今市面上可见的中文报纸包括《葡新报》（由西班牙华文传媒集团出版的葡萄牙报章）、《欧华报》、《侨声报》和《华新报》等。此外，还有在中国印刷，免费在葡萄牙派送的《同心报》。

 收益稳定、拥有良好市场的中餐业，成为早期华人起步的选择。当年中餐深受葡萄牙人的喜爱，促使中餐馆迅速增加，在最高峰时期，全葡萄牙的中餐馆达800家左右。当地华人把1992年以前的中餐业情况比喻为“黄金时代”，当时，“葡萄牙人为了吃一顿中餐，可以不惜排上几十公尺的长龙等候位子；连中餐馆每半年加价，他们也欣然接受。”80年代移民到葡萄牙的华商郦剑鸣回忆说。

        1992年之后，中餐业慢慢走向衰落。当年葡萄牙政府实行大赦，华人数量暴增。由于大部分新移民也投身于中餐业，致使竞争越发激烈。恶性竞争并没有带旺中餐业，反而使中餐的利润减低；更使原属高档消费的中餐馆，变成普罗大众就餐的地方。

        即使面对利润薄和人工荒等问题，但中餐业依然维持了十多年的繁荣。直到2006年，葡萄牙政府突然对全国中餐馆展开突击检查，给中餐业带来致命的打击。这场号称“东方行动”的大检查，共检查了全国各地的130家中餐馆，其中高达80%的餐馆卫生指数不合标准，有些更触犯了法律条文，里斯本和波尔图各有13家和3家中餐馆被勒令当场关闭。

        经过这次检查后，中餐业一蹶不振，风光不再。即使在行动中安然无恙的中餐馆，后来也因生意迅速滑落而难逃关门大吉的厄运。目前，葡萄牙的中餐馆只剩下200多家。华人多转做其他行业，也有一些改做日本料理，经营轮转寿司和铁板烧。

        中餐业者曾作出多种努力来扭转局面。他们虽然获得当地华人社团，以及葡萄牙政府官员的公开声援，但主流媒体却不时会旧事重提，经常播放有关中餐馆卫生问题的节目内容，使消费者对中餐馆依然持有负面印象。

        经过业者不懈的努力，中餐业开始有了一丝复兴的兆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餐业还是有希望的。最重要是要搞好餐馆卫生和管理。”葡萄牙餐饮业协会会长朱长龙如是说。

    葡萄牙华人工作几乎全年无休，基本上只在元旦节和圣诞节这两天休息。有人这么说：“在这个大家都拼命挣钱积累资金的时候，休假过节对华人而言是种奢侈。”如此一来，许多华人就把难得的圣诞节假期，也当成春节来过。即使是非基督徒，也会与当地人一样吃喝玩乐，互送圣诞礼物，过得非常热闹。

        不过，葡萄牙华人并没有忘记华人最重要的农历新年。虽然春节期间，华人商店依旧照常营业，但他们往往都会在打烊之后一起聚餐聊天，观赏中国的春节电视节目，共同感受淡薄的新春气息。

        春节对葡华来说，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由于当地华人多是以家族纽带关系移民过来，有时一顿团圆饭凑上百人都不出奇。

        许多华人社团商会也与时并进，以推广中华文化为主题，展开一个个别开生面的迎春活动，包括大型春节联欢会，邀请当地民众一起庆祝，向葡萄牙人民推广中华文化。

        来到可称为唐人街的Vila Do Conde华人聚居区，更能感受到处处洋溢的过年气息。除了有大红灯笼、彩灯、中文的春节联欢宣传海报等，还有节日高潮的舞龙舞狮巡街表演。

        特别的是，这些来自葡萄牙当地武术学校的舞龙舞狮队，是由葡萄牙人所组成。他们穿行每条大街，在每个店铺依次巡回表演，使整个地区锣鼓喧天。若非看到这些举着巨龙和狮头、敲锣打鼓者都有一副异国面孔，还会误以为是身在中国庆祝春节呢！

与经济发达的其他欧洲国家比较，葡萄牙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华人在这个平静安定的国度里，也学会了在平淡中享受生活。听着葡国哀伤忧郁的民谣法多（Fado），让华人也不知不觉地恋上清醇甜美的葡萄酒与散发着香气的蛋挞。

        然而，对他们而言，未来还是个未知数。

    西班牙位处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西邻葡萄牙，东北与法国接壤，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北部相望，东濒地中海。境内群山巍峨，高原起伏，沿海海岸线绵延，多优良港湾。

       早在1492年，西班牙就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它曾一度是海上强国，在全球各地都有殖民地，但于1588年开始衰落，1873年爆发革命后建立西班牙共和国。1936年，佛朗哥（F.Franco）发动武装叛乱，西班牙内战爆发。1939年，共和国倾覆，佛朗哥建立了独裁政府，长达36年。1975年弗朗哥病逝后，西班牙才走向西方议会民主政治。

       具有强烈地中海风情的西班牙，被誉为世界上最令人神往的国家，有着源于不同文明的多元文化以及十余座世界遗产城市，还有明快动人的佛朗明哥舞和血腥刺激的斗牛活动。风光明媚、人文景观丰富，是世界三大旅游王国之一。

       华人在几个世纪前已迎着地中海的阳光而来，虽经历了许多浮沉变化，却一直与热情开朗的西班牙人共同前进。

 早在16世纪，华人便已经踏足西班牙，他们是跟随西班牙传教士而来的佣人。到了1570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之后，与当地华人接触频密，并且展开了贸易往来。据说，当年首名入籍西班牙的华人，就是来自菲律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部分法国和英国所招募的华工，便转到西班牙来定居。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山东杂耍艺人经由俄罗斯以及东欧等国，辗转进入西班牙。由于西班牙的生活费比较低，谋生也容易，致使他们最终选择了此地作为立足点。

       接着，温州人和浙江青田人也一批又一批地踏上这块土地。他们之中大部分原是石雕工匠，后来转行经商，穿街走巷兜售领带、首饰和青田工艺品等。同时，一些来自湖北省的天门人也千里迢迢来到西班牙，在当地或售卖纸花，或当牙医。

       其他旅居西班牙的华人还有海员、修道士等，这些移民几乎全都是男性，他们大多数和西班牙妇女结婚，并且融入了当地社会。

       曾经担任西班牙青田同乡会会长的陈迪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名定居于西班牙的华人。他在1949年离开北京农业科学院赴西班牙探亲，接着就留了下来。

       直至1973年中国与西班牙建交之前，在西班牙定居的华人仅有大约500人。

       早期的西班牙华人，主要是投身于餐饮业、杂货以及贸易业，但是数量和规模均十分有限。西班牙的首家中餐馆，是由林连水在1953年开办的；直至1965年，马德里也只有5家中餐馆。

              70年代后，移居西班牙的华人经济条件较好，有的自行开设餐馆营业；而知识分子则成了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师、神父等专业人士；但是，大多数移民还是依靠打工过活，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他们只能从事待遇较低的工作，过着清苦的生活。

西班牙华人大量增加，是80年代以后的事。首先是西班牙政府收容了一万名左右的印度支那难民，其中，有大约80%是华人。同期，一些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也纷纷举家移居到这里来，而来自中国大陆浙江省和上海市的新移民也有数百人。

       1985年西班牙政府由于面对劳动力短缺问题，曾经实施新移民法令，颁布“大赦”令，以致有大约9000多个华人因这项“大赦”而获准在西班牙定居，1991年，政府再度颁布大赦令，当时则有5000多名华人被允许留在西班牙。

西班牙政府之后还陆续颁发了数次大赦令，使许多原本在欧洲其他国家非法的华人，纷纷涌入西班牙，成为合法居民。

* *在1936年10月，西班牙爆发内战期间，有100名中国人参与著名的“国际纵队”。他们都站在左翼政治力量这一边，英勇奋战，不少华人因此而献出了生命。两年后，该部队撤离西班牙，有少数华人决定留下来落地生根。*

 今天，在西班牙过百万名外来移民中，华人是第四大移民群体。共有十万余人。他们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其中70%来自浙江的青田、温州；其次是上海、广东、福建，另外还有一些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华人。他们多数持着居留证，分布在西班牙120多个大小城市，较集中的是首都马德里、巴塞罗那（Barcelona）和瓦伦西亚

（Valencia）等。有近万名华人已入籍西班牙，其中一半是在西班牙出生的华人。

       近20年来，西班牙华社发展渐渐走向成熟，华人在经济上进军各领域，皆有亮丽的成绩。如今，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大城市，华人商店和大型批发库随处可见。而华人的社团、中文学校和中文报章更是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西华社会日趋活跃和蓬勃。

西班牙华人说，他们来到当地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当老板。根据当地政府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整个西班牙，有超过30%的华人移民都是老板，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经济势力。

       在马德里的移民当中，华人老板的数量最多，有超过两万人；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则有四分之一的华人是老板。

       即使许多人初来乍到时替人打工，但在拼搏工作后储蓄资金，或在亲友的协助下，他们终有一天可以创业，自己当起老板来。

       “华人之间的贫富差异其实也很大，但华人就是有坚韧的生命力。即使他们一无所有，也不会去当乞丐。他们会自食其力，用尽方法求存，如摆地摊做小买卖，或用劳力来换取财富。”十多年前从上海移民来此的《欧华报》总编辑辛夷说。

       在华人眼中，西班牙是个淘金的好地方。宽松的制度、良好的营商环境，及容易领取商业执照等客观因素，都在吸引华人涌到这里。

       “华人可以在短短十年内立足西班牙社会，大街小巷华人商店林立，除了秉持勤劳能干的精神外，还得力于他们发挥了团结的力量，以集资的方式创业起家。”一名华商指出。“举个例来说，一个家庭中，5个兄弟姐妹会努力集资让其中一人先开业，等他稳定下来后，再扶持另一人创业。以此类推，到最后人人都可以当上老板。”

       亲友之间的互相扶持，往往让华人起步比其他族群快，也更容易成功。

       在西班牙，中餐业仍然是华人的传统行业。上世纪70年代，欧洲其他国家的中餐业正处于饱和状态，于是华人就到西班牙寻找新出路。随着西班牙旅游业的发展，中餐业逐渐走上轨道。在1992年巴塞罗那举行奥运会前后，当地中餐业发展也达到了最高峰。

       目前，西班牙各地中餐馆林立，虽然已经过了高峰期，却仍然有大约3000家之多。其中，大型的中餐馆消费高，对象是消费能力较强的当地人；小型中餐馆迅速增长，让华人打工一族也能够吃到价格廉宜的家乡菜。

       近年来，因中餐馆过多引发恶性竞争，导致生意和名声滑落，许多华人纷纷转行。加上当地政策宽松，华人也慢慢从单一的中餐业，渗入各行各业，其中最火红的行业，非“百元店”和批发业莫属。很多西班牙华商都是靠开百元店起家后成为仓库老板，继而再自设工厂打造自己品牌的产品。

       走在居民住区内，挂有HIPER 100招牌的商店随处可见。店外招牌上虽然都写满了西班牙文，但走进这些摆满商品的店内，迎来的却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这些近六七年前才流行起来的华人“百元店”，店面规模从几十平方公尺到千多平方公尺不等，店内大小商品，多是中国制造，因款式多、价格便宜而卖得火红。

       其实，百元店最早由西班牙人开创，因商品价格大多为100比塞塔（Peseta，西班牙以前使用的货币，折合约0.7欧元）而得名。华人来到西班牙后进口大量中国的廉价货品，导致几乎所有西班牙人的百元店都倒闭或转让给华人。

       从1999年开始在乌兹拉经营百元店的周志波说：“以前只需4万块就可开店了。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比本地商品便宜，因此生意很火红，在竞争下，西班牙人商店就开始倒闭，只剩下规模较大的。”

       不过他表示，现在百元店已到达饱和点，同类型的商店布满了大小城市，利润也减少了。“保守的华人往往抱残守缺，不思创业，看到哪个行业赚钱，就迫不及待跟风，以图分一杯羹，导致竞争激烈，两败俱伤。

  在西班牙人眼中，华人具有一种“起死回生”的力量。那些原先不被当地人看好的边缘地段，或是败落的地区，只要华人驻进就能带来新活力，往往让该区经济腾飞。

       其实，华人选择这些地区作为起点，主要是店面比较便宜，可以减低成本。但他们借着胆识和眼光，遂渐凸显经济影响力，在该地形成华人聚集区。华人服装批发业和工业区，也是这样在近十年内出现。

       巴塞罗那的华人服装街，原是当地人传统的批发地，但从十年前华人大举进军后，很快就几乎占据了所有店铺。如今这里有超过百家华人商店，售卖各类服装、皮包和首饰等，吸引不少西班牙人、法国人和南美洲人光顾。经过几年的蓬勃发展，服装街已扩展到3条主要街道，包括Trafalgar及其他横街如Sant Pere、Sant Pedro等。

       马德里的拉瓦皮埃斯（Lavapiez）服装批发区也是如此。1996年，那里大约只有十来家华人商店。当时该地200平方米的店面和住房只需约23万欧元顶让费。如今此区已延伸到城南的乌兹拉（Usera）地段，周围集合了约500家华人批发商，而且时移势易，地价暴涨，如今同样面积的店铺顶让费高达100万欧元。

       来到马德里郊外的富恩拉夫拉达工业区（Fuenlabrada），看到华人在十年内从小本经营到现在的大型贸易批发，一个个从无到有的故事无不让人惊叹。此区原是当地的传统工业区，自1991年“远东工贸集团”成为第一家进驻此地的华人企业后，至今已有200家大型华人企业。区内华人企业的大型招牌到处可见，还有一条东方街，让人不禁忘了自己身处于一个西方国家！

       华人企业的势力不断扩展，并蔓延到欧洲各国，甚至辐射至非洲和美洲地区。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简称西华联）第五届执行主席刘日辉透露：“富恩拉夫拉达工业区是南欧，乃至全欧洲最大的物流集中中心。华人企业除了批售百货、玩具、服装和首饰之外，还将经营品种也扩展到电动器材、电脑配件、电器等。同时我们还创造了一系列的品牌，丰富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成为西华经济的中流砥柱，也是当地经发展不可少的力量。”

       但是，这批“魔术师”的快速发展却也让西班牙人无所适从，尤其是他们的营销方式和生活习惯，往往“挤”走原驻当地的西班牙商家。例如华人常常连周末也照常营业，引起当地商家的不满。后来政府发出通告，店家一律不得在周末和假日开店，否则就会予以警告罚款，甚至封店。

       更为严重的冲突事件发生在埃尔切（Elche）——西班牙最著名、也是欧洲最大的百年传统鞋城。2000年，以温州鞋为代表的中国产品进入西班牙市场，在几年内快速攻占了埃尔切鞋类批发量的30%。这些鞋子物美价廉，比西班牙本土制造来得便宜，甚受当地民众欢迎，但也对当地制鞋业产生威胁，因此逐渐遭到当地商家的抵制。

2004年9月16日，埃尔切发生了针对当地华人鞋商的暴力行动。有人纵火焚烧华商仓库、销售店和集装箱，并阻拦消防人员灭火。在这起事件中，有17个集装箱的商品被焚毁，造成的损失达100多万欧元。

       “埃尔切大火”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华商的营销模式和西班牙本土模式的冲突。于是一些有远见的华人鞋商开始反思在西班牙的经营之道。2005年，西班牙华人鞋业协会正式成立，带领华商进一步融入当地鞋业市场，并建立健全市场经营法律手续，让华商们依法经营。同时，该会也与当地鞋商加强交流，通过雇佣当地工人及合作经营等方式，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

  移民到西班牙的华人，最初大多数都视自己为淘金一族，日夕奔波劳碌，没有享受可言。

       但日子久了，生活稳定后，西班牙华人也开始学会享受生活。尤其是新一代华人，每逢假日就会去逛街购物、唱歌跳舞，或到赌场去小赌一番，或学当地人去“泡”酒吧聊天。

       而斗牛和足球季节，更是华人和西班牙人一起狂欢的时段。

       退休华人则踊跃参与老年人俱乐部或长青俱乐部，早晨一起到公园去练气功或进行其他健身活动。搓麻将则几乎是全体华人最爱的消遣，但当地人却认为这玩意儿太吵，所以偶尔会提出投诉，甚至报警处理。

       15年前，购屋置业对西班牙华人来说是种奢侈，但随着经济实力提高后，华人开始有能力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屋。不过不少华人还是因贷款利息高，而会把房子分隔六七间小房再分租出去，或作短期的房间出租，以增加收益。

       马德里华人集中的乌兹拉区，早期人烟稀少，冷冷清清，房价租金低廉；但自从开发成唐人街后，华人已在该区购买了超过300套房子，该区大街热闹非凡，成了马德里市内8条主要商业大街之一。

       原来的郊区封都（Fonto），如今已发展成巴塞罗那的华人城。许多华人开始在那里盖起房子，商店也应运而生。初来乍到的新移民或打工仔，多居住在此。在生活环境和条件改善后，这里也成为其他移民群的栖身之所。

       华人安分守已的态度获当地人良好的评价。华人生活最大的忧虑，就是治安问题，尤其是在治安不靖的马德里，华人往往成为抢劫的对象。一些来自南美洲和非洲的移民，知道许多华人是老板，又不习惯把钱存入银行，所以常向华人下手。

       “有些华人性喜炫耀，爱面子又要排场。宁可吃不饱，车子不可不好，说明了华人有钱后都爱买名贵车的作风。华人遭抢、绑架、敲诈勒索的案件频频发生后，才逐渐收敛了爱炫耀的作风。”

* *华人移居西班牙百年来，破天荒第一次走上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为的就是要求政府给予华人一视同仁的保护。1996年，华人移民陈志强在马德里市内遭歹徒抢劫被杀身亡，引起华社震惊。他们始站出来，在街头上大声要求：“中国人需要合法权益，需要人身安全”。*

华社日益壮大，大家在为事业拼搏的同时，也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感到忧虑。1970年代，西班牙的华人社团应运而生。现今，全西班牙共有90个华人社团，主要设立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其中75个由中国大陆移民创立，余者则属台湾移民的团体。

       1983年成立的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和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社团。它是唯一获选为西班牙外国移民组织执委的华人社团，同时也是唯一享受政府每年津贴的组织。该会秉持的“两个维护”方针，即维护华侨华人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华侨华人社会安定团结，也推展到整个欧洲华人社会，为华人社团开启了崭新方向。

       华团为引导整个华社积极融入主流社会，作出了许多努力，也赢得了当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赞许。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3个火车站同时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爆炸事件。翌日，华人社团高举“捍卫生命，反对恐怖”、“反恐怖，要和平”等中西文标语，冒雨走上街头，加入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为正义呼喊。这是唯一一支由外国移民组成的队伍，当时各大西班牙媒体对准了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脸孔，以“中国侨民和我们心连心”、“感谢中国人和西班牙民众在一起”作为标题大事报道。

       1998年西班牙发生水灾，华人团体捐献大量物品和钱财：2004年西班牙一个海滩发生漏油事件。华团更成立清洗队，到该地参与了5天的清洗工作。这些主动融入的成熟表现不仅提升了华人良好的整体形象，也提高了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自觉。

       华人社团也在1980年代开始举办小型的春节庆祝活动，当时只有简单的茶话会。自此以后，春节联欢会就成为西班牙华人不可或缺的活动，从无间断，且规模越来越大。

       2005年的春节，马德里著名的Plaza Mayor广场上出现了一个长16米、宽10米的巨大舞台。大年初一当天，彩旗飞扬，华人和西班牙人都为台上中西艺术家的精彩演出发出热烈喝彩声。这是旅西华人与马德里市政府联合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在当地引起极大的回响和轰动。

       翌年，西华联也在马德里阿雷纳体育馆主办大型的春节联欢晚会。体育馆内红灯笼高挂，数千华人和西班牙人欢聚一堂。精湛的演出和浓烈的节日气氛，让外国人也陶醉在其中。如今，庆祝春节已不单是华人的专利，当地人也踊跃加入表演队伍，投入舞狮舞龙及腰鼓等的演出。

       随着华人新移民不断增长，西班牙华人的宗教团体也日趋壮大和活跃。无论是佛教或基督教团体，都有其独特的凝聚力，人数众多、活动频繁。

       在全国约一万名华人基督教徒中，以来自中国浙江青田和温州的华人为多。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先在巴塞罗那成立，后来延伸至全国各地。目前，主要的城市如马德里和瓦伦西亚都有不少正式的华人基督教会，还有一些家庭式教会。

       1996年8月16日，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佛教徒于同一天成立了佛光会。佛光会每天开放让信徒前往膜拜，是华社中的重要佛教团体。

和其他地方的移民一样，华人来到西班牙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初来异地的他们，连基本的日常交流都困难重重，更谈不上融入主流社会。因此华人第一步就是要学习西班牙文，以奠定创业立足的基础。

西班牙政府和私立语言中心皆有为移民而设立的西班牙语课程，每周数天，但华人常因工作或环境因素放弃学习。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于1984年创办西班牙语学校，协助华人克服这方面的问题。20多年来，从培训出来的学生已有逾万人。

有人打趣说，西班牙人已经非常适应“华人式”的西班牙语，即使发音不准或词句倒转，他们都可以了解，双方的沟通可说越来越顺利。

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不忘根，绝大部分的华人父母都会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学习母语。不少父母也会聘请家庭教师到家中来教授中文。如今全西班牙共有22所中文学校，都是属于周末上课的非正式学校。

这些中文学校当中有具专业规模的，学生达数百人。其中，1995年创立的马德里中文学校有约700名学生，不仅是西班牙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外侨学校，还是全欧洲最具规模的中文学校。该校教学素质高，曾被称为“世界4所华文教育示范学校之一”。

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全球掀起了中文热，许多西班牙人也赶热潮，前来学习中文。为了让华人子弟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学校在课余时间也设有文化班、中国历史地理班、民族乐器班、民族舞蹈班、武术班等，还不时举办节日活动、书法展览等，并让学生到校外参与各项比赛切磋交流。

  超过百家华人批发店的巴塞罗那华人服装街，原是西班牙商家的天地。自十年前华人商家进入后，西商便逐步退出。昔日每年圣诞节彩灯高挂的现象，从此黯然失色，气氛冷清了许多。

       为了重现昔日的光彩，活跃于该区的巴塞罗那华侨华人纺织服装业协会，在2007年圣诞节前带领当地华人商家，筹办圣诞节街灯活动。此举获华商热烈的响应，在短短两天时间内筹获了近3万欧元。久违的“圣诞彩灯”，就这样从该年的11月23日到隔年1月7日，再次亮了起来。

       彩灯不单营造了圣诞气氛，也让当地居民感受到华人主动伸出的友谊之手。贯穿4条街道的彩灯高挂，走在街上的人群，无论是华人或西班牙人，都爱抬头看一看这些灯饰。

       华商说：“由华人出钱来装饰街灯，代表着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一大步。这也是消除华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矛盾的契机。”

只有逾十万名华人的西班牙华社，就拥有至少5家当地出版的中文报章，可见该国的中文媒体发展相当活跃。最早的《华新报》创刊于1994年，目前每逢周三和周六发行。《中国报》、《欧华报》、《侨声报》和《西华报》则属周报，此外，还有葡萄牙的《葡华报》和《同心报》等，种类繁多。有些报纸着重报导区域新闻，有些则把重心放在中国新闻。

       激烈的竞争促使各中文报纸发展至一定的规模和水准。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仅有广告和网上下载新闻的复印中文报纸，西班牙华人无疑是幸福的，因为报纸不但丰富了他们的资讯网络，还可以让他们投稿，成为发挥文采的舞合。

       2002年成立的《欧华报》是唯一获“最佳移民媒体”奖的中文媒体，它在主流社会的影响也让它成为西班牙期刊协会唯一的华人会员。该报于2005年出版了西班牙文报纸El-Mandarin《东方周刊》，以最直接的方式让当地社会更了解华人的动态。“当全世界的华人在办中文报时，我们已开始以海外华人的身份办当地国家语言的报纸了。”该报总编辑辛夷这么说。

       她表示，西文报也可消除西班牙人对华人的一些偏见，让双方走出封闭思维。该报发行量大约一万份，不但会送到首相府、西班牙商会、酒店、大型企业、飞机场等，还有到中国投资的西班牙商家。“我们也聘请了西班牙人专业人士，协助我们寻找当地人的兴趣所在。”

 西班牙华人社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高速发展，令人侧目。

       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华人社会是西班牙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班牙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值得关注的是，这群魔术师还在不断地成长壮大之中，假以时日，他们必将爆发出更大、更非凡的气势。

    法国位于欧洲西部，它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早在18世纪之际，就产生了一批如卢骚与孟德斯鸠启蒙思想家。间接促成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推翻了专制君主，树立了宪法议会民主共和制。

       19世纪初，拿破仑一世（1769－1821）自立为法国皇帝，率领千军万马，铁蹄横扫欧洲大陆，长驱直入莫斯科。法国优秀的文化，随着拿破仑武力的扩张，远播到欧洲各国。19世纪之际，法国建立了强大的舰队，到世界各地掠夺殖民地，与英国互争雄长。

       法国也是现代化的强国。它有高度发展的经济，是一个以工业为主导，农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其重工业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造船业及钢铁业饮誉全球。其他工业如机械、冶金、化工、电子及纺织业，也享有盛名。

       如今的法国是戴高乐于1958年领导建立的第五共和国，其首都巴黎是享誉全球的时尚花都，埃菲尔铁塔就像是它的守护神，伫立在塞纳河畔注视着底下的法国人民。而当地华人社会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洗礼后，已颇具规模，不仅为法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政治影响力也在日渐扩大。

在欧洲大陆，法国是华人最早登陆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18世纪初。

       据载述，最早到达法国的华人是福建莆田人黄嘉略。他于1702年跟随传教士前往法国，曾任法国国王的中文翻译，并娶了法国女子为妻。在法期间，他与法国语言学家合作编写了《法华字典》、《汉语语法》，还曾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共同探讨中国历史、语言、刑法和习俗。

       华人首次大规模到法国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法国与中国的北洋政府达成协议，从中国北方几个省份招募了14万劳工到法国从事战地后勤服务。1918年战争结束时，他们大多数死于战场，幸存者中有的历经千辛万苦返回故乡，但大约有3000人选择留在法国谋生。他们大多住在巴黎火车站附近，从事劳力工作。

       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里，有许多年轻的中国人来到法国留学，毕业后多定居下来安家立业，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有赵无极，程抱一、朱德群、熊秉明，李治华等人。

       早期到法国的华人还有浙江温州，青田人，马赛港口和里昂火车站是他们的聚居地。他们早出晚归，向当地人兜售小皮夹，石雕及装饰品等，开启了华人在法国从事皮革业的历史。

       70年代中叶，法国政府接纳了大约15万名印度支那的华人难民。他们都是来自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柬埔寨和寮国三地，使当时法国华人人数激增。

       80年代开始，以温州人和青田人为主的中国人，纷纷移民至法国。还有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毕业后也留在法国发展，成为新移民。

       上述不同时期来到法国的华人，构成了当前法国华人社会的基本群体。

       说起早期赴法华人，不得不提到作为勤工俭学运动先驱的“留法学生俭学会”。许多曾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留法学生，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中国政治领袖，包括周恩来、陈毅、李富春、李立三，以及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当今法国华人最大的特点是：人数众多且居住集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华人聚居在大巴黎地区，其余散居在马赛（Marseitle）、里昂（Lyon）、里尔（Lille）等大城市。差不多每40个巴黎人中，就有一个华人。

       法国华人主要有两大群体，即各占40%的印度支那华人和中国大陆新移民，其中温州人又占了中国大陆移民的70%；港澳台移民很少。

       印度支那华人由于拥有法国文化背景，熟悉法语，容易融入主流社会，他们绝大多数已入籍。中国大陆新移民虽受制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但仍凭着拼搏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在法国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法国华人社会较成熟和活跃，全国共有约100多个大大小小的社团，活动频繁。除了百余家由各个机构开办的中文学习班，媒体也是丰富多彩，至少有3家中文日报以及数十种中文杂志，还有数家中文电子媒体，共同努力塑造一个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大环境。

法国华人有传统的四大经济支柱，分别是皮革业、餐饮业、服装业和杂货业。

       皮革业起步较早，基本上是温州人的天下。他们从中国进口皮革产品，集中在巴黎3区的庙街（Rue du Temple）开店批发，几乎垄断了巴黎皮革市场。1951年，华人最早的皮革批发店“庙街之星批发店”在巴黎开张。介于70年代与80年代间，皮革业逐步发展成法国华人的支柱行业，他们生产销售的中低档皮包，在皮革业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后来市场趋于饱和，竞争的激烈导致利润下降，而且在法国长大的新一代无意子承父业，后继无人，皮革业便慢慢失去其往日的光辉，但在目前法国华人的经济结构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餐饮业则是大部分华人谋生的工具，也是发展最为蓬勃的行业。在法国人的脑海里，想到华人就会想到中餐馆。巴黎的中餐馆遍布大街小巷，数量超过8000家，规模大小不一，内外装饰一般都具有东方色彩。从久负盛名的潮州菜、粤菜、川菜、温州菜，到具有东南亚特色的菜肴，各种风味俱全。在印度支那华人居多的巴黎13区，中餐馆更是鳞次栉比，处处可见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

       美味的中餐征服了法国人的味蕾，每到午餐时间，中餐馆内都会看到许多当地人半生不熟地拿着筷子在进餐。许多高档的中餐馆，更是法国人招待贵宾的好所在。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就曾说过，由华人林东岩在1986年创办的“牛车水饮食中心”，是他最爱的中餐馆。可见中餐饮食文化早已渗入法国主流社会。

       入乡随俗，法国的中餐已经融入了很多当地元素。譬如，菜式虽以中餐为主，但味道却更像当地的西餐，更加入了饭前喝开胃酒、用餐饮葡萄酒和餐后吃甜点或喝咖啡的法国餐“程序”。

       巴黎的服装业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拥有“服装王国”之称，但法国华人服装业发展较晚，最早的可追溯到80年代，还是属于新兴行业。开始的时候，华人仅有少数规模较小的作坊，自己裁剪、自行销售。但十年后，随着大批涌入法国的温州人进军服装批发业，该行业迅速崛起。

       温州人看准时机，从中国大量进口成衣，或直接在中国大陆设厂生产，再把服装运到法国来销售。他们开始以批发女装为主，主要集中在巴黎11区开店。后来慢慢扩展到更多地区，如巴黎12区和拥有700多家鞋子、服装批发店铺的北部欧拜赫维里耶市。11区多条街的服装批发店，尽管几乎都是由华人在经营，却很难在这里找到中文招牌。一名店主解释说：“我们主要是和欧洲人交易，以法文或英文较方便，没必要写中文。”在这里，每天都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商人甚至非洲商人，慕名来此进货。

       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保障行业健康发展。1999年9月19日，法国华人服装业总商会应运而生。共有167家服装批发店成为会员，从业者平均年龄还不到35岁，充满活力干劲。

 杂货业也是华人大展拳脚的领域。目前，华人在法国经营的杂货店，已有1000家左右。华人聚集区的杂货业，通常经营亚洲蔬菜、水果、罐头食品、干粮、肉类冷冻食品及日常消费的轻工产品等。在非华人区则以供应西式食品为主，兼卖亚洲熟食。

       有的杂货业主也投资经营超市，巴黎第一家专营亚洲产品的超级市场——陈氏百货商场和郑辉创办的巴黎士多商场，主营亚洲食品，货品应有尽有，已成为法国社会家喻户晓的品牌。

       近年来，法国华人因人口不断增加而迅速拓展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开始走出传统的餐饮、制衣和皮件等劳力密集型的行业，向外贸、金融、保险、旅游、电子科技、电脑、房产等多元行业发展。还有许多以华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旅游、翻译、小吃店、美容理发、中医诊所、装修材料、录影书店等，以及各专业行业也遍布着华人的身影。

       华人经营生意的范围虽然更加宽泛，涉及的民生领域越来越多，但一开始这些事业大多数都是为华人服务。不过，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百货公司、酒楼和批发贸易等，逐步超越了最初只在族群内部交流的局限，转型兼顾内外向经济，成为组成法国经济的部分。

       有些华商更将目光转向法国人的行业，进军充满法国特色的烟草店和咖啡酒吧生意。这些在法国已是成熟的行业，收入相对稳定，而且营运费不高，对华人来说有莫大的吸引力。

       随着中国国内的经济起飞，也有许多法国华商改变了经营模式，保留法国境内生意的同时，也回到中国寻求投资。

       在一般人印象中，法国华人都是老板。但据调查显示，仅有约5%的华人经营生意，其余都是靠给别人打工谋生。打工的华人平均月入在1200欧元左右，但巴黎物价高昂，在郊区租个蜗居的小房就要月租350欧元，床位也要120欧元，即使非常节省，每月也至少要消费600至800欧元才能满足基本生存所需。没有合法居留证的华人薪水更低。

       而土生土长的华人子弟，受过高等教育，对父辈经营的餐饮业不感兴趣。律师、医生、电脑从业员、工程师、市场经理、房地产经纪人等职业，才是他们的首选。他们的崛起，展现了法国年轻华人的新形象。

* *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华人高行健，就是一位法籍作家，祖籍中国江苏泰州。他曾于1992年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2002年2月25日又获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亲自颁发的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法国人喜欢用3个谐音字 Métro、Boulot、Dodo 俗语来形容自己一天单调劳碌的生活，意思是搭车、工作和睡觉。在法国的华人，也爱套用这3个字来描述他们的生活三部曲。不过，如此单调的生活，只适用于老一辈以前的日子。从早期移民到今天，世代不同的法国华人，表现了不同的工作态度与生活方式。

       第一代来法国的华人，每天埋头苦干，希望能闯出一番事业，对他们而言，娱乐只是一种奢望。第二代华人虽也同样以经商为多，不过他们享有父辈的余荫，不必重复上一辈艰苦创业的旧路，可以腾出更多空闲时间。他们在当地受教育，法语说得好，容易融入法国主流社会。而第三代华人则更视自己为法国人，注重生活享受，喜欢结交外国朋友。他们在家庭、婚姻和伦理道德等的社会层面接受了西方平等自由的基本价值，不过也保留了部分中华传统文化。

       老一辈的华人退休后一般都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社团会所是他们消遣的好去处，约上三五好友，一起下棋、阅报、唱歌、喝茶聊天、收看家乡电视节目等，日子过得也很充实。一些来自东南亚的潮州籍老华人，已届古稀之年，但仍不愿意放弃家乡的传统爱好，拉上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组成潮州华乐团，三五成群兴致勃勃一起演奏潮州音乐。这些在家乡有“街头演奏家”之称的老华人在法国一样受欢，自娱自乐之余，也常受邀演出。

       而年轻一代华人则和法国人一样，喜欢到酒吧或咖啡座消磨时间。也有不少人会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体育活动，踢足球、打乒乓球、篮球和高尔夫球等。法国政府对民间的体育发展一向高度重视，几乎每个社区都设有篮球场、足球场和游泳池等公共设施，大大丰富了华人体育锻炼的选择。

  武术也是许多华人用来强身健体的运动，许多两鬓斑白的华人从小就养成了打太极拳的习惯，旅居法国后也每天坚持到公园或体育场练习，风雨无阻。每天清晨，巴黎的卢森堡公园、13区、19区和3区公园，都可看见华人和法国人聚在一起练习中国武术，成为这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许多久居法国的华人对生活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最明显的是，他们不再终年辛苦劳碌地忙着挣钱，开始重视生活的享受。对法国人来说，8月夏季出外度假是最隆重的事，就连总统和总理都不例外。华人也入乡随俗，在这度假的季节，放下手头的生意，出远门休长假，让疲惫的身心得以松懈。因此最近几年的8月份，常出现华人全家大规模休假的现象，唐人街的人流也比往年少了很多。

       假期到中国旅游也是这些法国华人家庭的新时尚。有人带着在法国出生的子女回到中国家乡寻根，让子女亲身体验中华文化和习俗，体现了华人重视家庭和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的一面。

       时移境迁，久居法国的华人深深体会到，为了生存与发展，就必须积极参政，以吐露华人的心声，争取应有的权益。1981年，法籍华人成之凡曾宣布竞选法国总统。她是法国，也是欧洲第一位竞选总统的华人。此后，1988年和1995年成之凡又两度参加法国总统竞选，引起全球华人极大关注。虽然三度角逐总统宝座未成，但她为华人树立了榜样，鼓舞了华人参与政治的勇气。

       2001年的法国市政选举，出现了两位华人副市长，而且都在塞纳马恩省。中国留学生何英被选为碧西市副市长；从寮国移民到法国的颜如玉，则当选艾斯玻利市副市长。他们的当选，极大地激励了华人参政议政的热情。在2008年各市镇选举中，来自柬埔寨的陈文雄，不负众望，当选为巴黎市13区的副区长，主管经济发展事务。这是巴黎市首次诞生华人副区长，消息传来，华社甚为振奋。

       目前，约18万拥有投票权的华人群体仍在不断壮大中，无论是谁，欲投身大选和问鼎总统宝座，华人的选票都是竞选者不容忽视的。

* *上世纪50年代法国人离开后，越南人用法国面包（French Baguette），再结合当地特色扎肉、腌制萝卜丝和一些香叶制成馅料，创造出一种新式三文治。70年代，移民到法国的越南华人把此具有越法混合特色的三文治发扬光大，如今成了法国非常流行的便当食品。*

 在法国，华人传统节庆普遍受到重视。

       最隆重的是春节。每逢农历新春，应景的腊梅、迎春花、贺岁条幅等，都会把唐街妆扮得喜气洋洋，每个华人的脸上也都绽放着喜悦的神采。除夕夜，华人仍保留着合家团聚、吃年夜饭和守岁的习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则是法国华人过年的一道精神大餐。

       春节期间的彩妆大游行更是万人翘首期盼的重头戏。法国华裔互助会自1989年开始组织两年一次的花灯游行活动，后来渐受华人和法国社会欢迎，遂在1997年改为一年一次，并改称春节华人嘉年华会。如今，游行规模日益壮大，有京剧、武术、高跷、腰鼓和秧歌表演等，让散发浓郁中华气息的“盛装秀”在巴黎街头上演，向法国人展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项活动由华人出钱出力自费承办，秉承着坚守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理念，不遗余力地坚持了20年。

       法国华人更于2004年，把春节大游行破天荒地移师到巴黎最著名的香榭丽舍（Avenue des Champs Elysees）大街上。这是巴黎市政府第一次允许外籍侨民在“法国第一大道”举办节庆大游行活动，足见华人和春节在法国的地位。那场史无前例的盛事，吸引了近100万民众参加，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不仅是华人，连法国总统、政要们都很重视春节。除了通过当地权威的中文报向华人拜年，上至总统府、国民议会、参议院、移民事务部，下到各市政府和区政府，也都会纷纷举行春节招待会，与华人共庆佳节。法国邮政局还会在春节期间发行华人生肖邮票，首次发行的是2005年的鸡年邮票。除了春节，其他传统节庆也受到法国华人社会的重视。譬如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除了有登高、赏菊的习俗，法国华社还特定此日为法国华人老人节。从1986年起，每逢节日来临，华人社会都会举行盛大的敬老活动，以发扬尊老敬贤的中华传统美德

       清明节，法国华人除保持扫墓的习俗外，也进行集体公祭活动。1986年，在法国华裔社会福利敬老服务中心墓地组的筹划下，数千华人在巴黎南郊的芝耶市立公共坟场举行了首次公祭仪式，主要是拜祭印度支那地区的华人祖先，此后每年清明时节都有举办。公祭按中国传统礼仪进行，先恭读祭文及先人名单，再由高僧及多位居士诵念祝祷经文，新求普渡众生。然后由罗马教廷驻法国主教使节，用法语主持天主教弥撒祭典仪式和祈祷。集体公祭后各人再分头去为自己的先人扫墓。

       此外，每到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华人社团都会主办应节庆典和活动，当地华人和一些华人留学生都会欢聚一堂，十分热闹。

       法国华人虽身在异国，但仍坚守着中华文化的传承，他们的这份毅力和执着，令人敬仰。

   法国实行严格政教分离政策，是一块宗教信仰自由的土地，世界主要宗教在这里都有不少信徒。信仰自由，让华人在这里自在的解放心灵，也让他们更容易融入法国社会。

       一般来说，印度支那华人由于受到中国文化传统和东南亚文化双重影响，大多会加入佛教和道教组织；而中国大陆新移民则信仰不同的宗教，尽管他们许多人原本在中国时是无神论者。

       全法国共有60万名佛教徒，其中大部分是华人。他们基本上都会在家里或商店内供奉佛像或神像。许多华人社团还有馆庙一体的传统，即会所本身也设有佛堂或神坛，如法国潮州会馆。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有些佛堂和神坛还会有诵经和免费的素餐招待善男信女，每到华人新年，更是人潮汹涌。

       许多佛堂内除供奉释迦牟尼佛陀外，还有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十八罗汉像等。佛光山巴黎道场内甚至还设有中文图书馆，主要出租和售卖与佛教有关的书籍。1989年1月29日，巴黎观音菩萨玄武山佛祖神庙揭幕，在这座相信是巴黎市区内最早的庙宇里，供奉着守护财富的北极真武玄天上帝，至今仍香火鼎盛，吸引众多信徒前往膜拜。

       天主教是法国最主要的宗教，华人信徒有日趋增加的趋势。第一间华人天主教堂是于2005年在巴黎13区正式启用的“中华圣母堂”。当时由安德烈·温特鲁瓦大主教主持，仪式同时使用了华语和法语。大主教用画笔为华人传统的醒狮点睛祝福，随后燃放鞭炮以示庆祝，显示了天主教仪式也注入了中华文化元素。

       信仰基督教的华人也不少，早在40年前华人就已在巴黎3区建立了华人基督教会。为了方便不懂法语或普通话的华人移民，巴黎美丽城的温州教会，用的是温州方言传教。

       华人教会一般除了组织信徒礼拜和传教外，也举办中文学习班、歌唱班、法语班、艺术班等活动，有的甚至还会提供移民方面的服务。

70年代前，法国中文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当地出生的华人耳濡目染的全是法国文化。当时，尽管老一辈坚持在家庭中说华语，但依然改变不了新生代对华文的漠视。有些家长甚至还特别请了家教，帮孩子补习华语。直到东南亚华人大量移入后，以中文教育来保存文化的意识才日渐提高。各华人社团开始把办中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作为重要使命，纷纷开办学习班。

       十年之内，先后有50所中文学校诞生。至今，全国有近百个社团办有中文班，对华人子弟仅收取象征式费用。

       遗憾的是，法国目前尚未出现全日制的中文学校，如今的中文班和中文学校都是补习性质，只能是见缝插针地利用法国学校假日和学生上课以外的时间上课。这些学校也开设书画琴棋、舞蹈武术班等，以便让孩子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有的还组织夏令营到中国观光旅游，让孩子直接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

       在华社的努力和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中文在法国越来越吃香。目前，超过90%的新一代华人都会讲华语，在家里也多数以华语沟通，就连许多法国人也对中文产生了浓厚兴趣。现在，巴黎许多政府中小学都开设了中文班，开办中文系的法国大学也在不断增加。据说，法国还是欧洲报考汉语水平考试人数最多的国家。政府对中文教育的重视，更大大激发了新一代华人学习母语的热情。

       法国中文教育的发展生机勃勃，学校虽越办越多，但还是几乎期期爆满，且每期都有慕名而来的非华裔学生。2005年成立的法国华文教育协会，进一步加强了各华校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法国华文媒体则是一片欣欣向荣。从早期留法学生成为华文媒体的先驱开始，到如今，巴黎已成为欧洲华文媒体的“心脏”。全欧最大的两份华文日报《欧洲时报》（1983年）和《欧洲日报》（1982年）均创刊于此。分支机构遍布全欧洲的欧洲华文传媒协会，也把常务秘书处设在包黎，此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

       目前，法国的中文媒体一方面争取与当地主流媒体合作，如《欧洲时报》和法国《巴黎竞赛周刊》联手出版法语版的《中国特刊》，同时又加强与中国大陆媒体的互动，如《欧洲时报》和中国上海《新民晚报》共同打道的《欧洲联合周报》，更开拓了华文媒体广阔的发展空间。

       此外，当地除了能收看到香港的凤凰卫视台外，由当地华商所创立的陈氏传媒公司，还在2006年把中国中央四台带到了法国，再从法国辐射到周边国家，大大丰富了欧洲华人的娱乐资讯生活。

留学生也设立了许多华人论坛，进一步丰富了法国华人获取资讯的渠道。

* *1907年李石曾创办的《新世纪》，可能是法国最早的华文刊物。而在法国留学期间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曾于1922年编辑过一本名为《少年》的月刊，后改名为《赤光》。*

 法国的华人团体大大小小近百个，主要集中在巴黎。其中，成立于1949年的旅法华侨工商互助会（现改名为法国华侨华人会），是法国最早成立的华人团体，也是最有凝聚力的华人之家。

       华人社团无论大小，都以各种方式来保存和宣扬中华文化，它们在法国展开了一连串的华人传统节庆活动，邀请当地人包括政要出席，不遗余力地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

       除了各社团每年合力举办的春节大游行外，还有近年来在中国城举办的元宵节活动等，都显示了社团传承中华文化的意愿。他们也积极参与法国人举办的文化活动，竭力让法国人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华人社团也起着团结族群、引导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作用。1987年10月，一本名为《黄色黑手党在法国》（La Mafia Jaune en France）的法文小说出版。书中把华人描写成走私贩毒和杀人不眨眼的黑帮，唐人街更是藏污纳垢、神秘危险的街区。为维护华人的尊严和形象，法国潮州会馆与陈氏公司联名把该小说作者控上法庭，最后获得胜诉，法院裁定将该书全部收回，不许出售。此事在华人社群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也直接促成了华人融入法国促进会的成立，积极维护华人权益和协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华人社团近年来也进一步加强与主流社会的联系，使当地人更加了解华裔族群的优秀品质和文化传统。许多华人社团在公开场合，呼吁法籍华人积极参加选举，以从根本上提升法国华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

巴黎的唐人街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形成的，主要有巴黎13区、3区和4区唐人街，后来崛起的有19区、11区以及中国城，被认为是全欧洲最大的华埠。

       但这里所说的“唐人街”，其地位并没有受当地政府承认。这些唐人街没有充满中国色彩的牌坊和入口，街区的街名也全都是法文，仅仅是因为华人比较集中，以及布满了各类华人商店，于是有了“唐人街”的称谓。

       走在这里，在繁忙街道上穿梭的多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放眼望去，街道两边的商店挂满了方块字的招牌，耳朵听见的则是华语和各地方言乡音，让人误以为自己还生活在中国。

       13区的华人主要来自东南亚，街区具有浓厚的东南亚特色。80年代初陈氏百货商场在此开设，带动了大大小小的华人店铺竞相效尤，13区唐人街因而开始扬名，被誉为塞纳河畔的香港。

       3区、4区则是温州人和青田人的天下，其他省籍华人难以插足。19区美丽城则是13区饱和后形成的又一个唐人街，也是东南亚华人和温州、青田华人混合居住的街区。11区近年又有以温州人为主的成百家服装批发店冒起，也被视为唐人街的一部分。

       此外，巴黎东南面的安富市有个于1992年建成的中国（商业）城，面积4万2000平方公尺。这是一个集休闲、旅游、购物、展览于一炉的大型中国风格建筑群，曾举办过故宫珍宝展，是中西文化和经济贸易交流的重要窗口。后来因连年亏损和经营权问题，逐渐失去昔日的耀眼光芒，目前仅剩下少数商店和酒楼在营业。

       生活在唐人街的华人是幸运的，基本上都能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清晨醒来即可以享用传统早点，如粥、油条、包子、饺子和烫面，还有越南、泰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等风味美食。中文报纸和书刊也随手可得。华商的超级市场里的商品都有法文和中文标签，工作人员也同样是华人，生活非常方便。

       有人说，华人在法国生活一辈子都可以不用学法语。的确，只要你在唐人街生活，就不会遇上多大麻烦。

  这是一片富饶、民主、自由的土地，华人来此逾百年，已深深地爱上了它。在这里流过了血泪和汗水，最终，他们的付出赢得了主体民族的认同和尊敬，已成为这个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今，他们勇于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领域崭露头角，表现出充分的自信。积极、乐观的法国华人，还努力地传承中华文化，为这个国家的多元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卢森堡是欧洲内陆小国，四周与德国、比利时和法国相接壤。它是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国，200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全球首位。钢铁业、金融业和卫星通讯广播电视业是其三大经济支柱。

       公元前50年，这里曾是高卢人居住的地方；公元400年，日耳曼部族入侵；后经历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和荷兰的统治，直到1890年才彻底脱离荷兰的统治。境内城堡林立，有着“千堡之国”的称号；加上地处西欧要冲，地形险要，一直是西欧重要的军事要塞。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使卢森堡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处。其居民一般会讲4种语言，除了卢森堡语，还能说法语、德语和英语；不少人还懂得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在这里，华人在宁静中安身立命，和当地人一样享受着安定的生活。

 据说，在清末年间，就已有中国移民到达卢森堡，但人数不多。当年，第一个来到卢森堡的华人，有说是瑞士籍的香港人，也有人说是英国籍的沈阳人。

       20世纪50年代，有许多香港华人来到卢森堡。60年代则是比利时籍华人到来的巅峰期。后来中国广东籍、浙江籍华人逐渐移入，使卢森堡华人的地域结构更加广泛。

       卢森堡虽经济发达，不过与毗邻的大国比较起来，它面积小人口少，市场也相对地小，加上生活消费颇高，因此移居该国的华人并不多，且流动性极大。许多华人到了卢森堡之后，因为语言障碍而无法在当地找到好工作，因而再次移居到邻近国家去寻觅更好的机会。

       早期旅居卢森堡的华人，大多数都经营中餐业。老移民说：“欧洲其他国家的中餐业发展十分蓬勃，竞争激烈，希望可以到新的环境去开拓市场，结果发现中餐馆在卢森堡还是有大势发展的余地，所以就到这里来开拓市场。此处虽然市场不大，盈利不多，但养活妻儿还是不成问题。”

       从1975年至1984年间，卢森堡收容了一批以华裔为主的印度支那难民。然而，由于这些难民在卢森堡谋生困难，于是纷纷举家迁居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以谋求更大的发展。仅有少数的华人选择留下，或开设餐馆，或从事劳务工作，或靠政府救济金过活，而这一批人的人数并不超过500人。

       到了90年代，卢森堡推行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中国大陆移民纷纷到来。浙江青田人正是这段时期的移民主力军，约占了移民人口的80%。

       近十年来，卢森堡华人新移民的人数还在持续增加之中。有许多中国人都通过家庭团聚、同乡介绍职业等途径，申请移民到卢森堡来。

       此外，因为金融地位以及经济发展成就不俗，卢森堡也吸引了不少华人精英移居当地，并且从事相关的领域。他们大多是被有关机构委派到该处工作而居留下来。

 目前，卢森堡华人约有2500人，散居在各地，首都卢森堡市是主要聚居地。由于人数不多，华人大都互相认识，但因分散在各个角落，平时各自忙于生计，彼此少有联系，偶尔通过社团或宗教活动才会聚在一起。

       当地华人以青田人最多。1979年，詹冠令成为首名登陆卢森堡的青田人；至今，已有1000多名青田人移居此地。此外，也有部分人是来自温州、上海、北京、昆明等地。台湾人则不多，除了台湾投资厂商驻卢森堡人员及家属外，其余多分散在境内各地经营餐厅；另外，据说还有大约30名台湾女子远嫁到卢森堡来。

  卢森堡是个生活节奏缓慢而平静的国家。在许多新移民的眼中，它显得暮气沉沉，单调乏味。

       “大部分的商店在下午5时或6时后就结束营业，市中心的街道显得冷冷清清。”在卢森堡生活近20年的罗春兰如是说。

       卢森堡的建筑物古老陈旧，现代娱乐设施不多，常让初来乍到的华人，打从心里觉得这里冷冷清清，了无生气。加上华人往往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在工作上，几乎全年无休，生活更显得单调乏味。

       不过，日子久了，华人发现平静而忙碌的生活背后，却也多了一分安逸自在。

       经济发达的卢森堡，每月最低工资为1400欧元，因此华人打工仔月均收入也在这水平之上，贵为老板的更不止于此。虽然华人所领取的薪水一般不比当地人多，但因省吃俭用，华人的生活质量往往比他们来得更好。

       当地人对华人的印象不错，卢森堡政府也给予华人公平的待遇，歧视问题并不存在。华人一般在当地的生活不会面对太大的问题，只要学会法语，便能通行无阻。若碰上了用卢森堡文书写的文件时，也可以求助他人翻译。

       “只要过了语言的难关，生活基本上并没有问题，最难的是要用德语或法语来考驾驶执照。”成为卢森堡媳妇已有15年的金莉表示““华人在当地人的眼中是勤劳刻苦，也是弱势值得同情的一群，尤其是知道华人的语言障碍，本地人都很乐意无私地伸出援手。”她也笑说：“本地人比较难于接受的，应该就是华人说话的嗓门特大，扰人情绪。”

       大多数在卢森堡驻足的华人都相当满足于现在的生活状况，以小生意谋生，不奢望赚大钱或大富大贵，生活显得轻松写意，在辛苦工作之余也开始享受人生。

       由于地理的便利，“出国”成了卢森堡华人家常便饭的事。华人笑说：“卢森堡太小，有时走着走着，一不察觉就会‘出国’了。”

       在卢森堡没有消费的时间或地方，于是最大的消遣，就是到周边国家去游玩。许多华人可以一时兴起，坐一两个小时的火车到时尚之都巴黎去购买名牌服装和皮包，或到幅员辽阔的德国去游玩；又或是为了品尝一顿美味传统的中餐，开车数小时到比利时去大快朵颐。

       华人爱吃中餐的习惯依然不变。华人家庭大多数会在家里做饭，偶尔才到外头去吃西餐。年轻一代华人则非常接受当地的饮食文化和口味，尤其爱吃西餐的牛排和比萨。

       如今卢森堡华人以第一代和第二代为主体。第一代华人的生活较有规律而沉闷，也不会主动接触当地文化，仍眷恋方块字和中国语言，经常从大陆带来中文书籍杂志、中文歌曲和连续剧光碟，或收看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台来消磨时间。而第二代的华人虽然都取了中文名字，但另外还有个外国名字，个性较开朗放任，生活也较多姿多彩。

       目前，当地许多华人家庭还保有三代同堂的传统思想，把父母从中国接过来，方便照顾。不过，也有一些第二代华人，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年届18岁后就搬出去独立生活。

       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的现象并不普遍，通常都是卢森堡男子到中国工作结识中国女子，成婚后带回来；反而是当地的华人女性嫁给卢森堡人的例子较少。一般传统华人家庭并不鼓励异族通婚，家长们为了物色子女的婚姻对象，甚至会带孩子回到中国去相亲。

       虽然华人在这里的生活安逸，但他们都不急于申请入籍。目前仅有约20%华人入籍。

       根据法律，只要在卢森堡拥有居留证十年后，即可申请入籍。然而，大部分年龄介于40至50岁的中国移民，对孕育自己成长的祖国，仍保有浓厚的情感。即使生活在遥远的欧洲，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回中国去探亲，因此也就保留国籍，以方便出入境。

在当地人眼中，卢森堡华人的事业就等同于餐饮业——这里有超过90%的华人在餐饮领域打拼。

       华人在全国各地开设餐馆，大多以中餐为主，也有一部分经营东南亚餐、日本餐和韩国餐等。华人餐馆的数量虽多，但大部分以独资方式经营，规模小且发展较其他地区缓慢，在卢森堡只是一股微小的经济势力，在整个强大的国家经济上可说微不足道。

       华人初到卢森堡，因为没有特别技术也语言不通，加上开餐馆的资本不是很，税务又可以缴得少，就大多进军传统的中餐行业。后到的新移民眼看中餐业的收益稳定，也随着老移民的步伐同样跻身此行业。

       近年来，随着卢森堡华人新移民的迅速增长，中餐业发展迅猛，目前已经有200多家中餐馆，而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在巅峰时期，有人甚至夸张地形容，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中餐馆开张。规模较大的中餐馆有孔夫子酒家、翠园酒家、丽晶酒家、帝苑酒家、北京酒家等，最大的可同时容纳百人用餐。

       由于烹调技术高明、口味鲜美、价格大众化等优势，中餐深受卢森堡人民的喜爱。卢森堡人已从偶尔光顾中餐馆，到现在每周必吃一两次中餐，享受丰富的中华饮食文化。不过业者表示：“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必然会做些调整。中午还特别设了自由餐，让外国人享有一顿廉价、实惠而丰富的午餐。”

       这里中餐馆最大的特色，就是环境布置充满中华文化特色。有的在大厅里摆放古色古香的方桌漆凳、挂上大红灯笼；有的墙上画着龙凤图案或水墨画；有的播放江南丝竹之类的古典音乐或中文歌曲，营造出充满东方气息的环境氛围。

       此外，业者也会让侍者穿着旗袍或唐装，以华语和当地语迎宾。

              除了中餐馆，卢森堡还有3家由华人经营的商场，即东方贸易商店、新世界超级市场以及亚洲超级市场。这些商场的顾客以外国人为主，产品多是亚洲商品，有进口自泰国、韩国等的货品，也有从法国和比利时进口的商品。

       另外，卢森堡还有若干台湾商人开设的代理商店，代销毛毯、体育运动器材、衣饰、德国精密度量衡、电脑仪器科技产品、电器等。

       此外，也有部分华人开始为华人行业找其他出口，期望可以从传统的餐饮业转型到更多元发展。而在卢森堡成长的第二代华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大多都没有继承父亲的餐饮业，而闯入专业领域当“白领一族”，如在银行、房产中介所或政府机构等上班。

 无论是华人或是当地人的节日，都是餐饮业者最忙碌的日子。当地人会趁着节日，到餐馆去和家人聚餐庆祝，这对于大多数开餐馆的华人而言，是赚钱的好时机。华人只能在照常营业的同时，和外国人一起度过这些中西节日。

       以圣诞节为例，华人餐馆会用尽心思推出圣诞节套餐，烹煮佳节必吃的传统食物，店内的圣诞装饰也别出心裁，与当地人一起欢庆节日。

       即使是最重要的春节，华人不会放过这生意火红的时机，仅有少数的华人会关门休业。卢森堡人喜欢在春节期间，到中餐馆去感受华人过年的热闹气氛。餐馆业者会预先把中国大陆的春节庆典电视节目录制下来，然后在大年初一当天晚上播出，并带动大家投入欢愉的节庆气氛里，因此轻易地吸引一大批顾客。

       春节期间，华人也会在收工后的晚间，出来搞活动，串串门子。新年的团圆聚餐肯定少不了，吃年糕、互相拜年讨红包的习俗也依然盛行。一些华人平时还会自己腌制卤制品，以在春节时馈赠亲友。

       华人社团和中国大使馆也会趁着传统节日，包括春节、中秋节等，举办各种活动来庆祝，使当地的华人能聚集一堂。有的庆典还专门邀请中国的文艺团体前来表演，非常隆重。

       卢森堡华人一年内要过3个“清明节”。除了农历四月初五的传统清明节，以及先人的忌日，华人也会在11月1日洋人清明节这天去扫墓拜祭。墓园内禁止烧金银冥纸，所以华人拜祭时只是打扫墓地和献花。

       卢森堡当地没有任何的佛寺或庙宇。华人也很少在家里摆设佛像或神像祭祀，只有一些来自印度支那的华人，尤其是越南华人，则会在店铺内供奉佛像，祈求生意兴隆。

  源自台湾佛教团体的法鼓山，在卢森堡华人家中设有联络处，免费派送台湾出版的《法鼓》月刊。同时也有一样笃信佛教的华人不定期在联络人家里进行禅修并弘扬佛法，近期他们正筹备组织法鼓山卢森堡分会。

       目前，卢森堡唯一的华人宗教组织，是于1991年成立的卢森堡华人基督教会。

       其实早在80年代，少数移居卢森堡的香港人，就已开始举办粤语崇拜，并经常举行查经和祈祷班。该项聚会在1984年开始，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有超过100名教友参与。随着新教友以中国大陆人为主，聚会上也改用华语布道。

       教会成立的初期没有固定场所，后来，由英国基督教会租下一个场地，并慷慨与华人基督教会等4个教会共用。华人教会也在近几年内筹获款项，耗资50多万欧元购买了一处600平方米的房屋，改建为活动场所。

       华人教会在当地相当活跃，也是华人的聚会地点之一。曾有大约200名华人在该会接受洗礼仪式。除了每逢星期六下午的聚会，教友们也会趁星期五休业之便，在星期四收工后有午夜聚会。教会开办开放式的康乐中心、老人中心以及中文学习班，也有意举办烹饪、电脑和法语课程等。在服务华人方面，该会还计划让年轻教友辅导小孩子做功课，以及提供为华人翻译信件的服务。

       教会牧师刘克强雄心勃勃地说：“这里给华人休闲的地方太少了，教会会在下午时段开放场所办活动，让各年龄层的华人有个健康的消遣场所。另外，华人人口逐渐老化，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可成立老人中心，让老一辈的华人在异乡都不会感到寂寞。”

 卢森堡华人子弟都依据政府的法律规定，从年满6岁开始接受当地9年的义务教育。当地学校都是以法语和德语教学，另外也要学习英语，以及平时会话用的卢森堡语。

       纵使卢森堡当地的语言已够多样化，但大多华人依然坚持要他们的孩子学习华语。因此在当地受教育的新生代，拥有非常强的语言能力，一般都能说上几种语言。

       1997年，台湾官方在卢森堡曾开办首间周末中文学习班，后来由林丽娟领导的卢森堡中华文教协会接手管理。但或许来自大陆家庭的华人孩子较难接受以繁体字教学，该校的学生人数逐年减少，最后终在2007年关闭。

       卢森堡——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为了让在卢森堡土生土长的华人孩子有接受中文教育的机会，在2004年开设了卢森堡中国文化学校，乃是目前硕果仅存的中文学校。

       学校在开办初期，面对家长不愿把子女送到学校来学习的困境。后来，校方在上课时间上做出调整，家长们才开始接受，人数快速地增加。刚成立时，该校只有45名学生，到了2007年已增至101名。

       该校校长张意说：“这些年龄从6岁至19岁的学生，我们根据他们不同的中文程度来分班，目前共有5个班级。学校的主要教育对象是华人子弟，希望在海外长大的华人孩子可以更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背景。同时也让他们更容易和父母对话，减少沟通上的问题。”

       近年，在学习中文热潮的影响下，也有外籍家长开始把孩子送到学校来，通过学习中文接触中国文化。

目前，学校的教材由中国大使馆提供，而教师主要是由嫁给卢森堡人的中国妇女，或是在附近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来担任。“学校在各方的支持下发展正常，希望师资更加充足，以便可以开设更多班级，让更多学生受惠。”张意如是说。

       另外，卢森堡——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也发现，到中国旅游在卢森堡已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于是该会推出了“学说几句中国话，中国旅游情趣佳”的活动，利用华人家庭分散的住所，在会员家中举办中文学习班，以方便有意到中国旅游的当地人就近学习中文。学习班除了教导外国学员说一些简单的华语，同时也向他们介绍一些中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和民族风情，活动一推出即获得当地人热烈的响应。

* *卢森堡并没有本土的中文报，但是，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发行全欧洲的《欧洲时报》以及《欧洲日报》。也有华人以邮购的方式长期订阅荷兰、比利时等地的中文报章。2007年9月创刊的《海潮——侨界通讯》，则是卢森堡—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协会所出版的刊物，也是当地华人的第一本刊物，这本季刊主要是为促进当地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创办。*

卢森堡的华人社团不多，当地最大的华人团体，是于2003年成立的卢森堡青田同乡会。目前该会已有超过1000名会员，大部分在卢森堡居住的青田人都是该会会员。

       卢森堡也有另外几个华人同乡会，如杭州同乡会，上海同乡会等，不过有的会员仅有数人，活动也不多，例如轮流到会员的酒家去聚会——这种吃饭聊天的活动更像是一般老友的“见面会”。

       除了地缘组织，卢森堡华人的文艺社团也较为活跃，肩负着散播中华文化的责任。卢森堡中华文教协会自1997年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地推动中华文化活动，曾主办过数次大小型的音乐会，也主催中国传统乐器的教学活动。该会在2008年举办过书法展览会，同时也到附近的国家作巡回展。该会最大的目标，是在卢森堡设立中文图书馆。据说，他们目前已募集一万本书，但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建馆地点。

       2002年正逢卢森堡和中国建交30周年，卢森堡——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应运而生。该会除了服务侨社，还致力促进两国的经济、文化合作交流。该会现有140多名会员，除了本地的华人，也吸纳来自德国、比利时的外国朋友。

       该会立足在此多文化交汇之处，充分发挥会员职业、爱好等特点，举办展览、中餐烹饪班、演奏会等活动，积极将中华文化渗透融入当地人的家庭和生活中，让中国艺术之花在异国他乡生根，在与其他文化碰撞中闪露光芒。

       卢森堡人民热爱艺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艺术更是充满好奇和向往。中华文化在卢森堡深受欢迎，许多华团主办的文化艺术活动都获得当地人的热烈支持。当然，中华文化活动登陆卢森堡向当地人展现魅力的同时，也让在该处生活的华人，沉浸在浓郁的中华气息中，一解思乡之愁。

       各个华团所举办的大型中华文化艺术活动，成功达到了传播文化的效果，在卢森堡掀起了“中华热”。目前，有华人在当地开设书法班、中国画班、华乐教学班等，大部分的学员都是蓝眼睛金头发的当地人。

* *卢森堡的人口主要由移民群体构成，纯卢森堡籍人已经越来越少，因此，当地政府非常照顾移民群体。华人刚到当地时，可到各市政厅开办的语言中心上课，自行选择学习德语、法语或卢森堡语。*

  虽然中餐广受当地人的欢迎，但在人口太少、餐馆太多的情况下，出现了“僧多粥少”的饱和现象。尤其在只有8万人口的卢森堡市里，可说是中餐馆林立。

       这一来，造成同业之间的竞争也相对地激烈。除了菜单上的变化之外，业者还要以削价、送小礼品等的方式来招徕顾客。

       餐饮业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厨师短缺。许多厨师到卢森堡工作，往往累积了资金后都会另起炉灶，自己创业，导致人才快速流失。加上近十年来，卢森堡政府缩紧工作证申请，业者要从中国或国外聘请厨师过来更是难上加难。

       餐饮业者说：“整个欧洲的经济走下坡，同业间的竞争又很大，这行业真的越来越难做，让人忧心忡忡。劳工短缺问题也须及时向政府反映了。”

卢森堡这袖珍小国，虽留不住雄心万丈、想要创一番大事业的华人，却也留住了一群知足常乐、向往平静生活的人们。他们在生活安逸之余，也乐意向当地许多对中华文化心生热爱的卢森堡人，展现自己的文化，带领他们一同探索这悠悠五千年的传统文明。

       华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为这多元文化的小国，注入了一股东方文化的气息，使它散发出更迷人的魅力。

 处在欧洲枢纽位置的比利时，与法国、卢森堡、荷兰和德国为邻，拥有完善的交通和航运系统。这里是全球铁路密度最高，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部高速公路设置路灯的国家。首都布鲁塞尔除了是北约和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同时也驻有近1000个重要国际机构。作为欧洲第二大港口的安特卫普市（Antwerp）是世界最大的钻石加工地，因此享有“钻石之都”的美称。

       历史上，它曾先后沦为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和荷兰的殖民地，1830年才脱离荷兰独立。现在，它是一个南北两半各有自治权的联邦国家，南部法语社区由瓦隆行政区管理，北部荷语社区由佛兰德行政区掌管，东部边疆地区居民以讲德语为主，首都区则三语共存。

       在这个因以族群和语言分区而结构复杂的高度发达国家，华人凸显了中华民族超凡的适应能力，积极融入这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度的同时，也在生活中散发出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

 因地理位置的优越，早在19世纪，就有华人海员及商人抵达比利时，因此，比利时可算是西欧国家当中，中国人较早涉足的国家之一。

       清朝末年，比利时已有中国留学生。根据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卷十中记载，他访问布鲁塞尔时，曾代表清王朝向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致谢，感谢他对中国留学生的优待。

       20世纪初，许多华人陆续到欧洲各大港口当海员，这当然包括欧洲第二大港口安特卫普。当年这些在船上从事劳力工作的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广东省，也有为数不多的浙江人。海员绝大多数是单身男子，有的与当地女子成婚而定居下来；有的则把家乡的亲人带到比利时来谋生。

       一战后，部分赴欧洲参战的华工到比利时来谋求生计。同时期，也有一些商贩从意大利、法国等地长途跋涉到此，靠着挨家挨户售卖纸花和青石制品等维生。据1935年的统计，当地约有500名华人。

       二战期间，比利时受到严重破坏，当地华人谋生艰难，只好转徙他乡。截至1955年，留在当地的华人仅有百多人。在60年代之后，华人人数才开始持续增长。随后的20年里，香港和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大量移入，掀起了较大规模的移民热潮。

       70年代，比利时收容了大约7000名来自东南亚的华人难民，他们多数操广东话和潮州话，聚集在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蒙斯（Mons）等大城市。后来，随着中国的开放，陆续前来比利时投亲靠友的华人也就日益增加。

       到了90年代初，比利时的华人已超过1万5000人，其中约9000人拥有比利时、荷兰或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国籍。老移民说：“这里并非出国的首选落脚地，有些人甚至未听说过这个小国家，只是后来到了热门的移民国后，发现竞争大、谋生难，才辗转来到中餐市场尚未真正开发的比利时。”听说比利时赚钱比较容易，在荷兰的华人就到比利时北部的荷兰语区，法国或意大利的华人到其南部的法语区，而德国的华人就进入其东部的德语区。

       比利时政府在1996年以后调整移民政策，华人移入该国变得困难。目前，靠亲属关系移入的移民，与新一轮较大规模赴比留学潮中的约3000名莘莘学子共同组成了新一代的华人移民群体。他们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比利时打拼，希望可以仿效早期华人中的佼佼者

 比利时现有华人移民3万多人，主要聚居在人口稠密的首都布鲁塞尔和港口城市安特卫普。

       来到安特卫普的唐人街，似乎是走入了香港的某街道，大家都用广东话交谈，也有人在赶往茶楼“饮茶”吃点心。这里以香港人居多，也有不少广东籍东南亚华人。较后形成的布鲁塞尔唐人街，则广东话和普通话皆通用。

       原本以广东籍占多数的华人社会正渐渐起着变化，浙江籍华人人数有后来居上之势。“仅是青田人，保守估计就有一万人。”1985年创办的比利时青田同乡会的会长徐持理这么说。许多浙江青田或温州人从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地转来比利时，主要集中在南部法语区。占总人数约三分之一的香港人，则居住在安特卫普及其周围的荷兰语区城市。

       比利时还有大约5000名绝大多数是广东和潮州籍的越、柬、寮华人、近2000名上海人、台湾人，以及少数的江苏和福建人。另外，中国各省份也有许多留学生慕名到鲁汶大学城深造，当中有不少人毕业后定居下来，或与当地人结婚而在此展开新生活。

       比利时的华人社群规模不大，文化活动也是近几年因新移民不断涌入才逐渐丰富起来的。从30多个社团及宗教组织、5所中文学校、3家中文报纸和一些文化、武术运动中，可看出华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那份坚持。

 比利时是个文化大熔炉，饮食文化自然也非常丰富多彩，首都布鲁塞尔几乎汇聚了世界各地的美食，因而被称为欧洲的美食天堂。

       “比利时人多方位的饮食文化，给华人造就了许许多多的机会。这餐饮业原本就是海外华人的老行当嘛！”开餐馆的早期华人，无不在鼎盛期尝到生意红火的甜头。

       早期来到比利时的华人，几乎都是进入自己熟悉又收益稳定的中餐业。一直到现在，餐饮业仍然是华人的最大经济支柱，超过90%的华人从事此行业。大约2000家的华人餐馆遍布比利时各个城镇，营业额占了该国餐饮业总额的15%。

       第一代来此开餐馆的华人大多数是广东籍，因此中餐以广式菜肴为主。老移民说：“我们都称这种卖广东菜的餐馆叫‘集粹’，也就是‘杂菜’的广东话发音。这是外国人对中餐馆的叫法，久而久之，就成为他们眼中中餐馆的代名词。今天，甚至有一些餐馆的店名就干脆叫‘集粹’”。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华人新移民的增加促使中餐业发展到了巅峰。华人开设的餐馆接近饱和，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业主翻新餐馆打造富丽堂皇的高档餐馆，或是在菜色方面加入新点子；也有的从中餐过渡到泰国餐、越南餐、印尼餐等东南亚美食。

       比利时处在多国之间，许多华人又是从其他国家过来的，因此当地华人所经营的生意也受到了其他地方文化的影响。

       部分资金有限的华人，把英国华人经营的外卖店模式搬到比利时来，不过他们经营的只有中餐外卖店，并不是鱼片和炸薯条的西式套餐。临近荷兰的地方就带着浓浓的“荷兰味”，21世纪初，华人在荷兰餐饮业掀起的WOK餐馆热，很快就在比利时流行起来。

       “荷兰华人的潮流，不一会儿也成为比利时华人的潮流。不过，经营的手法还是得配合不同的区域。北部当然就会像荷兰一样，食物份量给得较多，南部则讲究气氛和吃的艺术，开胃酒和头盘的程序少不了，还要红酒和浪漫氛围的配搭，学足法国。”提到比利时华人餐馆的特色时，业者都会笑说，就是综合了多个邻国的餐饮特色。

       近年，华人最热门的生意，就是开日本餐馆。

       “日本餐的做法简单，利润又高，华人纷纷转做日本料理，以铁板烧为主，一下子开了近200家。”华人说，全比利时的日本餐馆，有90%是华人开的。

       看到什么生意赚钱，华人就会投身当中，可惜经营的规模并不大，因高税收的缘故，他们不愿意扩大生意。餐饮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华人杂货业和进出口贸易，大约有30多家公司主要销售亚洲食品和商品给餐馆和华人家庭。但对批发、贸易行业，华人总会发出无奈的叹息：“市场太小了，进口的小商品始终打不进生活水平高的比利时人圈子。”

       “看来华人也只能在餐饮业中打拼，只是随着时代和需求的改变，做的料理也一变再变而已。”这是有些华人预言自己的族群在比利时的未来发展。

       开餐馆的华人老板，可以说一定也会是亲力亲为的员工。

       “这里的税收高，福利又好，请一个员工除了支付工资外，还要缴付差不多同样数额的税给政府，加上其他保险福利，聘请一人做事等于要付3个人的钱。比如说洗碗员工一个月薪水100欧元，可是最后要缴付的钱，连工资加税务可能得多两倍。”老板心痛地说，最好还是自己担起那份差事，省下这笔庞大开支。有时候，整间餐馆的工作甚至就是“全家上阵”，丈夫掌厨，妻子跑堂收钱，子女负责端菜。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有18小时都是在餐馆里干活。以前没有现成品，鸭子得自己卤，春卷皮得自己搓粉，一切都是靠双手建立起来的。”来自台湾的比利时华侨餐业同业会会长华学珍，娓娓道出身心俱疲的过去。

       比利时华人餐馆还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一定要为员工准备住宿。因此，大多数的老板都干脆把餐馆楼房买下来，把楼上改为自己的住家，同时也是员工的住处。餐馆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华人却不言倦。

       “相比其他欧洲国家，这里的餐馆业还是相当活跃的，生意比较稳定，收入也普遍较高。业主有着殷实的资产，生活条件还是优于其他中产阶级的人。”华人说，这也是为什么开餐馆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创业途径。一些原本没有烹饪技巧和经验的新华人，在凑集从亲友那里借来的款项后，就闯入餐饮业，自己开起店来当老板。

* *蒋华是中国近代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第四名女儿，曾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并于1951年旅居比利时。她和钱秀玲等人为比利时华人教育和融入主流社会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为了提高中餐烹饪技术和管理水平，她在1967年成立比利时华侨餐业公会，并常常在布鲁塞尔开展中餐联谊活动，其产品曾在“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奖。她的先生魏需卜是“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魏宸组的儿子，两人可说都是名门之后。他们的长子魏崇明则在家族的熏陶之下，也成为了比利时高级外交官，出任比利时驻韩国大使，为当地华人增光。*
* *大多数华人都是开餐馆的老板。由于各自的打烊时间不同，所以在比利时举办的结婚喜宴都采取分批制，粤语称为“流水席”。酒席一般从下午5点开始，有的是下午3点，宾客先到先坐，只要坐满两、三桌人就可以开席上菜。吃完的宾客可以先离开，或是到隔壁房打麻将消磨时间。不同时间分批到来的宾客轮流开席，即使到了午夜时分，还是有许多刚刚打烊的餐馆老板到婚礼上去祝贺新人并递上“利是”（红包）。在比利时，一场婚宴可能会闹上12个小时，甚至到隔天凌晨的两三点才结束也不稀奇。*

 虽然华人在比利时各地开店做生意，但华人聚集最多的还是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时间久了，两个城市就逐渐形成了唐人街，被认为是华人经济的动脉。

       现在，这两条唐人街已从最初的华人聚集区，发展成繁华的旅游区和商业中心。它们不单刺激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造福了在唐人街经营生意的华人商家们。“虽说华人在比利时属于中产阶级，但在税收方面却贡献良多，因为一般华人都自己开业做生意，每单交易抽税至少21%。”1997年成立的比利时浙江工商联谊会会长季松然如此说。

       唐人街的异国风情吸引着形形色色的人群，消费群已经从单一的华人群体扩展到当地群众。或许他们是来品尝中餐的美味，也或许是来体验东方文化的韵味。

       安特卫普的唐人街——冯·维森贝克街（Van Wesenbekestraat），在安特卫普官方网站的“购物指南”一栏被推荐为值得一游的地方，也出现在许多旅游手册的重点介绍内，可见它的地位已不仅是华人经济活动的中心，而是整个市区的商业重点与旅游景点。

       唐人街街坊会主席王文生表示，该街处在安特卫普市的心脏地带，靠近火车站，不长的街道两旁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铺林立。除了为数不少的华人餐馆、点心楼外、还有超市、水果蔬菜店、面包店、旅行社、影视商店等，以及别具中华特色的针灸医疗所。这里的饮食业几乎被香港人垄断，有90%的餐馆是他们开的；超市和杂货店则是以苏里南和东南亚华人商家为主。

       “街旁两排约100间的商店70%是华人开的，房屋大概也由华人购买了。这些超过100年历史的古屋身价不菲，主要是因为处在黄金地带。”王文生说。

       以前该处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市集，开餐馆的华人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货。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自苏里南华人移民在此开了第一家售卖华人生活用品的超市后，便吸引了更多不同行业的华商进军该区，慢慢形成了唐人街。目前，唐人街已逐渐延伸至旁边的另外3条街。

       “华人商家曾自行筹款建议在该街兴建中华牌楼，可惜未能获采纳，只好把筹回来的款项买了4只石狮子，分别放在大街的两头。同时也为整条街换上30盏龙柱街灯，为的就是凸显这条街的中华特色。”王文生说。

       后来，该街获欧盟拨款装饰，华人社会再度萌起要在该街建中华牌楼的念头。

       “华人社会雀跃万分，主动筹款约15万欧元从中国天津直接进口建筑材料和聘请工友，更于2006年9月25日举行奠基仪式，可是后来该街的一家比利时人开的面包店反对这项工程，甚至控告了市政府，此计划就因官司还在进行而暂时搁置了，牌楼也一直到现在还未建立起来。”王文生虽表感叹，但即使面对这些波折，他还是非常乐观的。“整个华人社会仍坚信，牌楼始终有建立起来的一天。”

       唐人街除了商业功能外，还是华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小天地。

       这里鳞次栉比的华人商店，为华人解决了生活上的各种需求。走在唐人街上，肯定会碰上熟悉的脸孔，也可用自己熟悉的家乡话来交谈。许多开放给公众的会所、武馆、华人基督教会以及佛光山等，都是华人平日的好去处。

       旅比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伍炳顺笑说：“退休的老华人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到唐人街来报到，除了上茶楼吃点心外，就是到联合会的会址去活动。”1973年成立的联合会，是比利时最早的全国性华人社团组织。该会在安特卫普唐人街附近购买了一栋房子作为会址，星期一至星期五都开放给华人打牌、搓麻将及聊天聚会搞活动等。

       “以前的华人在这边生活苦闷，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最大的消遣就是上咖啡吧去会老友。自从欧洲有了无线中文电视台后，生活才有了娱乐。新一代华人会去参与当地人的活动，如打高尔夫球、保龄球和羽毛球等。老一代因语言不通，人地生疏，只好到这里来寻找自己的天地。”来了逾半世纪的伍炳顺，早已习惯了与唐人街相伴的日子。

       联合会早期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中国大使馆会派专人到会址去为民众办理去中国的签证等事宜，为未能到布鲁塞尔使馆的人开了个方便之门。

       目睹比利时华人社会逐渐老化，彭丽莲在1997年成立了全国唯一的旅比华侨老人中心，旨在为华裔老人提供消遣活动。“以前都是用我的美发美容屋充当临时会址来展开活动，后来发动两次买屋行动，才购得了在唐人街一带适宜的现址。”她雄心勃勃地说，该中心正策划开办中文学习班以及华裔老人住宅区。

       “中心已开办的课程有古典和现代舞蹈班，每3个月就会举办长者生日会，不定期的出国旅游，和其他欧洲老人会交流，以及举办隆重盛大的九月九日敬老日。”彭丽莲也在十年前成立了仙韵乐社，会员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都与来自荷兰的粤曲演奏家一起练习排戏，偶尔还受邀演出。

       走在安特卫普唐人街上，耳边不时会传来粤曲的乐声。

       这里有许多从小就听粤曲长大的香港移民。他们说：“离开故乡后，从唱粤曲中找回了乡土乡情，更体会到了粤曲歌词中的意境，对歌曲中的悲欢离合感同身受，还有对香港的怀念。”因此，一群群粤曲发烧友每个星期都有聚会，或许就在其中一人的家里从中午排唱到晚上，只为了情意和消遣。

       “有了这唐人街，华人的生活才算完整。”这是许多华人的心底话。

* *安特卫普唐人街是华人大本营，也是过年过节最热闹的地方。春节前都会有个露天跳蚤市场专售中华产品，街道上也处处张灯结彩、彩旗飘扬，入口处还挂了大红灯笼和写着“春节快乐”的彩带。春节期间的彩妆游行，更是在唐人街内由比利时人创办的铁牛派功夫汉利武术馆、比利时蔡李佛龙狮团以及比利时中国武术龙狮总会等大展身手的时候。*

比利时是个文明宁静的国家，处处充满温馨。即使华人不是社会的主流，但是他们天性勤俭，安分守已，踏实地工作换来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也得到了当地社会的认同和尊重。无论是走在街上、地铁站还是在商店内，身边的人都会向华人投以亲切的微笑和礼貌的点头。

       “华人都是非常友善的。形容他们只有两个词，勤劳工作和勤奋读书。”一个喜欢中餐的比利时人这样说。

       “东方人以前的观念是手停口停，所以要靠不断地工作来累积财富。可是比利时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生活有保障，尤其在这里接受教育的第二代，更不会为了要有更好的生活而想太多。”华人笑说：“西方人一天工作5至6小时就好，工作压力太大就要罢工了。”

       慢慢地，华人也学会了放慢生活节奏。

       最明显的，是华人也开始放假，开始享受起生活来。“老一辈华人的餐馆以前都是全年无休的，担心几天的关门休息就会少赚很多钱。”来自香港的腾记面店老板文腾这么说。“现在一踏入7月份的暑假，华人之间最常听见的问候语就是：什么时候放假？放多少天？到哪儿去玩？”

       暑假休息，已经不再是当地人的专利，也成为了华人享受天伦之乐的最佳时机。

       除了休假，有些华人甚至和比利时人一样，午餐只是啃面包，然后到了晚上七八点，才是全天最注重的家庭成员相聚的晚餐时间。

       要学习比利时人的风俗人情，还不只这些。“他们热情友好，即使与华人见面，他们也拉手问候，要不然就亲一下面颊，有的还亲上两次甚至3次。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习惯，实在难学。”华人老移民有点难为情地说：“最好他们做什么，就跟着做啰！”接着就笑了起来。如果受邀出席聚会，最好带着小礼物，可以是巧克力、小礼品或是鲜花，但千万别带白菊花，因为那只供放在坟前拜祭之用。

       “在送礼人的面前拆开礼物，对华人而言是不礼貌的行为，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收到礼物后最好当着对方的面马上打开，然后表示喜欢该份礼物。”生活久了的华人，开始习惯东西方观念的不同之处。

       比利时社会比较注意仪表衣着，所以华人平常的打扮也较得体大方。安特卫普妇女会主席谢香兰说：“虽然许多华人妇女都在餐馆帮忙工作，也有的是生意人，但她们一样爱打扮。”有个老华人妇女透露，以前要出席比利时较正式的场合，女性都得穿裙子，所以现在老一辈的华人妇女都习惯了穿裙子上街。

       华人在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尝试摆脱只顾着努力挣钱生存的族群印象，学习着比利时人的生活态度，改变生活方式，积极融进这个和谐的社会中。

  比利时是个多语言的国家，但由于华人是少数民族，中文很难在当地受重视，更别说被列入主流教育的教学中。

       第一代的华人在生活条件转好后，办起了非营利的业余中文教育机构，让下一代有学习母语的机会。

       创办于1965年的旅比华侨中山学校，是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学校。“最初的时候，家长都不愿在周末送孩子来上课。负责人除了开车一家挨一家到中餐馆去载送学生，还特别包好饺子来招待这些学生，可见当年创校的艰难。”校长何敏贞深有感触地说，但是，目前全比利时80%的华人孩子都会到中文学校上课。

       “学校拥有自己的校舍，是由台湾代表处拨款一半，并由华侨餐业公会和台湾乡亲会合力购买的校址，一共开办16班教导约300名学生。虽说是间台湾办的学校，学生群中却有80%来自中国大陆，学习的是注音繁体字。”何敏贞说该校的特点就是在周六和周日，从早上10时10分一直上课至下午3时30分，几乎是全日制的学习班。

       广东人较多的安特卫普市，最早的中文学习班是由华人教会在80年代开办的，通过广东话来解说圣经故事和背经句等，也传授中华传统的思想和价值观。可惜的是中文班于两年前停办了。该市目前的周末中文学校是1994年开办的安城中文学校。

       “刚开始是妇女会聚会时谈到自己子女学习中文的问题，所以妈妈们当起教师来搞中文班。第二年搬到联合会的会址后学生人数暴增至200多人。”校长彭莲考表示，该校全面使用中国广州暨南大学的简体字教材，不过教学语言则分别有普通话和广东话。      “比利时的小学和中学每逢星期三只上半天课至中午12时，中文学校会利用下午这段时间以广东话来授课。周末的时候教授普通话。”

       比利时第一所以简体字、汉语拼音和普通话教学的布鲁塞尔中文学校，是在坚持不懈的筹备了十年后，于1998年创立起来的。比利时青田同乡会无偿提供一栋300多平米的会所作为办校场所，让每年约200多名的莘莘学子受益。该会后来在蒙斯市政府的支持下，还在政府中学设立分校。

       “办学的方针是要让学生识字，他们懂得辨认中文字后自然地就会学习更多。学口语的中文走不远，学生只有认识文字了才会走得更远。”校长陈雅琴坚定地说。

       为了迎合不同语言背景的华人，比利时兼备各种华语教学形式的中文学校。多语并存的国家背景，无形中推动了华人后代的中文语言能力。来自荷语、法语或是德语区的华人聚在一起，都是使用华语这个共同语言来交流。当然，最辛苦的是授课的教师，不但要有一定的中文基础，还要懂得荷兰语、法语，甚至德语，才能和学生沟通及讲解课文。

   1913年出生在江苏宜兴的钱秀玲，于1929年随着哥哥乘坐了一个多月的邮轮，从上海来到比利时留学。她是中国最早到比利时留学的女学生之一，当时年仅16岁，连一句法语都不会说，却在一年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只录取5个名额的鲁汶大学化学系。后来，她在该大学完成化学博士学位，并与年长她4岁的同校青年医生佩令吉成婚，定居当地。

       当年在课堂上是唯一的中国女性已显得突出，但她曾不畏风险在战火中营救人质的精神更为人敬佩。二战时，钱秀玲不顾个人安危，竭力劝说德国将领肯豪森免除近百名比利时人质的死刑，她因此成了比利时人心中的英雄，被誉为中国的“女辛德勒”。战争结束后，比利时政府在1945年颁发国家英雄奖章给她。当地的小镇艾克兴市更是特别将一条街道命名为钱夫人街。比利时的媒体也曾经为她制作过一部记述她勇救人质的专题纪录片。

       今年96岁的她，对于这些往事似乎已非常模糊。“华人！华人！”她偶尔以法语向身边的人这样说。离开中国大半个世纪，或许她最惦记的，就是自己永远是华人的身份。这也是为什么她在二战后，除了在鲁汶大学的实验室工作，还开设了布鲁塞尔第一家中国餐馆“孔夫子酒家”的原因。同时她也与其他华人共同创办了比利时第一家中文学校——旅比华侨中山学校，让更多比利时人认识中华文化，也让当地华人有机会学习中文。

  比利时华人女子常说自己是最辛劳的一群，除了要照顾小孩和打理家庭事务外，还要到餐馆去打工。有许多人甚至是在厨房内掌大厨一职。

       正如她们口中说的“苦命苦干”，这些女将们在比利时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她们于2002年3月12日成立了比利时中华妇女联合会。任该会名誉主席的钱秀玲和蒋华，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代表人物。

       “宗旨是要团结广大的旅比妇女同胞，凝聚力量并加强彼此的联系，活跃侨胞生活。”主席江南英还说，她们也通过开展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协助华人妇女了解比利时的政策、传统和习俗，并帮助她们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逐步融入当地社会。“说到融入主流社会，最值得妇女们自豪的是，比利时历史上第一位华裔议员就是我们女同胞陈安琪。她是华人参政议政的楷模和典范，也改变了华人只经营餐馆的商人形象。”

       妇女会庆祝成立5周年及三八妇女节的晚会上，比利时副首相昂克琳及数位女议员均出席了此活动，体现了她们对华人贡献的高度认可和赞扬。“妇女会的活动不局限于比利时，还曾资助云南120名白内障患者做手术，以及连续4年捐助广西60名失学儿童让他们能够重返学堂。”

       兼顾家庭、事业和社会工作并不容易，但华人妇女还是任劳任怨，忙得不亦乐乎。她们似乎感染了比利时人的乐观态度，任何时候都是予人快乐开朗的感觉。对她们而言，难得的聚会和消遣，或是趁着7月份全国大减价时购买名牌衣物，就是辛苦生活的最佳调剂了。

       她们，总是能够为自己找到开心和满足的泉源。

     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走在这犹如玩具城的欧式红砖建筑之间，非但没有显得格格不入，反而渐渐融入其中，构建出另一种独具特色的风景。

       他们感染了比利时人的单纯思想和乐观态度，在这个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和谐国度里，创造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经典传奇。

  欧洲西部濒临北海的荷兰，是千百年来与海争地的低洼之国。

       荷兰国名“Nether”指的是“低的”，“lands”则意为“土地”。说它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一点也不夸张——它有一半以上的国土低于海面或海拔不到一公尺。而这些环海的陆地上，却住着六成国民。

       自1229年，荷兰境内耸立着逾万座由荷兰人发明用来抽水和提供动力的风车，使它赢得了“风车王国”的美誉。

       沧海变桑田，这个环海开垦的弹丸之国，是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虽仅5%的国民从事农业，其鲜花、蔬菜、奶酪和土豆种子的出口量却居世界第一。它每年培育90亿个鲜花球茎，垄断了全球70%的鲜花市场，是名副其实的“花卉之国”。

       这个国家不屈服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反屡创奇迹，曾以200万人口的国力建立起海上贸易和殖民强国。今天的荷兰，是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难怪有人形容，荷兰是地理上的侏儒，经济上的巨人。

       这被称为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福利完善的国家，有一群飘洋过海而来的华人，在社会各领域洒下辛勤的汗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他们在荷兰正过着安逸的生活。

 从17世纪开始，就已经有华人从中国或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来到荷兰。在欧洲贩卖石雕的浙江青田人，据说也曾于1822年辗转到过荷兰。然而，这些人大都只是短暂逗留的“过客”。

       最早成批移居到荷兰的华人是海员。1911年6月间，一艘在海上行驶了许久的船只终于靠岸，500多位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双脚落在荷兰的土地上，开始了他们的劳力生涯。当年，荷兰的船员工会组织荷兰海员大罢工，由于船务公司不愿接受工会的要求，就从英国伦敦、利物浦等地大量雇用以广东以及客家籍为主的华人，以化解当时的罢工风潮。

       据说，当时船务公司也曾到中国招募海员，许多脑袋后仍然拖着一条长辫子的华人男子，就这样远渡重洋来到了荷兰。除了海员，他们还在码头当搬运工人、消防员或煤炭工人，工作艰苦，却没有得到与当地人相同的酬劳，也明显受到荷兰工人的敌视。一份工会的报章上，甚至还称华人为“一种肮脏、卑贱的人”。

       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Rotterdam）码头一带，就在这个时候形成了唐人区。区里有华人工头开设的“水手馆”供膳宿，但环境十分恶劣。许多华人都是在年轻时来到荷兰，直至终老异域，再也没有回过祖国，谁也不曾想过这是一趟永不复返的旅途。即使很多人在中国经已结婚生子，但后来也都娶了白人女子为妻，其混血后代大部分均留居在卡登德瑞特（Katendrechtse）和阿姆斯特丹市中心。

       20世纪20年代末，碰上世界经济大萧条，在荷兰谋生的华人更是雪上加霜。许多人遭到解雇，因而饥寒交迫。当时，有华人做了一种南方食品——花生糕，在街上叫卖，却出乎意料地大受欢迎。

       仅仅数年间，5分钱的花生糕已经成了荷兰家喻户晓的食品，也让华人因此绝处逢生。据说，在1933年，穿梭在阿姆斯特丹大街小巷卖花生糕的小贩就有逾200人，而其他城市也相继出现这一种行业，甚至还有人谱出一首花生糕之歌。至今，在许多老一辈人的脑海里，还回荡着当年花生糕小贩用不太标准的荷兰语所发出的叫卖声：“Pinda，Pinda，Lekka，Lekka！”（花生糕，花生糕，好味，好味！）

       花生糕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华人艰苦的日子却还没有结束。经济危机过后，有的华人重操旧业当海员，有的则选择返回中国，也有的移居其他国家另谋发展，华人因此日渐减少。不过，花生糕小本生意的成功，也使许多荷兰华人学会自救，尝试投入中餐馆、洗衣以及杂货等行业中。

       自此，华人便从漂泊的海员转变成长期居留的侨民，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安居之路。

       战后，一些原本居住在印尼的华人移居到宗主国荷兰。1965年，印尼政变引发大规模的排华动乱，更多华人纷纷移居荷兰，为荷兰带来了大量的华人移民。这些印尼华人一般已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加上文化和教育水平比较高，很快便成功融入荷兰社会，并成为该国在经济上的活跃力量。

       60年代，大批香港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而来到了荷兰。接着东南亚华人移民也移居过来。嗣后，荷兰在南美洲的殖民地苏里南宣告独立，当地华人鉴于当时的局势不太明朗，纷纷选择到荷兰来定居。进入80年代，中国掀起了新移民浪潮，华人更是大批大批地涌入荷兰。

       荷兰经济发达，社会安定，加上对移民的态度既友好又宽容，因而引来了源源不绝的华人。然而，当地人往往会把失业率和犯罪率的攀升归咎于外来移民，以致政府不得不收紧移民政策。诸多条例限制了华人新移民人数的增长，不过，对于留学和投资移民，荷兰的大门始终还是敞开的。

 根据官方统计，荷兰华人人口约有12万人，而民间却认为有15万人。

       荷兰华人明显可分类为几个群体，其中中国大陆移民占约37%，主要来自广东、福建和浙江温州、青田和福建等地；另外30%华人来自香港，20%为印尼华人，苏里南华人则占6%。他们一半聚居在阿姆斯特丹，30%住在鹿特丹，15%则是住在政府行政中心海牙市（DenHaag）。

       大约经历了四代的荷兰华人社会，目前有四分之一是年轻有为的青年，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无论是在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上，荷兰华人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备受各界赞赏。华人在荷兰的实力日渐加强，春节活动盛况一年胜一年；中餐、方块字、节庆习俗等，也无一不渗入荷兰人的生活中。

       令人欣喜的是，今天荷兰华人受到尊重，与早期受歧视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2004年，政府在法律上承认了华人为荷兰少数民族之一。

华人的传统行业离不开饮食业。不过，荷兰华人的餐馆，却总是可以走出传统中餐的框框。每隔一个时期，这里就会有不同类型的餐馆出现，然后掀起一阵“跟风潮流”。相似的餐馆一家接一家在全国各地冒出，甚至慢慢流传到邻近的国家，进而风靡欧洲。

       华人说：“荷兰人很早就已组织世界上最庞大的商船队，开始海上贸易，可说是全欧洲最精明、最懂营商之道的民族。华人很难跟他们竞争，只好开中餐馆，避免与荷人有利益冲突。”

       但中餐馆多了，就产生激烈竞争。在逆境中，华人开始求变，花样百出。

这家荷兰最大的水上中餐馆——海上皇宫饭店，是阿姆斯特丹市的地标之一。董事长毕嘉裕说，那是父亲毕传有在20年前的创举。

说餐饮业养活了荷兰华人，一点都不为过。在面积不大的国境内，华人竟然开了4000多家中餐馆，占了全国各类餐馆的逾30%，其中，中印（尼）餐馆就有2000家。老一辈的华人，十之八九都从事餐饮业。如今，仍然有超过75%的华人在此行业中求存。

       华人最初开的餐馆，主要面向海员，以家乡菜为主，店面也很简陋。二战后航运业低迷，华人海员纷纷上岸，开中餐馆谋生。那时许多有荷兰籍太太帮忙的中餐馆，可以很轻易地就把正宗的中餐打入当地社会。

       战后印尼的独立，让荷兰中餐开始展现特色。

       当年印尼独立后，几十万荷兰人被迫回国，但他们仍眷恋着印尼餐的味道。嗅觉敏锐的中餐馆老板便将印尼美食纳入菜单，因此有了荷兰独有的“中印餐馆”。

       60年代末到80年代，华人移民激增，中印餐馆猛增数倍。无论是来自香港、东南亚或中国大陆的华人，来到荷兰都想开中印餐馆，哪怕他们一生中都未尝过印尼餐，连食物名字都叫不出来！

       “一板一眼照着煮就是了，这些偏咸的菜肴，也只有老外喜欢吃！”这是许多烹饪过无数次中印餐，却从来不曾亲自尝试的中国厨师的经验之谈。直到如今，荷兰华人独创的中餐和印尼餐结合的“结晶餐”，尤其是杂菜、火肉（俗称Babi Pangang）和芙蓉虾，依然深受荷兰人喜爱。

       到了90年代，随着中印餐馆的饱和，华人转而进攻荷兰人传统快餐店。因所卖的餐点都是以炸土豆（薯条）为主，华人习惯以粤语称它为“薯仔店”。一位快餐店老板指出：“快餐店卖的都是半成品，成本较低，华人改变经营方式，加入印尼餐风味，一炮而红。许多荷兰人的快餐店，就这样转手卖给华人。”迄今，华人经营的薯仔店超过1000家，遍布市中心及郊外地区，几乎包揽下荷兰人一半的生意。

       2000年以后，华人从台湾引进了WOK自助餐，也引起潮流。这种由顾客自行选择新鲜食料，然后到开放式厨房选择酱料，再看着厨师把它们“一锅”煮出来的自助餐，满足了顾客自由选择及卫生的要求，迅速窜红。短短几年内，荷兰就出现了约500家同类型餐厅，较大型的WOK甚至可容纳千人。从荷兰掀起的WOK热潮，还蔓延到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地。

       近来新移民以专业知识分子居多，而那些来自印尼和苏里南来的华人，也因有语言和文化的优势，相对容易地进入白领阶层。如今约3万名的第二代荷兰华人，大多数进入荷兰公司任职，乐得当个高薪人士，不要“餐馆老板”的头衔。

老一辈的华人对此转变也欣然接受，将生意转让给急于想创业的新移民。他们感概万千地说：“经营餐饮业是最吃力的，每天都是‘起五更睡半夜’，赚辛苦钱。如果可以，当然不希望下一代走同样的路，期望他们好好读书，从事一份好的工作，生活舒适。”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之下，荷兰华人的服装和百货批发业并没有蓬勃发展。华人说：“荷兰人的生活水准较高，非常重视商品质量，对中国廉价物品不太有信心，因此批发业难以生存。加上荷兰人做生意精明、很难与他们一较高低。”

 大多开餐馆的荷兰华人，生意火红的时候，往往一干就是15至16小时。所以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就始于午夜时分。

       “大家开的餐馆分布在不同的城市小镇，要见面的话，就唯有打烊后相约到一个城市去聚餐，而饭局也往往只能约在晚上11点之后，到12点才开始吃我们的‘晚餐’。遇到华人的婚宴或是社团开会聚餐，更会闹到凌晨两三点。”

       这种生活方式也导致荷兰华人社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

       “早晨！（粤语发音zóu shěn）”——荷兰华人，无论是来自哪个省份，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句粤语式早安。而且，无论碰面的时间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打招呼的方式，还是一句“zóu shěn”。

       晚上说早安，听在外人的耳里虽觉莫名其妙，但对荷兰华人而言，却是如此亲切自然。

       他们解释说，以前广东人在餐馆收工后见面时，往往都是隔天的凌晨，所以就会说声“早晨”；另外还有个说法是，他们通常睡得迟起得也迟，下午睡醒后逢人就说声“早晨”。其他省份的华人来到时，误以为这是广东话的问候语，于是就将错就错，将这习惯“发扬光大”。

       荷兰华人还有一句说得最多的粤语，就是“饮茶”（yám chǎ，指吃点心）。有人说，要在欧洲享用最正宗、最美味的点心，除了英国之外就数荷兰。饮茶文化已深入每个荷兰华人家庭，即使住在郊区的华人，还是愿意天天舟车劳顿到城内的点心餐馆去饮茶。

       坐在富有中华色彩的中餐馆内，听着粤语交织出来的嘈杂声，再吃着各类正宗的港式点心，会让人有置身在香港的错觉！

       只有走出唐人街，穿梭在运河两旁的古老建筑物之间，看着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才会感受到荷兰的气息。荷兰地势平坦，人人都爱骑自行车。华人来到这人均拥有超过两辆自行车的国度，也会入乡随俗学荷兰人在专用车道上骑自行车。

       荷兰人和华人还有个共通处，就是酷爱足球。当年许多来自香港的年轻人喜欢踢足球，于是不少以餐馆或地区作为名称的业余足球队自发成立，由餐馆老板出钱及担任领队参加比赛。目前，在全荷华人联合体育运动总会的极力推动下，荷兰华人足球队纵横国内外球场，常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足球赛夺标。

       荷兰人坦白直率的个性，也开始在第二代华人身上显现出来。华人说，最受当地人影响的就是不会转弯抹角的说话方式。“在这里，似乎一切欲望都可释放出来，连买大麻和嫖妓都是合法的，还有什么不能说、不能做的呢？不过如此坦率的个性，在其他华人社会里，可能就会遭指责为没礼貌。”

       荷兰是个开放自由的国度，卖淫、吸大麻、安乐死、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等，都是反传统的先例。在这些方面，华人却没想要“积极融入”。

       “这样的花花世界是给游客的，华人生活最真实的写照是，日对炉头，夜对枕头，不然就动动手指头！”当地华人形象地说。

       生活在一个如此自由、发达和高福利的国家，让华人感到舒服、轻松和受尊重。虽然税收高达60%，但还是吸引华人留下。

       “超过一百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和睦生活，即使是黑眼睛黄皮肤，也并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异数。大家都真心接纳彼此，这样的感觉真的很好！”从香港移居到荷兰34年的张尧，道出心中对荷兰的这份感情——这也是许多当地华人的心声。

* *尽管华人到荷兰来已有逾百年的历史，他们不但始终无法改变“中餐胃”，还把中华饮食文化带入当地生活。在荷兰最权威的荷语大词典（Van Dale）中，有一个动词“Chinezen”，意即“在中餐馆吃饭”，说明了中餐是如此地深入民心，其影响力恐怕也是其他饮食文化所不及的。*

华人虽在外来移民群体中占的比例不高，可是安分守已、刻苦耐劳的个性，备受荷兰社会的欢迎和赞赏，在外来移民群中，其地位高居榜首。荷兰人常说：“老一辈华人勤奋挣钱不搞事，年轻的则受教育成为高知识阶层。”

       然而，勤奋谦卑的华人却相对较为封闭，多年来一直“乖乖”地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老华人说：“当年来的时候只是过客旅身份，以为掘了金就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遇到不好的事就逆来顺受。”

       早期华人分秒必争地工作，娱乐时间不多，更遑论争取权益或是进入政界有所作为。80年代荷兰政府正式推行少数民族政策，有远见的华人持着“确定身份，争取权益”的口号，企图唤醒华人社会加入少数民族。可惜，当时政治意识薄弱的华人不为所动。他们不愿和其他民族如土耳其、摩洛哥人平起平坐，甚至仍怀抱着大中华民族的心态，自视甚高。

       “堂堂大中华民族，怎么可以成为少数民族呀！”这是当年许多老华人的想法。

       因为没有名分，导致华人常常错失许多应有的权利，成为自我封闭和“隐形”的少数民族。然而，随着经济力量不断地发展及新生代的崛起，华人对争取自身权益意识日渐提高，融入主流社会的愿望也日趋迫切。

       这项引起争议的少数民族课题，在与政府展开20多年的拉锯战后终于告一段落。2004年10月1日，华人终于有了“荷兰少数民族”的正式身份，这在欧洲尚属罕见。

       同年，半官方机构荷兰华人参议机构（IOC)应运而生，标志着华人在荷兰参政议政进入新的里程碑。该机构代表当地华人向政府反映民意，维护华人权益及福利，并确保华人获得少数民族优惠。

       成为荷兰第八个少数民族的身份也使大部分华人的心态发生变化。如今，对他们而言，荷兰是永久的定居地。他们不再沉默被动，而是积极参与，回馈社会。作为国家的一分子，华人明白必须以政治管道来反映自己的心声。

       为克服大部分华人长久以来的政治冷感，并鼓励更多人积极参政，荷华社会在2005年自发出资，设立了荷兰华人参政基金会，以培养华人政治家。基金会不但邀请当地议员、律师等专业人士为华人子弟举办政治讲座，也出资支持市议会和国会议员选举，努力让荷兰华人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当地政策规定，只要住满3年申请永久居留后，华人就可在市政选举中投票。如今大约有8万荷兰华人拥有投票权，但他们往往都不热衷于选举。在该会的努力下，华人参政意识和融入的实际行动向前迈入一大步。以阿姆斯特丹为例，以前仅有3%的华人参与投票，2006年飙升至30%。

       “要把华人送入国会的路途虽还很长，可我们坚信这一定会发生在下一两代人身上。”基金会主席杨华根说。

* *来自苏里南的何天送，于2000年1月1日上任为北荷兰省芬豪城（Venhuizen）的市长，之后又担任梅德布雷克（Medemblik）市的市长。他是荷兰乃至全欧洲的第一位华人市长，开启了荷兰华人参政的新时代。在2002年，香港移民张尧以及荷兰第二代华裔邓建平分别当选区议员，为华人从政作开路先锋，也激发了华人积极行使投票权的热忱。*

   不大的荷兰华社，仍孕育出超过250个华团组织，其团结和活跃可见一斑。新旧移民、不同群体的荷兰华人有着不同的语言与兴趣，因此组成的社团也是五花八门，各领风骚。

       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旅荷华侨总会，其前身是1947年由浙江青田、温州人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的瓯海同乡会，现在则是在全国都有分会和中文学校的核心组织。1987年以凝聚全国华团为目标而成立的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是欧洲最早的全国性华人组织。

       随着新一代的成长，华人社团也开启了新的发展方向。华人积极融入社会，也改变了华社传统社团的模式。近年成立的参政团体，明显已和20年代出现的同乡会截然不同。然而不变的是，它们的活力与朝气始终如一。

       “新生代要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还得充分发挥优势和特点，为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荷兰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傅旭敏坚定地说，“融入主流，参政议政是青联的努力方向。”

       此外，专业领域社团也渐渐出现，如1997年成立的荷兰华人学者工程师协会和2002年诞生的荷兰华人经济技术发展中心。“在400多名来自企业界和科技界的会员当中，有四分之一拥有博士学位，大家借此桥梁交流，尝试实现资金和技术结合，开拓高科技经济市场，从而提升整体华人的素质和经济实力。”荷华经技中心主席陈龙雄心勃勃地说。

       “许多荷兰华人热爱中华文化，有必要构建一个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不仅可以照顾华人对现代多元文化生活的需求，还要向荷兰人展示底蕴丰厚的中华文化。”2007年才成立的荷兰华人艺术团团长陈光平，则立志把该团发展成一支具有水准的业余团体。

* *早在1987年便已成立的荷兰中厨协会，其宗旨是为了宣传中华美食，以及推广中华厨艺。除了多年来举办中餐烹饪班之外，于2000年，该会更协助政府创办了全欧洲首家中餐烹饪学校。*

尽管荷兰华人在多方面努力融入社会，但对下一代的中文教育，却显得格外执着。

       最早的中文学习班可追溯到1919年，拓荒者是当年中华会的主要成员。华人移民骤增后，欧洲福音布道会也在1973年开设中文班，两年后购买会所，创办全荷兰第一所中文学校。后来许多社团也把推动中文教育视为己任，纷纷设立中文学校。

       发展至今，全荷兰的中文学校，或附属于华人社团，或由独立基金会开办，或由个人创办，已有近50所，分布在每个城市角落。

       早期华人多数是广东籍，中文教育全以粤语授课。近年来，以华语为教学语言的中文学校纷纷开办后，许多老学校也逐步缩小粤语班规模，或完全改以华语教学。

       “由于许多华人家庭还是以粤语沟通为主，所以从幼稚班到四年级班，学校仍然用粤语授课，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则用华语上课，让他们可以同时掌握双语和繁简体字。”已有近30年历史的旅荷华人联谊会中文学校校长蔡树坚说。

       中文学校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华人学生，是荷兰人所领养的中国儿童，虽然有着黑头发黄皮肤，他们却对自己的家乡、语言和文化一无所知。思想开放的荷兰养父母把他们送到中文学校，让他们有追根溯源的机会。

       除了语文，大部分的中文学校还设有其他课程，例如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为500多名学生开办了21个各类文化学习班。该中心还创立了荷兰丹华奖学基金会，及中文教育专刊《桃李园》。

       华人社会将中文教育视为族群的精神支柱，感召了当地政府。1992年，荷兰华人申请了中央政府补助，推展《中文教育发展计划》，自行研究和编写教材。经历了7年多的努力终于出版，陆续销售到各省各市的中文学校推广应用。此外，从1998起，政府拨款资助全荷兰的中文学校。

       生活在语言文化大不相同的欧洲，看到自己熟悉的中文媒体，犹如重见光日。在荷兰，走在华人聚集的地方，中文报纸随手可得。无论是华人开的餐馆或商店，都可以见到种类繁多的中文报纸，摆放在显眼处让人免费领取。作为不可缺的精神粮食，报章每两周一次的出版日，总是让许多荷兰华人引领以待。

       荷兰第一份中文刊物是旅荷华侨总会在1977年创刊的《华侨通讯》，成为华人了解居住地和祖籍国的窗口。移民持续增加，促使中文媒体蓬勃发展，除了90年代出版的《唐人街中国人》、《华侨新天地》，还有2003年出版的《中荷商报》等，每份报章的发行量可达3万份。

       为了帮助许多只会说粤语的华人更了解居住国，第二代华人吴汉唐于1996年创办了荷兰唯一的粤语广播电台“城市之声”。该台一开始由政府资助，到2006年后才依靠广告收入来维持开销。吴汉唐身兼台长和主持人身份，电台也从当初几个人慢慢发展成40多人的规模。

       “近年电台也增设了每天至少一小时的华语节目，从2005年开始每逢周日还设有荷兰语广播，向当地听众介绍中华文化，用荷兰语教授中文。”吴汉唐表示该台近期也开始摄录影像节目，向互联网和电视延伸。节目中也用英语向当地人介绍华人动态，成了联系华人和荷兰主流社会的最佳桥梁。

       华人在荷兰这个新家园里，虽积极融入，却从未把根忘掉。

* *中文教育逐渐打入了荷兰主流教育，许多当地中学都将中文列为外语课。2005年，荷兰小学De Schalm更在每周三下午课余时间开办了中文课程给该校的30多名华裔学生，成为全荷第一所试办中文课的学校。*

 华人早期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聚居而形成唐人街。当地政府对此也给予明确的“身分”，即在唐人街一带的街道上设有中文路牌，如“善德街”（Zeedijk)、“顺风里”（Stormsteg）、“侨德仕街”（Geldersekade）等。这些印有荷兰文和中文的正式路牌，也折射出华人在该国的地位。

       阿姆斯特丹唐人街里还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佛寺——荷华寺，是由政府献地，华人捐助建成。该寺2000年由荷兰女王主持开幕仪式，是著名的旅游热点。监寺妙益法师说：“这里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周遭环伺着红灯区和毒品咖啡厅，却显得清静脱俗，甚至还是许多妓女的心灵净化地。”

       从2003年开始，海牙唐人街成为华人春节大游行的基地。荷兰政治之都海牙市政府每年资助一半经费，与当地华团联手举办春节游行，规模一年胜似一年。此盛事已成为海牙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更是荷兰全民普天同庆的大日子。数公里长的游行经过商业繁华街道，数万名群众夹道捧场。华人和荷兰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春节气氛中，凸显了华人与当地社会团结融洽的和谐氛围。

许多华人在荷兰生活了大半个世纪，早已视他乡为故乡，在此安家立业，融入社会。但仍有少数人，尤其是孑然一身的老华人因不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生活困难，活动范围也只能局限在华人圈中。

       荷兰华人社会非常关注老人问题，他们一直秉持着“少有所教，老有所养”的精神，努力为年老华人打造一个安乐环境。在多番努力下，荷兰华社在全国各地建设了十家老人住宅，不仅解决他们生活的基本问题，还提供联谊活动的空间。

       除了由荷兰中华互助会引领成立的松柏会分布各地，还有阿市老人同乐社、旅荷华人联谊会以及荷兰华人义工网等，都为年长者推动更多活动，也为华社注入强烈的敬老精神。每年9月，许多华团还会举办全国“敬老日”。

       老人百年寿终的福地，曾经也是困扰华社的课题。“鹿特丹华人墓园仙乐居在2000年启用后，弥补了近百年华人专用墓园的空白，让华人在冥府也可以‘同声连气’。”筹建主席黄志明表示，该独立墓园还拥有传统的中华牌楼，在欧洲非常罕见。

 荷兰，是人与海编织而成的传奇。华人在这充满郁金花香的美丽国度里，也编织着一个个从无到有的传奇。荷兰的安稳、舒适、开放和包容，让华人的故事一代代延续下去，更让中华文化的精髓在这里扎根、成长。

       将来会怎样？可以肯定的是，荷兰华人故事的下半部，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泰晤士河静静流淌，白金汉宫熠熠生辉。

       英国地处欧洲大西洋不列颠群岛上，主要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组成。这个一度享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的国家，旗下殖民地曾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足足占了整个地球20%的面积。

       昔日的辉煌虽不再，但落日的余辉依然笼罩大地，今天的英国，雄厚的实力犹存，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它首先点燃了工业革命的火花，还孕育了不同年代的文化巨人，像16世纪的威廉·莎士比亚，18世纪的奥斯汀以及近期风靡全球的《哈里·波特》作者罗琳等。

       二战后，英国以战胜国的姿态，重整旗鼓，经济逐渐繁荣，为充实劳动力，放宽移民限制，尤其对前殖民地的人民，敞开方便之门，吸引了大批华人前往谋生。

  沈福宗是第一个抵达英国的中国人。在1687年，他随着一名叫着菲利普·科普列特（Philip Couplet）的神父到了牛津博德利图书馆（Oxford's Bodleian Library）编中文图书目录。

       从18世纪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亚一带大肆扩张，他们雇华人为海员，把华人带到英国去。在1840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政府。随后的100多年，香港与英国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不断有华人从香港前往英国。

       早期的华人从广东省出发，搭上高挂着大英帝国之旗帜的轮船，于浩瀚的海洋上面对巨浪袭击、被孤寂折腾，人还没抵达目的地，身心已经疲惫不堪。到了英国之后，他们大多聚居在利物浦（Liverpool）及伦敦东区的海港，人数不多，且乎均是男性，从1851年的78人，渐渐增至1931年的1194人。

       为了谋生，上岸的华人就开设了洗衣店。英国华人的洗衣业在19世纪蓬勃发展，单是利物浦及伦敦东区就有150多家洗衣店。直至洗衣机走进了千家万户之后，华人手洗的洗衣年代才告结束。二战时期，伦敦东区毁于战火，新的华人社区朝西发展，且集中在爵禄街（Gerrard Street），也即是今日的伦敦唐人街。

       由于遭受战争破坏的英国极需大量劳动力，1948年的英国国籍法明文规定，凡英国殖民地的居民，都有权移居英国，让已熟悉英国文化及语言的人成为他们最直接的廉价劳工。这项规定吸引了不少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港的华人涌入，致使旅居英国的华人人数激增。

       华人到此定居，有的是为了婚姻，有的当家庭女佣，也有的是为了逃难而来。有的从事杂货业、制衣业，有的当海员、中医师或艺术家；有的则是留学生，在这里接受英式教育，学有所成之后，大多留在英国发展，担任护士、会计师或律师，但此类人数不多。

       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新界民生困苦，因此，英国政府特别允许大批新界农民远渡重洋移民到英国。华人说：“当时香港人要到英国工作十分简单，只要有出生纸证明自己是居民身份，而在英国又有雇主的话，便可以去工作；至于没有出生纸的新界人，只要找乡长写证明书，或者以族谱田契等证明，也行！”就这样，大批的新界人开始往英国迁移，最早到英国的新界人主要是以张、文、廖、邓等姓氏的华人为主。

       新界华人刚到英国时，英语说得不好，英文信件又看不懂，只能在洗衣店或餐馆里打工，赚取微薄的工资，处境颇为艰苦，加上那时英国政府对华人不闻不问，华人普遍受到唾弃、排挤，有些华人还曾遭到无辜殴打。

       华人靠打工储蓄，存够资本后大多以开餐馆起家。“当时的中餐很‘寒酸’，我们都是把好几种菜炒成一碟，称为‘杂碎’。”老华人回忆说：“当时，中餐馆确实是华人唯一可自由发挥的舞台，有些较具规模的中餐厅，甚至还设有舞池，装潢华丽的程度几乎可媲美五星级饭店。”像张梦熊的香港楼和东升楼、张汉强的颐和园和莲花楼、东伦敦的老友记等都曾在英国华人社会风靡一时，奠定了中餐业日后于英国服务行业中的重要地位。

       1981年，英国修改国籍法，开始限制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迁往英国。但是到了1989年之后，由于越来越接近1997的香港回归期限，为数不少的香港中产家庭纷纷移民，为了安抚人心并减少香港人才外流，港英政府特别在1990年承认了5万个香港家庭的居英权。

       到了21世纪初，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逐渐增多，大量的福建人以各种途径到这里居留。他们入乡随俗，积极地融入华人社会，自食其力地在英国寻出路，一有机会就在这里落地生根。

       直至今日，部分华人对这个日不落帝国依然崇拜，认为它是最理想的落脚地。福建人小高一边炸着金黄色的薯条一边说：“英国或许不像美国一样遍地是黄金，但胜在治安稳定，生活条件好，欧洲那么大，我们同村的人都想来英国工作或生活。”

       然而，英国关卡守得紧，偷渡的风险很高，常常有人因此而赔上了性命。在2000年，共有58名华人在多佛的一辆卡车上被发现窒息而死；于2004年2月，则有23名华人劳工在英格兰的莫克姆湾拾贝时因涨潮而遇难。为了防止类似的不幸事件持续发生，英国政府极力打击黑工。他们严惩雇用黑工的华商，也发布消息，呼吁没有身份的“幽灵人”到移民局报到，接受当局妥善安置，以减低“幽灵人口”的数量。

* *20世纪70、80年代，英国有数家饮食集团的老板恰巧都姓张，而当时英国的华人大多姓文，故此，英国唐人街便有了“文家天下张家财”的说法。*

    华人是继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之后英国最大的亚裔群体，超过25万华人拥有英国公民身份，主要集中在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Manchester）等地，其中，伦敦的华人数量最多，居住地也最集中。

       华人踏足这片土地，从原先的洗衣业到现今不或缺的中式餐饮业，还有伦敦唐人街一年一度盛大的中国新年庆典活动，都深深影响着每一个英国人。

       这里的华人会计、医生、护士、律师等专业人士也备受社会尊重。

       政府重视中文，把中文纳入中学和高级会考项目中，愿意学习中文的华人越来越多，中文教育逐渐步入轨道。中文媒体也不寂寞，周末走在伦敦唐人街上，各种各样新鲜出炉的中文报刊随手可得，为华人社区提供实用且免费的商业与生活资讯。

       据调查显示，英国华人的平均收入是少数族群中最高的，平均每周至少赚550英镑，在整个社会居中上水平。

英国华人社会虽不如东南亚的华人社会成熟活跃，但这个国家的华人，却享受着其他国家鲜少的闲适与自由，那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

 华人餐饮业的发展，“丰富”了英国人的味蕾，也改变了他们对食物的看法。

       在英国，华人进军餐饮业已有大半个世纪了，色香味俱全的中式菜肴已成为许多英国人的日常饮食。如今，全英国估计有2万3000家的中餐馆与外卖店，主要集中在各城市的唐人街。

       这里的中餐馆，每一家从老板、厨师到服务生几乎清一色是华人，服务生大部分是马来西亚籍华人，他们一般既懂粤语也懂英语和普通话，与客人和厨师都容易沟通。

       中餐馆工作时间长，也比较辛苦，但收入却不低，加上小费，有些服务生一个月可净赚约2000英镑。许多中餐馆既包员工伙食，也提供免费住宿，这对于刚到英国找工作的华人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对于老板来说，经营中餐馆盈利高且稳定，除了足以让他们支付日常生活费外，还负担得起子女高昂的学费。

       因此，华人对经营中餐饮食业乐此不疲，至今，依然是他们在英国所从事的主要行业。

       资本不足但又有兴趣涉足中餐业的华人会首选外卖店，投资不多，也可以当老板。一般来说，外卖店不招待客人，也无需装潢布置店面，可以省下不少成本。华人只要在店里坐等电话接订单，炒好菜，再把佳肴送给顾客就可以了。据估计，一家外卖店每个月的营业额也有近万英镑，多的可达2万英镑。

       中餐业的兴起，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如杂货店与超市。

早期，中餐馆所需要的糖米油盐酱醋茶，都是老板托朋友帮忙从香港捎带，机票昂贵，又不能超重，很不方便，为了满足需要，有人开设杂贷店，专门向中餐馆提供他们所需的货品，唐人街的厨师说：“只有亚洲进口的食材与调味料才能烹调出道地的中餐。”

       后来，逐渐地，杂货店发展成大型批发和销售的超市，这大大降低了中餐馆的成本。目前，全英国的华人超市已超过100间，货架上货品琳琅满目，塞满了从中国、东南亚等地进口的亚洲食材。“李锦记调味料的选择更是多样化且齐全，甚至比在香港、澳门超市的选择还要多。“在英国居住超过5年的廖智全说。

       “荣业行“超市是其中的佼佼者，老板叶焕荣曾在2007年以8000万英镑的身价被列入当地的富豪榜。这名来自广东东莞的客家人是全英国最大的中国及亚洲食品经销商，由他所创办的”荣业行“超市的分店在伦敦、曼切斯特和伯明翰（Birmingham）随处可见，他在经济领域的辉煌成就，是华人的骄傲。

       华人后裔大都对子承父业兴趣不大。他们皆在当地受过良好的教育，许多人成为律师、医生、会计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但截至目前，华人在国主要从事中餐饮食业的经济格局依然不变。

       华人常略带夸张地感叹：“中餐饮食业，养活了全英国的华人。”

   说起英国的好，华人如数家珍。“治安稳定、经济发达、空气清新、艺术氛围浓厚、教育水平高、贫富差距不大、绅士淑女多、国家福利好……”华人滔滔不绝，说出居住在英国的切身感受。

       英国的华人，估计约有40万。他们既分散又集中。散布在英伦各岛的华人，英格兰约有33万人，苏格兰约5万人，威尔士约5000人，北爱尔约1万5000人，主要聚居的城市包括伦教、利物浦、伯明翰、格拉斯哥（Glasgow）、爱丁堡（Edinburgh）、曼彻斯特、卡迪夫（Cardiff）等。

       仅伦敦地区就聚居了超过15万名华人。那里的唐人街，中医诊所、餐馆、电话店、理发店、茶餐室、迷你超市、中文报纸等应有尽有。形形色色的华人，有在巷口抽烟的厨师，有开着敞蓬跑车的新生代，也有提着大旅行包、垂头丧气，对前途一片迷茫的年轻人。

       小小的唐人街，就像是英国华人社会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当地华人的生活百态。

        这里有70%的华人来自中国香港。其他的则来自台湾、中国大陆、东南亚及世界各地。

       英国物价昂贵，刚到的华人，每花一分钱都精打细算，刚来的华人一般都会在市区租一套两房一厅的楼房。租金每月至少350至600英镑，还不包括水电费，大一点的公寓，月租则要800至1200英镑，华人若没有稳定的收入，房租绝对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在外用餐费用高，除非是和朋友欢聚或者参加应酬，不然华人一定会坚持到超市购买食材，为自己或家人自备饭菜。

       在英国买轿车不贵，这里的华商、专业人士甚至月薪不超过2000英镑的服务生，几乎都拥有自己的车子。很多来自香港的华人为了好兆头，车牌号码一定会有一个或多个8或3的数字，它们和粤语的“发”与“生”同音，寓意做生意会“生生猛猛”或是“一定发”。

       华人新生代深受西方文化的濡染，行为举止，就和当地小孩一样，说着流利的英语，穿着摩登。华人说，“话题若扯上美国电影、音乐和服装，他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小时。”

       英国是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伦敦正义工商会副会长方桥发说：“英国的高福利是香港甚至美国所不能及的。在这里，退休华人可以免费乘搭公共交通，去医院看病也是免费的，冬天还有燃料费补贴。政府每个星期还会把退休金汇入你的银行账户，保证你衣食无忧。”几乎每个华人都对英国的福利制度深表满意，他们半开玩笑地把英女皇视为“二娘”，退休金就是“二娘”每个月给他们发的零用钱。

       退休后的华人，常相约聚在会馆打麻将、品红酒吃西饼。有的携伴到处去旅行，有的在家享福，帮忙照顾孙子。

       英国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福利制度完善，这里还有其他的魅力，吸引着华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由。华人担心外人无法理解，再解释道：“这种自由不是走在路上可以随便去抢别人手提包，或像美国一样人人有枪，这里的自由是尊重人权。你可以在公园里大声抨击英女皇，宣告天下说英国政府无能，而不需要担心有人会给你带来任何伤害。”这种言论和思想自由，在大多数国家，是再多钱也买不到的。

       英国华人逐渐富裕起来，社会地位也稳步提升。华人给当地人的印象不再是只会炒菜，越来越多的人已跻身主流社会。他们一改过去与世无争的习惯，积极投身各类政治活动，目前虽然尚未成气候，但已掀开了英国华人参政的序幕。

在英国，农历新年牵动着每个华人的心，也是他们展现中华文化的最佳时刻。

       虽说华人农历新年是当地少数民族的节庆日子、也不是公共假期、但各地政府重视华人新春活动的程度、不亚于圣诞节和元旦，每一年，各地都有新春庆典活动。

       伦敦唐人街的新春庆典活动是全欧洲最热闹的。春节前两个礼拜、唐人街的几个街道上就处处悬挂着红彤彤的大灯笼、中餐馆的窗户上贴满了喜庆的春联，华人超市的货架上堆满年货，大家纷经购物、一片喜气洋洋。华人说：“就连当地人也迫不及待地想和我们一起过节。”

       新春期间的第一个星期天，是华人最忙碌的一天，英国各城市的唐人街都有团拜或表演活动，耗资40多万英镑的伦敦庆典活动最是盛大，活动还未开幕，唐人街上已聚集了超过250家的媒体记者。那几天，伦敦浸浴在欢腾喧闹的气氛中。

       “我们特别到中国邀请表演队伍到英国来表演，节目丰富多彩，包括中国传统的武术、舞蹈、杂技、歌曲和京剧等。”邓柱廷是2008年新春庆典的活动策划人，也是伦敦华埠商会连任8年的主席。“每年的活动都吸引了35万人以上，唐人街挤满了人。”他说。

       那一天，爆竹声此起彼伏，噼噼叭叭地响彻整个英伦。

       华商们在这时候也最为忙碌了，为了迎接佳节，人潮会把街上专卖华人吉祥品的小摊子挤得水泄不通，华人餐馆或外卖店也门庭若市，这也是华人收钱收到手软的一天。

       中秋节也是重要日子。那一天，伦敦华嶂商会、蜜惠市龙狮体育会、佛山市禅城区龙狮团、英国泗和行集团等其他华人社团都会在唐人街上举办中秋节普天同庆龙狮表演大会。

       华人在街上敲锣打鼓地舞狮舞龙，把四方游客吸引过来，也带动了附近的中餐馆生意兴隆。此外，华人社团和宗教团体也会举办晚宴等活动，大家欢聚一堂品尝月饼，促进感情。

       端午节时，华人传统的赛龙舟在英国也相当受欢迎。各个小镇都会举行划龙舟比赛，即使没有华人带领，当地人也会自制龙舟，穿起救生衣，撑起船桨来比赛。他们看见华人还会很友好的说：“Happy Duan Wu Festival”（快乐端午节）。

估计英国目前约有200多个华人社团。

       早期的华人社团像利物浦致公堂、四邑总会馆和伦敦正义工商会、伦敦互助工团等已有近百年历史了。

       老华人文祖逑回忆说：“我们刚到英国时，华人彼此就像家人一样互相帮忙。社团会帮助在英国的老华人寻找他们在香港的亲人，也帮香港的朋友打听他们在英国失去联络的家人或朋友。”

       英国华人一路走来，虽然平日大家都各忙各的，但只要其他华人一旦有事，必定会拔刀相助。

       80年代末，华人新移民不断增加，新的华人社团陆续成立。它们常举办各种活动，例如举办春节联欢活动、划龙舟比赛等，社团也努力争取华人正当权益。

       随着时间推移，新老移民的社团活动方式，就明显反映出两代华人社团的差别。传统社团的活力越来越小，会所逐渐沦为老会员聊天、搓麻将的场所。但由新移民掌舵的新组织，却充满朝气，已逐渐成为现阶段华人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社团关注中国的事务，并就力之所及，赈济不幸的同胞，如四川发生大地震，灾情严重，人财两失，社团立即发动捐款赈灾，华人反应热烈。

  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引起了英国华人对中文的重视，激发了英国华人学习中文的热忱。那时候也是英国中文教育的兴盛期，估计英国华商总会的中文学校学生就高达1万5000人。

       现在，香港政府驻英办事处每年都会从香港运来小学教科书，免费供应给英国中文学校，也赞助教育津贴。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中文学校还特别开办了小学、高级中文班。学生从5岁至50岁都有。

       如今，英国全国共有200多所中文学校和教会创办的中文补习班。

       著名的中文学校包括英国华商总会中文学校、共和协会中文学校、格林威治中文学校、伦敦华夏中文学校、简体字与普通话中文学校等。这些中文学校皆由华人社群出资承办，教育水准高，体制也完善。

       在中文学校学习中文，一般来说每年只要交杂费就行了。有些大约是70至90英镑，比较有规模的中文学校，大约是200至300英镑。

       “英国的中文教育不是盈利机构，老师不会加薪，他们有些是志愿来服务的，只领取微薄的车费或午餐费。”

       英国中文教育漫漫长路，华人辛苦栽培，有人乐于奉献，有人乐于资助，只祈望下一代可以手写中文字，看明白中文书、听得懂中文。

       近年来，英国教育部为提高学生的全球化竞争力，将华语规定为中小学必修课，继法语之后成为第二大外语。借助于政府的重视，英国中文教育正逐渐步上轨道。

   英国的包容，让华人媒体有展翅的空间。

      英国是个出版大国，各社团、各地方甚至各民族都会自己办报，所以早在二战前，华人报刊就出现了，像《解放》、《民主阵线》、《诗语》、《华人商业影响》、《亚欧评论》等中文报刊，都见证了英国华人社会每个阶段的发展历史。

       1975年，欧洲版的《星岛日报》在英国诞生。这是份由香港人掌舵的报纸，内容离不开香港八卦新间，还有大陆和香港两地的政治、经济、娱乐及文化动态。然而，报纸也有专门的版面，第一时间报道欧洲各国华人与社团的消息和活动。

       每个周末，《星岛日报》也会附上刊载亚洲讯息的杂志《东周刊》，以丰富当地华人的生活。每日发行至少14万份的《星岛日报》，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覆盖了整个英国的华人社会。

       如今，《星岛日报》已成为英国华人不可或缺的读物，在英国华人社会影响深远。

       在英国，中文报刊至少超过十份。除了《星岛日报》需要付款购买外，其余的中文报刊，像《欧洲时报》、《文汇报》、《英中时报》、《英中商报》、《华商报》和《新欧侨报》等一律免费。

       每个周末下午五六点时，伦敦华人们即可像在糕点屋内选面包一样，在唐人街街道两旁的铁架上或者超级市场的门口外，获取各式各样新鲜出炉的中文报纸，作为一个星期甚至整个月的精神食粮。

       中文免费报也是最大的免费广告汇集地。报纸上的广告内容无奇不有，从征婚、移民热线、法律咨询、租房、按摩服务至代写论文、代办证件等包罗万象。住在伦敦唐人街的冼先生说：“免费中文报的读者群数量庞大，虽然报纸本身不赚钱，但其所属的商业集团因为广告效应，知名度会大大提升。”

       英国的中文电视台主要有3家。其中，欧洲东方中文卫星电视台是香港徐展堂东方卫星电视在欧洲的分支机构，总部设在伦敦，有普通话和粤语节目，以中国内地节目为主，每日播出4个小时。欧洲无线卫星电视则以港台节目为主，每日播出16个小时。另一家传讯电视，则是香港传讯电视在欧洲的子公司。

       此外，华语广播电台有4家，全国性和地方性各两家。其中，英国官方所办的英国国际广播公司中文部，每日有一个小时全国性的华语节目播出，华人所办的伦敦国际电台中文部，每日也播出一个小时粤语节目。

  成世雄来自香港新界，是英国少数参政的华人之一。他是英国伊斯特本市（Eastbourne）市议员，也是所在选区的郡、区和地方议员，是英国第一位同时拥有4项议员头街的华人。

       伊斯特本是英格兰东南部东萨塞克斯郡（East Sussex）最大的自治市镇，大约有十万居民。镇上有一个叫比奇角（Beachy Head）的峭壁，峭壁背后，是全英国阳光最充沛的地方，因此，这里也是英国人最爱的度假胜地。

       回忆当初参选议员的动机，他说，“十几年前，我的外卖店的大门坏了，墙壁也脏了，不少客户和朋友建议我整修一下，可我按照规定把申请单递交给地方议员时，却遭到了无理的拒绝，理由竟然是‘因为我和你没交情’”。

       为此，他萌生了参选议员的念头，为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争取权益。没想到他竟成功地在1997年当选为当地的地方议员。接着，人缘极好的他在1999年又被选为地区议员，2001年又代表自由民主党首次获得东萨塞克斯郡郡议员议席。2007年，他、妻子张莲爱和大儿子成德仁，以独立党派候选人的身份分别赢得伊斯特本市议员、普尔盖特区议员和惠灵顿地方议员，轰动整个英国政坛和华社，顿时成了当地报纸的抢眼新闻。“我们的胜出源自于对人的诚心，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件事。”成世雄诚恳地说。

       “我念书不多，高中都还没毕业。”他回忆说：“我15岁来到英国，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就被逼着进学堂。”20世纪70年代，种族间仍然充满矛盾，他和好朋友常被当地人欺负，“我们常常处于弱势，他们人很多，远远就向我们丢石头，我们甚至被殴打到躺在地上起不来，惊动警察出面救人。”他书念了几个月就停学，到餐馆去学厨艺。

       “议员的职责其实就是为当地市民提供更好、更安全的居住环境，像修复马路、增添路灯、处理垃圾、兴建房子、美化公园等。”这些都是他日常要处理的事务。英国政府给的津贴很少。“我们算是半个义工，津贴不够有时还得自己倒贴。”他说。

       如今，他已经是郡、区、地方和市议员了，再向上就是国会议员，“我被选上国会议员的几率大概像会中六合彩头奖一样渺小。”他谦虚地说。

       许多英国华人对政治不热衷，他很无奈，只希望全球华人以印尼为鉴，别只顾着赚钱，待排华风刮来，华人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在伦敦居住了30多年，他从来不把自己当过客，一直在努力地融入英国主流社会。

 古老陈旧，是英国给人的第一印象。

       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这里很少见，触目所见的，多是褪色的老式建筑物，和百年不变的老街名。

       然而，这里的一景一物，却包藏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散发出昔日大英帝国的辉煌。那种深厚、持重的感觉，让人不知不觉就融入到整个古朴、包容的大环境里。

在这里，华人整体上都过得不错。虽然融入主流社会的路还很漫长，但留在那里的华人，都眷恋与珍惜这里美好的环境，多数不想离开。

  爱尔兰西临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与英国相望，山明水秀，风光旖旎。这片富足而安宁的土地孕育出不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音乐人，如萧伯纳、叶芝、恩雅等。深厚的文化底蕴，滋润着爱尔兰人，也感染了世界。

       爱尔兰人曾在英国的占领下，度过了700多年灰暗的日子，到1921年才获得自治权，但北部6郡一直在英国管辖下。

       1973年爱尔兰加入欧洲共同体后，经济开始突飞猛进。以前的农业小国，摇身变成欧洲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年人民平均收入甚至超过英国。

       今非昔比的爱尔兰人，没有因为条件变好了而骄傲；他们有过背井离乡的经历，更懂得包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特别是千里迢迢而来的华人移民。

华人移民爱尔兰的历史很短。

       早先，华人都把目光集中在英国，仅有少数华人会将目光射向英国旁边的爱尔兰。据说、在20世纪50年代，移居到这里的华人只有十来位。

       到了70、80年代，爱尔兰经济蓬勃发展，到来的华人也就跟着日益增加。早期的华人，大多数是从英国或香港辗转而至，另外，还有少量来自越南、马来西亚和台湾，总数估计也不超过一万人。他们大部分都集中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那里不但气候温和，而且到处均是绿油油的草地及盛开的鲜花。华人走在街上，几乎每一个都是互相认识的，见面时总会彼此寒暄一番。而爱尔兰人也友善热情，并且非常乐于与华人分享当地的文化。

       华人大部分都是带着本身的积蓄有备而来的，他们一心一意在这里创业，因此，中餐馆、快餐店和超级市场等也就随之迅速地在这片土地上发展起来。

       那时，这里华人很少，竞争力不大，做什么都赚钱。华人初到此地，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们坚韧、勤劳和自强不息的工作态度，不但换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也为他们的下一代制造了优渥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游刃有余地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英语是爱尔兰的官方语言。而华人也对英语并不陌生，许多人在英国学有所成之后，再转至爱尔兰从事专业领域的工作。越南华人则多以难民身份居留在爱尔兰，且大都以经营小型餐饮业或外卖店来维生。当地政府提供房子，颇为细心地照顾他们。来自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则多以帮厨或餐饮业营生，他们循规蹈矩、努力地在这片土地上谋生，钱赚够了就衣锦还乡。也有少数的台湾人到这里留学，其中还有一些人嫁给爱尔兰人做媳妇。

       90年代末期，爱尔兰的入境签证宽松，大大便利了华人移民的到来。

       1997年，爱尔兰积极地向中国推介其大学和语言教育模式，规定只要中国人申请语言学校审查合格后，就可获准入境签证。华人说：“当时，在中国东北沈阳和大连等地区掀起了一股前往爱尔兰留学的风气，家长们不惜拿出几十万人民币让孩子出国深造。”

       新移民的到来，把精彩的饮食、服装、娱乐、医疗等文化也一并带到这里来，不仅丰富了华人社会，也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老华人说：“这批‘年轻’的华人给‘老’华人带来了更多的活力与朝气。如果没有他们，都柏林对华人而言，大概就像一座死城了。”

       这些年，华人已成为紧接在波兰人之后的第二大移民群体。政府认为移民人数已达到饱和点，于是开始紧缩移民条规，规定留学生必须根据课程长短来定期续签留学签证、华人得先拿到了工作签证才能够工作等严格条例。

       爱尔兰政府实行这些措施的目的，华人都心里明白“他们只想留专业人士，那些不走运的华人就只能打包回家了。”

       这些消息对华人而言，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但爱尔兰的创业机会依然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尤其是来自福建的福清人。他们定居在这里之后，便把所赚到的钱寄回家乡，引得更多的人心动，也就想方设法打算到爱尔兰来。

* *爱尔兰的法律规定，凡是在2005年以前出世的小孩，包括华人所生的小孩，都可直接入籍。有一部分华人为了赶在2005年以前让自己的小孩拿到爱尔兰的国籍，甚至未婚先孕，希望能以照顾孩子的理由，申请在爱尔兰居留下来。*

 爱尔兰经济繁荣、治安良好，到处草本青翠，风景宜人，曾被欧洲杂志评选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爱尔兰十方华人大多聚居在都柏林，其余散居在科克（Cork），高威（Galway）及其他大小城镇。

       早来的香港人及东南亚华人，多经营餐饮业、百货、食品批发业。华人超市的批发版图逐渐扩大，两间由香港人经营的“亚洲行”与“东方行”无人不晓。中文班在20年前就出现了，不过原本的粤语教学近年来已改为用普通话教学了。

       新来的华人多以留学之名来到这里。他们几平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介于19岁到30岁之间。学有所成后，就留下来，在当地的公司或政府机构任职。他们也有开店做生意的，房地产、装潢业、餐饮业、媒体业、酒吧、KTV等无所不有。

       新移民从国内带来的娱乐和资讯，丰富了贫瘠的华人文化。他们也在这里组社团、办教育、做媒体，逐渐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多彩的华人社会。

如果说英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已经成熟饱和，那爱尔兰的华人社会才刚起步，如刚发芽的幼苗，在这个新环境里茁壮成长。

       在爱尔兰，华人专业人士多。这里的就业机会多，许多留学英国的年轻华人，都喜欢在爱尔兰发展。只要英语过关，他们就可轻易地进入爱尔兰职场的每个角落。

       有华人在医院、会计楼、媒体、电子科技业、保险局、移民厅、律师楼工作，也有华人在谷歌、IBM和雅虎等大型的外资投资科技企业发挥所长。大约有一万名华人投身在软件业上。

       这几年，新移民表现勤奋，他们办事效率高，就连当地政府也要招聘华人当警察。当地人觉得华人当警察好处多多，一来中英双语兼备的华人警察可协助不懂英语或法律的华人，二来也可增进警民之间的了解，减少误会。这样不仅可提高警察的办事效率。也能全面提升爱尔兰警察部队的形象。

       “在爱尔兰当警察的福利很好，生活也有保障，外籍人士当上警察的话，可直接入籍爱尔兰，很多华人因此跃跃欲试。”华人也觉得，若在警察队伍中看见和自己一样的脸孔，说着中国话的警察，心里面多少也会觉得踏实些。

早期的香港粤菜，显得单调。随着华人的大批涌入，他们把家乡美食也一并带来了。像四川菜、北京饺子、麻辣火锅等大江南北不同风味的中国菜肴，如雨后春笋般地在都柏林利菲河（River Liffey）以北的帕奈尔街（Parnell Street）和卡贝街（Capel Street）上冒出来。各式各样的中餐馆，让人目不暇接。

       据估计，在爱尔兰，华人经营的中餐馆和外卖店约有250家。

       为了加深当地人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华人在餐馆的装潢上费尽心思。墙上挂着山水画、吉祥结，摆设中国瓷器来点缀等。一到中餐或晚餐时间，店里一定座无虚席。

       可是，爱尔兰中餐馆现在也面临困境。移民局的华人居留条例天天在变。为了控制华人入境人数，当局要求华人餐馆聘请一个华人就要聘请一个当地人或者欧盟的人。这样的政策，让华商头痛，因为这不只会影响到他们聘请员工的人数，也会加重成本。

       华人反应激烈，直接向移民局上诉：“中餐馆是体现中华文化最直接的管道之一，当地人不懂中华文化，在介绍中国菜肴时会比较逊色。”只可惜，这些反对皆无效。

       中餐馆老板对朝令夕改的移民法令虽感到无奈，但是生意还是要继续。他们妥协了，只得按1:1的比例聘请当地人，让他们穿着黑白衬衫，与华人一起穿梭在客人群中，只是不谙中文的服务生不会直接为客人点菜。

       这里大型的超级市场以香港人开的“东方行”和“亚洲行”最具规模，从各式亚洲罐头、熟食面到饺子皮和肉馅等，几乎华人熟悉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可以在那里找得到。超市又像消息驿站，华人可以在这里拿到免费的中文报纸，可以通过超市的布告栏了解华人社团或爱尔兰华人社会的最新动向，还有一些捐款的活动也在超市举行。

       爱尔兰的中医诊所与英国中医的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透过网络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来。中医师陈苏颖在当地行医20多年，回想过去，他无限感慨：“早期的爱尔兰人不接受针灸，他们觉得针灸是个假象，当时的中医医术被严重质疑，我们根本不能在这里糊口。”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懂中医，甚至对学习中医医术和养生保健法也有兴趣了，特别是针灸治疗，更是让当地人啧啧称奇。

       华人来到爱尔兰，目的非常清楚，不是念书就是工作。他们工作讲求实际效率。华人说：“几乎每个新移民都打两份工，赚钱第一。”他们的时间表，几乎相似。大概是早上5点起床，6点清洁赌场或派报纸，8点上课；下午4点打工，晚上12点上网、读书；凌晨1、2点睡觉，5点又起床开始新的一天。

       周末，他们会兼职，在商店当售货员、在厨房当杂工、清洁工、保安，或在加油站、酒吧当服务生等，大约一个星期最少可挣400至500欧元。只要两周的薪金，就可在这里维持一个月的生计了。

       初来乍到的华人拼命工作，与当地人的“悠闲”态度有着天壤之别。这让在当地士生土长的新生代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些新到来的华人，常常愿意牺牲私人时间，长时间工作。他们的热情与敬业态度，是我们新一代所不能及的。”当地人好像每天就只做一件事，到银行办事也要花上一天的工夫。华人早就领教了他们慢郎中的作风，慢慢地也变得习惯了。

       每年的圣诞节，爱尔兰人几乎全部放假不工作，只有华人店铺还在开门营业。有些华人觉得在爱尔兰打工还是幸福的：“这里可以打工的选择很多，若和英国比较，爱尔兰华人算是幸福的。因为英国华人多半在中餐馆工作，那里的工作时间长而且很累，但两者报酬却不相上下。”在爱尔兰的麦当劳、SPAR、CENTURE连锁商店、爱尔兰银行、酒店等都可看见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在店里忙碌着。

       这里有时也会出现雇主强压薪金、或无理解雇等不公平的情况。爱尔兰劳工法规定最低薪资为工作一小时8.9至9欧元（约12美元），但有些华人的薪资可能被压到一小时5至6.5欧元（7至9美元），甚至更低。遇到此类情形，当地华人社团都会伸出援手，安排律师义务替华人向雇主索回该享有的报酬。

       整体来说，华人在爱尔兰的发展一帆风顺。当地的女总统玛丽·麦卡丽斯夫人（Mary McAleese）曾表示，爱尔兰人与华人的文化交流将有利于推动爱尔兰的经济发展。这个国家甚至把华人当作上宾，认为华人选择居住爱尔兰，是他们的荣耀。

 早期的华人人数不多，虽彼此认识，但大部分都是各忙各的。随着新移民迁入，新旧社团逐渐把华人联系起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华人社会。

       爱尔兰的华人都是这么形容爱尔兰的；空气好，雨水充沛，绿色处处，风景美，人热情。“70、80年代，这里美得没话说，空气清新，到处是绿草，就像来到世外桃源。”

       爱尔兰的华人，大部分居住在都柏林。这是个古老的现代化城市，历史悠久，却富有活力。在这里，历史人物的雕像、百货公司、名牌商店沿街街而立，视觉上就像带你进入了历史与现代的交错地带。见证了历史兴衰的利菲河安静地穿过市中心，犹如城市的命脉。一河之隔，将城市划分为南北两区。南岸人口尤为密集，老华人多聚集在那里。

       华人新移民则多集中在北区。他们在那里开餐馆、商店，把中国的休闲娱乐全搬到爱尔兰来。都柏林平均每个月都会有华人新开张的餐馆、快餐店或酒吧。华人也乐得和朋友遍尝附近所有的美食。在中餐馆吃午餐，两个人约45至80美元，晚餐约70至130美元。

       更多为华人服务的KTV、网吧、酒吧、健身房及各式各样的家乡餐馆等也陆续在都柏林市中心出现。

       说起酒吧，不得不提爱尔兰的酒吧文化。爱尔兰人爱喝酒，各城镇酒馆林立，酒吧文化闻名于世。华人下班后，也会习惯性地前往酒馆或餐厅，边喝着纯正的爱尔兰黑啤边聊天。爱尔兰人热情好客且待人诚恳，华人只要举起酒杯，就可以和他们坐在一起，搭肩称兄道弟了。

       “爱尔兰人很纯朴，他们不会算计别人。一旦和他们交上朋友，他们就会全心对你，就像天使一样，会使你感动得手足无措。”已经不止一个华人是这么形容爱尔兰人了。“爱尔兰人最视重‘出生与死亡’，一旦知道朋友的家人过世，就算没有告知他们，都会想办法给你送个花篮或慰问卡。”即使葬礼不在爱尔兰举行，他们还是很有效率地透过网络，把花篮和慰问卡寄送到你手上。

       爱尔兰人也很有人情味。华人说：“有个华人女孩在工作期间忽然昏倒，送院抢救后，发现她原来已经到了癌症晚期，只有两个月的生命。”在了解到这女孩想要回家的心愿后，爱尔兰政府就免费帮她购买了飞机票，还特意安排了医生和护士陪着她回中国。

       爱尔兰人的热情与体贴，融化了华人的心。在外闯荡，都希望可以认识多几个像爱尔兰人这样知心的朋友。只是，前提是你必须要会讲英语。

       在这里很少发生排外现象。华人说：“这里的人喝醉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觉，不会借醉装疯作弄别人。”当地政府对种族主义也非常警惕，警方、教育和服务机构都实施了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虽还有少部分的新移民在公众场合感受到歧视，侮辱和骚扰，但情况并不常见。

       在华人看来，这里的人友善亲切。尊重彼此的文化，把不顺心的事情看成平常事，这是华人在他乡生活的感悟。

       虽然，旅游书上说，都柏林消费昂贵。但也有华人说：“在这里赚钱这里花，一切都还是划算的，只要不是天天泡酒吧，绝对可以有钱储蓄。”只有实际在这里生活的华人，才了解这个地方的所得与消费对比。

       华人喜欢煮食，即使是单身男子，也喜欢打开食谱，为自己张罗晚餐，华人说：“这里的中餐馆虽多，但大多迎合了当地人的口味。华人想念家乡菜，还是得自己亲力亲为。”都柏林街上的菜市场多，货物应有尽有，只是价格稍贵。牛肉和猪肉一般要在大超市里才买得到，鸡肉算是最便宜的肉类了。

       在爱尔兰，打国际长途比拨打当地的市内电话还要便宜。华人想家就随手拿起电话，拨打香泄、中国大陆、马来西亚等地方，聊个150分钟，也才十欧元。这对于在当地属中高收入水平的华人来说，电话费从来就不是他们生活的一个负担。

       95%以上的华人都租房子。租房的人多，让都柏林市和科克房产在短短的5年内增值了3倍多。这里的房租多半是按月付费的，整间公寓屋子的租金约550至1505欧元，有些单房租金，不包括水电费，一个星期就要100欧元左右。华人说，他们的到来为当地房地产业打了一针强心剂。现在，在都柏林购买一套房子，最少大约要60万欧元，华人如果省下买房子的钱，华人的银行存款，据说比当地人还要高。

       这里的华人习惯以车代步，大部分华人都拥有自己的车辆。约1000欧元就可以拥有一辆不错的二手车了。有了车子，华人喜欢结伴到郊区散心，感受爱尔兰各处的优美风景。“我们还可以随时开车到英国呢。”从都柏林到英国管治下的北爱尔兰，开车也不过5个小时。

大年初一，爱尔兰华人的店铺却照常营业。“这里的华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新年还是要工作。除夕夜时，或许会提早下班，和朋友到餐馆聚一聚，或者相约三五朋友一起到KTV唱歌庆祝。”来自福建省的陈华德说。他在都柏林开了一家唯一售卖中国装饰品的精品店。

       “店里有70%的客源是当地人，他们对华人的新年文化、中国物品很感兴趣。”农历新年前夕，他店里的生意特别兴隆。

       近年来，都柏林市政府为华人举办大型的新春庆典活动，邀请中国著名的表演团来表演，为都柏林制造新年气氛。“都柏林没有唐人街，新年庆典不像伦敦的新春活动奢侈热闹，在这里大家就是坐下来吃顿饭或看看表演，听听歌而已，所谓的农历新年气氛也就几个小时。”在都柏林《新岛周报》任职的惠铁军言谈中流露出遗憾。

       华人都盼望着，爱尔兰会有个更丰富多彩的新春庆典，也企盼着政府会把新春佳节列为当地的公共假期。

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为了让爱尔兰的新生代能更好地掌握中文，这里的华人社团陆续开办中文学校。

       “爱尔兰的中文学校不多，估计不超过十所，且大部分集中在都柏林。”陆铨福是爱尔兰华人协会中文学校的校长，他的孩子从小就在中文学校里学习，现在是学校的老师。华人协会的学校历史较悠久，学生人数也是全岛较多的，估计每年的学生总人数约100人。

       早期爱尔兰的中文学校均以粤语授课。2000年后，都改成普通话。以华人协会中文学校为例，每周日在当地的天主教学校租借教室，每次两小时，每年上课35个星期。学杂费只够应付每个星期的租金费。华人社团会在春节时为学校筹募教育基金，“沉浸在喜庆中的人们最慷慨，不需两三个小时，就可筹得可观的教育基金。”陆铨福说。

       学校设有十个级别，为学生提供不同程度的语文课程，教材由英国中文学校联合会编写。这里的华人子弟学龄人数不多，中文学校没有英校活跃，所以只能参考他们的教学方针，以简体字和繁体字并用教学。

       家长都希望子女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在他们的心里，也希望孩子不要忘记母语。大部分新生代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就连在学校说着英语的表情也和当地人一摸一样。

       “现在的孩子或许还会和家人说说粤语，但他们多数看不懂中文，甚至连写简单的中文字都会觉得困难，就像我的小儿子一样。”说起自己的儿子不愿意学中文，身为爱尔兰华人中心主席的黄国宏也觉得无奈。

       中文学校每个班级至少有两位中文老师指导，务求让每个学生都可以学好中文。为了让他们更好掌握中文，老师在教学时，一般以英语和普通话掺杂授课。他们也会采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来教学，希望激发学生对中文的求知欲。

       由于环境使然，高年级的学生会因为功课忙碌，无暇抽空到学校上中文课，他们会觉得学习中文是个负担，渐渐地选择半途退学。

       中文学校最常见的就是年级越低的学生人数越多，年级越高的班级则人数越少。来自澳门、主修教育学的中文老师卓慧贤谈到：“若爱尔兰政府也能效仿英国或其他一些国家，将中文纳为进入大学的应考外语科之一，情况或许就会大为不同。学生会为入读心仪的大学而选读中文，因此培养出对中华文化的兴趣。”

       近年来，大批新移民涌入这里，不会说普通话的新生代只能用英语和简单的中文单词与他们沟通，表达非常吃力。“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中文。至少让

       我学会说普通话，会写一些中文字。”27岁的鲍敬康，小时候随父母移居爱尔兰，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广东话，就是没勇气说一句普通话。

爱尔兰有11个华人社团。它们多属地缘和业缘的组织，有成立最早的爱尔兰华人协会、爱尔兰越南华人协会，以及近期才诞生的华人专业人士协会、福建同乡会和福清同乡会等。

       “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每一个爱尔兰华人的心里。举凡各个活动讲座，几乎都可见新旧社团的代表彼此心连心地齐聚在会堂上。他们紧密合作，集合社团优势与力量，不断地与当地官方展开对话与交流，并达成共识，为华人争取该享有的合法权益。

       随着新移民人数增多、新生代进入主流社会，华人意识到应争取自已的公民权益。爱尔兰华人专业人士协会为之出力甚多。语言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加上在爱尔兰生活、工作，切身体验到华人的需要，由他们直接向政府沟通，效果往往会事半功倍。

       “我们会与官方定期交流，反映华人社群的情况。华人和政府互动良好，向他们提出合理要求，有关部门都会友善配合。”李志扬来自香港，在爱尔兰读书生活了20多年，是爱尔兰专业人士协会的主席。“或许也因为当地政府对中国文化感到好奇，所以对我们华人特别关照吧。”

       华人常说：“在这里遇上最大的麻烦就是居留签证、工作签证等问题。即使你腰缠万贯，也会担心没有身份的问题。”

       2008年1月，爱尔兰华人专业协会领头，联合其他华人社团举办了一场让爱尔兰移民官员与华人群众面对面的问答会。会场气氛热烈、针对华人提出的许多移民问题，移民局官员均做了解释说明。

       爱尔兰以前不是一个移民国，这里的人通常只有“出口”，没有“进口”。“华人大批移入对他们来说是项挑战，他们没有经验，所以每天都在摸索，不断地效仿各国处理移民的政策，希望找到最好的方法来妥善处理移民问题。”来自香港的陈毓芳在爱尔兰居住了34年，对爱尔兰的移民政策了如指掌。

       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社团强调互助互济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办中文学校，资助有需要的学生和家庭。

       此外，爱尔兰超过4万名的中国留学生也成立了全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除了筹办各种联谊、体育和娱乐活动外，留学生也在网络上开设了爱尔兰华人论坛。论坛主题广泛涉及爱尔兰留学人员在当地的生活资讯。会员们以问一答的方式交流，为初到爱尔兰的学员解答新生活的困扰。

       华人论坛是当地华人在爱尔兰生活必备的一本活字典，也是爱尔兰最大的中文网站。爱尔兰第二代华人，亦开办了IBC（Irish Born China）网站，欢迎华人上网交流，沟通联络，但多为英语互动。

  随着中国移民大量涌入，爱尔兰的中文媒体逐渐崭露头角。一叠叠的中文报纸就在华人聚集的城镇发行。中餐馆、华人超市甚至华人聚集的大专院校，都提供免费的中文报章。店家一般都会把中文报纸放在入口处，方便读者领取。只要看见中餐馆大门被推开得比平常还要频繁，就可以估计是报纸的出炉时间了。

              中文报纸的出现，丰富了爱尔兰华人的生活。报道内容与华人息息相关，涵盖了新移民所需的各类资讯，包括二手商品买卖的价格、欧洲旅游情报以及爱尔兰政府宣布的新政策等。特别是针对那些英文阅读能力不好、忙于打工、不懂得上网浏览新闻的华人群体来说，这些随手可得的中文报纸更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爱尔兰主要有3家中文报刊，分别是《新岛周报》、《华人报》和《海外新报》。它们以周刊，双周刊以及月刊的形式定期出版，并各自在自己的网页内建立留言、活动信息、照片发布等功能，希望透过网络与读者有个亲近的互动平台。3份报刊又以《新岛周报》与《华人报》的读者较多，它们平均最高发行量约两万份，最低也达1万6000份。

       这里的中文报纸不讲求盈利，所以同行之间不存在竞争。每家报社的工作人员不多，从市场宣传到采访编件不超过6位，很多时候他们还一人身兼多职。报社的收入主要靠广告，实际也赚不了钱，每家赞助办报的集团都有其他的业务，他们主要以办报为平台，发布更多涉及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新闻，一来可以架起中国与爱尔兰华人社会的联系桥梁，二来也可以透过自己的报刊来做宣传。

       3家中文报的负责人都年轻有冲劲、想法新颖。它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包括中国内地及爱尔兰本地的媒体，像中国新闻社、新华社、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Irish Time、Daily Star、Herald等。此外，它们也与欧美17家中文媒体透过互联网建立伙伴关系。

       爱尔兰的中文报刊活跃，中国城爱尔兰华人广播电台也不逊色。电台在电波中传递着爱尔兰华人与中国的最新消息，后来发展到用中英双语穿插广播的主持方式服务新老移民。每个星期两档，分别在周五晚上7点半，周日早上十点，听众也可在线收听。它是爱尔兰华人的资讯传播站，也是海外游子分享生活空间的管道。曾经有人这么形容，只要在电台上说过的话，就可成为大部分爱尔兰华人饭后茶点的话题。

来自大连的王瑞新，在爱尔兰居住了7年，早先在中国做现场直播的主持人，说是因为酷爱爱尔兰音乐和歌手恩雅，才被吸引来到了这个国度。刚开始为了生活，曾连续打3份工，生活忙碌劳累。

       机缘巧合下，朋友把他推荐到爱尔兰电台，让他每个星期无薪主持两档中文节目。就这样，他找到了自己熟悉的舞台，成为爱尔兰第一个中文节目主持人。做节目可以让他发挥所长，也是他生活解压的渠道，就算不给他钱，他也会坚持下去。

       每个周末，他风雨无阻地透过电波，播出日常所见所间、有血有肉的华人故事，交流华人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想法和经验。

       此外，他也常参加市政府、华商以及社团筹备庆典、晚宴等活动。在爱尔兰华人圈子颇有名气的他，也是新春庆典、周年庆活动时被点名聘用的司仪。

       他在爱尔兰成立了一间文化传播公司（Chinatown Promotion Service），负责制作和筹划有关华人节庆或文化的节目。像当地有名的卡拉OK比赛、华人选美大赛、亚洲行周年庆、新年晚会策划等，都是他负责策划、主持。就连当地一家电讯公司Vodafone为了开拓华人市场，也找他帮忙作宣传。

       他认为，爱尔兰华人甚少去看、去听甚至去接触当地的新闻或媒体，但以中文为媒介语举办的话动，华人一定会踊跃参与。事实上，每次出席活动的华人人数也确实印证了他的看法。愛尔兰的中文媒体成了华人沟通的主要平台。而他，就是最好的传播者。

       在这幽雅静谧的国家住久了，王瑞新早把它当成第二个家了，他喜欢这个国家，也很习惯这里的酒吧文化。

 爱尔兰，绿草如茵，风景如画。

       这里良好的居住环境，让华人很快就适应下来，随之把家眷接来，希望可以在这美好的居住环境里经营自己的事业。加上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良好，就业机会俯拾皆是，华人实现着发财致富梦想的同时，心里早就把这里当成另一个家了。

芬兰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边，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在北极圈内。境内遍布大大小小的湖泊，有“千湖之国”的美誉，景色秀丽。广袤静谧的树林，湖滨小木屋，是芬兰最常见的景象。冬长夏短，冬天太阳只出来几小时，人们有大半年的时间生活在黑暗之中；可是夏季的光照时间长达20个小时，又被称为“太阳不落之国”。

       芬兰人笃信“认清事实是智慧的开端”，提醒自己要务实地接受芬兰是夹在大国之间小国的现实，只能靠智力来发展国家。因此，政府在教育和科技研发方面，不惜投下大笔经费。享誉全球的手机品牌诺基亚、Linux操作系统，都是芬兰人智慧的结晶。

       偏远而寒冷的芬兰，从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穷国，一跃而成为90年代科技先进、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电子资讯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成为芬兰的主要竞争优势，在2003至2005年，连续3年名列全球竞争力之首。

       它本是个非移民国家，但近年来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亟需劳动力，开始逐步放宽移民政策，以吸纳外国人才。

芬兰，默默地接纳了华人。芬兰漫长冬夜里闪烁的银莹之光，就如人生美好的愿景，吸引有胆识的华人前来逐梦。

 华人移民姗姗来迟。

       在上世纪的60年代，芬兰仍然属于欧洲的少数穷国之一。虽同是北欧国家，华人在那时候，一般都只把目光投射在瑞典与挪威。直至80年代末，他们才开始注意到芬兰。

       据说，第一个定居于芬兰的华人是陈安萍，她是因为在1953年嫁给了一个芬兰人而来到了这里。两年过后，一个名叫缪程的华人于赫尔辛基著名的高塔酒店担任中餐厅厨师。60到70年代间，又有数名华人到芬兰工作或做生意。在1975年之前，在芬兰只有大约12个华人。他们原先是到比利时、荷兰谋生，但无法在当地找到工作，随后得知欧洲北部的芬兰需要劳动力，这才辗转过来的。那时，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连芬兰在哪里都不知道！

       七八十年代，除了一些从中国大陆、香港和马来西亚来的华人外，芬兰政府也收容了三四十名越南华人难民。到了这时，芬兰的华人总数大概有三四百人，在这里开设的中国饭店也由两家增至七八家。

       芬兰政府自1986年开始便正式对外开放，放宽外国人在当地投资的政策，允许华人以技术人才的身份来到芬兰。华人于是赶紧把握时机，手上有点资本的就纷纷开设中餐馆，那时，规模不一的中餐馆越开越多、十年之内就增加到七八十家，华人人数也迅速增至1000多人。

       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华人人数增长率最快的一段时期，人数甚至翻了一倍，多达2000余人。90年代以后，华人移民开始以留学生为主体，由于芬兰大学的学费全免，吸引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前来深造。毕业之后，他们当中有些会选择在当地开设中餐馆，有些则在芬兰公司任职，从事与科技研究、电脑資讯相关的工作。这些人起初大多抱持着充当过客的心态留在芬兰，然而，在这里安顿了下来之后，就再也不想离开了。

       “大多数人都明白，在芬兰这种享有平等待遇、有政府照顾又有保障的生活，在许多国家是找不着的。”在芬兰生活了30多年的芬兰华联会会长罗伟仁，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这也是大多数华人的心声。

       “芬兰的生活安定，福利好，只要肯干，生活基本上没有问题。政府的福利太好了，有些人就算不干活，生活也不成问题，不少移民的孩子还是由政府养大的。”罗伟仁打趣地说。不过，只有少数华人移民依赖教济金过活。他们给芬兰人的印象一直是勤劳刻苦、安分守已。

       自2000年开始，芬兰的高素质教育水平，吸引了更多的中国留学生，目前，他们的人数约有1000多名。因为芬兰缺乏电脑科技领域这方面的专才，故此，学理工，资讯科技的中国留学生在当地要找一份工作并不难。留学生毕业之后，他们大部分都会选择留在芬兰，其余的有部分选择返回中国，也有的移居欧美等国。目前，单是在诺基亚公司任职的华人就有200余名之多。

       然而，大量移民的涌入，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北欧其他国家因而收紧了移民条例。不过，由于芬兰人力资源短缺，并不完全拒移民于千里之外，但却设下了重重门槛，对新移民进行严格的筛选。

       为了解决中餐馆人手短缺的困境，芬兰政府于是对外籍劳务市场实施开放政策。外籍劳工只要得到芬兰雇主的聘请，即可申办工作准证。不过，劳工部签发工作准证的标准相当严格，种种条例使外籍劳工不易入境，但是，华人仍然能够以家庭团聚或结婚为由，获得合法居留权，凡是住满了3年，便可得到永久居留权，5年后就可申请加入芬兰国籍。

       对向往美好生活的华人而言，芬兰是充满吸引力的国度。尽管眼前有许多未知数，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华人都愿意碰一碰自己运气，从不轻易放弃追求心目中理想的家园。

* *在芬兰，劳动阶级的人力资源十分缺乏，近两年来，一些芬兰公司经常到中国去招聘清洁工，不少中国人均通过这条途径而来到芬兰，并且取得合法居留权。*

体验过芬兰魅力的人，再也不想离开。

       大部分华人居住在首都赫尔辛基及坦佩雷（Tampere）、爱斯堡（Espoo）、万塔（Vantaa）等几个首都周边的城市。对大约4000名分别来自香港、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的华人来说，芬兰虽不是当初的首选，可是这个小国却给他们带来安定的生活，让他们内心充满安全感。

       跟其他北欧国家一样，中餐也受到芬兰人的喜爱，约有八成的华人经营中餐馆。

       由于华人在芬兰的历史不长，大部分华人还是第一代移民，财力有限。华社尚未成熟，无论社团或媒体，都处在草创阶段，更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精力去发展中文教育。

       友善的芬兰人、优美的环境及清新的空气，令华人的生活过得很舒适。套一句当地华人的话：“在这里只要肯干，生活绝对没问题。”大部分华人对现在享有的小康生活，深感满意。

  芬兰华人靠中餐起家，胼手胝足地在此开拓了一片天地。芬兰目前约有150家中餐馆，其中80家集中在首都赫尔辛基。

       中餐馆老板多数是第一代华人，以香港人居多。许多餐馆属于家庭式经营，这种小本生意通常不雇员工，就由夫妻两人和孩子自己来管理，近年来，一些中餐馆的香港老板年纪渐大，第二代不愿接手，餐馆经纷转让给中国青田籍人。跟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青田人也有逐渐操控芬兰中餐业市场的趋势。

       香港人跟青田人做生意的方式截然不同。香港餐馆采取传统点菜的形式，价位算是中上档次。而青田人改卖自助餐，以多元化选择、低廉价格作为招徕生意的卖点。可是，餐馆之间的价格战造成恶性竞争，影响了中餐的水准及声誉。

       其实，芬兰的中餐业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到中国去的芬兰人与日俱增，使他们对中餐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一些中餐业者希望把中餐的档次提高，使菜肴美观精致，色香味俱全，以吸引更多芬兰顾客。

       经营餐馆，就是用时间换取金钱。在芬兰，雇用员工费用很高，华人老板一般都亲力亲为。举凡采购、备料、下厨到清洁工作都一手包办，有时还要化身水电工修理水管、更换灯泡。规模较大的餐馆情况好些，至少有厨师掌镬，老板能有空闲时间。芬兰华人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工作上，他们的孩子每天放学后，一般也会到餐馆去帮忙。再说，餐馆工作的劳动量很大，长期辛劳，休息不足，到了四五十岁时，身体多少都会出现一些毛病。因此，有些经营餐馆多年的华人，会选择转行，到学校或公司去当清洁工人，或转到别的餐厅打工，每天只工作8小时，过比较轻松的生活。

       中华文化的魅力，还带动了这里的中医和武术的发展。

       芬兰人一般都能接受中医，近5年来开始认同针灸等传统中医疗法，这情况在芬兰首都尤其明显。赫尔辛基的西医还会推荐病人去进行针灸以治疗疼痛。在芬兰，目前约有50家比较正规的中医诊所，主要由芬兰人开设，华人开的反而只有十家左右，一小时的收费在40至60欧元之间。芬兰的中医诊所目前开业尚不需执照，但为了保障病人的利益，芬兰议会正在讨论有关中医立法管制及规范等问题。

       作为独一无二的传统国粹，中华武术也在芬兰扎下了根。来自北京的张放，1990年受聘来到芬兰，在一家私人武馆教授太极拳。他透露，由于芬兰人爱好体育，所以能够接受太极拳，他们把太极拳当作一项运动项目来锻炼身体。他在芬兰推广武术的过程还算顺利，更因此认识了不少芬兰朋友。

       他在1995年成立了自己的武馆，有些芬兰学生跟着他练拳，一练就是十几年，目前武馆已有200多名会员。张师傅除了教拳之外，还积极推广武术，训练及培养芬兰的选手，带领他们参加各项武术比赛，也举办过武术锦标赛。由于武术不是奥运会的参赛项目，没有获得国家的经济资助，在芬兰的发展仍有限制。不过，张放至少已将武术的种子撒在这里，让芬兰人了解了中华武术，赢来广泛的好评。

       同样来自北京的赵亦农，是芬兰华社一位有名的成功企业家。他坦言，自己并不认同早期那些一到了海外，就放弃中国人的身份，并以此作为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标志的说法。相反地，久居国外的他，却越发感到中华文化的优秀，而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把握。于是，他选择了不同的路，要向更多外国人介绍中华文化，改变他们对华人的刻板印象。

       长期以来，赵亦农从事的都是推广中华文化，或其他跟中国有关的事务。当年在芬兰大学念书时，他已开始教授武术、中国历史及哲学，来赚取生活费，现在则从事传播中国新闻的媒体工作。他目前正经营一个名为radio86的媒体，以英语制作有关中国新闻的广播节目，销售给一些欧洲国家的电台。在法国、德国、瑞典、芬兰，都可以听到他公司制作的新闻，业务发展的前景十分乐观。

       “表面看来，芬兰小国寡民，发展的机会不多，其实不然。正因为人口少，华人更少，与其他竞争激烈的国家相比，芬兰的机会反而更多。”赵亦农分享在芬兰生活了20年的心得。

 1992年，作为芬兰的第一个华人组织，华人华侨协会正式成立。同一年，芬兰华人联谊会也跟着成立，会员都是有餐饮业背景的华人。不过，由于芬兰有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华人面临的生活难题较少，所以这两个社团对华人而言并没有实际的意义，社团的活动也不多。

       2003年左右，芬兰出现几个新兴华团，例如芬中文化科技教育交流协会和华商会。2007年初，会务停顿了几年的芬兰华人联谊会，也开始重振雄风。一批有志者重组了理事会，希望为华人提供实际的帮忙，如为新移民筹划讲座，促进他们对芬兰法律的认识；成立耆青会，让退休的老华人有个交际的场地；举办中国文化活动，加强年轻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尽管知道华团的作用有限，大家还是尽力而为，分工合作，在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帮助华人解决难题，作风务实。

       年轻的芬兰华团，犹如个活力充沛的少年，正在逐步蜕变成一个成熟睿智的成年人。

       赫尔辛基目前有两个华人教会，一个是华人独立教会，信徒多是新移民；另一个是从华人教会独立出去，后来归在芬兰路德教会底下的分会，教友主要以中国留学生居多。两个教会都致力于为华人服务，但现阶段的华人，把精力主要都集中在工作上，对宗教信仰的热忱并不高。华人基督徒和佛教徒很少，信奉其他民间信仰的人也不多。

芬兰的教育素质之高，享誉全球，近年吸引很多国家前来取经。芬兰政府不只注重国民教育，还鼓励移民学习自己的母语，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芬兰政府投资庞大的经费来发展教育，目前设有英、法、俄、华4种外语班。根据教育法规定，只要有4至8名讲同一种语言的学生，就能开班请一名老师来教课。其中的华语班，又分普通话班和广东话班，华人小孩每星期有一个半小时的学习时间。

        看来，在推行华文教育方面，芬兰政府似乎比华团还要积极。

       在中国教育部和中国驻芬兰大使馆的协助下，赫尔辛基市教育局于2008年9月26日正式开办了首都第一所芬中双语学校，包括美湾小学和美湾中学。赫尔辛基市中小学教师代表与学生约500人参加了开学典礼。这两所学校，将特别为一年级到九年级的学生，安排芬中双语教学。教学大纲将遵循芬兰统一的课程内容，学生必须学习芬兰语和华语，校方也要求学生着重学习两国的文化知识。

       过去，由于华文缺少实用价值，所以华人子弟都提不起学习华文的兴趣，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海外华人及中芬混血的小孩长大后，认识到掌握了华文，不仅能扩大视野，也能增广出路。此外，有不少芬兰人开始对中国及中华文化感兴趣，因此华文成了他们学习的热门外语之一。

    从表面上看，芬兰人沉默寡言，表情冷漠，但实际上是纯朴善良、笃实可靠、宽容豁达的民族。他们的诚实，让华人感到安心。“在这里生活不用每天绷紧防备的神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单纯，很自在。”这份安心和安全的感觉，使华人在这里生活得越来越舒服。

       “生活，在于你做出怎样的选择！在芬兰生活，要忙碌还是悠闲，都是个人的选择。在这里不工作也不会饿死，很多时候，只是知不知足的问题。”1990年移民到芬兰的李小梅认为，反省生活的态度，要比盲目投入生活更加重要。

       芬兰贫富差距不大。每个人的独特性都受到尊重，不以职业贵贱或收入多寡，来制造人为的阶级鸿沟，这是让很多人感到舒服自在的原因。少了身份、地位的压力，人与人之间自然没有“我比你好、我比你有钱”的攀比心态，生活回归单纯的状态。平静的生活，给人带来平和的心境；简单地过日子，让人体会到单纯的快乐。

       由于一般芬兰人具有相当的英文水平，能以英语表达，因此华人留学生或公司的华人职员，都以英语作为和芬兰人沟通的媒介。而在华人的小圈子里，华语更成为共同的语言。语言的障碍，使华人无法融入主流的社会。

       幸好，讲求平等的芬兰人并不排外，也愿意用英语跟华人交流。因此，华人即使没有融入主流社会、不懂芬兰语，在自己的圈子里也能活得很好，只遗憾没法交到知心的芬兰朋友。

       3年前，李小梅和他的丈夫陈光结束了餐馆生意，去芬兰的乡下经营菜园。

       “现在收入虽然少了一半，但我们一点都不后悔。这种悠闲、无忧无虑的生活，使我们天天开心，夜夜好眠，跟孩子的关系也亲密多了！”两人之前从不曾想过，有朝一日，能享有眼前这种惬意的田园生活。

       这家人的快乐不来自金钱，而是来自悠闲的生活，来自一颗恬淡从容的心。

    华人当年误打误撞，闯进了这个欧洲北部的「大农村」，却意外地发现一个以完善的社会福利、人性化的制度打造出来的人间天堂。

       乐观的华人不惧凛冽的寒冬，也无畏经年不见天日的漫漫长夜，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努力耕耘着这片宁静的沃土，而梦想的实现，就是这片土地给予他们的最大回报。在这静谧的环境里，华人体验到心平气和的从容。一种简单而高质量的生活，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满足和安逸。

     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的瑞典，曾经是北欧强国，19世纪初期还统治过芬兰及挪威。不过，自1814年起，它一直谋求中立，近200年来不曾卷入任何一场战争。长期的和平稳定，以及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让瑞典跻身全世界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之林。

       这里是诺贝尔奖的故乡，也是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大音乐输出国。近年来，瑞典产品以其实用、简约的风格闻名于世，宜家、爱立信、沃尔沃等均是风靡全球的瑞典品牌。

       具有强烈东方情结的瑞典，早在18世纪上半叶就设有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开展贸易，1950年更成为最早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也正因如此，瑞典成了北欧最多华人聚居的国家。

据说，第一个踏上瑞典这片国土的华人，是一个名字叫作阿福的广东人，他是在1786年以海员的身份登陆的。

       接着，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数名浙江青田人来到瑞典。这一批华人，有些是随船到德国和法国做生意，最后辗转抵达瑞典的华商；有些则是穿越寒冷辽阔的西伯利亚，行走各地贩售中国丝绸和青田石雕，最后到达瑞典，并在这里驻留。

       1948年，瑞典合作社邀请了江苏人王绍林前来推广中国茶叶。之后，王绍林因为中国国内局势变迁，被迫滞留瑞典，直至1961年，才得以和妻儿在瑞典团聚。

       “在60年代以前，这里的华人家庭才不过十来户，而且几乎都聚集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大家彼此都相当熟。那时的中餐馆只有一家，是刘万春先生开的，而且，是从50年代便已经开始经营。”追忆早期华人移民生活的点点滴滴时，王绍林的儿子王敏行如此讲述。

       60年代瑞典的经济发展迅速，吸引了大批的香港、台湾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前来谋求生计，华人人口增至4000多人。华人靠着中餐业，迅速在瑞典站稳了脚跟，那段时期，几乎每个小城都有至少一家中餐馆。

       在70年代末，瑞典接纳了一万多名越南华人难民，并且给予他们技术方面的培训。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瑞典的中国移民也开始增加，陆陆续续有一万余人从浙江、广东和福建等地到来，他们多数从事贸易和餐饮业。

       根据瑞典政府的规定，凡是经营小企业的移民，皆可从本国聘请数名同乡过来工作。敏锐的青田人于是充分利用了此一政策，申请了不少同乡从中国过来。同时，到瑞典来的台湾人和香港人却渐渐减少。在1989年之后，瑞典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获得了居留权。然面，瑞典之后又收紧移民政策，但是仍然非常欢迎国外的留学生以及专业人士。故此，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属，增加至将近3000人。

* *1902至1904年间，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先生游历欧洲，曾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居住过一段日子。他在那段时期买下了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座小岛，这座小岛目前被北欧华人称为“康有为岛”。*

 住了半年以上，就能和瑞典人享有同等的福利，满5年就可申请入籍。

       华人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努力，在这个国度里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说，瑞典华人目前安享着中西合璧的舒适生活，融汇在两种文化间游刃有余。他们享受高素质的文明生活，不仅没有据弃华人的身份，还时时心系祖籍国的发展。

       而土生土长的年轻一族也走出了父辈经营的中餐业，投身于各行各业。他们就职于政府部门、医疗机构或教研单位，经济条件一般较好。

       这里没有唐人街，没有中文报刊，但卫星电视和网络，却让瑞典华人得以跨越地域的疆界，与祖籍国、全世界联系在一起。

 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世界闻名，国民从出生到死亡都有政府关照，经济压力远比东方国家来得小。居住超过半年的华人，即与瑞典人享有同等的福利。尽管还是忙碌周旋于工作和家庭之间，但因少了“不努力就没有钱”的压力，所以大部分华人的生活是悠闲又安定的。

       优渥的福利政策，更为有孩子的华人家庭减去不少压力。他们不但无需担负孩子的教育费，当地社会也对父母们非常宽容。“小孩病了，大人请假在家照顾，或提早下班接小孩放学，在瑞典是被允许的。换作亚洲国家怎么可能？”嫁给瑞典人的Jenny在斯德哥尔摩居住了11年，对这里人性化的福利制度，体会很深刻。

       在瑞典，国民一年享有5个星期的年假、55天的病假，瑞典人认为，不能为工作卖命或牺牲掉生活。每天工作8个小时，余下的时间该属于家人和自己。因此他们一般不喜欢超时工作，偶有逾时则必有加班费。

       这种泾渭分明的作风，在华人看来有点人情味不足。但正因为公私分明，少了人情上的压力，瑞典人才能随性地过日子。

       在瑞典工作，不存在高低贵贱的职业界限，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令华人感觉良好，但他们同时也要面对另一种压力。“瑞典人对个人能力很看重，要强过他们才能获得肯定，因此这方面压力不小，人人都会要求自己一定要有杰出的表现。”在瑞典工作了8年的张玉华表示，虽然自已在工作时丝毫不能松懈，但她却仍喜欢与瑞典人共事，因为在这里只需把工作做到最好即可，而毋需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费心机。

       在瑞典，想追求大富大贵的生活并不容易，因为这里工资虽高，但税额也非常惊人。不过，在强调公平的原则上，瑞典政府和企业，一般都愿意给移民提供机会。对瑞典华人来说，只要肯努力展现实力，又对工作充满热忱，就大有迁升的机会。总而言之，“实力”是赢得瑞典人青睐的关键因素。

       此外，无论你在什么年纪想转换人生跑道，在这里都会受到尊重和鼓励。不少瑞典人中年重返校园，追求全新的知识和技能，在人生的中途重新出发。瑞典社会鼓励人民不断地学习创新，提倡“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瑞典政府同样也为移民提供再教育、再工作的机会，华人受到这种精神的感染，充分利用各种学习的机会，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天天准时上下班而少应酬的工作，让华人有更多时间投注在家人和朋友身上，乐享天伦。休闲时，他们或锻炼身体保持健康，或沉浸在个人兴趣中，生活悠然而写意。“这里生活中的诱惑很少，人容易平静下来，知足常乐地享有平衡的生活。回到中国，反而觉得内心很浮躁。”在瑞典居住十几年的张彦君笑称，自己过着农民般的生活，但从骨子里感到舒坦。

  在尊重女权的瑞典，女人们大多非常独立，婚后普遍继续外出工作，不愿在经济上依赖男人。生活在这样的国度，华人女性也向瑞典女性看齐，过着自食其力，不仰赖男人的生活。她们有着自己的思法，谈吐爽直而个性鲜明。她们全身心投入工作，一步一脚印，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瑞典以双薪家庭居多。因税额惊人，物价不菲，夫妻俩往往都得工作，因此女性无需为了家庭而放弃事业。在这里没有“帮”老婆做家务的说法，夫妻俩共同分担家务是理所当然的事。各自付账，也是男女平等的一种表现。无论情侣约会，抑或一家人上馆子用餐，习惯上都是各付各的，连夫妻之间的账目也都清楚分明。

       虽说是男女平权，但华人女性始终还是比较辛苦些。毕竟在东方家庭，男人心底终究不易摆脱“家事女人做”的成见，在夫妻俩都外出工作的情况下，华人妇女还要兼顾家务及孩子，承受的压力不言而喻。

       在瑞典，离婚的女人也比较容易被社会接受。据调查，这里有半数以上的人离过婚，再婚现象也很普遍。“即便婚姻出现了问题，瑞典女性也很坚强，甚至有尊严地活得更好。”离婚多年、独立带大3个孩子的华人女子Judy如是说。此外，瑞典完善的社会福利，也给了单亲妈妈很好的保障，让她们不用为经济发愁。离婚妇女不但每月能固定领取房屋津贴，小孩也享有从小学到大学教育费全免的优惠。

       社会福利提供的保障和关怀，是女人在瑞典得以独立自强的关键。她们往往变得更加主动，勇于坚持自身的权益，敢于追求自身的幸福。

       受当地风气影响，若婚姻出现了问题，瑞典华人女性一般都有离婚的勇气，并且也会考虑再婚，而不会像传统的东方女性，在社会压力下选择“孤独终老”。有趣的是，一些离过婚的瑞典男人，再婚对象都比较喜欢找温柔的东方女性。

       在这片允许追逐梦想、鼓励终身学习的土地上，女性的自身价值可以得到充分的实现。华人女性在这里活得充满自信、神采飞扬。

 瑞典的华人与其他北欧国家的华人一样，大多靠中餐馆起家。全瑞典目前有300多家中餐馆，其中在斯德哥尔摩的占了三分之一。近年来，瑞典又出现不少泰国和日本餐馆，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早期，经营中餐馆的大都是香港和台湾人，但由于第二代都不愿接手，只能转让给对中餐业野心勃勃的青田人。

       精明能干的青田人最了解瑞典人的需要，他们善于通过价格战，以低廉的产品吸引顾客，一般多卖自助餐。90年代以来，这里的中餐馆开始流行自助餐，只要70至80瑞典克朗，就可以任凭食客吃到饱，成功吸引了很多顾客。

       由于瑞典的雇员工资偏高，为降低成本、中餐馆多采取家庭式经营，只要大妻二人加上一两个工人就行了。“跟从前相比，瑞典的中餐已经没那么好做，一来是越来越多料理餐厅的出现，二来是近几年来税务局查得很严，赚钱容易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目前多数中餐馆仅在苟活的状。“从父亲于里接过中华酒楼十多年的张慧芳，对这行业了如指掌。

       中餐馆难做，但聪明的华人善于变通，在困境中另辟蹊径。

       随着瑞典人越来越注重健康饮食，清淡的寿司开始受到人们的青睐。一家又一家的寿司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目前在瑞典约有300多家。小小的寿司店经营起来远比中餐馆来得容易，人手需求亦不多，更没有烹煮时呛鼻的油姻，因此吸引了不少华人投身其中。

       对具备中餐业经验的华人而言，经营寿司店易如反掌。一份寿司售价70至120克朗不等，利润比中餐高。加上瑞典人喜欢叫外卖的习惯，租一间小小的店铺就已足够。“每天来去就是这几种口味的寿司。瑞典人饮食习惯保守，因此也不用变换什么花样，只要生鱼片够新鲜，就会有顾客上门。”寿司店老板李静开店一年，分享她的经验之道。

       华人开拓了一条餐饮业的新出路，多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策略的转变，令华人餐饮业的前景变得明朗起来，加上欧式生活的悠闲步调，他们在瑞典过得越来越好。

  瑞典华社自1960年代开始成型，发展迄今已有40多年。然而，瑞典的国家福利好，华人们都活得很舒适，没有什么顾虑担忧之处，所以社团发挥不了大作用，华人的参与度也就不高。

       近几年来，比较活跃的有3个社团，分别是香港人居多的瑞京华人协会，凝聚青田人的青田同乡会及越南华人创办的潮州同乡会。3个团体之间关系融洽，瑞典华人的主要活动，大多都是它们合作推动起来的。

       “华人觉得哪里好，就会往哪里去，现在没多少人要来瑞典了。七八十年代来瑞典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很多人留下发展，可是从90年代起，多数留学生毕业后都选择回去。中国现在发展快、机会多，这里相对来说是闷了点，爱热闹的人就呆不住。”连任十几年瑞京华人协会会长的李润生感叹道。

       瑞典的青田人，明显要比当地其他华人来得团结。2002年，青田人侨领叶克清，想要以组织的形式为青田人谋取更大的利益，于是成立瑞典青田同乡会。目前该会已发展成拥有3000名会员的组织，在瑞典华社扮演着重要角色。

       青田人的餐馆事业闻名瑞典华社，他们凭着团结、灵活和彼此间高度的信任，在餐饮业上互相扶持。他们一般只需3年，就可从打工仔晋升为老板。如今，大部分青田人都有了不错的经济基础，除了在中餐业稳住阵脚，不少人也成功经营电脑生意。

       “我们青田人的目标很简单，出来闯荡就是为了赚钱养家。青田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密切，你有需要就开口，一定有人肯把钱借给你开业。生活上也没什么好担忧的，只管努力工作就行了。”在斯德哥尔摩经营一家小餐馆已有3年的林老板，吐露这些年在瑞典打拼的心声。“每天都很忙碌，在餐馆里转来转去的，可是忙得很踏实、很开心。”辛劳付出的回报，让他享有当前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还有下一代良好教育的保证。

       叶克清一家，在瑞典华社可谓家喻户晓。他也是从经营餐馆起家，后来逐渐转向批发进口生意，并与瑞典人合开多家连锁店。如今叶氏实业公司的旗下，拥有贸易公司、零售连锁公司、房地产公司及金融投资公司等，生意日趋壮大而多元化。几年前，叶克清还组织青田人回国，进行投资考察，在蒙古投入巨资开发房地产，已获得了可观的回报。

       2008年初，青田同乡会开办了瑞青中文学校。“这是回馈华社的第一步。瑞典的青田人多是农民出身，教育水平不高，瑞典语也不好，为此他们吃了不少亏，所以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我们都希望，这学校能提高孩子们的教育水平。”叶克清的次子叶沛群，热情满腔地道出了父亲办校的初衷。

       叶沛群是个典型的第二代华人知识青年，乐观自信，在事业上积极进取。从小在瑞典接受西方教育，熟悉中西文化的他，目前协助父亲发展中国的地产事业。“我们接下来将发展更多生意，尤其要找机会跟瑞典人合作。有了在中国投资的经验，对我们进军瑞典的地产业很有帮助。5年后，瑞典将有一间富丽堂皇，专门接待中国人的宾馆！”叶沛群对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和期望。

       青田人是在瑞典迅速崛起、活力十足的华人群体。假以时日，也许他们不但可以在商业经营上大展拳脚，也能为整个华社的瑞典生活带来更多的贡献。

* *除了瑞青中文学校，瑞典还有一间历史颇为悠久的瑞京华人中文学校，为这里的华人子弟提供每星期一次的中文课程。此外，在瑞典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也有专设的民族语言课程。凡是有父母一方不懂得瑞典语，其子女便有资格免费接受这项教育。华人父母一般都会踊跃申请这一项课程，好让他们的孩子每个星期都可以上2至4小时的中文课。*

   瑞典人拥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他们非常重视仪表，给人一种高傲冷漠的印象。在华人眼中，瑞典人不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淡漠态度，就是过度讲究礼貌，使彼此有着无形的距离。瑞典人多半活在自己的小圈子，连对朋友都很冷淡，平时跟华人的关系更是君子之交，因此华人一般都觉得他们难以亲近。

       讲求尊重与民主的瑞典人，虽然不是特别喜欢华人，但也并无歧视之见。相对于其他好吃懒做，仰赖政府供养的移民，他们其实更欣赏华人的自力更生与奉公守法。然而，瑞典人对华人的了解终究不多，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更导致人民之间无需彼此帮忙或照顾，而只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各自生存。

       瑞典华人，也和其他海外华人一样，遇到移民普遍面临的问题——融入。在这方面，有人如鱼得水，也有人遭遇重重困难。

       有人说，划地自限，往往正是一些华人移民无法顺利融入当地的原因。例如，一些华人刻板地认为，在瑞典华人只能在餐馆打工，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目前在瑞典公司担任科技部门主任的吴金凤，笑谈路上遇见一名陌生华人的经历。她还未及向对方说明自己的工作，对方却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你在哪间餐馆工作？”

       吴金凤刹那间突然有所领悟，原来许多华人之所以迟迟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是自己设下了限制。“为什么华人自己就有这种刻板的印象——我们只能在餐馆打工呢？”这个在瑞典生活了20多年的台湾女子，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

       黄敏行则以老移民的经验指出，华人应该努力寻出一个最恰当的自我定位：既建立对这个国家的情感，又不失去华人的身份认同；既拥抱中华文化，又拥有瑞典朋友，放开眼界去欣赏当地的文化艺术。

       “第一代华人把自己当成是外来客，被第二代认为根本没有融入瑞典。于是就出现一种逆反心理，什么都是瑞典化，结果矫枉过正。”定居瑞典将近50年的王敏行这么感慨道。经过这么久，他知道不管华人如何瑞典化，当地人始终把他们当作移民。“这也有好处，至少让华人保持清醒，别丢掉自己的身份。你就是你，何必一定要区分中国人或瑞典人？只要找到融通的办法，在瑞典生活一样没问题！”

       的确，若为进入瑞典社会而抛弃华人的身份认同，这样的代价未免太高。

瑞典目前有一万名越南华人，其中大多是在1979年以难民身份迁移过来。南部城市马尔默（Malmo)是最多越华居住的城市，但他们散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越华的第二大聚集地是忆基斯都娜（Eskilstuna)。

       在忆基斯都娜这个距斯德哥尔摩一小时车程的城市，住了大约1000名越华，其中近六成为潮州人。不少人已在这座小城生活了二三十年，彼此都非常熟悉。见了面，他们总以潮州话或广东话亲切地交谈。

       他们在这里成立了潮州同乡会和耆青联谊会，凝聚当地的老人和青年，并租下一间会所，让会员们在周末有个聚会的落脚处，进行联谊活动，增添生活的乐趣。

       越华性喜低调，对生活没有太大的野心，安享着眼前的稳定和保障。他们多数经营餐馆或亚洲食品商店，目前瑞典的五六家规模较大的亚洲食品批发行，都是越华在经营。

追求幸福安宁的华人，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下，凭着毅力、勇气和汗水，终于舒适地生活在瑞典这高福利的文明国度里。

       展现自我，尊重对方，正是瑞典华人悠游于中西文化之间的体悟。

丹麦号称“西北欧的桥梁”，位于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由西兰岛（Zealand）、菲英岛（Funen）和日德兰半岛（Jutland）及406个小岛组成。它具有北欧国家的典型特色——经济发达、高福利、高收入、高税收、高消费，虽是北欧最小的国家，但其首都哥本哈根却是北欧最大、也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在历史上，丹麦王国曾经非常强大，统治过挪威、英格兰、苏格兰大部分以及瑞典南部。后来它国力式微，节节战败，丧失了大部分国土。战后，丹麦致力发展专业化农业，成了世界主要的农国之一；同时，它工业发达，外贸是国家的经济命脉。

       和平、民主与平等的浓烈气息让丹麦成为世上人民最快乐的国家。在这里生活的1万5000名华人，他们是否也过着童话般幸福、快乐的日子？

   最早把华人带到丹麦这个童话国度的是杂技团。

       在1902年的夏天，有34名华人来到趣伏礼公园（Tivoli Garden），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华人村”展览，成员多为香港及广东人。始料未及的是，丹麦人对华人的兴趣居然远远多过其他种族，仅是短短两个月的展览，他们就吸引了十多万个当地观众。

       前来趣伏礼公园参加展览的34名华人当中，据说有8名单身汉、两对夫妻以及5个孩子，在展览结束之后继续留在丹麦。

       留下来的华人，变卖手头上的中国货品之后，积累起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的找到短期的工作，有的就在丹麦的茶馆里充当跑堂。

       不过，随着丹麦人对华人的兴趣开始消退，留下来的这一批华人，大半都在谋生方面遇上了困难，不少人在1906年以前就离开了丹麦。真正留下来的只有3名娶了丹麦姑娘的华人男子。此外，也有一些海员在1904年滞留在丹麦。

       早期的华人移民当中，有大半是香港、广东以及海南文昌县的海员，还有来自浙江青田的小商贩。在1930年前后，大约有10名华人从德国转来丹麦，以买卖青田石雕，或经营古董为生。后来，由于丹麦政府移民法令的限制，华人人口一直都没有多大的增长，直至1949年，在这里的华人移民只有区区37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一批港台华人辗转移居包括了丹麦在内的欧洲国家。而丹麦的移民政策也开始放宽限制，加上60年代因经济发展而引发的劳工短缺等问题，均为华人打开了入境的大门。

       华人很快便适应了丹麦的生活。与此同时，因受到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华人的影响，中餐业也开始于丹麦崛起了。由1960年至1965年间，中餐馆从5家增至10家，到了60年代末，丹麦华人在餐馆业已经声名大噪。

       来到1970年，已有为数500名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华人留居丹麦。他们之中多数以餐馆为业，或在餐馆里打工，那时候就职于当地公司的华人并不多。大体而言当时的华人可说是仍然活在丹麦社会的边缘。

       接着，又有一群越南华人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之间，陆续以难民的身份进入丹麦。过后，不少人就以投亲或家庭团聚为由，申请家中其他的成员过来。保守估计，当时的华人人数至少超过5000人。在80年代以后，丹麦的华人人口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中国留学生则已成了丹麦华人新移民中的主体。

       1979年，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到丹麦求学。首批到来的留学生后来绝大部分都留在丹麦发展。随着两国之间不断加强文化交流，赴丹麦的中国留学生也逐年增加。而完成学业后，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留了下来。

       直至2002年初，当地政府修改移民条规，增添了入籍考试。之后，就再没有多少华人能以家庭团聚、到中餐厅工作或婚姻为由，获得丹麦的居留身份了。

丹麦约有1万5000名华人，其中半数左右已入籍。来自福建、浙江及广东的华人，占了一半以上，其余则是越南、香港、台湾及新加坡华人。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哥本哈根、奥胡斯（Aarhus）、奥登赛（Oderse）、奥尔堡（Aalberg）等大城市。

       将近七成的华人，在丹麦从事餐饮业，而知识分子居多的新移民，则大半任职丹麦公司，从事电脑、通讯等科技工作。只有少数华人，涉及贸易、零售、中医等行业。华人的经济起步较晚，企业规模都不大，然而行业的范围却在扩展之中。

       丹麦华社虽不大，却有20多个华人组织。华人重视子女的中文教育，年轻人的中文水平普遍不错。然而，中文报刊及宗教团体的发展，就差强人意了。

       对当地华人而言，丹麦是个安乐窝。生活尽管单调、平淡，发展空间也有限，但他们明白“平淡是福”的道理，随遇而安。如今能拥有丰衣足食、安逸舒适的生活，华人无不怀抱着一颗惜福、感恩的心。

不少丹麦华人，都以中式烧烤店（Kina Grill）起家。

       所谓中式烧烤店，其实也就是西式快餐外卖店，只是改为华人来卖烤鸡、汉堡和薯条等，或兼卖一些春卷家及中国风味的食物，为当地人提供更多的选择。

       据说，第一家中式烧烤店是由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海南人所创，没想到竟大受丹麦人欢迎，其他华人也纷纷跟起风来。区区两三万丹麦克朗，就能自己开家烧烤店当老板，试问谁能不动心？当时，烧烤店在丹麦一时蔚为时尚，甚至在大雪纷飘的冬天里，还有不少丹麦人冒着风雪排队买烤鸡呢！

       不过在早期，经营一家烧烤店并不容易，餐馆通常需夫妻俩共同打理。在30多平方米的小店里，两人要一边带孩子，一边忙着做生意，每天至少要忙上12个小时。从天亮到天黑，每件事他们都得亲力亲为，可以说一分一毫都是用血汗辛苦挣回来的。

       如今在丹麦，烧烤店的数量已经不如住昔。丹麦的中餐馆基本已发展出烧烤店、外卖店和餐馆3种类型，全国共有约300家，单在哥本哈根就有258家。

       有趣的是，丹麦人在中午不爱吃热食，一般都以简单的冷食为午餐，到了晚上才上馆子去享用热腾腾的晚餐，因此，中餐馆一般从下午才开始营业。

       丹麦人的饮食习惯较为保守，喜欢选择相同的菜色，于是中餐馆以熟客的生意居多。“在这里，中餐不像中餐，老外都帮我们改了，中国菜都要迎合老外喜欢的口味。丹麦人喜欢多汁的菜，不管点什么，总会先加进酱油、胡椒粉。”广东楼的李老板说。

       这几年，丹麦人的饮食习惯逐渐改变，倾向多菜少肉，讲求健康味美，因而中餐馆也就开始面临高素质厨师短缺的问题。

       此外，丹麦的餐饮业竞争日益激烈，中东移民所开的餐馆，价格尤其便宜。一些餐馆为了招徕客人，竞相降价，引发了同行间的价格战。因此，大家的利润被分薄了，开餐馆再也不像早期可带来丰厚的回报。加上丹麦令人咋舌的重税制度，对华人而言，可真是一个不轻的负担。

       开餐馆，诚然是个苦乐参半的行当，工时既长，税务又高。然而，只要有市场，也肯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这一点，让那些往往既是老板，又是员工的华人深感踏实，心理压力也就没那么大。

   外在客观因素的变迁，也为华人带来了新机会，使他们逐渐脱离卖中餐的宿命。

       从前，餐馆界的老移民们忙着赚钱，既节俭又没有多少时间去消费，因此服务业难以兴盛起来。然而，随着华商知识分子日渐增多，改变了当地华人固有的商业结构。

       很多华人开始尝试走进其他行业，从餐馆走向了超市、旅行社、理发厅等服务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在毕业后找到工作而留下来，作为高收入群体的他们更需要那些专为华人服务的行业，如律师所、驾校等。近两年来，丹麦还出现了由华人成立的投资顾问公司。

       另外，那些在丹麦当工程师的华人，中年以后擢升不易。这些人在寻求新出路的当儿，更倾向自行创业，充分运用自身在丹、中两国的经验和关系，投资一些经营良好的小工厂。例如，他们会买下丹麦的品牌，在中国制造产品，然后再回销到欧洲各地。

* *丹麦有一位著名的“春卷大王”，名字叫作范岁久，他成功地将中国点心变成了世界快餐，并且创立了30年不倒的大龙春卷品牌，其产品畅销欧洲、美洲、亚洲、甚至非洲等20多个国家。*

    目前，丹麦有20多个大小不一的华人团体。在这里，只要3个人就能注册成为一个团体，因此大家都按着各自的需求去成立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彼此间尚未整合起来。

       “当前的丹麦华团主要扮演着娱乐、联谊的角色。其实，社团应致力于为华人铺设一条融入当地的渠道。我总是告诉华人，进入主流社会并不可怕。”丹麦唯一的华人女议员王立智一针见血地指出，华团尚未发挥最大的作用。

       就人数的规模来看，丹麦华人总会及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是目前两个较有实力的组织。但由于成员背景不同，两者各自为政，少有交流。

       国家安逸的环境，加上完善的福利制度，也让华人对参加社团缺乏兴致。

       丹麦华人总会主要由经营中餐馆的老板组成。在北欧国家，它是唯一拥有自身会所的华人组织，属下还设有中文学校、工商会、妇女会和文化娱乐中心，为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华人提供各种福利。

       中文学校在每个周六开办中文课；工商会则与丹麦的供应商进行磋商，为以餐馆业者为主的全体会员，争取购买货物的优惠，谋求福利；妇女会则不定期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此外，华人总会每年还定期举办春节及中秋联欢会，以及武术、太极拳和舞蹈等培训班。

       2000年成立的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会员大多就职于丹麦的公司、企业或研究机构，在丹麦拥有丰富的生活与工作经验。他们除了协助在当地学习和工作的华人了解并融入丹麦社会之外，也致力于加强中、丹双方各领域学科技术的交流，促进经贸合作。这群知识分子具备着语言和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影响力不小，也能为丹麦华人作出更多贡献。

       或许，当地华团尚未有整合的需要，因此大伙儿各自运作，还未能团结起来发挥出最大的力量。然而，自从出现了一位华人女议员后，华团出现了转变的契机。

       “100年来，丹麦华人从没公开庆祝过春节，华团都是关起门来自已庆祝。”

       王立智发现，华人在当地主流社会的曝光率极低，既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没有参与感。于是，在华人前来丹麦100周年的2002年，她代表华人群体找上了市长，献议在市政厅举办春节活动，还找来媒体加以报导，并邀约首相献上春节贺词。

       于是，从2002年开始，每年邀请当地政府和人民共同参与春节庆祝会，成了丹麦华社的重头戏，华人也因此朝融入丹麦社会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丹麦华人心中的美好生活，就是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一所舒适的房子，以及孩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

       丹麦教育制度完善，从小学到大学都提供免费的教育，18岁以上的学生还有生活津贴呢！

       对餐馆业者而言，教育是避免孩子再步上自己后尘的方法。至于知识分子，则更明白身处于这个信息和知识世界，为孩子培养优势的重要性。

       因此，华人家长更乐于将孩予送到私立学校去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从小打好学业的基础。除了丹麦语之外，他们也让孩子掌握英语、德语或法语等其中一种欧洲语言。

       基于这份坚韧的信念与执着，使丹麦的中文教育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当年，丹麦华人总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办中文学校，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中文学校校长，华人总会前会长林荣宗如是说。1993年，幸而得到侨领范岁久捐出十万克朗作为创校经费，中文学校才能顺利创建起来，发展成今日具有200名学生的规模。

       每逢周六，会所里总洋溢着热闹和欢乐的气氛，大人小孩挤满整个会所，大有“华人之家”的味道。一些家长边等孩子下课，边在沙发上聊天，要不就在一旁静静翻阅那些从中国订购的中文报。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在中文教育的发展上也不落人后，每逢周六固定在一所公立学校租借的儿间教室里开设中文课。这批知识分子很重视孩子的中文教育，认为集体学习效果会更好。此外，他们也在1996年开办了“美人鱼中华文化学校”。一转眼十多年过去，美人鱼中华文化学校每周吸引75名学生，浸濡体会中华文字及中华文化的奥妙。“上完这里的课，孩子至少具备汉语水平考试的水准，再辛苦都是值得的。”一名正在等孩子下课的家长欣慰地说。

    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华人已成为丹麦外来移民中最受尊重的一群。他们给当地社会留下了勤奋守法、积极进取的美好形象。

       华人在丹麦自食其力，工作勤奋又诚实缴税，很少有人失业。应邀参加华人聚会的丹麦移民大臣，就曾幽默地说：“如果外来移民都能像华人一样，那我这个移民大臣就要失业了。”

       早期，大多华人皆赤手空拳而来，为了生存，日子再苦再累，也仍须咬紧牙根挨下去。他们都积极栽培下一代，企盼着他们成龙成凤，能凭专业知识在丹麦公司觅得立足之地。

       岁月悠悠，如今很多华人都已经小有成绩，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孩子们也都已成才，不负所望地在丹麦公司任职，父辈们心中的重担总算可以放下。苦苦耕耘了大半辈子，他们总算盼到“上岸”的这一天，轻抚着岁月留在掌上的老茧，安享清福。

       这一切，对于生活要求不高的华人面言，已然心满意足矣。然而，过于平静的生活，也容易让人感到空虚。尤其在漫长而不见阳光的冬天，或逢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会使人特别惦念亲人朋友间的关怀与温情。

       丹麦华人普遍觉得，这儿就是少了点人情味。西方的个人主义，加上完善的福利制度，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难有深入发展的机会。大家都只顾自扫门前雪，不像东方社会的关系深厚，人情味浓烈。

       不少华人，须得长期跟家人朋友们分隔两地，心中自然感到若有所失。

       “如今什么都不缺了，除了亲情！”华人心中总会不时冒出这些感慨。

       华人新移民，一般都有不错的工作，享有优裕的物质生活，然而他们有时难免会感到有所缺憾。当年到丹麦留学，继而留下来发展，不少人在家乡还有一对年迈的父母，因此心底恒有一份沉甸甸的挂念。

       而对于年纪已大，苦尽甘来的老移民来说，悠悠日子里伴着浓浓的乡愁，让言语不通的他们倍感寂寞。

       其实，丹麦的生活安稳平静、医疗免费，很适合老年人居住，但不同的文化氛围，就难免会让他们觉得孤单清冷了些。

       每逢周四早上至下午4点，十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华人老移民，会在社区的老人活动中心定期聚会。这些老人大多都是从餐馆业退休，为孩子咬紧牙关熬了半辈子，如今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搬出去了，他们如释重负。

       现在，如何打发漫漫长日，是他们要面对的人生课题。

       老人中心的华人义工说：“其实，老人也有社交的需要。他们会在这里弹琴唱歌、聊天聚餐，或看看中文报，或彼此用熟悉的语言聊聊近况。”75岁的杨老先生，慢条斯理地说：“自己要找活动来打发时间。除了每星期参加老人中心的活动，我和太太也会天天去游泳，花很多时间来锻炼身体。”

       有些老华人，并非没有告老还乡的念头。“可是，回去了就得放弃退休金。缴了这么多年的税，如何轻言放弃？再说，离开中国20年，回去也不习惯了。”移居丹麦近20年的李女士，娓娓道出了心中的矛盾——相信这也是当地老华人们普遍的心情写照。

       李女士和丈夫，好不容易把女儿拉扯成才，了却了最大的心愿。如今，夫妻俩生活轻松，吃住都不愁，但却避不了心灵上那挥之不去的孤单感。

       她坦言，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家里始终都是外人，跟丹麦人关系再好，还是融不进去。这些年，她都以自己的方式过生活。日常生活中，她跟当地人维系着单纯和睦，却不深的关系。“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也许不一定会出来了。短短20年间，中国已经发展得这么好。别人以为我在外国很风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看来，该如何学会去适应孤单、面对寂寞，是这群丹麦老华人，所必须完成的功课。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丹麦华人也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2001年底，在哥本哈根市进行的议会选举中，来自台湾的王立智成功当选，成为丹麦第一位华人议员。

       丹麦的市议员算是一项荣誉性的工作，并不属于公务人员。这位十几年前远嫁而来的台湾女子，白天作为一所商学院的高级行政人员，工余才担负市议员的工作。然而，许多华人因搞不清楚情况，老在白天来找她帮忙，致使她常在本职工作和议员任务两方面分身乏术，忙得不可开交。

       从政7年，王立智对丹麦华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从前，华人需要一个帮他们解决个人问题的公仆，现在他们已开始展现融入的意愿，要的是一座桥梁，以便展开一些较长远的事务，例如举办奥运游行、悼念四川震灾死者等。”

       王议员多年的夙愿，是能为丹麦建造一座中国城。有了中国城，就能吸引中资企业的到来。除了作为华人的商业据点之外，中国城还可以发展为丹麦的旅游景点。

       她也希望在城中开辟一条文化街，街上尽是售卖正宗中国菜的中餐厅。充满创意的她，还计划用乐高积木，在中国城里砌出一座故宫，以展现丹、中融合的特色。

       除此之外，她还有意为当地的老华人争取更多福利。例如，在规模大一点的老人院内，增设专门收容亚洲老人的部门，并调派一些懂中文的护士，特别关照那些不懂丹麦语的老华人。

       无论如何，她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持续协助不同群体的华人顺利融入当地生活。

丹麦平淡的生活，正好满足了一群知足常乐的华人。安徒生笔下的小美人鱼，为了与朝思暮想的王子见上一面，不惜付出化作泡沫的代价。如斯勇气，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为了追求美好生活，丹麦华人的勇气也并不亚于小美人鱼，一路走来同样承载了不少的风雨。

       终于，仿佛航进了一个避风港，海湾的水域风平浪静，船只得以平稳舒缓地向前驶去。当地华人，终于得以安然欣赏沿途的美景，不再忧心忡忡于狂风骤雨的来袭了。

挪威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翠绿的山峦，壮美的冰川，以及那永昼、永夜的极地奇观，令它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它曾是欧洲落后的国家。然而，20世纪70年代在北海发现了石油，挪威迅速发展为一个发达、先进的国家，且连续多年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除了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出产国外，挪威农、渔、牧业，也非常发达，大批出口的三文鱼，更是享誉全球。2007年，人均收入还名列世界第一。

       经济的腾飞，吸引了荷兰、比利时等其他欧训国家的一些华人到来，短短数十年间、下少华人已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

 中国青田人陈特浩，是第一个闯荡挪威的华人。1932年以后，他先后在法国、意大利和丹麦逗留过，再辗转来到挪威，决定留下来发展。

       他一开始在码头捕鱼，卖给当地人。由于言语不通，他只得比手划脚和当地顾客作买卖，总算换来三餐温饱。

       1966年，陈特浩用多年积攒的资金，开设了挪威的第一家中餐馆——中国楼：

       中国人与挪威人，饮食习惯大异其趣。挪威人在第一次尝到中餐菜肴后，赞不绝口！于是口耳相传，中国楼在奥斯陆迅速窜红起来，每天门庭若市，许多挪威人都在排队等吃中国菜。

       除了陈特浩、20世纪上半叶到来的华人，大多是在挪威船上工作的海员：在船只靠岸之后、他们往往只是下船补充一些日用品，或顺道逛逛当地的商店，短暂逗留一阵、就匆匆上船离开了。

       早期有一家“良记行”香港船员代理公司，相信每个华人老海员对它都会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

       那期间，几名海员眼见挪威没几家中餐馆，就决定留下来。他们合作凑足资金后，开了一家中餐馆。就这样，这批华人在挪威扎下根来，中餐馆血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

       70年代中期，挪威政府接纳了大批的越南华裔难民，致使华人人数在数年内飙升至千多人。

       80年代以后，当地中餐业日益走红，亟需劳动力，政府于是开放门户，许多华人闻讯而来，充当厨师及餐厅工人。这些人持有合法工作证，先是作短期居留，住满3年，便可申请长期居留权，7年后就可入籍。

       90年代后，中餐业的热潮逐渐冷却下来，政府颁布新政策，华人再也不能以厨师身份入境。然而，挪威优质而免费的教育，每年吸引了很多中国学子千里负笈而来。呆了几年，有些人爱上这儿悠闲宁静的生活，决定留下，在当地公司从事技术、科研的工作。另外，有的夫妻也从小本起家，合力经营小餐馆。

       而今，这些毕业后留下的学生，已成为挪威新移民的生力军。

 北欧各国，福利制度完善，华人过着悠游的生活。其中，又以石油生产国挪威的华人，生活最为富裕。

       挪威目前约有一万名华人，大多来自中国的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地，有些来自越南。华人主要集中在首都奥斯陆，其次是卑尔根（Bergen）、斯塔万格（Stavanger）等大城市。有八成的华人已入挪威籍，至少定居了十年以上。

       在当地，华人主要仰赖餐饮业为生，有六至七成的华人投身这行业。至于第二、三代的华人，具有较高学历，又能掌握当地语言，有的加入当地的政府或科研机构，有的担任大学讲师或研究员，有的则成为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会计师及工程师，只有少数涉足贸易、地产、旅游和轻工业等领域。

       华人拥有自己的中文刊物《北欧华人通讯》，还有华人社团及宗教组织等，这些都是华人保持联系的媒介。

  在挪威，华人经营的大大小小的中餐馆及外卖店约有200多家。

       中餐馆大多是小本生意，大规模、气魄恢宏的大饭店较罕见。由于请员工须缴交高税额，法令又偏向维护工人的利益，所以小型中餐馆一般是家庭式的，从掌厨、收银、捧菜、洗碗、乃至打扫卫生等工作，都是动员全家成员，大家分工合作。

       中餐馆的营业时间很长。天刚破晓的清晨时分，业主就要忙着购买鱼肉蔬菜，带回店中切割清洗，上午11时开业，直至午夜12时才打烊，营业时间长达十余小时。

       中餐馆的收费，属于中等价位，顾客以挪威人为主，华人一般不会光顾。他们大概觉得价格偏高，味道也不算正宗，要吃家乡菜时，宁可自己在家烹调。

       华人经营中餐馆有年，经验丰富而善于观察，很快就摸透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只要注意卫生，维持食物的水准，就会生意滔滔。当地人的胃口，喜欢又酸又甜的咕咾肉，或用酱油拌炒的牛肉、鸡肉杂烩。“只要将肉类和蔬菜一起炒，多放酱汁就行了。”老板笑呵呵地说。

       如今，日本餐在当地非常流行。由于当地的午餐时间短，而寿司吃起来省事又方便，因此大受欢迎，被视为卫生又营养的餐食。于是，中餐馆也卖起寿司，价格比日本餐馆还要便宜两三成，深受上班族和学生们的欢迎。此外，有的餐馆也提供越南餐，有的还设置露天座位，甚至兼开酒吧、摆放撞球台等，让客人边喝酒边看球赛。

       在中餐业的全盛期，奥斯陆的餐馆曾多达40至50家，而今只剩下20家左右。由于年轻一代不愿接手，该国目前也不再接受厨师移民申请，传统的中餐馆因而遇到了瓶颈，可能走向衰退。最后，唯有那些跟上潮流、成功转型为高级、精致路线的餐馆，才能继续生存下来。

       近年来，华人也开拓了一些新商机，积极从事中、挪出入口贸易。但由于挪威市场不大，再加上中国厂商兴趣不大，营业额还是有限。

 华人与挪威人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待生活的态度。

       挪威的生活环优良，国民十分讲究生活的素质，重视物质生活享受。不过生活节奏较慢，做起事来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华人做事却讲究效率，时间就是金钱。

       挪威华人平时忙于工作挣钱，闲暇时一般不是打牌、搓麻将，就是搞聚会，大伙儿一块吃火锅、烤肉。遇到暑假或圣诞假期，许多人还会回国探亲，或出国去旅行。

       由于出外用餐消费高，华人习惯在家中料理三餐，多以中餐为主。他们可以在超市购买品类齐备的中国酱料，以及大部分需要的食材。受挪威人影响，有些华人也是以火腿、乳酪充当早餐。有时，一杯咖啡与三明治就解决了午餐，可是晚餐就比较丰盛了。

       勤俭的华人，即便在物价惊人的挪威，也同样能想出省钱的法子。每当超市促销特价食品，华人便借机大量进货，囤积在冰箱里备用，长期下来，就能省不少钱！

       华人多数时间都蜗居在店中或家里，很少出外花天酒地。挪威人在冬天喜欢滑雪、夏天爱晒太阳，华人却并不热衷。不过，他们总期望每年回老家一趟，探望亲友，一解乡愁，即使花费再多，也在所不惜。

在华人将中餐引进挪威以后，挪威文中才出现了“Spisepinner”（筷子）以及“Vårrull”（春卷）这两个新词。

80年代移居过来的华人，如今熬出了头，行有余力，便参与社区活动。他们是华社的生力军，已酝酿着将当地华社，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其中，由十位侨领于1988年联手创办的挪威华人联谊会影响力最大，不知不觉已走过了20载。

       华联会仿佛一个老成持重的大哥，引领着其他华人组织，彼此精诚合作，在必要的时候发挥集体力量来解决实际问题。挪威华社现共有14个组织，社团间互通有无，往来频密。

       然而，华人平日忙于生计，鲜少有时间与精力参与社团的管理与活动。再说，奥斯陆的租金昂贵，要物色一个适当的会所，供会员聚会活动，委实不易，因此社团活动不多。

       但华社仍然关注中国事务。2008年5月四川发生了大地震，挪威华社就动员起来积极赈灾，各界反应热烈，共筹得高达80万挪威克朗的款项。当奥运火炬传到欧洲时，挪威媒体特别挑起了西藏独立的议题，还发表了不属实的报道。华社自发组织起来起草新闻稿，发到当地各大媒体去，详尽解说了西藏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的渊源，终于平息了当地媒体对中国的不满。

 挪威移民中，有知识分子群体，意识到加深与当地人接触及融入主流社会的重要性，于是展开行动。2003年，这批曾经留学挪威、毕业后留在挪威工作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旅挪学者联合会，会员们多任职于当地大公司。比起老华人，他们与挪威人的接触较多，彼此在工作上合作愉快。他们扮演了民间、乃至中国与挪威之间高层次交流的桥梁角色。5年后，会员从40名增加到300名，在华社的地位及影响力已日益壮大。

       “挪威华社对我们期望很高，因为我们懂挪威语、有知识，得以与挪威社会有更高层次的交流，代表同胞争取权益，甚至有人希望我们能出来参选。”联合会主席张秀华的脸上，流露出自信的光彩。华人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社会上越来越被认可，在与西方社会交流之际，他们显得更有自信，俨然肩负了发扬中华文化的使命。

       2004年，奥斯陆举办了首届中国文化节，获得空前热烈的回响。文化节幕后劳苦功高的推手，是两名当地的华人女子。她俩有感于挪威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实在太肤浅，于是萌生了筹办中国文化节的念头，并马上付诸行动，积极动员、呼吁华社的支持。

       “我们原来只怀着一个单纯目标，就是想让挪威人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文化艺术。没料到，竟赢来了挪威社会及华社的普遍好评。”文化节节目策划人Elise Chen满怀欣喜地说。中国文化节从此被列为挪威的重点文化活动，每3年举办一次。

       忠于理想，勇于实践，挪威华人踏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在挪威长大的华人子女，因受到挪威人的濡染，思想性格也显得单纯、诚实与直率。

       然而，华人家长却觉得孩子过分追求个人自由，缺乏礼貌与责任感。“这里长大的孩子都变成‘鬼佬鬼妹’啦！对他们不能管得太紧，但幸好这边环境比较单纯，不容易学坏。”3个孩子都在当地出生、成长的李道瑛笑着说。

       一般而言，父母只要有意识地常用母语跟他们对话，子女就多少可以掌握方言或普通话。不少人在国内还有亲人，每隔一两年都会带孩子回国，让他们浸濡在华人的环境里，培育他们对华文及中华文化的兴趣。

       新移民很重视第二代的中文教育，担心孩子若没能掌握自身的语言和文化，将会失落了华人的身份认同。另外，他们也意识到中文的地位和价值日益提高，连挪威人都热衷学习，更何况是华人子弟！那些嫁给挪威人的中国女子，一般也会让混血的孩子去中文学校上课。

       奥斯陆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创立于1995年，目前有220名学生。除了华社的支持，学校还接受政府的部分津贴。

       每个星期天早上9点左右，华人家长陆续牵着孩子们来到这里。女校长袁军一早就笑盈盈地站在校门口了。

       没有这位浙江舟山女子孜孜不倦的付出与坚持，并牺牲了十几年来的假日星期天，中文学校不可能办得这么成功，更遑论有现在的规模：12个中文班、中华舞蹈班、书法班以及太极拳班等等。

       袁军说：“学校不仅教授中文，也鼓励孩子接触中华文化。透过学习相关的课程，能激发孩子的兴趣。他们不少在上过中华文化课后，就想要学中文了。”学校希望透过灵活的方针，吸引更多孩子走入中文的世界。

       针对教育问题，华人父母的态度始终比较严肃，会担心孩子学习得不够充分。然而，挪威长大的华人孩子，在各方面都已经“挪威化”了。他们自小生长在这物质优越的环境，终生受到政府的照拂，也跟挪威人一样不甚看重金钱，想法单纯，也不担心学习成绩对未来出路的影响。他们不再有上一代华人的忧患和重负，是懂得拥抱生活、真正融入挪威社会的一群。

挪威人有句俗话说：「没有坏天气，只有不适当的衣著。」

       华人欠缺的，就是仍未能如挪威人一般敞开胸怀，尽情拥抱生活的美好。

       天气一直在变，但天气好坏，关键在于人的感受和心态。气候是这样，生活难道就不是吗？

   有人会以为冰岛异常寒冷和荒凉。可是你能想得到吗？它其实是由火山聚成的。2000多万年前北大西洋深处的一次岩浆喷发，铸就了孤悬海外的冰岛，因此它还得了个“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痕”的雅号。身世的奇特赋予了冰岛冰火交融的奇景，故而又被称为“冰火岛”。

       冰岛全境有3/4是高原，1/8被冰川覆盖，冰川面积约8000平方公里。但这并不是冰岛的全部，它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地热资源，温泉数量居全世界之冠，那是岛上的火山赐予的传奇，境内共有火山二三百座，其中有许多是活火山。

       这个岛国邻近北极圈，是地球上少数可以看见极光之处，它四面环海，人们可出海赏鲸鱼、海豚、候鸟。

       或许，有人会认为，在这片靠近北极圈生活的人，得要忍受凛冽寒冬、漫漫长夜。殊不知，冰岛也有着宜人的温暖，它是“北方的暖国”，这要归功于流经其南面和北面的北大西洋暖流和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使得冰岛虽多雪多雨，但冬暖夏凉。来到冰岛的华人都慢慢懂得了如何享受这里温馨恬淡的冬夜，还有阳光沁人的夏日。当然，他们享受到的远不止这些。

在公元8世纪以前，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冰岛的存在。即使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整座冰岛的华人也不足5名。

       冰岛的渔业相当丰富，在渔场谋职自然就成了早期冰岛华人最主要的行业。

       说起渔场工作，来自马来西亚的老华人Daniel Lee 颇有感触：“从以前到现在，华人在渔场找工作最容易。尽管薪水较高，但那里的工作量非常大，而且很辛苦，当地人都不太愿意去做。”他回忆说，“30年前，华人在渔场工作的月薪就有2000至3000美元，有的渔场还提供免费住宿。”

       20世纪80年代可说是华人移居冰岛的巅峰期。在那段时期，冰岛还曾经邀请中国的运动健将到这里来担任体育教练，而且前后达40来个人，有些运动员在完成任务之后，决定留在这里，而他们的家属也相继移民冰岛，共享天伦之乐。

       此后的20年里，到冰岛来的华人人数缓慢增长。根据当地华人的说法，截至2007年，单单是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华人总数，已缓慢地增加至大约750人。此外，还有少数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

       在2000年以前，冰岛的移民政策是比较宽松的，据说，曾经有超过100多名非法居留的华人都成功入籍冰岛。不过，近年来冰岛的移民政策日趋严格，只要发现有人逾期居留，移民局就会即刻通知警方将之遣送回国，故此，基本上，如今冰岛境内已经没有非法居留的华人了。

冰岛总人口约32万，限于地理条件，人口密集度非常高，首都雷克雅未克就集中了全岛60%的人口。这里约800名华人，同样也主要居住在雷克雅未克及其近郊。

       华人多来自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身份大部分是老板，也有的是体育教练、研究人员，还有留学生和家庭主妇等。

       尽管国家高度发达，福利制度完善，生活无忧，但许多华人由于语言不通，在生活上还是面临着不少大大小小的困难。他们大都会把生活难题的解决方法寄托在华人华侨协会上，这是冰岛唯一的华人社团，它就像寒夜中的一盏明灯，给他们温暖和安慰。

       华人似乎非常满足这里的生活，更在这个洁净的民主国度里自由地展现着自我。

  这个岛国上的居民，原本是一群与海搏斗的渔夫。然而，时来运转，渔夫们一个个换上西装，打起领带成了银行家，他们玩起钞票的功力和捕鱼一样了得，在短短数十年内，冰岛就一跃成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首五名之一的发达国家。

       2007年，在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上，冰岛更取代了挪威成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位居世界首位。华人在这遥远的世界边缘，一边品味着瑰丽的景致，一边享受着高速发展的经济和优厚的福利所带来的舒适生活。

       冰岛太遥远了，听过冰岛的人未必想要来这里看看，但到过这里的人却肯定难以割舍那份异样的挂念。因为，这里就是那样的纯净与美好。

       目前，约有20名华人专家和学者在冰岛大学、国家医院、基因研究所、国家歌剧院和疗养院工作，待遇优厚。大概有100多名华人在冰岛的渔业加工厂、服装厂和食品加工厂工作。针灸、武术等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在当地也颇有市场，只是目前都在起步阶段。

       冰岛华人的月收入一般为3200美元，有些甚至达5000美元，虽然收入不菲，但由于冰岛消费奇高，即便有自己房子的人家，一家三口的每月开销也要大概2500至3000美元不等，故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兼职。

       在冰岛最好的兼职莫过于做导游。冰岛凭借其奇特的地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其中华人的身影也是越来越多，当地还有3家由华人经营的旅行社。夏季是冰岛的旅游旺季，许多华人就干脆当起了兼职导游，一面享受难得的阳光，一面赚点外快。

       “在冰岛生活，比在自己的家乡还要自在。”几乎所有居住在冰岛的华人都这样认为。“这里不讲究太多礼节，大家不分你我，下属可以直呼老板的名字。你在大街上看见总统，甚至可以直呼他的名字并和他打招呼，这里有着很简单的人际关系。”华人华侨协会前会长王华胜说。

       这里民主、自由，人人平等。只要你在这里生活，不管你从哪里来，冰岛人能享受到的，你就一样也不会缺少。

       曾经有个承担冰岛东部大电站工程的意大利承包商廉价雇用中国电工，支付每人每月仅约150美元，这个数字非但不及冰岛人同种工作岗位的十分之一，甚至低于中国大陆的工资水平。

       这件事曝光后，不仅引起当地华人的愤慨，更触犯了冰岛法律，最终冰岛工会勒令意大利承包公司按照冰岛法律条款，对所有员工实行同工同酬。“意大利公司的行为在冰岛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当时冰岛唯一的华人杂志《冰花》对此事的评论。

       公平和谐的就业环境，简单友好的工作氛围，政府的一视同仁，让以艰苦勤奋著称的华人尝到了工作和生活的乐趣。

       雷克雅未克有五六家中餐馆，招牌多为冰中双语。美味多样的中餐为人们的饮食带来了更多的选择。餐馆装潢也颇具匠心，处处透着中国的传统特色，成为传播中华文化另一种无声的形式。餐馆老板多为越南、香港华人，而厨师则多为马来西亚华人。这里的中餐口味融合了南洋风情，别具风味。

       不过，华丽的餐馆并非华人日常光顾之所，多数华人还是享受在家里烹调的乐趣和温馨。嫁到冰岛的马来西亚华人袁慧芝就对家乡美食的滋味难以忘怀，幸好她居住的环境多为华人邻居，闲暇时，大家聚在一起，搓面粉，蒸包子，擀面条，互亮拿手绝活，别有一番情趣。“我以前是十指不动阳春水的，现在连叉烧包都会做了。”她笑着说。对他们来说，若要在冰岛吃到熟悉且好吃的家乡菜，只有靠自已了。

       虽然冰岛偏僻、遥远，但要买到地道的中国食材也并不难。当地有一家曾是菲律宾华人开的迷你超市，货架上多是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进口的调味料、特产和果蔬，深受华人喜爱。不过，在冰岛还是吃鱼比较划算，这里的鱼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像鳕鱼、马哈鱼等，是华人餐桌上最常见的菜肴。

       冰岛全国的热水、用电都是利用无污染的天然地热资源得到的，因此尽管冰岛消费水准很高，但水电费用却很低廉。“随手扭开水龙头就有纯净的矿泉水喝；地底下的温泉水供应不绝，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家洗热水澡；室内的暖气炉提供无限保暖，在家里穿件单衣就可以了。”在雷克雅未克大学就读牙医科的张诚说。

       几乎每个华人在冰岛都住得舒心，他们珍惜与满足目前的幸福生活。

有时候，华人会淡淡地冒出一句：“生活有些单调”，但他们马上又会加上另一句：“当然更多的是恬淡和快乐。”

       生活单调，一是因为华人少，另外多半有语言障碍的原因。虽然在冰岛用英语沟通没有问题，但真正要融入当地社会中，拓展社交的范围，冰岛语必不可少。

       对于还不熟悉冰岛语的华人来说，冰岛华人华侨协会和中国驻冰岛大使馆都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鼓励他们学习冰岛语，参与当地活动，有时还会帮忙找房子、找工作、办居留手续等。

       冰岛华人华侨协会成立于1995年，其前身为冰岛华人联谊会，由热心华人事务的王华胜等人发起组建。作为冰岛唯一的华人社团，冰岛华人华侨协会在保护华人权益、共商发展，以及凝聚侨心等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每年都会举办多次华人聚会和文化交流等活动。

       1995年至2006年，协会还曾版了41期的《冰花》杂志，这是冰岛唯一的华文刊物。如今虽然因为资金短缺等原因已停刊，但在协会网站上仍能自由浏览到以前各期的内容。

       近五年来，每逢春节的第一个周末，华人华侨协会就会带领由当地华人自己组织的业余醒狮团，在雷克雅未克市中心或商场前举行舞龙舞狮游行和中国功夫的表演。虽然没经过什么专业训练，但他们也把狮头龙尾舞得似模似样，在冰天雪地之上，热情四射地展示“龙腾狮跃闹新春”的景象，吸引了无数的冰岛人和游客驻足。有的甚至被这种热烈的中国文化艺术所感染，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到游行队伍中。

       冰岛华人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他们来的时间短，因此对故国有着很深的依恋之情。为了让远在家乡的亲朋好友了解远在“极地火圈”的他们，趁着春节之机，他们冒着严寒，浩浩荡荡地来到冰岛著名的间歇泉，在摄像机前向中国观众拜年。该节目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国新闻》和《新闻六十分》等节目中播出。

       除华人已有的传统节庆外，圣诞节和复活节也已成为冰岛华人心中颇为重要的节庆。每到这些日子，华人华侨协会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聚餐和复活节乡间别墅度假聚会等活动。在独特的冰岛奇景中，郊游、烧烤、泡温泉、登山、滑雪、打保龄球，在如诗如画的山水间，留下了他们美好生活的足迹。

     有人说，极夜的漫长让书籍成为冰岛人最好的伴侣，有人说，绮丽的山川让他们充满想象力，也有人说，冰岛人继承了祖先的浪漫与思考，《尼雅尔萨迦》传奇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荡气回肠的《埃达》史诗更被誉为文学奇葩。“冰岛人用智慧弥补了他们的贫瘠。”丹麦中古时代历史学家萨克索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冰岛的教育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百余年前，这里就已经完全消除了文盲。全国总人口仅30多万，但在校的学生就达十余万。冰岛大学是冰岛的最高学府，2006年师生总人数达一万人。此外，许多冰岛人还会选择到英美等国进修。

       孩子们在冰岛学习是轻松的。这里的教育针自由而开放，没有竞争的压力，只有追求知识的乐趣。接受冰岛教育的华人子弟，冰岛语流利且很自然地就与当地小孩打成一片，但中文方面有些欠缺，他们多数仅能够会话，阅读和写作能力较差。

       这是让在冰岛的华人比较无奈的地方，一方面华人孩子少，另一方面师资也缺乏，所以除了1996年由华人华侨协会支持邹凤兰办过一期儿童华语班后，十几年过去了，一直没出现新的华语学习班。多数华人家长会选择在孩子假期的时候把他们送到中国补习华文。

       华人努力地融入冰岛，而冰岛人也对华人的一切充满好奇，在冰岛的各类媒体中，从来不乏有关华人的报道。冰岛从50年代起就有很多学习、翻译中文的学者和作家。早在1953年，冰岛就成立了带有官方性质的冰中文化协会，旨在推进两国文化的交流。

       前冰中文化协会的会长阿索尔·海尔加松是位盲人，一曲《东方红》让他深深地迷恋上了中华文化，他不仅倾力向冰岛人介绍中华文化，也积极地让更多的华人认识冰岛。

       近年来，冰岛政府也非常重视举办中国文化节活动。文化节内容包括中国文物展、艺术展、音乐会、杂技演出等。中国文化节的举办让冰岛人有更多的机会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神奇魅力。

       在冰岛，你甚至能交到“赤诚相对”的朋友。其他国家华人见面不是握手，就是递烟，而冰岛华人的待客之道却是请你一起泡温泉！冰天雪地之中，将赤裸的身心沉浸在大地恩赐的温暖中，此情此景真仿若已登仙界，生活中的烦恼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除了温泉，能让冰岛人和华人一样迷恋的就是好酒，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煮酒论英雄。夜阑人静常常和喧闹的酒吧形成两个世界，每个周末都是不可放过的狂欢夜。

       冰岛人纯朴、诚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上，华人离乡的惆怅也就逐渐被这洁净的社会慢慢地淡化了。

  卜军夫妇来自北京，他们俩身上似乎流着游牧民族的血液，喜欢到处闯荡。1997年的夏天，他们来冰岛旅游，一下子就迷恋上了这里的人文与生活环境。

       1998年，他们透过朋友在雷克雅未克买了房子，第二年，他们放弃了中国的高薪工作，义无反顾地到冰岛来生活。

       他们的专业是电脑，但是，在这里丝毫无用武之地。“冰岛的人口很少，电脑行业市场很小，加上这里的网页都用当地文字，我们不懂冰岛语，根本没办法在这里继续从事老本行。”

       为了生存，夫妻俩只有另辟蹊径。“在冰岛旅游时，我们都住在Guest House，发现这里的房间特贵且选择又少，后来，经过充分的市场调查，我们认为在冰岛从事旅馆生意前景会很好，便下定决心在这里经营旅馆了。”他们在房价低时，把位于雷克雅未克Laugavegur街道上的101号的房子买下来并重新装潢。2002年，以101 Reykjavik Guesthouse为名，他们的旅馆生意正式开张了。

       101 Reykjavik Guesthouse有20间大小不一的睡房，环境明亮干净。“我们细心地呵护房子的每个细节，打扫时甚至连床底下的缝隙也去擦，大部分的客人都误以为我们是新开张呢。”卜军自豪地说。

       夏天是冰岛的旅游旺季，也是旅馆最繁忙的季节，人手经常不够，夫妻俩常忙得通宵达旦。“即使工作时间长，我们也觉得舒服，因为这里的人很讲信用也很自觉，他们要退房即使找不着老板，也会自动写张小字条留言并把钱留在柜台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他们会赖账，或给你制造麻烦。”卜军说。

       “这里的人文环境很好，当地人友善、朴实，大家不会耍心计或者尔虞我诈。当地人看问题非常简单，很多事情都很好商量。他们从不对华人有偏见，反而还会很热心地给予帮助。”

       就是这份令人舒心的工作环境，让他们舍不得离开。

       还有，这里的人情味，也让他们特别留恋。“冰岛的华人虽少，但人情味十足。在夏天，当我们忙得焦头烂额，顾不上吃饭时，朋友们会主动蒸好包子，做好辣饼送过来，适时地‘救济’我们，让我们感到特别温馨。”

       冬天是冰岛的旅游淡季，很多酒店或廉价旅舍都会关门休息，卜军夫妇的旅馆则多以月租形式出租给学生。夫妻俩也会趁此空闲期间和孩子回北京探亲。“冰岛虽好，然而我们的家在中国。等女儿长大了，我们俩就回北京定居。”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冰岛，这个「冰与火」的世界，似乎比世界上其他「幸福的家庭」更为幸福，令人向往、陶醉。

       可惜的是，享受到这份幸福的华人是那样的少。

  这里所谓的“其他国家”包括了巴尔干（Balkan）半岛诸国，波罗的海（Baltic）东岸三国及其他小国。巴尔干半岛从来就是一个火药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是烽火连天，遍地硝烟。对华商而言，这是个危机，也是个商机；是个“金矿区”，也是个“地雷区”。经过了近20年的拼搏之后，华商已在这里奠下坚实的根基。至于波罗的海东岸与其他小国，由于商机不多，在这里的华人尚处于创业阶段，未成气候。

 本篇章将阐述欧洲3组国家的华人概况，这些国家包括：（一）巴尔干半岛的斯洛文尼亚（Slovenia）、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简称波黑）、塞尔维亚（Serbia）、黑山（Montenegro）、马其顿（Macedonia）以及阿尔巴尼亚（Albania）。(二）波罗的海东岸的爱沙尼亚（Estonia）、拉脱维亚（Latvia）以及立陶宛（Lithuania）。（三）散布欧洲各地的其他小国，包括：圣马力诺（San Marino）、摩纳哥（Monaco）、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安道尔（Andorra）以及摩尔多瓦（Moldova）。

       巴尔干半岛位于战略要冲，种族多元，宗教歧异，历史渊源错综复杂，造成种族间矛盾重重，积怨极深，被喻为世界的火药库。一战结束后，巴尔干竟出现了一个联合王国，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及马其顿组成，1929年改称为南斯拉夫王国。第二次大战期间，南斯拉夫被德国侵入占领，受到很大的破坏。大战结束后，1945年成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又改称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80年，随着领导人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各成员国种族矛盾日深，宗教冲突日益严重，政局与社会动荡不安，终导致内证分裂。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及马其顿先后宣布脱离联邦而独立，因而引发了内战，波黑境内的伊斯兰教徒（波斯尼亚人）、基督教徒（克罗地亚人）与东正教徒（塞尔维亚人）互相杀戮。内战延续了3年，直至1995年，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及塞尔维亚才在巴黎签署和平协议，结束了内战。联合国也派遣维和部队6万名，驻扎在波斯尼亚境内，维持和平。1992年，塞尔维亚与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又爆发了科索沃战争。科索沃（Kosovo）原是塞尔维亚南部的一个自治省，但其居民90%是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仅占10%。阿人不满塞人 的管辖，要求独立自主。为了达到目的，阿人组织“科索沃解放军”，人数约有4万人，常与塞军发生流血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向塞尔维亚施压，要求塞军全面撤离不果，于是便向塞国大肆轰炸，迫使塞国就范，签订和约。嗣后科索沃宣布独立，北约成员国迅速予以承认。2006年，黑山脱离南斯拉夫，宣布独立，这意味着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彻底崩溃。

       南斯拉夫在铁托统治下，与苏联决裂，走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路线。30年来（1950-1980年），南斯拉夫的工农业虽有进步，但经济发展步伐缓慢，劳动力生产率下降，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和外债增长，国内经济发展趋势摇摆不定。

       自从1991年独立自主后，诸共和国经济情况日渐好转。但由于受到战争破坏程度大小不一，从而影响到各国社会与经济的进展。斯洛文尼亚的情况最好。它原本就是前南斯拉夫最富裕的共和国，几乎赶上欧盟一些国家如希腊与葡萄牙的水准。独立后农林渔业、石油矿产都大有进展，且受到战争的冲击不大，所以最为突出。其次是克罗地亚，自1991年独立以来，其经济政策主要是推动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及维持财政金融稳定。它的工业原本就有稳固的基础，如纺织、石油产品、木材、钢铁制品、食品及造船工业都有长足的进步。

       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经济显得萧条，失业率居高。如马其顿，经济仍以农林业为主，工业发展落后，只有农业加工及家电、机械等轻工业。阿尔巴尼亚，一度被誉为“社会主义的明灯”，自20世纪90年代改制以来，即表现了十足亲西方的姿态，加强寻求与欧美先进国家合作，并积极参与国际或区域性经济组织。无奈多年来国内政治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贫困，失业率居高不下。

       波罗的海东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都经历了外来侵略的共同历程。它们在1940年或被苏联兼并，或被迫加入苏联，人民因抗苏而遭屠杀与驱逐。直至1990年才宣告脱离苏联，成为独立共和国，并获得苏联的承认。从此逐渐靠拢欧美阵营，最终加入欧盟及北约。

       90年代以来，三国都推行经济改革，不遗余力，生产增值卓有成效。在推动市场计划的方针下，扩大了欧盟成员国的出口，增加贸易额。爱沙尼亚农业与工业生产有显著的提高，居于三国的领先地位。拉脱维亚原是三国中工业较先进的国家，改制后将重点放在具有出口潜力的产业，包括木材加工、制纸业、食品加工、资讯、电子机械工程金属加工、化学与纺织业。立陶宛的经济改革也制造了无尽商机，成功地吸引外资来投资设厂。

       至于其他几个小国，圣马力诺位于意大利的中北部，被意大利国土所包围。旅游业很发达，其发行的邮票蜚声全球，有“邮票王国”的称誉。摩纳哥位于欧洲西南部，三面为法国所环抱，南面濒临地中海，旅游业与赌城蒙特卡洛（Monte Carlo）的收入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列支敦士登地处瑞士与奥地利之间，工业、邮票业与旅游业是三大经济支柱。安道尔位于欧洲南部，农业、商业与旅游业是国家主要收入来源。摩尔多瓦则是内陆国家，北部、东部和南部与乌克兰相邻，西部与罗马尼亚连接；盛产葡萄酒，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

    中国自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准许中国人移居海外。此后十年间（1976-1985年），中国人或以“家庭团聚”、或以“特殊劳工——厨师”身份为由，申请入境欧洲。移民多是浙江温州及青田人，目的地主要是西欧。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西欧的移民人数迅速增加。

       接下来的数年间（1986-1993年），是中国移民进入欧洲的高潮时期。移民初期仍然注目于西欧（英、法、荷兰）及南欧（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国家。移民除浙江侨乡外，几乎还包括各省各县的新移民，其中尤以福建族群最突出。

       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边境贸易的开放及中苏长途商贸的兴起，为了追逐厚利，便有名闻一时的“倒爷”应运而生。他们肩挑手提大包小包中国货品，长途跋涉，一路上向顾客兜售，从莫斯科转道进入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

       80年代末期，苏联发生了“政治大地震”，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先后宣布脱离苏联，独立自主。而苏联不得不宣布解体，改名为“俄罗斯联邦”。接着有些国家对华人移民大开门户，华人可以免签证入境，华人移民于是蜂拥而至，卷起了东欧国家华人移民的狂潮。在匈牙利，短短的两三年间（1989-1992年），就有3万中国人入境。每年进入罗马尼亚境内的也高达上万人。但好景不常，匈牙利热很快就冷却下来，该国因华人移民的大量涌入，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与种族冲突问题，政府于是把华人驱逐出境，又限制移民入境，华人备受排斥，离境的华人很多，有些回国，有些另觅栖枝，再移民到其他国家去。其中一部分移民到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去。

       9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主要是塞尔维亚）的华人只有百多人。但到了90年代末期，华人移民涌入，人数骤增。南斯拉夫总统马尔科维奇对华人入境网开一面，至1998年，南斯拉夫的华人大约有上千人，他们多聚居在首都贝尔格莱德（Belgrade）。据移民局的统计，2000年南斯拉夫合法居留的中国人约有7000到一万人。这里的华人很少有作长久居留之计，多数人以它作为跳板，最终的目的地是西欧及北美。他们的原籍多是青田、温州及福建，也有极少的上海人与北京人。入籍的很少，多数人仍然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20世纪90年代初期，波黑境内爆发了内战，战争期间，物资缺乏，食品不足，虽然危机四伏，生命朝不保夕，却制造了不少商机与契机，华商头脑灵活，洞察时势，把握商机，不怕冒险，相信有不少华商发了战争财。但战火平息后，波黑当局却对华人移民严加控制，所以人数不会激增。据2003年4月17日《解放报》的文章报导，波黑的中国人当中，至少有400人获得了萨拉热窝（Sarajevo）的居留证，并迅速扩展商业网。华人多聚居在首都萨拉热窝及第二大城市巴尼亚卢卡（Banja Luka）。他们以青田人居多，其次是福建人。

       “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在前领导人霍查的铁腕统治下，闭关自守，孤立自处，国穷民困。20世纪90年代之前，除了少数中国留学生外，这里几乎没有华人的足迹。90年代之后，阿尔巴尼亚才对外开放门户，善于捕捉商机的中国商人，便陆续闯荡过来。

       华商先是摆设地摊，贩卖中国商品。由于价廉物美，甚受阿国人民欢迎。嗣后他们渐渐聚集在首都地那拉（Tirana）的梅德尔赛街开店营业，形成了“中国街”。但阿国政局动荡，社会不安，华人谋生不易。尤其是1997年发生了全国大动乱，群众冒死闯入军火库掠夺武器，打家劫舍，华商损失惨重，有人因而离去，可是旋踵又有人到来。据调查显示，阿国的华人约有5000人，大部分来自浙江温州与青田。他们多数没有入籍，仍持有中国护照。

       斯洛文尼亚政府为维护本国人的权益，对外来移民管制严厉，华人移民需具备特殊条件，所以入境的新移民人数不多。据调查，这里的华人不会超过1000人，多数持工作准证，其中以青田人居多。

       波罗的海三国的华人极少，移民潮尚未出现，这可能是基于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是这个地区的商机不多，华商发挥的空间不大，赚钱不易，以致华人裹足不前；其二是政府严格限制外来移民入境，如立陶宛对华人移民的限制越来越严，规定厨师及翻译等专业人员必须有5年以上的从业经验，并持有相应证书才可申请，来工作两年后需回国重新办理工作申请，再来工作两年后就不能继续工作。这一来，使爱沙尼亚的华人人数只有百余人，其中留学生、中国使馆人员及家属就有近百人，其他多是经营小本生意的商人。

       至于欧洲其他小国的华人，也是人数极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国家面积小，人口少，生存空间不多。

  如前所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半岛国家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前南斯拉夫的几个国家，闹分裂、搞独立。独立自主后，它们的社会与经济制度便开始转型，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这表现在积极吸引外资，向外开放自由市场，及打开外来移民的门户。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国新移民开始涌入巴尔干半岛国家，而这地区也为新移民提供了有利的创业条件。

       接着几年来，巴尔干半岛陷入炮火连天的局势。而1999年爆发的科索沃战争，再度使局势恶化，导致北约国家的介入，对塞尔维亚实行经济制裁。在这动荡不安的非常时期，物资匮乏，人民贫困，消费力低，他们买不起价格昂贵的欧美产品，而价格低廉的中国货品，由华商带入当地的市场，正符合消费者的需求，中国商品因而大为走俏。

       对中国新移民而言，动荡的巴尔干半岛，既制造了危机，也制造了商机。一些华商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凭着华人刻苦勤俭的美德，或肩挑手提，沿街摆卖；或经营小商店，售卖百货；或开设贸易商行，作中介代理；或经营中餐馆，赚取利润。总之只要是能够赚钱的行业，华商无不涉足其中。所以当地的华商说，这里是个容易赚钱的地方。

       不过也正如一些华商所形容：这地区既是“金矿区”，也是个“地雷区”。有些胆大心细的华商，在短短几年内，就从赤手空拳的地摊业主，摇身一变而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据说当时有的苏州华商在一年之内就赚了300万美金。

       说这里是“地雷区”，是因为这里黑势力猖獗，营私结党，横行霸道，专以华商为敲诈对象，强收“保护费”，华商只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更叫人担心的是，一旦发生暴动，一些群众便趁机强行进入华人商店，烧杀掠夺，华商一生心血，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因此华商都小心翼翼，不敢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深恐放长线钓大鱼，会遭来全军覆没之殃，因此都是采取打游击的策略，尽量在短期内多赚钱，一有风吹草动，便收拾行囊，转移其他战场。由于政局不稳定，活跃于投资设厂的港台商人，对这地区都投鼠忌器，不敢贸然涉足。

       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华商，多从事餐饮业、杂货业、百货业及贸易业。不过大同中也有小异，以下是各国的个别论述：

  塞尔维亚华人以从事商贩业、出入口贸易及餐饮业居多。

       华商多聚集在首都贝尔格莱德。这里的70号商城，就是著名的唐人街，街旁竖立着数百间华人商店，售卖各种中国货品，包括皮包、服装、玩具、鞋袜、手表及装饰品等，琳琅满目，价廉物美，吸引了顾客近悦远来，人潮川流不息，除了当地人以外，还有邻国的买客，也不惜千里迢迢到来办货，使中国商城平添了几许热闹。

       这里的华商主要是温州人。温州人是最早移民欧洲的中国人，他们善于经商，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他们身在异乡，凝聚力特强，先行者总是提携后进者，因此结合成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向各行业进军。

       华商除了是流动摊贩、摆地摊业主外，也是零售商及贸易出入口商，贸易商与中国大陆的厂商建立起联络网，代理输入中国的商品，然后分销给零售商。实际上，一些成功的华商都是出身于地摊业主，经过多年的奋斗后，才攀上社会的高层。有“南方70号商城”之称的新世纪中国商城创建人郭晓，便是一例。

       正如欧洲其他国家的华人一样，塞国的华人也投资经营中餐馆，属于中小型家庭式的居多，不过却有三几间餐馆的建筑物红墙绿瓦，红色灯笼高高挂，显得古色古香。其中以北京饭店和新香港饭店最有名且较具气派。顾客多是高官豪客及中上层阶级人士。比较为食客熟知的菜肴有宫保鸡丁、春卷、京酱肉丝及酸辣汤等，当地人大都爱好中国菜，连电视台也特别加以介绍，好让观众耳目一新，进一步领略中国精深博大的饮食文化。

    波黑的中国人，主要是青田人，其次为福建人，多聚居在首都萨拉热窝及第二大城市巴尼亚卢卡。华商中以流动商贩、零售商及杂货商居多。售卖的货品种类繁多，包括服装、鞋帽、玩具、瓷器、五金、装饰品及电器用品等等。华商异常活跃，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华商开设的商店。境内有布尔奇科特区中国大市场，这里是华商最大的聚集区。波黑的中国商品，多来自浙江的义乌，产品精致，价格低廉，符合市场需求，很是畅销。

       华人也在各地经营中餐馆。中餐馆很受当地人的喜爱，生意红火。一些当地人爱吃中国菜简直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甚至可以连续几年一直指定要宫保鸡丁和炸春卷等菜肴。

       波黑连年战争，死亡枕藉，残垣断壁，几无一片净土。但对某些人而言，既有危机亦有商机，香港人郭伟江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例子。郭氏原是香港的贸易商，1996年由伦敦来到萨拉热窝，希望在废墟中寻找商机。他认为战后对物资的需求很大，一定有赚钱的机会。经过了一番努力，克服了一连串难题，他现时有两间店铺，一间是走平民路线的小型百货店，另一间是专卖女装的时装店。他卖的女装主要由香港进口，颇受当地少女欢迎。他不但有店铺，更有货仓。他的下一个计划是在萨拉热窝开一间香港式的餐馆，走高档路线，客源以欧洲的军人和联合国人员等高收入人士为主。

  这里的华人有800人左右，多来自浙江青田。主要经营餐饮业，少数人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

       目前斯洛文尼亚每个城市至少有一家中餐馆。首都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则有30多家，甚受当地饕餮的欢迎。其中以“中国长城”饭店开张时间最长，经营规模最大。餐馆营业时间长，但利润颇高，业者盈利丰厚，多置有房产，并备有豪华轿车代步。

       据食客反映，中国饭菜咸淡适中，不油不腻，口感独特，而且价格不贵，人均一餐花费15欧元左右。所以一些当地人每个月都会来光顾好几次。连总理罗普对中国菜也情有独钟，他曾说过：“近7年来，几乎每星期六我都与夫人和3个儿女去卢布尔雅那中国长城饭店品尝中国菜。”据饭店老板透露，罗普非常喜欢吃炒米粉、炸鸡条、铁板鸡和炸香蕉，尤其喜欢喝酸辣汤，每次来都要喝，有时还要喝两碗。

       这里注册的华人外贸公司有十余家，经营出入口贸易，主要分布在卢布尔雅那及马里博尔（Maribor）。中国货品多由这些公司进口批发分销。不过，直接从意大利港口办理进货的费用颇高，且手续繁琐，自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后，由于科佩尔（Koper）港口通关方便快捷，费用较低，自该港向周边国家（如捷克、匈牙利等）转口中国货物的情况增多，使这里的外贸公司业务更为兴盛。

   马其顿的华人很少，在这里经商的华人只有数十人。马其顿的华商中，其中有一名浙江郭氏女商人，堪称女中豪杰。她只身到马其顿闯天下，克服了初期碰到的种种困难后，商业才渐入佳境，并在当地广结人缘。她经营的是中国商品，包括服装、鞋帽、食品及日常用品。从1997年，她接受了马其顿最大的陶瓷工厂的订单，从中国进口陶瓷粗坯。由于马其顿进口税高，而且国家的经济还是处于过渡转型期，人民的购买力低，公司的营业额不大。但她深信假以时日，马其顿经济应会好转，届时公司必大有作为。

 阿尔巴尼亚的华人有5000余人，几乎全来自浙江温州。跟欧洲其他地方的温州人一样，这里的温州人刻苦耐劳，心灵手巧，善用头脑，把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此处的华人大都没有入籍，仍然持中国护照。

       首都地拉那（Tirana）的梅德尔赛街，是华人商店较为聚集的地方，经过了20多年的苦心经营，如今已形成了一条唐人街，大红灯笼高高挂，人潮川流不息。华商经营的中国商品，种类繁多，包括服装、电器、玩具、工艺品及日用品等等，很受当地居民的欢迎，尤其是中国家电十分走俏。据国贸中心资料显示，当地人使用的电视机，很多是“中国制造”的。2005年，阿尔巴尼亚进口中国电视机达5万台，价值128万美元。中阿两国的贸易额，近年来有显著的增长。除电视机外，还有其他电器设备、纺织品和服装等。此外，由阿尔巴尼亚及希腊合资的公司从中国进口的长城牌汽车，也于2006年首次进入地拉那市场，并因品质佳、价格廉宜而受到当地人的青睐。

       在地拉那诸多华人公司中，要以长城公司（以销售服装为主）、南方公司（以销售电器为主）及东亚公司（以销售药业为主）知名度最高，都是温州人经营的，也是目前阿尔巴尼亚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尤其是长城公司的名气最为响亮。

       长城公司的老板叶小明，温州人，原是外科医生，1992年首次踏上阿尔巴尼亚国土。那时的地拉那，贫瘠落后，物资匮乏。他极可能是第一个在这里打拼的中国商人，抢得了先机，且当机立断，善用政府3年免税的优惠政策，迅速创办了长城公司，运来温州服装和鞋类，由于价廉物美，一下子占领了地拉那市场，打响了“长城”的牌子。叶小明再接再厉，严守信誉，确保产品质地优良，不断改进经营方式，扩大市场，并与官方建立良好关系，生意蒸蒸日上，终于坐上了阿国商业的龙头宝座。

       叶小明本欲乘胜追击，投资设厂，向生产领域进军。无奈1997年发生了最严重的武装动乱，致使他的设厂计划落空，亏损了数十万美元。但他没有气馁，改变经营战略，再次稳坐商界第一把交椅。2004年，叶小明转战马其顿，在首都斯科普里（Skopje）注册了“佳力”公司。不到两年，就建立了20家“中国城”连锁店，布满了首都及各大城市，他被誉为中国在马其顿“最成功的企业家”。

       阿国的中餐馆，近十多年来，开了关，关了开，始终不到十家，食客也不多，就是红火不起来。目前地拉那的中餐馆有好几家，如“天福餐厅”、“上海餐厅”、“香港餐厅”、“五一餐厅”及“北京饭馆”等，有的是中国人独资经营，有的是中阿合资，有的是本地人当老板，请中国人当主厨。

 这些地区的华人多数从商，在爱沙尼亚有两间中餐馆，两家推拿店，一家针灸院。中资机构则有中兴通讯与清华同方。中餐馆食客稀疏，可谓惨淡经营；拉脱维亚的华人则主要从事餐饮业，老板和厨师都是中国人。生意清淡，只能苦苦支撑；而立陶宛的华人也是以经营餐饮业为主，此外，还有零售服装鞋帽的商店。

其他国家的华人人口稀少，各国大都只有十户八户人家，主要是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未能形成大气候。

 当20世纪80、90年代交替间，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走向解体，前苏联加盟国纷纷宣告独立，相继走上经济转轨之路，采取私有化与市场化的措施，积极吸引外资、向外开放市场，全面放开物价，且敞开门户广纳移民。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移民浪潮涌向东欧国家，他们带来了价廉物美的中国货，充斥了市场，抑制了物价，他们也带来有限的资金，开设并经营不同类型的私营公司，这都和经济转型相吻合，推动了经济发展的步伐。

       华商是建立市场、繁荣地方经济的推动力。有些地方原本是破落的仓库或建筑，人迹罕至，但由于越来越多流动的华商，到来摆地摊，兜售中国货物，人潮逐渐多了起来。于是由仓库或陋屋改建的商店，慢慢竖立在道路的两旁，租赁给华商开店营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店林立，顾客近悦远来购物，人声鼎沸。与此同时，贸易公司出现了，而中餐业者也纷纷开馆营业，吸引不少中外食客来光顾，于是一个中国商城，或唐人街于焉成形。

       华人经商，虽赚取巨额利润，可每年也须向各国政府缴税。货物进口，须给海关纳重税；贸易公司、商店注册要付注册费；商业机构、私人企业、商店及餐馆盈利需交所得税。华商缴纳庞大的税额，给各个政府带来了巨额的收入。

       欧洲各大城市，中餐馆林立，遍地开花，吸引了中外食客上门光顾。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加上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人民的口味不一，经过了长期的发展与改良，终于形成了不同的菜系，而且中国菜的烹饪多样化，炒、煮、蒸、烤、烩、炝等，不一而足。

       因此，欧洲的中餐馆具备了不同的菜系，并在原有基础上，配合了西方人的口味而加以改变，以迎合顾客的口味，所以向来都有不少西方食客喜欢光顾中国餐馆，一饱口腹之欲，增添生活乐趣。而且较有规模的中国餐馆，具备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古色古香，装饰与布置都散发出中国文化气息，四壁挂满中国字画，在适当的地方点缀了中国艺术品，连桌椅餐具都是中国式的。一些气势宏伟的餐馆，更塑造了中国庭园式的布置，有象征式的小桥流水与亭台楼阁，姹紫嫣红，好让外国食客不仅能够大饱口福，也可品赏与领略中国文化。

       欧洲的中国移民，一向以刻苦耐劳，奉公守法，赢得了居留国政府与人民的赞誉。华人凭着拼搏奋斗的精神，不消几年，便略有成就，好些当地商人也就被比了下去，因此心生怨恨，认为华人抢了他们的饭碗，排华情绪也就潜然滋长。一有风吹草动，便以华人为发泄对象。因此，如何化戾气为祥和，增进彼此的了解，减免冲突的发生，便相当考验华人的智慧。

       近年来，华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确实需多融入当地社会，多与当地人接触，了解他们的感受，关注他们的处境，并让他们知道，华人在创业的同时，也为当地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原则，多数华人不忘回馈社会，捐助慈善事业，资助穷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并希望能藉此改善彼此的关系。此外，华人也开始自我反省与节制，避免过分奢华，炫耀财富，以免引起当地人的嫉妒与怨恨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巴尔干半岛及波罗的海国家的华人，寥寥无几。直到90年代之后，才有大批华人移民涌入，这个地区华人移民的历史短浅，只有十多二十年。华人人口也少，华社根基脆弱，大富大贵的富豪不多，人人都劳劳碌碌，糊口于四方，无暇参与社团的组织与活动，因此这里的社团组织也不多，塞尔维亚有华商总会、华人华侨联合会，都是以团结华人与争取华人权益为宗旨。还有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名思议，是个反台独、反分裂、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组织。波黑有福建同乡会，是个地缘组织。

这里的华人依然遵循传统节日，尤其是春节与中秋时节，都会准备丰盛的食物与糕饼，全家老小聚集一堂，吃喝玩乐，欢度佳节。平常的日子，华人最常用来消磨时间的休闲活动，便是搓搓麻将，或观看电视。经常收看的有中国中央电视台与香港凤凰台的节目。中国大陆与香港摄制的连续剧光碟，也很受此地华人的欢迎。

       说到延续与传承中国文化，不得不提到孔子学院的设立，以及热衷传播中医与中国武术的师傅。贝尔格莱德有一所孔子学院，是由南京师大与贝尔格莱德大学合办的，其主要任务是要发展成为汉语教学中心，由中国派出汉语教师，协助教导外国及海外华族子弟学习掌握汉语。它也是增进两国学生友好交流的平台，培养更多了解汉语的外国人，为促进两国友好发展作出贡献。除了塞尔维亚以外，类似的孔子学院也在拉脱维亚等国家设立。

       中国医术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中国医师的先驱累积了无数珍贵的经验，撰述成医书，历代相传，蔚为经典瑰宝。草药的神奇作用，尤其是针灸与推拿术，把刺针对准穴位轻轻插下去，不痛不痒，也不出血，却又能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叫外国人瞠目结舌，感到不可思议。有一名叫作胡振刚的中医师，应聘到斯洛文尼亚第二大城市马里博尔（Moribor）去行医。刚刚开始的时候，外国顾客对中医都是抱着一种好奇的态度与“试一试”的心态。但经过三几次的治疗后，颇见疗效，口碑不错，来就诊的外国人慢慢增多。有些像椎间盘突出的职业病，西医必须要开刀，但许多患者不愿意，往往就到中医诊所来求治，经过胡医师针灸以后，顽疾痊愈，就成了常客。中医因此扬名海外。

       中国武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既有百余种不同的拳术，又有短器械如刀、剑，长器械如枪、棍，双器械如双刀、双剑，以及软器械如九节鞭、三节棍等，挥舞起来，虎虎生风，又可防身健体，很受海外华人和外国人所喜爱。

       中国武术的扬名全球，还得归功于功夫巨星李小龙（Bruce Lee），提及他的身手，外国人无不竖起大拇指，脱口喊一声：“Wonderful!”（神奇）。李小龙的英雄形象，激起了他们的学习功夫热，波黑南部城市莫斯塔尔（Mostar）甚至还竖立了李小龙的铜像，以表彰其过人功绩。

       而中国的武术好手也立志要在海外设馆授徒，传扬中国武术。有一对兄妹高鸿升与高鸿萍，都是国家级的武术精英，妹妹更曾是国家队主力，担任过香港电影“八百罗汉”的女主角。后来兄妹两人到了萨拉热窝发展，先是开设了一间餐馆，广结人缘。餐馆只是个踏脚石，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在萨拉热窝开设武馆，使中国武术能在波斯尼亚发扬光大，开花结果。

  这个充满火药味的半岛，早在20年前，便有许多华人蜂拥而至，抢得先机，且充分发挥了华人的奋斗精神，终告功成利就，奠定了事业坚实的基础。倘若政府没有改弦易辙，实施对华人不利的政策，以致华人被迫离境，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华人必会再接再厉，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至于波罗的海东岸及其他地区的小国，华人人口稀少，又缺乏商机，这种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转变，加上各国政府也严控华人移民入境，创业维艰，华人要扭转劣势，实非易事。